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人類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檳榔樹冠下的層疊園圃：

現代性農業體制邊界的屏東檳榔民族誌

Multi-layered Patches Under the Areca Canopy:

An Ethnography of Betel Nut Agriculture at the Margins of Modern Agricultural Regimes in Pingtung, Taiwan.

田勗

Hsu Tien

指導教授：呂欣怡 博士

Advisor：Dr. Hsin-Yi Lu

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

June 2026

doi:10.6342/NTU202601203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檳榔園的複層時空：現代性農業體制邊界的屏東檳榔民族誌

Multi-layered Spatiotemporalities in Betel Nut Patches: An Ethnography of Betel Nut Agriculture at the Margins of Modern Agricultural Regimes in Pingtung, Taiwan.

本論文係田勗君（學號 R11125002）在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15 年 04 月 15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_____

（指導教授）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系主任：

謝誌

這本論文的完成，要感謝萬巒鄉四溝水居民無私的照顧和分享。2022 年 8 月，我帶著對 1898 年潮州民變事件的好奇心來到四溝水旅行，似乎受到了某種將人留住的力量所召喚，在這裡待了四年的田野時光。即便後來將研究的空間擴展到周邊的聚落，也暫時放下對歷史謎團的追尋、轉向當代的農業研究，緣分仍讓我和歷史事件的受難者後代家屬建立出親密的友誼，他們充實了這本論文中最重要且精彩的田野故事。因此，我首先感謝屏東平原的先民和存在於此的眾神：在祢們的守護與庇佑下，肥沃的熱帶土壤持續滋養著後世，結出豐碩的果實和故事，也賦予我難以想像的毅力，完成這本論文。

在田野中我受惠於許多人的協助。首先，感謝林玉光先生引導我進入田野，給予我許多工作與學習的機會，沒有你的協助我可能已經離開屏東；感謝英珠阿姨和偉勳大哥的接待和照顧，能有您們這樣的家人是我的福氣；感謝林祐任大哥收我做檳榔學徒，這本論文的精華來自於您多年累積的智慧和耐心，以及對我的信任。另外，能在泗溝村建立社區的社會網絡，也要感謝泗溝村的社區發展協會、福攸宮和三山國王廟前輩們的陪伴。在泗溝村之外，我還受到許多人的幫助，感謝萬巒、五溝與成德村中接受我訪問的行口、大大好檳榔攤、興農萬巒營業所、佳冬營業所。最後，我要特別感謝泉水窟的郭主任一家人，邱阿姨擅於說故事，她的生命史啟發我對家庭議題的探索。

這份論文核心的關懷是屏東平原農村中的人們在面對高度不確定的環境與社會條件中，如何與檳榔結伴生存下去。這樣的關懷無論如何都來自農村成長經歷。感謝父母在我學習以自己的語言描繪周遭世界時，放生我在竹北的農村中玩耍、任由農村環境在我心中長出生機蓬勃的宇宙，也感謝父母在家鄉農地面臨土地徵收時，帶著我參與抗爭行動。農村帶給我私密的個人記憶，以及公共參與的體驗。農村既是存有的，也是政治的。這些銘刻於身體的記憶，早已注定我會走

doi:10.6342/NTU202601203

上（或繞往）這條求學路途的命運。

我的學術養成分別受到臺大農業化學系、地理系和人類系的訓練。這本論文的撰寫仰賴三個學科的知識和社會支持。首先感謝大學時期的導師蘇南維接受我的訪問，讓我得以觀察食品化學如何捕捉並影響真實世界農民、微生物、空氣的互動，進而形成屏東獨有的風土。能在屏東和農業化學久違重逢令我感到驚喜，直到現在我才領悟科學需要走出實驗室和人類學遭逢一樣的田野；地理系是一個相當活潑且多元化的地方，我在這裡學會田野工作的基本功、寫程式、畫地圖，甚至是設計遊戲和製作捕霧網。感謝地理角角頭洪伯邑老師百忙之中抽空擔任我的口試委員，協助我在這本論文中補充地理學視角。

學習路途曲折，感謝人類系收留了我。若沒有林瑋嬪老師的熱情推銷，我應該不會進入人類所就讀。謝謝老師在我摸索自我時，發覺和欣賞我的潛能，並持續在課堂和口試階段啟發我發揮的空間。謝謝欣怡老師陪伴我渡過研究所，因為有老師耐心的聆聽、解惑和恰如其分的日常關心，我得以順從自己的步調，不疾不徐地完成碩士論文、探索學術內與外的可能性；也因為有老師持續的鼓勵和提點，我才有勇氣完成這本論文，分享給潛在的讀者。感謝童元昭老師引導我認識屏東，大學修老師的課最大的收穫是解殖：不只是社會的，也是研究發問方式的解殖。感謝機緣安排，我有幸接受瑪玲老師全套的考古學訓練，倘若我的論文能展現出嚴謹中帶有溫情的特質，有部分要歸功於瑪玲老師的教導。另外，感謝人類系和地理系的學習夥伴，一直到獨立撰寫論文的階段，我才知道自己多麼依賴他人的共作。首先是陪伴我開車深入臺灣各地田野工作、時常開會到凌晨的家漢、柏諺、宏祐、馥依；研究所階段，感謝人類系上與我交換田野發現和心情的好友騫翮、各自努力但默默關照彼此的 R11 同學，以及到場聆聽口試、協助整理筆記和善後的朋友。另外，我也要特別感謝 112-1、113-1、114-1 文化人類學、113-2 文化人類學丙的修課同學。這些年助教課與大學部同學間的分享和討論，推進了這本論文的完成，也滋養了我個人的成長。

doi:10.6342/NTU202601203

就讀研究所的這段時間，我總是吃得很飽、睡得很熟，算是個身心平安又健康的研究生。這要感謝許多學校之外的支持網絡。首先是康豹王爺、師門的學長姐和近史所的行政同仁。菩薩保佑，讓我能遇到大家。雖然我還沒有如王爺期待地轉宗成歷史學家，但我未來一定會帶著這段時間的史學訓練和眾人的好意，快樂地生活；研究所的生活圈常讓人陷入孤獨的險境，感謝賴冠妘、徐辰瑋、陳怡儒、寶妮、林亭妤和張語倢純粹真摯的友誼，希望受苦的人們也可以遇到像你們這樣的朋友；感謝表妹王承妍提供我在臺北的生活據點和兩年左右的日常照應；最後，感謝伴侶阿容的陪伴和情緒支持。我們因為人類學相識、因為馬陵諾斯基變成伴侶，這是我在人類學之路上最珍貴的收穫。雖然和你比賽瑪利歐賽車沒贏過幾場，還是感謝你給我充實的信心。

這本論文曾接受兩個單位的補助，分別是 2024 年中研院民族所的合作培訓計畫之田野可行性調查補助，以及 2024-2025 年中研院客家文化研究計畫。這兩個計畫不僅提供論文田野工作的部分支出，也讓我能透過成果報告工作坊接受許多師長的指導。其中特別感謝林文玲老師、容邵武老師、王乃雯老師、黃雯娟老師、葉守禮老師，以及客家文化發展中心戴正倫、邱秀英等人在工作坊中的建議與鼓勵。

doi:10.6342/NTU202601203

摘要

檳榔是臺灣經濟起飛的黃金年代中崛起的消費品，並且在 1970 年代水稻沒落後成為屏東平原主要的作物之一。然而，由於公衛和環保爭議，檳榔長年未被國家納入正規農產品，進而擁有著和主流作物截然不同的農業生命史。本研究以屏東的客家農村為田野場域，觀察檳榔產銷體系如何透過靈活的交易網絡，流通農政體系標準化工程之外的檳榔果實；接著進一步探討檳榔園圃如何與屏東平原的熱帶環境、城鄉關係與全球供應鏈相互交織，發展出適合當前處境的家庭型態與物種混作的共生關係。

藉由這本屏東檳榔農業的民族誌，我希望指出：即便檳榔被排除於現代性農業體制之外，缺乏農業輔導、育種改良與正式運銷體系的支持，卻允許相當多元且開放的農業體系，使不同經濟規模與勞動條件的從業人，以及無論是物種種類或個體性狀都具有多樣性的植物，得以共存於檳榔園圃之中。這樣多元的園圃世界，一方面凸顯出臺灣「小農」難以被清楚界定的一面，也展現了小尺度園圃在面對農業市場轉移、氣候變遷等多重風險時所具有的韌性。

關鍵字：屏東平原、檳榔、多物種、家庭農場、台灣小農經濟、農產運銷

doi:10.6342/NTU202601203

Abstract

Betel nut emerged as a major consumer commod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and became one of the major crops of the Pingtung Plain following the decline of rice cultivation in the 1970s. However, due to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public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s, betel nut has long remained outside the category of officially recogniz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giving rise to an agricultural trajectory marked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mainstream crops. Based on ethnographic fieldwork conducted in Hakka villages in Pingtung,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he betel nut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system circulates areca fruits beyond the standardized framework of state agricultural administration through flexible trading networks. It further explores how betel nut gardens have become intertwined with the tropical environment of the Pingtung Plain, rural–urban relations, and global supply chains, thereby fostering distinctive family arrangements and multispecies forms of symbiosis adapted to contemporary circumstances.

Through this ethnography of betel nut agriculture in Pingtung, I argue that although betel nut has been excluded from the institutions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lacks the support o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ervices, breeding programs, and formal marketing systems, this marginal position has nevertheless allowed for a remarkably diverse and open agricultural system. Such a system enables cultivators operating under different economic scales and labor conditions, as well as plants characterized by diverse species compositions and individual traits, to coexist within the same garden landscape. This plural world of betel nut gardens not only highlights the difficulty of clearly defining

doi:10.6342/NTU202601203

“peasant” in Taiwan,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e resilience of small-scale gardens in the face of multiple risks, including shifts in agricultural markets and climate change.

Keywords: Pingtung Plain; betel nut; multispecies; family farming; peasant economy in Taiwan; agricultural marketing

doi:10.6342/NTU202601203

目次

謝誌……i

摘要……iv

Abstract……v

目次……vii

圖次、表次……x

第一章　導言：危殆時代裡的檳榔多樣性……2

一、　現代國家治理的精簡化（simplification）與失敗……8

二、　治理的多重權力起源……13

三、　不受照護的生命……16

四、　家庭農場：對話臺灣農業與漢人社會研究……21

五、　田野方法與空間簡介：熱帶沖積扇裡的肥沃園圃……24

六、　章節導覽……30

第二章 檳榔樹與檳榔公衛論述的蔓延……32

一、　檳榔樹的擴張與稻作萎縮後的重生……33

二、　從「治病」到「致病」的檳榔……38

三、　從「南方」的他者到「流行疾病」的他者……44

四、　台塑：檳榔論述的企業隱線……50

五、　受到監護的人類身體和脫離監護的檳榔……56

六、　結語……61

第一部 農政之外……63

第三章 改良場之外的田間作業與時間韻律……64

doi:10.6342/NTU202601203

一、 未標準化的田間作業 65
二、 時間與育種 82
三、 結論：放慢的演化時間 97
第四章 江湖：正式市場外的檳榔交易 101
一、 現代農產運銷體系的人與物 103
二、 如何思考繞開市場制度的檳榔？ 107
三、 屏東檳榔交易現場 113
四、 結語：檳榔交易對農產運銷的意義 137
第二部 檳榔樹冠下的世界 141
第五章 檳榔樹的多物種夥伴 142
一、 棕櫚科植物的多元混植習性 142
二、 從外銷市場淡出的香蕉 144
三、 新興作物的落地 152
四、 底層植被 159
五、 結語 166
第六章 檳榔園裡的家庭與老後餘生 168
一、 檳榔園與豪宅並存的農村地景 170
二、 女人與檳榔 175
三、 男人與檳榔 184
四、 另類的家：失婚者與檳榔 191
五、 結語：檳榔園裡的人如何安老？ 199
第七章 結語：開放的多樣性 202
參考資料 209

doi:10.6342/NTU202601203



doi:10.6342/NTU202601203

圖次、表次

圖 1　田野場域地圖.....26
圖 2 「大肚期」的檳榔樹。可以看見隆起的葉鞘，像是懷孕的女性身軀。.....68
圖 3 資材行透過相機記錄、蒐集農民田間的各種檳榔樹的疾病和生長變異.....71
圖 4　不同鄉鎮資材行提供給農民的肥培管理指南.....72
圖 5 臺灣檳榔產季表.....85
圖 6（左圖）檳榔樹羽狀複葉的葉鞘脫落後的環紋.....89
圖 7（右圖）檳榔果串剛割下來在節上留下的傷口.....89
圖 8、圖 9、圖 10 三棵同齡的檳榔樹.....91
圖 11（左圖） 宛如捧花的花穗.....93
圖 12（右圖）長在花穗末端的鬚仔籽.....93
圖 13　被選育的檳榔果實，經成熟呈黃色，需要曝曬成黑色狀態後進行育苗。.....95
圖 14 勝堃在家屋門口屋簷下的保麗龍箱裡育苗，接著再種植到芒果樹下。.....96
圖 15 發布於公開社團的檳榔價格資訊.....117
圖 16 從左至右為正子、尖仔、小顆.....117
圖 17（左圖）行口仔細挑選檳榔農的檳榔，檳榔農則在旁緊盯.....121
圖 18（右圖） 檳榔農離開時立刻確認收據，避免自己吃虧.....121
圖 19 六月的交易現場.....124
圖 20　師傅利用自己專屬的剖白刀對切檳榔果實，確認分級.....127
圖 21　剖開的檳榔。纖維泛紅（上）屬於紅肉，纖維嫩白（下）則屬於白肉。.....127
圖 22 運轉中的圓形分級機.....131
圖 23 出貨給不同對象的標籤.....134
圖 24（左圖） 結於花穗末端「鬚仔籽」（xi ´ e ` zii ` ）.....139
圖 25（右圖）：剖開果實後水分乾燥的哈噠籽.....139
圖 26 2024 年山陀兒颱風後的香蕉園.....151
圖 27　檳榔樹下的大菜.....166
圖 28（左圖）　獻章家的檳榔園圃.....187
圖 29（右圖）　砂質土壤上的荔枝樹.....187
圖 30　放在檳榔園中塑造有人在工寮的腳踏車.....188

doi:10.6342/NTU202601203

圖表 1　近五年一月份日溫差平均（統計期間 2022-2026）。 29
圖表 2　每月平均降雨日數（統計期間 2014-2023） 30
圖表 3　檳榔種植面積統計（1966-2023） 34

doi:10.6342/NTU202601203

阿婆匍等背囊（阿婆駝著背）
定定行近來（慢慢走近來）
佢每日都會來遶園仔 （她每日都會來巡園子）
講心事分聽（講心事給我聽）

佢講佢賴仔妹仔盡會讀書（她說她兒子女兒很會讀書）
長年待佇美國摎日本（長年待在美國和日本）
老公早早沒忒自家一儕過日（老公早早過世自己一人過日子）
已經十過年（已經十幾年）

後生時節佢體力好（年輕時她體力好）
耕田種菜還愛做裁縫（耕田種菜還要做裁縫）
一家人就耕這坵田（一家人就耕這坵田）
辛苦行過來（辛苦走過來）

這下老了沒路用（現在老了沒用處）
沒力垓擔做粗事（沒力挑擔做粗活）
好在菁仔還有價（所幸檳榔還有價）
加減收成有飯吃（加減收成有飯錢）

等毋驚風毋驚雨（我們不怕風、不怕雨）
自家會長大（自己會長大）
分阿婆有衫著有飯食（讓阿婆有衣穿、有飯吃）

等毋驚風毋驚雨（我們不怕風、不怕雨）
自家會長大（自己會長大）
同阿婆手掌等這塊地（和阿婆守護這塊地）

——山狗大後生樂團〈檳榔的獨白〉[1]

[1] 本歌曲原文為客語，作詞人與華語譯者是顏志文。

doi:10.6342/NTU202601203

第一章　導言：危殆時代裡的檳榔多樣性

若從天空俯瞰屏東平原，或是行經臺灣鐵路屏東線高架路段，很容易注意到縝密的檳榔樹冠。檳榔在 1980 年代迅速取代稻作，成為屏東縣面積最大的農作物，不只遠超過稻作，甚至佔據了果品作物的三分之一[2]。臺灣媒體從天空拍攝檳榔樹填滿臺灣農地與山坡的影像，它被視作如怪物一般的存在，四處蔓延。伴隨著檳榔蔓延的還有檳榔有害的論述，近三十年來檳榔坡地栽培面積、不同群體食用檳榔與口腔癌的統計資料迅速增生，水土保持和衛生專家不約而同地認為檳榔是造成國家滅亡的潛在危機，國家也跟隨制定許多目的在消滅檳榔的政策。

檳榔的政策反映出許多上世紀現代化治理的特徵：透過綜觀全局的統計資料掌握國土的生產活動、國民的身體，制定改善計畫，提升國民的健康和土地的生產力。和許多戰後臺灣的政策和計畫目標一樣，這些圍繞檳榔的政策不單是要讓檳榔變成可見的一組數據，也是現代性意識形態的一環：統治菁英認為改善了國民食用檳榔的習慣和降低種植面積，就是一種進步，也是成為現代國家的象徵。

但是，當前各種危機都顯示出現代化造成的糟糕後果，而非全人類共同的進步與安定承諾。人類的工業活動已經對生態地景帶來長距離的破壞，特別是氣候變遷正逐漸失控，全球農業環境遭遇頻繁的乾旱，以及突發的短時強降雨、極端高溫，以及在溫暖的氣候下快速繁衍的病蟲害問題，不只讓經濟作物產量與品質難以預料，甚至可以在短時間內摧毀整個園圃。除了環境危機，發生在個人身上的危機以全球的政治經濟為尺度，隨著跨國供應鏈的移動、本世紀不斷重演的全球與區域經濟危機，以及新自由主義下不斷退縮的福利制度，讓典型勞動生活條件充滿不確定性；就算能找到穩定又規律的營生方式，在社會保險逐漸萎縮的條件下，養老、育兒的社會安全功能逐漸從國家脫手，落到個人與家戶身上，疾病

[2] 以 2023 年農糧署統計為例，屏東縣果品作物栽培面積為 31,554 公頃，光是檳榔就占 10,373 公頃，占比超過三成。

doi:10.6342/NTU202601203

和照護成為許多家庭不可預測的危機。

那麼，我們可以怎麼做？要如何對眼下的世界抱持希望？放眼望去，無論是災難或希望的尺度對於我們來說都相當巨大，例如「人類世」這個概念透過整個行星為尺度，敘述同一性的敘事，以人類改變地球環境為軸，發想未來的危機與希望（Tsing, et al. 2019），最為人熟知的是工業活動造成的碳排放和氣溫上升，需要透過國際減碳政策與協定緩解危機。在這些災難和計劃的尺度面前，以地方社群為尺度的生活經驗和知識變得不太重要，也不夠有效率。

然而，以普同的單位衡量地球的災難與改善計畫，就如同上世紀各種現代化計畫一般，從帝國的俯瞰視角把真實世界的實作和異質的價值排除在視線範圍外，最終造成希望的落空。同樣的，以星球為尺度的人類世地景並非均質，不僅有許多脫離計畫軌道的叉路，不同社群所受到的影響也不一。比起對地球現況尋找單一的解答，靈活且難以複製的在地實踐仍是回應危機與變遷的重要線索。

這本論文亦想從屏東檳榔農業的多樣性，挑戰檳榔樹冠之上的俯瞰視角。包含空拍的影像、作物栽培面積、口腔癌人口的統計，都是一種綜觀全局的俯瞰視角。當我們離開這些由上而下的視角，實際走進屏東的檳榔園中，看到的是生機蓬勃且多層生命相互依存的熱帶地景。看似單一且充滿侵略性的檳榔樹，卻提供了無數物種與人類的庇蔭之處。檳榔雖從來不在農業推廣與研究的清單上，也處在主流商品市場的邊緣，卻允許了多樣性的蔓生。而這樣的多樣性對於正遭遇失序的當代情境來說，深具啟發性。

為了描述檳榔的多樣性農業，我首先想到了「貓燈咖啡」那家人，這個例子雖和檳榔無關，卻映照出屏東在台灣工業化以來處於邊陲的發展路徑下，多樣性生存策略的重要性。

「貓燈咖啡」是屏東平原中部鄉鎮中，唯一在晚間六點開店，午夜打烊的咖啡廳。田野工作期間，每天都經過這條交通要道，卻沒有發現它的存在，相信來往的過路人都不容易發現咖啡廳，因為外面的招牌掛了「英語補習班」。

doi:10.6342/NTU202601203

屋主劉哥是英語系畢業，早年曾經營金香工廠，後來金香產業外移東南亞，他轉行在潮州的透天厝開英語補習班，前幾年決定退休收掉補習班（但招牌還沒撤除）。退休後並沒有閒下來，他利用原有的英語專業，兼差作外國遊客導遊。太太光姊以前擔任補習班櫃台，為了找到一個適合在屏東營生的工作，退休之後的她考取了照顧服務員證照，還兼任紫微斗數老師，原本英語補習班計畫翻新成為長照中心，劉哥夫婦發現臺灣長照法規並不成熟，改變心意開一家咖啡廳。他的兒子和兒媳婦留在屏東，透過線上平台幫人接案作設計，補習班能夠蛻變成氣氛嬉皮的咖啡廳，就是經過兩夫妻的設計巧手。

咖啡廳吧檯擺放不同兼差職業的名片。一家四口白天有不同的主要工作，夜晚開張的咖啡廳，是全家人共同的副業。平日晚上全家人都還有零星的活動，大家輪番顧店、顧小孩。貓燈咖啡的家庭正經歷生命史的轉換：劉哥和光姊屆齡退休年齡、子女剛成家、新的成員誕生，每個人都有了新的角色。多元的營生管道與深夜咖啡廳的時間、勞動力搭配良好，也有比較穩定的收益，逐漸成為家庭共同的生活步調。他們可以比都市家庭花更多心力和時間照顧彼此，老的能夠安老，小孩的能夠在家人圍繞的環境中長大。光姊告訴我「我們家喜歡學一點技能，才不怕找不到工作，失業也可以趕快換工作。而且一定要這樣（尋找多元營生機會），不然只能去高雄上班。如果我們全家都在高雄發展，孫子就沒辦法給我們照顧。」

我在屏東農業家戶中經常收集到類似貓燈咖啡一家人的經驗：有的檳榔農是高雄市國中教師兼農，有檳榔農身兼高雄工業區的化工廠專員和屏東市火鍋店長；還有一位在鄉村顧檳榔攤的婦女，香蕉價格高的時候，她就變身成市區香蕉貨車的業者。我鮮少遇到領取農民保險的專業農，通常一個人會有一個以上的職業和身分、一個家戶會有不同的居住地、一畝田會有至少兩種的農作物，一種農作物會有好幾個的品種…。用當代的流行用語來說，屏東的日常生活相當「斜槓」，挑戰了許多我們對於當代台灣農村的印象。首先，農業並不一定都把人固著在同一個居住地和固定的田地，可能在特定的安排下支持人的移動；更重要的是，相

doi:10.6342/NTU202601203

比於臺灣其他農村發生的離農與人口空洞化，我的報導人不斷改造家屋與農地上的生計，發展出跨城鄉、跨世代的生活節奏，這種彈性的生活方式在應對變遷時相當靈活，無論是家戶生命史的更迭抑或是國家展業結構的轉移。

屏東農業的跨物種多樣性還與熱帶環境息息相關。即便屏東是臺灣工業化歷程中的邊陲，熱帶氣候的自然和歷史條件為這些屏東平原家戶帶來了獨家機會，他們在農地上栽培的物種選擇遠比台灣各地都還要豐富，即便屏東農戶和臺灣各地的家庭農場一樣，僅握有零碎化的農地，卻可以在一公頃以下的土地交錯種植檳榔、咖啡、黃金果、可可、酪梨等作物。報導人樂此不疲地和我分享他們在農地裡「試」了新作終於結果的喜悅。這些農戶經常走在農業試驗機構前，搶先試驗新物種。園圃作物的多樣性嘗試，不僅可以和家庭生命階段搭配，還可以降低作物因氣候與市場所帶來的不確定性。

圍繞著這些故事，我發現檳榔是屏東平原農村生活和農業生產活動多樣性的重要來源。在我所見的園藝作物中，檳榔比起大部分的作物更能夠克服差異而允許多樣性的存在，它巧妙地和其他作物的生理需求、家戶的生活型態搭配，支持了穿梭於城鄉之間的生活方式，又或是「小規模栽培、多方嘗試」的園圃運作。

檳榔克服差異的能力最主要來自於它的生物特性：檳榔和它同科的棕櫚科植物對生長條件適應力極佳，能夠在不同的土質和鹽分環境中存活下來，還可以在遭遇極端天氣事件時轉變莖頂生長點的細胞分裂速度，渡過不安定的時刻，因此檳榔不僅能適應園圃內外的環境變動，也允許和不同生長條件的作物共同生活在一起。再者，棕櫚科植物和一般的木本植物不同，它缺少了巨大的樹冠，取而代之的是集於頂部的複葉，大部分的陽光和水分透過複葉的縫隙掉落林下空間，為許多植物提供溫煦、潮濕的宜居空間。而以生產活動來說，檳榔栽培所需的勞動力遠低於其他果樹，農戶可以將勞動時間分散給其餘的林下作物，甚至是非農職業。以上種種特質都讓檳榔農戶可以在當代社會各種不可預測的情境下做出靈活的回應。

doi:10.6342/NTU202601203

檳榔多樣性還不僅止於園圃中的人和作物，缺乏農政單位介入的檳榔育種、栽培、時間性到交易關係都挑戰了現代化農業的一致性。和一般木本植物不同，檳榔缺少了形成層而不容易進行營養繁殖，生命週期又長，是個不容易將特定表現型（收成時間、符合市場需求的外觀）挑選出來規模化栽培的物種。檳榔農需要對每一棵檳榔樹進行長時段的觀察才能判斷檳榔樹的潛力，甚至影響檳榔樹的生理時間。接著，深刻表現農人與檳榔樹互動歷史的檳榔果實，再透過熟識的交易網絡流向規模不一的交易鏈，檳榔的交易鏈挑戰了經濟學中自由市場的種種預設：市場的運作並非仰賴自由個體間的交易，而是因時、因地、因人制宜的分級制度，交易資訊不完全透明，形式也和公平交易相差甚遠，卻比大部分國家規制的農產交易管道還要穩固且安全。

檳榔林下多樣化的生計活動、在城市與鄉村來回移動的家戶，還有掉落在國家管制外的自主交易活動，都讓我想起了政治學者 James Scott 筆下的贊米亞（Zomia）（2018[2009]）。贊米亞是處在東南亞國家邊境上身分不明朗且流動的社群，有策略地選擇居住空間、社會組織型態和種植作物，讓國家不容易辨識他們的身分與生產價值，這種「無國家空間」處在低地國家的相對位置，讓逃離至此的居民能閃避國家的控制。低地國家中心當然渴望將高地社會納入行政體系中，卻難以摸透他們變動且靈活的特質，總是將其視作未開化、等待被納入國家行政體系的歷史殘餘。

同樣地，臺灣政府在 1990 年代以來嘗試透過一系列檳榔危害防制措施，將栽培檳榔的土地、社群（包含農民、中間商與零售商）納入國家的行政網絡中，並且有計畫地控制檳榔的蔓延。但是在這本論文中的許多故事將指出，對比於檳榔樹本身和檳榔園圃上「棕櫚科植物式」的靈活，現代國家對人與物的分類，以及政策的執行方式顯得僵化而難以貼近從業人經驗，導致檳榔政策大多以失敗收場。

然而，在爬梳檳榔政策史的過程中，我逐漸領悟到，檳榔農業所展現出的多

doi:10.6342/NTU202601203

樣性與社群韌性，並非源自某種刻意逃離國家治理與市場運作的「無國家空間」，而是那些反覆失敗又重起的檳榔政策留下了效應。此一過程呈現出一個相當矛盾、甚至反其道而行的現象：權力的介入的歷史和形式，反而成為檳榔農業與其經濟多樣性能以延續的條件。

要理解檳榔政策如何不斷生成又走向失敗，除了要考察國家政策與真實世界之間的落差外，有必要回溯那些推進政策的檳榔論述如何導向特定的治理樣態。日治時期以來，新聞和官方檔案就可以看見政府因都市美觀的因素管理人民檳榔食用的習慣；但到了 1970 年代臺灣經濟和都市迅速成長的年代，檳榔問題超越了都市景觀的課題，關於人體、環境危害的論述快速增長，檳榔的食用者被流行病學分類成病理化的成癮者、栽培檳榔的土地災害也跟著受到矚目。世紀末國家對檳榔的態度從消極轉為積極，除了建置各種關於檳榔農業、食用人口的調查與統計資料外，行政院下轄的農業、公衛與教育部門還推動跨部門的管理計畫，以回應不斷累積的社會輿論。跨部門的合作，順利地讓檳榔穿透了政府部門和不同的專業領域，成為醫療、環境、教育部門的問題，卻取消了它作為農作物／農產品的正當性。結果是：農政單位的技術輔導、育種工程和農產品交易的規範都失去了介入的正當性，意外地讓檳榔農業更加逍遙於正式化的國家治理體系，允許其發展出異於現代性農業的物種生命樣態與經濟活動。

另外，爬梳臺灣檳榔產區的農業史會發現，當前所見的檳榔園圃年紀和檳榔論述增加的年代相近，大多是 1970 年代逐漸擴張而來，這些園圃曾經是全球供應鏈中失去競爭力的稻田，以及因蟲害侵襲而沒落的丘陵果園。當現代性農業地景走向衰退，檳榔取代了這些物種成為農民維生的手段。在接下來的時代，農民還會在檳榔樹下栽培其它市場作物，尋找新機會的同時，也減緩小農在面對跨地理尺度農業市場的不安。也就是說，檳榔面積的擴張，反映了現代性農業的失敗與困境，以及農民從中求生的創造力。

整體而言，檳榔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曖昧處境，以及它從失敗的現代性農業

doi:10.6342/NTU202601203

地景上長出的歷程，共同說明了檳榔從沒有外在於園圃之外的社會脈動和以進步為名的計畫，同時也說明，檳榔農業多樣性的存在，不只來自它本身的生物特質，更來自多層權力運作的效應，包含：在特定社會氛圍中形成的檳榔負面論述與相應的管理措施、現代性國家治理計畫和全球供應鏈交互作用下的矛盾、縫隙，以及廢墟。

這本論文的撰寫核心，是圍繞在屏東檳榔農業相當活潑卻又鮮少受關注的多樣性。但是為了避免將多樣性從歷史和社會脈絡抽離而導向一種美好的烏托邦想像，本文嘗試將檳榔農業的多樣性放置在歷時性的政治經濟脈絡中。在此一關懷下，我首先援引 James Scott 與 Michel Foucault 兩種對現代國家與權力運作的分析路徑，將檳榔置於臺灣現代性經驗所形構的權力關係脈絡中，藉此解析國家在檳榔產業中看似積極作為卻始終失敗、既在場卻又缺席的矛盾狀態。接著，我回溯較晚近的民族誌，這些研究修正，甚至另闢蹊徑地回應 Scott 與 Foucault 所開展的國家與權力觀念，轉而關注國家發展計畫、跨國資本主義等多重力量如何生成超出單一國家權力配置的關係與地景，並在其中牽動人與非人交纏的命運。這些根植於具體經驗的理論洞見，提供我理解檳榔如何自現代性農業體系中蔓生、卻又與之保持距離，亦使我得以更細緻地安放檳榔與國家、資本體系之間彼此辯證、互為條件的歷史。

一、現代國家治理的精簡化（simplification）與失敗

1997 年以來，台灣政府花費大量資源制定了一系列檳榔危害防制的政策，政策目的聚焦於檳榔食用人口和檳榔栽培面積的控制。多年下來，即便檳榔食用的人口和栽培面積都有下滑趨勢，但大多沒有達成原本設定的目標而以失敗收場，導致行政部門的檳榔政策經常為民間遊說團體與監督部門所詬病。我認為，James Scott 對於現代國家治理計畫的批判和預言，能相當程度地捕捉到檳榔與國家之

doi:10.6342/NTU202601203

間長久以來的對抗關係，也能部分解釋政府的檳榔政策不斷失敗的原因。

（一）精簡化的行政知識

首先，James Scott（2023[1998]）指出了國家能夠進行統治，仰賴的是一種綜觀全局的視野：無論是前現代國家或 20 世紀的現代國家都會為了執行傳統的功能，如稅收、徵兵、避免叛亂，必須讓複雜的社會和自然環境變得更容易辨識（legible），方便國家掌握資源並加以改造。

若要讓國家領土所及的社會和自然變得可辨識，需要透過各種舉措如標準化的測量單位、運算工具、表格將真實世界進行一定程度的精簡化（simplification），將人、物與空間納入統一的行政網絡之中。Scott 列舉了各種國家精簡化的社會工程，舉凡固定的姓氏系統、單位的標準化、地籍測量與戶口登記、統一的法律條文、統計資料建置等，都是國家為了排除在地壟斷資訊的能力，嘗試打造一種由上而下的透明性（ibid.:155）。以地籍圖的測量為例：每個社會都存在因地制宜的地權型態，卻是國家難以掌握的秩序，於是國家在司法和警察機關的協助下，將複雜的土地所有權簡化為個人的終身所有權。土地有了對應於法律上的主體，可以使用、繼承和販售，同時也就可以納稅。而地方上原有的所有權樣貌如共有制和形狀參差的土地，都被地政機構化約為統一化的表格資料，轉化成土地面積、土壤等級、種植作物以及預定的產量等。地籍圖的測量精確地呈現出國家精簡化工程的邏輯：首先，國家對人、土地、資源的繪製（mapping）僅鎖定特定的、對國家而言有實際效益的目標，同時去除複雜的變異和地方上彈性的生活方式，將現象編排在標準化的概要圖上，成為官僚從遠距離的辦公桌上可閱讀、執行行政處分的內容。

Scott 指出，即便國家的精簡化工程亟欲打造標準化且靜態的系統，但是這樣的企圖心總是難以水到渠成地實現，其中一個原因是行政人員所紀錄的精簡化

doi:10.6342/NTU202601203

資訊勢必也充滿了錯誤、省略、有缺陷的合計，而偏移了國家想要掌握的現象；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在於國家統治計畫與人民真實生活經驗知識的落差，Scott 將那些曖昧不明、無常規可依循的在地化知識稱作「梅蒂斯」（Métis），梅蒂斯泛指社會中成員原有一系列根據經驗而發展出來的知識形式，這些知識包含了人類對環境中動植物關係的覺察與協調、和人交涉的技巧，也涉及較微觀的身體技藝如運動或舞蹈，裡頭會夾雜著各種感覺和竅門，在面對複雜且充滿變化的實際狀況諸如社會關係的變動、氣候的變化等依照情境、關係做出因地制宜的反應。雖然這些知識可能遭受壟斷、通常難以明文化成標準的制度，卻具有多元的韌性和創造力。

（二）20 世紀的現代性農業

在所有的國家的精簡化工程中，農業是貫穿 Scott 論點的核心。對統治者和政策規畫者來說，農業涉及了國家從領土獲得的稅收、糧食資源，以及人民定居的形式，所以農業制度既是對自然環境的改造和經營，也是對社會的控制手段。不意外的是國家會特別專注於人民農業活動的改造/改善，偏好單一化作物的栽培，讓土地的運用和人民的居住型態都更加可控；與此同時，農業生計也是身處在帝國邊緣的社群的抵抗的形式，如東南亞高地的社群採取 Scott 稱為「逃避型農業」的游耕來逃離國家的視線與掌控。游耕不同於定耕的水稻，它的空間範圍相當分散、物種多樣，種植的人也會隨著季節等因素更換居住空間，這對於國家財政來說難以監督也不容易課稅。

但是，Scott 指出，原本遍布各地的多樣性農業正在上世紀現代性的農業計畫中快速消失，無論是東南亞的逃避型農業，抑或是各地家庭農場靈活的生計策略都在上世紀走向消逝。Scott 認為這個轉變除了涉及國家治理工具的變革外，最主要的因素是戰後國家治理目的與其背後意識形態的轉變：隨著西歐北美的工

doi:10.6342/NTU202601203

業資本主義生產的和戰爭的動員實驗所發展出來的科學知識和治理技術，為國家精簡化提供了一種進步的意識形態，Scott 稱之為「高度現代主義」（high-modernism），這其中包含科學與技術知識的發展、人類需求的成長，以及最重要的，相信能透過管理社會秩序的理性化設計來改善全體社會成員的生活品質。

此時，國家不再只渴望描述它感興趣的社會，而是要透過各種龐大、雄偉的改革計畫以及行政命令，將國民和自然環境納入一套簡單標準的、可清楚識別的網絡之中。其中，大型的農業計畫以綠色革命之名，隨著戰後美國現代化發展模型的輸出，並且藉由新興獨立國家的統治菁英之手，散播到經歷完戰爭、相當脆弱且亟欲重建的公民社會中，包含拉丁美洲，還有臺灣在內的反共亞洲盟友。

現代主義農業以集體農場與種植園體系為典型，主要特徵包括定耕、單作、機械化、單一化品系與高度資本密集。單一化的生產模式推動了農業前所未有的標準化，使作物的一致性成為提升生產效率與擴大市場獲利的關鍵條件。為了在大規模市場中極大化利潤，農民必須提高土地的種植密度，並施用高濃度肥料以提升產量。同時，龐大的超市供應鏈也對作物提出了嚴格的標準化要求，例如在運送、包裝與展示過程中，必須符合大小、形狀與色澤等外觀的一致性，進一步促使農地集中生產少數符合市場需求的品種，套用臺灣農產交易的語言，也就是蔬果分級制度。

此外，農業一致性不僅體現在作物外觀與品種的單一性，也延伸到生產時間的統一化。透過選擇生長週期相近的作物與同步收成時間，可讓農業機械順利操作，提升收成效率。因此不意外的是，作物育種技術幾乎與農業機械化同步發展，透過基因的選擇增加作物的一致性，進而簡化田野景觀，使機器得以在作物種類、果實成熟時間一致的平坦農地上高效運作。

Scott 不斷指出，包含工業型農業在內的大型現代化計畫，挾帶著對現代主義的高度信心、貶低了各種深植於在地的傳統社會關係與生態知識，因而缺乏多樣性所具有的韌性，最終導致悲慘的結局。例如，精簡化的農業導致基因的單一

doi:10.6342/NTU202601203

化，而使作物對病原體變得極為脆弱。若田地中僅種植基因高度相似的單一作物，一旦面對疾病侵襲便可能全軍覆沒。相較之下，若農地上種植的是具有多樣基因組合的地方品種，即使同屬一種作物，仍能因其基因差異而降低整體風險，增強對疾病的抵抗力。

Scott 描繪出國家的精簡化措施與社會之間的拉扯，深刻地反映在我所觀察到的現象之中：國家多年來不斷嘗試透過統計數字、專案登記來掌握臺灣各地的檳榔種植與銷售情形，這些措施除了用以精確地對從業人收稅和處罰外，更希望能引導農民與商品鏈的從業者轉換經濟活動。但由於國家掌握的知識是抽象的統計資料，對於檳榔園圃的多樣性生計與高度靈活的商品鏈缺乏認識，總嘗試將複雜的農業耕作與經濟活動轉化為「容易辨識且行政上方便的格式」，不僅造成計畫的反覆失敗，也忽略了檳榔所串連起極其複雜的生態與社會關係，其實是檳榔商品鏈上的社群面對各種環境與經濟風險的策略。

然而，如此多樣又靈活的屏東檳榔農業卻挑戰了 Scott 所描繪的現代主義農業型態。檳榔栽培以小農經營為主，缺乏單一化的物種秩序，園圃亦常呈現多作物混作的型態，更遑論機械化的採收方式。若依循著 Scott 的分析邏輯，或許容易誤以為屏東檳榔農業因缺乏現代國家與大型農業計畫的介入，而保有其自主性；又或者認為國家的農業精簡化工程僅鎖定具有經濟價值的作物，因而將檳榔排除在外。然而，這兩種解釋皆不足以成立。

首先，屏東的檳榔園圃和臺灣所有的農地一樣，雖然沒有走向種植園的形式，卻經歷了現代化農業政策的土地改革，也曾配合國家糧食市場政策栽培品系單一化的稻作，顯示其並未脫離現代主義農業的歷史浪潮。再者，檳榔的產值長期居高不下，曾多年位居臺灣農業產值第二，僅次於稻作。以經濟價值而言顯然並非國家農業體系中可被忽略的低價值作物。即便如此，檳榔農業仍長期處於國家農業治理結構的疆界上，缺乏農政體系的制度性介入。

不過，國家也並非完全缺席於檳榔的治理之中，相關管理政策與措施存在，

doi:10.6342/NTU202601203

食用檳榔的人、栽培檳榔的土地變成國家可見的書面格式，並且延伸出一系列的管理計畫，只是這些介入不是將檳榔納入與其他經濟作物一致的治理秩序，而是創造其在農業行政上的例外性。國家要改善的是吃檳榔的國民身體，而不是檳榔樹的身體。Scott 沒有辦法回答的問題是：除了經濟利益的考量之外，國家的精簡化工程究竟是在何種歷史與社會條件下發展成形、產生了甚麼效應？如何鎖定特定的治理目標？檳榔又是在什麼樣的社會脈絡中被國家所「看見」，進而被構框為某一特定範疇的治理對象，或反之，被排除於既有治理範疇之外？這些問題反映了 Scott 理論的限制：他將國家視為權力的單一來源，作為一種騰空（up there）於社會之上，有著統一且內在一致的實體，能夠設計出連貫的政策計劃並擴散到領土的各個角落、控制不守規定的人民與自然環境，但是國家的權力部屬其實都是相當鬆散且不確定的，不僅在治理知識的生成上涉及多元行動者的能動性（agency）和鬥爭（struggle），計畫的落地也需要透過各種中間人協助國家實行監控、傳達訊息、紀錄與提交報告，這些部屬才使得國家被社會中的常民所看見（Li 2005）。

換句話說，國家的計畫、政策是複雜的權力運作結果，需要各種中介形成權力的有效性，而權力的部署不會只來自國家這個單一的核心，而是散落在社會中各種權力關係之中。國家如何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中看見需要治理的對象、如何設計制度和計畫、交由哪些部門執行、執行的盲點都需要被拆解分析。就此而言，Michel Foucault 以近代歐洲性論述蔓延的考察所展開的權力觀，提供了有用的分析視角，使我們得以解析特定的檳榔論述如何蔓延並推進國家管理政策。

二、治理的多重權力起源

Foucault（2022[1976]）和 Scott 同樣注意到，十八世紀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中，西歐國家開始以整體人口為尺度推動各種改善措施，使領土內的人力得以回

doi:10.6342/NTU202601203

應經濟發展的需求。然而，Foucault 將人口治理置於權力分析的核心，由此拆解了主權國家自上而下的統治視角，進而呈現出一套與 Scott 不同的權力觀。

Foucault 指出，人口的治理展現的是西歐社會權力運作機制的轉變：古典的權力運作是以壓抑、禁止做為控制的基礎，從絕對的支配關係中提取（prélèvement）臣民的勞動力、財富甚至是生命；但是 18 世紀西歐封建社會瓦解以來，權力的機構不再以強取作為主要形式，而是將生命作為經營的對象，主張生命的增長並對其進行組織的權力，而不是阻撓、降服或消滅生命的權力。Foucault 將此一新的權力型態稱為「生命權力」（bio-power），其運作涵蓋兩種不同尺度的生命介入。其一是微觀層次的身體規訓（discipline），透過各類機構對人類肉身進行監控、訓練與能力的培養；其二則是巨觀層次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 of the population），在此尺度下，人類身體被視為物種整體的一部分調控，必須透過對繁衍、死亡與生命長度的量化，來進行人口層次的治理。於是，人口的動態不再僅是徵稅與掠奪的對象，還是一種需要透過公共衛生與生育計畫來經營的資產。

即便生命政治也涉及了 Scott 所說國家對人口的精簡化工程，但是 Foucault 指出國家對人口的經營不只是國家行政的精簡化，還需要動員整個社會的個體去增強身體的素質。於是，原本應該屬於私領域的性活動成為政治經濟的問題，也成為個體和國家互動的介面。各種醫療機構、教育現場和家庭空間策略性地設置了各式各樣的「陷阱」，誘導個體的性活動被暴露、陳述和觀察，接著進入專業機構研究產生知識。而知識的產製過程也打造出主體，從事性活動的兒童或非異性戀都不再是社會中曖昧不明的存有，而是可以攤開分析的對象，透過真相的表述使這些主體的偏差行為受到病理化地分類和理解。

因此，在 Foucault 的筆下，權力不是國家由上而下、由外加諸於內的力量，而是部屬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種關係之中。醫學檢驗、精神醫療的診斷、教學活動、家庭中的空間配置，表面上是要協助個體導向正常的傾向，事實上就是權力運作的本身，包含詢問、監控、搜查和理性化的論述，都讓權力進入個體私密的活動

doi:10.6342/NTU202601203

中而受到肯認，而個體也透過權力脈絡生產的論述認識了自身。

另外，Foucault 從歷史角度指出，生命權力具有多重來源，而性論述的擴張亦非發生於國家與臣民之間的權力關係之中，而是首先出現在封建秩序瓦解後的新興城市中產階級內部。起初，對性的監控與關注源於中產階級對自身身體的照顧、保養與修護，透過將自身身體與他者區隔，以維持其價值，進而鞏固其在社會中的主導地位。直至十八世紀末，隨著工業化與都市化所引發的社會衝突與勞動力需求增加，原本用以維護中產階級身體的醫療與教育技術，才逐步向俗民社會擴張，轉化為馴化與教化普羅階級的治理工具。

性論述的歷史考察，不僅使權力的來源更加立體，也讓我們看見差異與階序：國家以「改善人類生活」為名的計畫，勢必會涵蓋了介入工具和強度不等的策略和技術，生命權力可能允許一部份人擁有自由，或鼓勵他們成為間接統治者，卻也會將某一些人病理化地識別出來，以較強制的方式對其施行控制。如 Marc DuBois（1991）對 19 世紀節育政策的研究指出：一開始節育是英國女性自發的運動，將節育視作一種保障女性生殖健康、身體自主權的方法，接著醫學領域形成了一套關於節育的知識與技術，到後來對生殖的控制技術擴展到全球南方，意義和目的轉變成控制改善貧窮人口的社會工程。這說明了國家計畫的權力起源是多重且不確定的，涉及多重行動者的觀點、利益乃至知識生產技術的交織，每個行動者在論述生成中的立場有所不同，也不一定是服務統治階級的利益，但可能會在特定的脈絡中穿透差異形成實際的治理樣態。

同樣地，檳榔的論述和西歐性論述的增長，都是聚焦在國民身體素質的改善和保護。而爬梳檳榔政策的推行的過程會發現，檳榔統計資料的生產、論述的形成都涉及了國家行政部門以外的行動者，包含了科學家、黨國社會菁英和企業的遊說者。他們彼此處在不同的社會位置、具有不同來源的知識，背後又牽涉各自的價值觀甚或利益算計，這些多重的論述在臺灣工業都市化的過程中穿透差異共同形成了國家計畫的內容。因此，在本論文的分析工作上，不將檳榔的公衛問題

doi:10.6342/NTU202601203

視作一種單純的科學事實與國家政策計劃的背景，而是近一步分析誰提出了關於檳榔的論述、讓檳榔成為被看見的問題？而不同來源的檳榔論述在甚麼社會條件穿透差異匯集在一起形塑國家政策？這些論述又讓檳榔進入了哪些社會和國家行政的範疇？這些討論將有助於我們釐清檳榔和特定社群連結，成為治理對象的歷史脈絡。

三、不受照護的生命

Scott 和 Foucault 傳遞出的權力形式雖內涵有所不同，卻同樣是以生命的精進和改善為目標。即便物換星移，權力的部署和治理計畫的主導者亦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浪潮中洗牌，當前散落在不同政治尺度的治理計畫，仍反覆印證了 Scott 和 Foucault 的觀察，持續以生命的增產、保護和改良為方向。Anna Tsing（2012）用「可規模化」（scalability）這個概念精確描述現代性的生命配置：包含人類和非人（non-human）都被化約為可以任意替換的元素（nonsoels）（Tsing 2012:513），不再具有個體的技術、性格和社會關係，而是標準化的勞動力與資源，使其能夠被有效管理與調配，而當新的元素加入計畫，讓小尺度計畫擴展為大尺度計畫時，不需要改變原有的計畫，包含知識框架（framework of knowledge or action）。文化和生物的多樣性被視為規模化的阻礙，被剔除在可規模化的設計（scalable designs）之外。透過將這些多樣性的變數排除，實驗室培養皿的成果可以擴張成整個社會的指導方案、一個發展計畫也可以變成模組擴張到全球各地。

那麼，我們要如何看待像檳榔這樣不被監護和改善的生命呢？包含 Tsing 在內，許多研究相繼指出，上世紀各種圍繞人與非人生命的改善計畫並非均質運作。培養皿無法將萬物全面納入並加以規模化，也無法阻絕培養皿內外生命命運的相互糾纏。生命福祉改善計畫的運行，必然排除部分生命於監護與品質提升的照顧清單之外，也有生命的存續和繁盛是以消滅其他生命為條件；另外，除了負向的

doi:10.6342/NTU202601203

消滅和忽視，亦可能存在著從治理計畫中意外蔓延而出的生命遭逢，影響著規模化計畫的內容與節奏。這些生命相互牽連的故事，能夠補充 Scott 和 Foucault 未能關照的生命，協助我們進一步發問：人與非人生命的改善計畫如何相互牽動、消長？人類生命改善的公衛計畫，如何導致檳榔的生命被農政單位放棄？而被現代性農政機構放棄的檳榔生命又是在甚麼樣的歷史情境中與其他生命結盟共生？

（一）農業的多物種正義（Multispecies Justice）

首先，物種的「生」，難以避免與其他生命間的競爭和殺戮。這一點反應在 Scott 的精簡化農業和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的交叉點：現代國家為了要提升國民的勞動品質，也必須要提升糧食作物的生命品質，而人類與作物生命共同存活的條件是大量物種的死亡。就如同 Scott 所注意到的：綠色革命透過基因工程挑選單一化的糧食作物品系，運用化學肥料和藥物壓抑其他生物和基因的存活率。然而，Scott 沒有進一步指出的是，單一化農業不僅止於對殘餘的非人生命的消解，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反而背離綠色革命「改善人類生活」的初衷，對人類健康本身構成威脅。更重要的是，單一化農業往往與殖民主義的歷史遺緒、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以及種族與階級的差異交織共構，使其風險與代價不成比例地落在特定的人與非人身上。

例如，Hetherington （2020）透過巴拉圭的研究指出，綠色革命下的棉花和大豆經濟如何與新興政權的發展計畫、行政體系與科學知識相互牽絆，在 1970 年代起向國家邊境大量擴張。國家暴力和經濟作物結盟，將大量森林和貧農的土地轉換成單一作物的殖民地。其中，大豆田僅容許特定、符合市場需求的黃豆品系存活，所有未展現市場需求性狀的植物，以及被視為威脅優良品系生長的細菌與昆蟲，皆被系統性地移除。另外，在單一作物擴張的漫長之路上，原住民的生命與熱帶雨林中其他物種的生命，也在冷戰以來的發展目標中失去了生命的重量，

doi:10.6342/NTU202601203

其死亡被視為國家繁榮的「必要代價」，而對生命侵害的暴力本質也變得模糊。

不僅如此，大豆的單一化栽培高度仰賴對人體有害的化學物質。然而，巴拉圭的公共衛生體系長期資源向都會區傾斜，而許多支撐公衛體系運作的科學與醫療基礎設施，實際上又由大豆企業出資贊助。在這樣的結構下，即便大豆田周邊居民長期暴露於污染之中，甚至因此罹病或死亡，關於大豆農業對人體健康危害的知識仍難以被生產，責任歸屬也因此無法被清楚界定。

巴拉圭的大豆農業的跨國剝削結構，深刻地批判了 Foucault 的生命政治內涵：Foucault 的生命政治關注著北方國家城市居民的身體，但是他們身體的精進需要穩定且廉價的糧食，因此全球南方在西方社會生命政治萌生的時代，也逐漸成為單一作物的種植園以供應其需求。Hetherington 告訴我們，綠色革命並不沒有讓所有人類和物種的生命都能接受同等的福祉，有人被「餵飽」了，但也有某些人類和物種失去了寓居的土地和健康存活的可能。

Hetherington 的研究呼應了人類學界對多物種正義的探問（Kirksey and Chao 2022）：隨著環境危機逐漸威脅著人類生命的未來，當前社會逐漸意識到自生的存亡與其他物種的存亡難以分割，進而關心其他因為人類活動而遭遇生存危機的非人物種，甚至讓非人也具有法律的權利。但是，並非所有人和非人的生命地位都是完整的。Alexander Weheliye（2014） 等學者曾指出，權力結構決定了「哪些人能夠主張完整的人類地位（full human status），哪些人則不能」。如殖民主義所形塑的種族與自然觀念，持續在身分認同的文化政治中縈繞不去，而權力的運作亦跨越並貫穿物種界線，使得有些人類和物種被連結在一起成為受貶抑或厭惡的對象，又或者是暴露在缺乏照顧的風險之中，甚至成為被鎖定為消滅的對象。當社會對性少數、少數種族和底層階級的暴力仍持續上演，身處脆弱位置的人群與物種連結在一起，遭受更幽微的削弱與剝削。

回到檳榔的案例，透過接下來的歷史爬梳，可以發現檳榔的論述明顯和特定的階級、族群連結在一起，這些論述以他們的身體為核心，反覆確認既有的社會

doi:10.6342/NTU202601203

階序，並以更為幽微的方式再生歧視。而在檳榔食用者的健康成為關注焦點的同時，檳榔樹本身的生命卻被排除在農政單位的關懷之外。多物種正義的倡議提醒我們追問，當我們在論及人類和檳榔的生命，是在談誰的福祉、如何談論？在甚麼情況下，特定的人和物種生命的命運被連結在一起，而他們的健康和存活如何受到關注，或者可以被忽視？

（二）規模化（scalability）創造的廢墟

不過，當我們在關心殖民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如何導致特定人和非人生命的危殆時，會發現檳榔的生命雖然不受到國家農政的提拔，卻比起那些身處危殆處境的物種多了不少的自由和結盟的對象，而且檳榔農業的成長和物種的結盟，事實上就是以上世紀各種單一化的農業和發展計畫失敗的後續。檳榔的故事或許說明了：當代全球資本主義運作下無論是國家或是社會的組成、作用的基礎都越來越多變且難以簡單區分，而且國家單一理性的計畫不僅從未完成，還在看似扁平的全球化進程中不斷地滋長出各種新興社群與多樣化的生活方式：這些長得像 Scott 筆下的贊米亞很有可能是精簡化的計畫脫軌打造出來的。因此，若要回應上世紀現代化造成的危機，除了回過頭尋找在地實踐如原住民生態知識、小農經濟之外，當前這個充滿傷痕和損害的地景其實存在一些可能性。

Anna Tsing（2012; 2024[2015]; 2019）透過許多散佈在各地、被規模化的計畫所蹂躪的廢墟故事提醒我們，觀察目光不能只停留在單一化所造成的破壞與失落，而是觀察這些不均質、不在計畫中的廢墟如何允許生命的聚合（assemblages）。這些不被進步敘事所眷顧的廢墟，是上世紀各種治理計畫與工業生產破壞後拋棄的遺留，卻也是危殆處境上尋找生存線索之處。例如，北美的森林經歷高度人為擾動的工業砍伐和供應鏈轉移後，不僅創造出珍貴合適的生長空間，也聚集了東南亞戰爭難民和美國白人，他們採集珍貴的松茸同時，獲得了不同歷史脈絡的、

doi:10.6342/NTU202601203

多義的自由。Tsing 指出，無論是松茸與採集者都不是「在可規模性之前某種想像的時間中出現，它是隨著可規模性而生－來自其所造成的廢墟」（引自 Tsing 2024[2015]:71）。若少了上世紀工業化林業的干擾（disturbance），松茸就難以生存，更不會帶來異質的遭逢。

Tsing 借用地景生態學的概念，將森林裡人與非人動態的異質聚合稱為斑塊（patch）。斑塊的形成，是松樹、真菌和人類在政治經濟與生態消長共同作用的歷史中偶然遭逢，彼此會發生結盟、合併，又或者是競爭與互斥，並且會透過知識的傳遞、全球供應鏈的聯繫，抑或是真菌孢子的擴散重塑另外一個地方的地景。

在 Tsing 後續的文章（Tsing, et al. 2024; Tsing, et al. 2019）中還進一步指出，觀察這些散佈在全球各處的斑塊，也是我們認識和重思「人類世」（Anthropocene）這個紀元的合適尺度。在人類世這個概念被提出後，學界常以大尺度的模型（如氣候變遷的升溫指標）去接近人類的行為如何不可逆地改變地球的景觀和地質史。但 Tsing 與許多關注在地尺度的學者卻認為，近五百年來隨著歐洲的擴張、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透過人造的基礎設施重塑了某一個空間的土地、水文和大氣的同時，會讓人和非人的生命產生非線性的牽連，並且超乎預期地透過人類的基礎設施跨越地域，擾動其他地方的生態。所以，人類對地球地貌的影響是真實的，但製造人類世的單位，不是以地球這顆行星為單位，而是破碎但動態連結的斑塊。

當然，Tsing 並不是要我們忽視各種現代化計畫背後的科學霸權或是殖民歷史，而是要避免掉入另一種單一化的敘事，亦即將現代化的國家、資本主義視為改造地球景觀的全能者，讚嘆或譴責這些作因如何改變地球的命運，卻不關注小尺度的斑塊上的生命不斷尋找生機的努力，甚至是重塑地景的活力。

Tsing 的觀點給我相當大的啟發，我希望透過這本圍繞屏東平原檳榔的農業研究指出，棕櫚科植物的環境適應力讓它能伴隨著殖民歷史與跨國資本主義擴展到異化的空間單一化生長，卻可能在別的脈絡下邀請其他社群的結夥。被國家與主流市場排斥的檳榔就是如此，它的生命與其他植物、種植者的生命匯集交織於

doi:10.6342/NTU202601203

園圃之中，孕育出屏東平原多元混雜的農業活動，這並不是一種挑戰資本主義與國家的理性秩序的新發明或救世寓言，而是一種說故事[3]的線索：關於台灣現代化農業曾有的願景和希望的落空，以及遭遇的種種失落後仍保有韌性的生機。

四、家庭農場：對話臺灣農業與漢人社會研究

以上的理論脈絡，協助我觀察檳榔與現代性的國家治理、跨國供應鏈之間既連結但又邊陲的關係。這樣的討論其實也讓這本論文得以對話臺灣自 1980 年代以來的農業研究。我所處理的檳榔歷史時空與臺灣農業／農村研究所面對的背景高度重疊，都是在近代臺灣農業經歷一系列結構性變遷的脈絡中展開，包含台灣的工業都市化以及全球自由市場的擴張。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臺灣和許多東亞國家一樣，把握工業化的發展契機的同時，卻也面臨城鄉關係的逆轉與稻作農村社會經濟的普遍蕭條（葉守禮 2021a：112）。這段歷史也形塑了臺灣農業研究的主要課題：在臺灣逐漸納入全球資本體系的過程中，隨著稻作體系的衰弱與作物分殊化的發展，農業的結構與農村的地景究竟發生了哪些根本性的改變？而這些變化又如何有別於西方資本主義發展脈絡下的農業轉型？

在這段時代的鉅變中，檳榔是眾多農業轉型路徑中的其中一條重要道路（見第二章）。然而因檳榔處於一種曖昧不明的準合法定位，長期未受到國家農政體系與農業研究的充分關照，因此也較難直接納入主流農業研究既有的討論基調之中。不過，正因為檳榔具有特殊的生命政治處境，以及它與國家治理之間複雜而貌合神離的關係，反而讓我可以旁敲側擊地對話臺灣農業研究的經典討論路徑，嘗試由檳榔自正規農業體系外萌生的多樣性補充臺灣農業現代化的本土經驗。在

[3] 關於「說故事」（Storytelling），主要是受到 Anna Tsing（Tsing, et al. 2024: 9）的啟發。而她的觀點又攫取了許多來自女性主義的觀點。女性主義的取徑呼應了人類學的專長，亦即透過細微尺度的故事鋪陳與連結，在人類世的敘事中納入更多的人類（包含女性與老年人，以及受殖民掠奪的他者）與非人行動者，挑戰將資本主義描繪為單一、全能體系的宏大敘事。

doi:10.6342/NTU202601203

這樣的嘗試中，檳榔也可能成為議題上的節點，使長期以來研究對象有所交疊、但問題意識分途的左翼政治經濟學農業研究傳統與人類學漢人研究，能夠有對話的空間。

首先，1990 年代以來，臺灣農業研究以柯志明等學者為首，引領出相當深厚的左翼政治經濟學研究傳統。這些研究共同的關心是：隨著臺灣步入全球化農業市場，臺灣的農民（peasantry）「在資本主義經濟的衝擊下如何分化成不同群體，而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又如何？」（柯志明、翁仕杰 1993）後來的研究進一步從臺灣各地的農業經驗，觀察作為臺灣重要生產模式的「家庭農場」如何與資本主義產生在地性的接合（articulation），一方面帶來農民的分殊化，卻沒有因大農場的出現而走向普羅化。

臺灣學者對家庭農場的關心，有一個重要的對話對象是 Alexander Chayanov 的小農經濟理論，亦即辯論家庭農場為何可以在資本主義的市場中存續下來。如蔡培慧（2009）以臺灣整體農業為觀察尺度，指出臺灣一部分的農民離開了農地，成為其他部門的勞動力；另外一部分的農民維持家庭農場的生產模式，因作物選擇的差異而帶來了分化。即便作物分殊化，但家庭農場受限於土地制度等條件，只能透過自身勞動積累擴大生產規模，從糊口轉變成小商品生產農，沒辦法變成資本農，少數擴大規模的農企業也需要國家投入資源建置基礎設施、提供貸款才有可能。也就是說，小農的分化受到國家政策、市場等因素影響而有不同的分化路徑，但沒有導致小農生產模式的消失乃至進一步的政治結盟。另外，葉守禮（2021a；2021b）帶入了在地社會研究的視角，指出中部山城小農透過行口分銷網絡、地方後勤網絡之間創造性的交互作用，發展出彈性化、精細化與多樣化的高附加價值園藝農業，維繫了分散但社會關係緊密的家庭農場體系。

左翼政治經濟學研究傳統雖然建構出臺灣農業發展中「家庭農場」的獨特性，深化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在地條件，提出和古典馬克思主義和 Chayanov 小農經濟理論不同的發展路徑。但其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基礎，亦造成了一些困境：首先，

doi:10.6342/NTU202601203

這些研究以生產模式、生產關係等要素展示出農民分化的象限，並由此解釋小農存續的因素。不過，這樣的操作造成農民分類要素的格式化，即便後來的研究加入了國際局勢、國家農政、農民組織的分析，仍較難以從作物本身的生物特性與農戶本身的觀點出發，複雜化臺灣 1970 年代以來農業轉型的歷史。特別是，像檳榔這樣缺乏國家農政系統和正式市場介入的特殊作物，左翼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農民分化的觀察幾乎失去了分析的有效性。關於這一點，童元昭（2001）早年在屏東檳榔農業的研究已經精確地指出，單看農民的生產關係和生產模式，沒辦法了解檳榔產區家庭內部多樣化分工的重要性，尤其是檳榔的低勞動密度，允許家庭中不同勞動力分配、彈性的雇傭關係與技術密度的作物，以至於在柯志明等論者建構的臺灣小農象限中，檳榔從業家戶根本難以定位；另外一個更核心的問題是，左翼政治經濟學研究傳統將「家庭農場」當作一個生產與消費的經濟單位，缺乏對文化基礎的敏銳度，造成家庭農場中的成員被化約為勞動力，農地則被化約為生產資料。這樣的傾向，一方面缺少對家庭農場的「家」更準確的認識，也造成政治經濟學的農業研究與人類學漢人社會研究難以對話——即便兩者關懷的田野空間和對象時常是重疊的。

我認為，若要回應左翼政治經濟學缺乏的文化面相，並且對話人類學的漢人研究，關鍵的鑰匙是先拆解家庭農場的概念，才能從中找到對話的交點。如同蔡晏霖對家庭農場概念的反思所指出：「正如資本主義需要被歷史化，家庭農場同樣不應被視為一個跨文化、跨歷史的範疇」（蔡晏霖 2025：331）。由於農業從業的家庭，在人口組成、性別動態、族群結構上顯然都不是同質的社會單位，因此我們應該要進一步關心的是家庭農場透過哪些親屬意識形態、繼承制度，以及性別、族群、世代與差異結構來維繫？而這些權力關係，又「如何在台灣人口、移民、親屬、國家治理、城鄉發展與性別動態的歷史變遷中，不斷彼此形構又隨之重組？」（蔡晏霖 ibid.）若連結到漢人研究熟悉的方式來提問，究竟從西方左翼政治經濟學發展出來的「家庭農場」，和臺灣漢人社會中父系繼嗣的聯合家庭、

doi:10.6342/NTU202601203

主幹家庭，甚至是較大的宗族之間，有甚麼樣的關係？而家庭農場的歷時性變遷又如何反映在這些歷史悠久的漢人親屬制度上呢？

延續著蔡晏霖的呼籲，我在論文的第六章將聚焦回「家」的議題，在人類學長久以來累積的漢人親屬研究（Cohen 2016[1976]; Freedman 1958; Wolf 1972; 胡台麗 1986）基礎中觀察檳榔栽培家戶的特性，試著分析其中所涉及的家庭理想，以及因為世代、性別與婚姻狀態而開展出不同的檳榔園圃經濟生活，由此回過頭回應甚麼是「家庭農場」。透過這些材料，也可以進一步闡述漢人社會，特別是客家社會的變遷。在過去，與水稻農業緊密連結的大家庭型態「宗族」，不僅是一種親屬的單位，也被視為客家地方社會的基本構成。然而，隨著作物種類革新，家與社會性質也跟著改變——就如同臺灣的小農不斷地分殊化。許多晚近的農業研究觀察到，高技術密度的作物，已經在臺灣各地創造出不同以往以血緣和地緣所構成的地方社會秩序（見楊弘任 2014），其中資材行、行口、合作社與產銷班成為精緻水果產地農村中人情、工藝與知識交流的節點（葉守禮 2021a）。因此，我想在這本論文中，進一步追問的是：技術密度、國家與正式市場涉入的程度與其他主流果樹作物差異甚大的檳榔，其經濟活動形塑出甚麼樣的地方社會型態？又如何在家戶或個人的尺度上，建立出有別於過往「家」的型態，進而回應當代情境、能在新自由主義化的城鄉體系生存下來？

五、田野方法與空間簡介：熱帶沖積扇裡的肥沃園圃

這本論文研究的田野主要在屏東平原上萬巒鄉、內埔鄉兩個鄉鎮進行。除了在兩個鄉鎮進行田野工作，我也會跟隨著園圃中農民的交易活動、日常生活和居住安排移動到屏東其他鄉鎮、高雄與台北兩都會區。田野工作的執行期間是 2022 年的 9 月到 2025 年 12 月[4]。本研究的起始點是參與一個萬巒的社區營造工作，

[4] 平均每一個月會到田野聚落進行一次三天以上的田野工作，在檳榔產季期間則有可能會更密

doi:10.6342/NTU202601203

在進行地方文史的調查時，我發現舉辦活動若沒有搭配檳榔採收與交易的時程，就容易冷清，因此發覺檳榔農業是當地潛在的時間秩序。隨著接觸的人增加後，我逐漸領悟檳榔農業是屏東客家庄中沒辦法被忽視的現象，不僅每一個報導人家中都有栽培檳榔，他們的生命史、日常步調乃至於家庭安排，都難以脫離檳榔經濟，這樣的觀察引導我探索屏東平原客家庄與檳榔的關係。

然而，論文所採取的觀察和資料分析空間尺度，並非鄉鎮或村落，也不是傳統脈絡下的「客家庄」，而是以家庭農場所有權劃界，但與外在世界聯繫在一起的「園圃」。以園圃為對象，一方面是因為檳榔比起其他作物，缺少以鄉鎮為設置單位的產銷班，也缺少農會、合作社、農政單位等集合農民的組織，因此檳榔農業研究只能從個別農民工作的園圃開始。然而當我跟著園圃中的檳榔農執行農業施作、交易活動，便得以將田野的網絡伸向平時較難進入的資材行、行口，將這些從業人納入園圃的世界中，觀察不同園圃生產檳榔的條件，以及檳榔所創造出社會關係。再者，以為園圃為觀察尺度，也可以觀察園圃相應的家庭農場生活方式和步調。特別是，檳榔農業比起稻作或精緻果樹，更允許流動於農村和都會的家庭型態，有些檳榔農甚至只有在檳榔交易前後才會從外地返回屏東，其他時間鮮少返回老家。因此，園圃作為觀察的單位，有時比起客家社會所強調的伙房、宗族甚至「房」（Cohen 2016[1976]）的概念，更能夠精確地反映當代「家」的特質，表現出屏東農村家戶在城鄉之間彈性位移和重組的真實經驗。最後，以園圃為觀察的介面，也在理論立場上呼應 Scott 對精簡化的批判與 Tsing 所說的「斑塊」，亦即進入多層次且多物種共存的園圃世界，觀察其中生命群聚的歷史與異質的實作經驗，挑戰國家行政、現代農政體制、科學統計和環境模型等由上而下的觀察尺度，也避免單從人類或由單一物種出發的書寫角度，而是著陸且立體地觀察檳榔園圃中的生命與資本主義、國家治理、城鄉發展、政治階序等權力運作之間的動態連結。

集地在檳榔交易的時間點，前往交易行口進行為期一日短暫的訪談和參與觀察。

doi:10.6342/NTU202601203

我主要執行田野工作的萬巒和內埔客家村庄位於屏東平原的中心。屏東平原是臺灣最南端的沖積平原，全部分布在北回歸線以南，屬於熱帶氣候，終年暖熱，冬季均溫將近 20 度；此外，相較於冬季受落山風吹襲的恆春半島，屏東平原三面環山或丘陵，冬季季風較為溫和，更有利於作物生長（施添福 2001）。熱帶環境的先天條件，使屏東的農作物往往較其他地方早上市且產季時程較長，甚至能栽培出臺灣北部、中部不易生長的熱帶作物。因此，屏東很早就成為臺灣重要的農業生產區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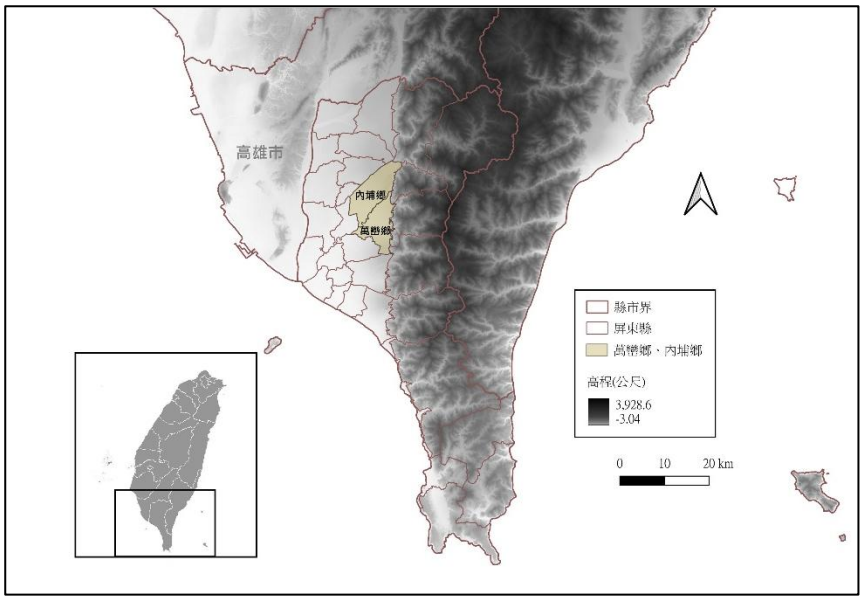


圖 1　田野場域地圖

自清代以來，屏東平原已逐漸藉由豐產的製糖甘蔗和稻米連結全球市場。受惠於熱帶氣候條件，屏東在現代水利設施尚未成熟之際，就能夠達成稻米一年兩收。其中清代屏東平原的「雙冬早稻[5]」更是閩南一帶最早收成者，稻米上市時間正逢閩南地區米穀最缺乏、米價最高的季節，成為閩南糧食的主要供應地（李文良 2019:88）；到了日本殖民時期，殖民政府更是以屏東為基地，一方面移植其他熱帶地區的作物，另一方面將屏東經驗當作帝國南進計畫的參考。也因此，殖民政府在屏東平原設立機構研究熱帶園藝作物的育種與栽培，其中較具代表性的就

[5] 農曆 12 月播種、並於翌年 4 月收成的稻作。

doi:10.6342/NTU202601203

是香蕉和鳳梨，這兩作物在 1920 年代已經栽培化規模，其他作物如咖啡、可可、哈密瓜、菸草亦有零星的栽培紀錄。戰後初期，國民政府面臨糧食生產體系失調與人口快速增加的壓力，恢復糧食供應遂成為農政的核心目標，屏東平原因面積廣大外又地處熱帶，其生產的稻米、大豆屢次創下單位面積產量的紀錄，對當時糧食供應的穩定性功不可沒（鄭力軒 2014）。

即便經歷政權更迭與市場需求的變化，直到 1970 年代以前，稻米仍是屏東最重要的農作物。然而，沖積平原的地理條件並不均質，並非整個平原都適合稻作。包含萬巒與內埔在內的六堆客家聚落，恰好分布於屏東平原最適合稻米生產的區域：他們由北（右堆）而南（左堆）定居在高屏溪、東港溪和林邊溪流域的沖積扇端，沖積扇端的土壤顆粒較河川上游的扇頂細緻，扇頂下滲的水分常在此湧出，形成湧泉帶，地下水非常豐富。由於兼具肥沃土壤與充足水源，六堆地區是整個屏東平原水稻最豐產的地帶。其中，萬巒和內埔兩鄉分別位於東港溪兩岸，更是平原最肥沃的精華區。東港溪因為有地下水滲出調節，是全臺灣 21 條主要河流中年均逕流係數最高的河川，即便是南台灣乾季枯水期，水量仍然穩定。因此，東港溪不僅提供周邊鄉鎮穩定的水源，也有助於早年陸運不發達時的船隻航行，以及貨物（主要是稻米）和人的流動（李文良 2019; 李俊宏 1997）。

水稻曾為六堆客家農村帶來富裕且繁榮的時光，然而 1970 年代臺灣稻作市場萎縮，萬巒和內埔的農村遭遇了和臺灣各地農村相似的衰退危機。不僅如此，這個時代更逢臺灣產業轉型，國家發展的資源集中於工業生產和都市建設。與屏東隔著一條高屏溪的高雄因為造船、煉油等工業，成為台灣最具代表的工業城市，屏東則淪為高雄工業區的自然和人力資源後援，限制了工業發展的機會。尤其是水資源的分配，清楚說明了高屏之間不平等的政經關係：內政部在 1986 年依據自來水法公告了自來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時，為了確保高雄地區的供水安定，蘊含豐富地下水的屏東平原，共有 18 個鄉鎮被劃入自來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再加上自來水法中明訂保護區一千公尺範圍內禁止一切開發，等於 80%的

doi:10.6342/NTU202601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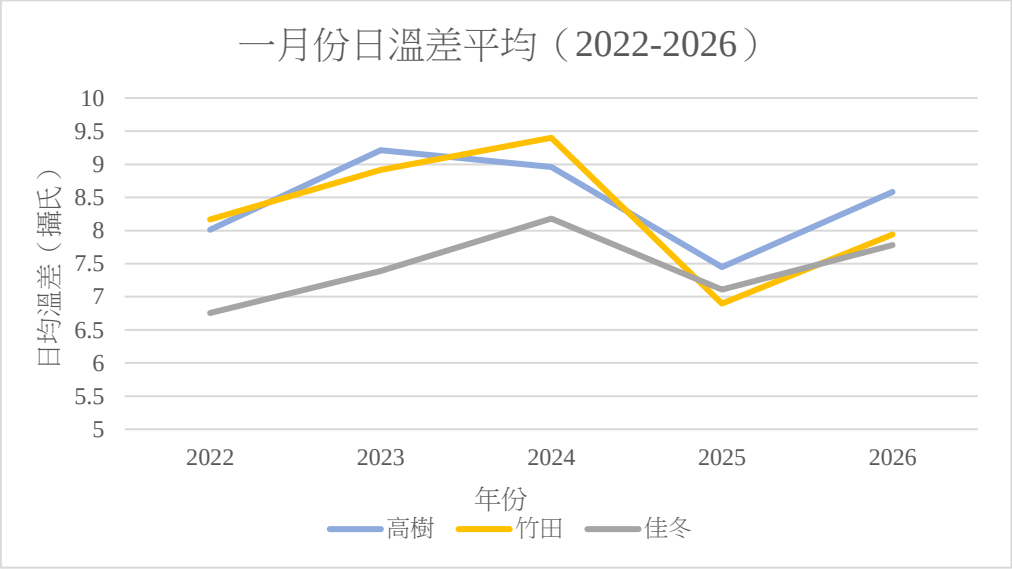
屏東平原都被劃入禁止開發的範圍，一直到 2000 年前後才取消東港溪水源保護區以及將高屏溪取水口上移到高屏溪攔河堰，限縮水源保護區範圍（鄭力軒 2014）。長期為高雄守護水資源，限制了屏東農戶的選擇：當臺灣各地的農戶選擇將稻田轉變成小型代工廠，屏東的農民必須為農地做出其他選擇——有些家戶把稻田轉變成熱帶果園，又或是養殖魚塭，栽培馴養出有外銷潛力的物種。而檳榔的栽培，是另一條相當普遍卻受到忽視的轉型路線，幾乎所有屏東客家地區的家庭，都經歷了稻作轉作檳榔的歷程。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將會詳述稻作轉作檳榔的過程（第二章），以及檳榔的經濟活動如何配合穿梭於高屏之間的生活步調與家庭安排（第六章）。

即便臺灣農業在整體經濟中的重要性已不若過往，稻作更幾乎在六堆客家庄銷聲匿跡。然而，屏東平原所具備的熱帶環境條件仍然延續下來，並持續形塑其在當前農業市場中的位置。例如，包括檳榔在內，屏東的作物仍具有早上市的優勢，能在臺灣蔬果供應相對匱乏的季節填補市場需求（詳見第三章）。另外，在稻作衰退之後，一些農民回過頭栽培日治時代引入的熱帶作物，在本土市場中尋找新契機。有農民就和我說，他培育的咖啡樹，是來自大武山上的廢棄咖啡園，這些日治時期被馴化後遺棄的咖啡樹經過幾個世代再次回到人類的園圃；也有農民在國家輔導之前，就從東南亞引進可可等作物進行栽培。如今，這些新興熱帶作物逐漸進入臺灣的都會市場受到認識，其栽培規模也隨之擴大。值得注意的是，當屏東農民放棄單一化的水稻耕作、嘗試栽培多樣化的果樹，會遭遇多變且高風險的市場與氣候環境。我在第五章會進一步指出：遍布屏東平原的檳榔樹，是屏東農民在不確定的當代環境中與風險共處的協力夥伴。

最後需要點出的是，我在萬巒和內埔這兩個地方蒐集的材料，並不反應整個屏東平原的經驗。因為農業的實作深受山脈、海洋、河流所形塑的微氣候影響。若聚焦於檳榔栽培較為集中的客家鄉鎮，它們雖然都位處肥沃的沖積扇端，但是環境條件仍有細微的差異：萬巒、內埔與竹田這幾個比鄰鄉鎮位於屏東平原的中

doi:10.6342/NTU202601203

部，這裡檳榔採收的時間比南側溫暖的林邊、佳冬略晚，但又早於北側的高樹，因此在上市時間上仍具有優勢。雖然收成時間不若林邊佳冬早，但根據檳榔從業者與資材行的觀察，萬巒一帶距離海岸較遠且更接近中央山脈，冬季夜間的輻射冷卻較為明顯，使日夜溫差較大，而靠近山麓的地帶則容易在春夏季節受到地形雨影響，降雨頻率較高——的確，我們可以從中央氣象局的測站資料[6]驗證這些從業人的觀察。這樣的氣候條件不僅適合更多樣化的果樹栽培，檳榔樹收穫的果實發育更加均勻，其質地亦相較於林邊一帶更為細緻。其中，最靠山邊的聚落所生產的檳榔甚至因品質優良，在業界被稱為「山腳檳榔」，深受追求高品質檳榔的消費者青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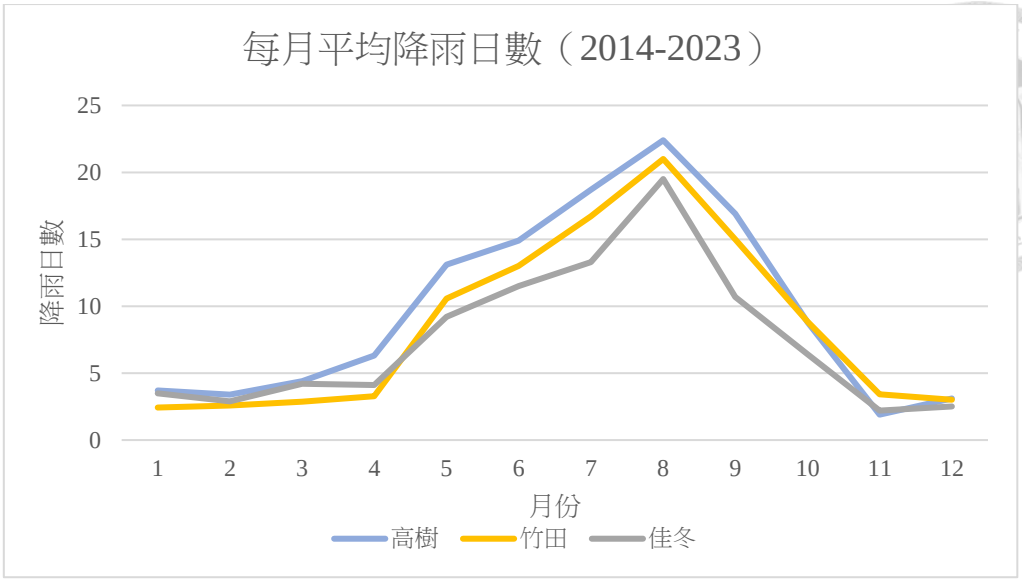


圖表 1　近五年一月份日溫差平均[7]（統計期間 2022-2026）。

[6] 在我進行田野工作的平原中部鄉鎮中，僅有竹田測站有較長時間的統計資料，因此以其作為數據代表。另外兩個更靠近的測站分別是內埔測站和赤山測站，內埔測站設站時間短，沒辦法提供跨時的對比資料；赤山測站則位處更靠山麓的沖積扇面，和本文所關注的地理空間略有差異。

[7] 距離海岸較遠的高樹和竹田因少了海水的調節，加上內陸空曠地區的輻射冷卻效應，冬季（以一月份為例）日夜溫差的平均值大多高於沿海鄉鎮的佳冬。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CODiS 氣候觀測資料查詢服務

doi:10.6342/NTU202601203



圖表 2　每月平均降雨日數[8]（統計期間 2014-2023）

六、章節導覽

在這本論文中，我首先於第二章回溯 1980 年代檳榔和檳榔公衛論述共同增長的歷程，這段歷史將說明檳榔如何成為稻作農村轉型契機的同時，從一般的農政體系脫離。接著，我的論文將會分成兩個部分：「農政之外」與「檳榔樹冠下的世界」，分別探討脫離農政系統的檳榔產銷，以及檳榔園圃中的人與其他作物的生命交流。

「農政之外」部分中的第三章，我觀察檳榔在缺少農政單位標準化技術與市場規範的規訓下，檳榔的田間活動和其他物種有何差異？文中分別從田間作業型態、技術養成與傳遞以及育種行為來探討檳榔農、資材行如何在專業科學機構之外觀察檳榔樹的動態。少了農政單位的標準化措施，不僅使檳榔栽培方式更具開放性，也連帶地讓植物的生理狀態與生命時間具有現代農業少見的多樣性；接著第四章，我將跟著採收下來的檳榔進入交易現場，分析坐落在現代化農業市場體

[8] 屏東平原乾濕季分明，冬季降雨皆少，到了春夏季期間，高樹和竹田更靠近山脈，地形降雨較豐沛，平均降雨天數較高。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CODiS 氣候觀測資料查詢服務。

doi:10.6342/NTU202601203

制之外的交易關係。我以「江湖」的隱喻來闡述缺乏國家介入但有其運行道理的檳榔交易體系，並且從人類學對禮物交換與市場交換的討論來檢視批發市場之外的交易活動如何維繫秩序，又如何貢獻於當代充滿變數的農業市場。

「檳榔樹冠下的世界」的部分，我在第五章深入檳榔林下的混雜地景，探討檳榔的生物特性所伴生的物種關係與經濟活動，由此探究當代農民在面對市場風險以及氣候變遷等多重危機下檳榔所扮演的角色。農政單位亟欲縮減面積的檳榔園圃，事實上允許了差異化的農業實作，也降低遭遇變遷時的風險；第六章，我將回到臺灣農業研究中的基礎單位——家庭農場。臺灣漢人傳統家庭的構造與水稻經濟相當緊密，但上世紀後半葉漢人家庭已逐漸隨著水稻瓦解，壯年外移都市成立核心家庭，成為國家社會福利體制的主要制度單位，以及人文社會科學對現代家庭的關懷對象。這樣的轉變，使得鄉村中的中老世代通常被描述為照護的對象，而非敘事中的行動主體。在本文中，我試圖說明，屏東的檳榔地景，映照出農村老年家戶所處的城鄉與代際關係。特別是當家庭面對教育、醫療與照護責任落入家庭與個體身上，檳榔成為許多家庭經濟安排中的重要參與者，也承載著不同個體對過往經歷的反芻以及對未來生活的想望。

doi:10.6342/NTU202601203

第二章 檳榔樹與檳榔公衛論述的蔓延

近幾年，一個另類的臉書粉絲專頁「財哥專業檳榔攤[9]」在臺灣年輕人之間串紅。和網美網帥經營的粉專不同，財哥的形象，是一個嘴唇通紅、外表有點江湖味，但是充滿人情和日常哲學的中年男性。他的粉專貼文以大量刪節號、念起來遲鈍的特殊文體（網友稱「財哥體」）針砭時事、表達生活體悟，最後再配上宛如「長輩圖」的粗糙圖文。鮮明的社群風格很快引起廣大的年輕人追蹤，甚至連行政院長的粉絲專業都模仿財哥檳榔攤風格宣導政令。

財哥的爆紅，不僅來自獨特的社群經營風格，而是他所運用的各種素材超出個體層次，召喚出臺灣人集體的記憶，轉化了檳榔的負面意涵：財哥這個人物讓許多人聯想起特定的男性長輩，這些男性長輩可能不善表達、華語講不流利，卻有著鮮為人知的可愛真情；而財哥檳榔攤的圖文，則讓人想起了那些交流道附近的檳榔攤招牌，還有隨地可見、草根卻又刺激的檳榔盒包裝。

財哥那粗糙又不合時宜的拼裝美學，反映的是檳榔矛盾的物質意涵。長久以來，檳榔視為低俗的成癮物質，讓人直接聯想到像財哥這樣的中年男性。在公共層面，又多以公衛問題[10]進入大眾目光和國家政策的決策中，不像外銷水果那樣能躍上國際舞台令人驕傲。但是在當代臺灣，檳榔有時和藍白拖、珍珠奶茶這些元素一樣，能夠確認臺灣內部共同的社會性，用以表現臺灣本土的草根文化。

然而，檳榔的公衛爭議和衍生出的政治意義，是在近三十年來才定型。回顧過往的歷史，檳榔可能是饋贈之物、南方異域的稀物，也可能作為不同宗教的儀

[9] https://www.facebook.com/caigezhuanyebinlangtan

[10] 有關檳榔所引發的爭議，主要集中於口腔癌相關的公共衛生問題，以及涉及山坡地與國有林地栽培活動的環境議題。受限於討論篇幅與論述軸線，本文主要聚焦於檳榔作為公共衛生問題的相關討論。這樣的選擇一方面是因為檳榔的公衛問題是國家檳榔政策主要的焦點，檳榔產業造成的問題則是次要議題（見下文分析），另一方面，關於檳榔對山坡地水土保持造成影響的論述，往往簡化了檳榔農業在栽培型態與地理分布上的多樣性，從而使屏東作為臺灣最大規模平地檳榔產區的事實，長期未受到充分關注。

doi:10.6342/NTU202601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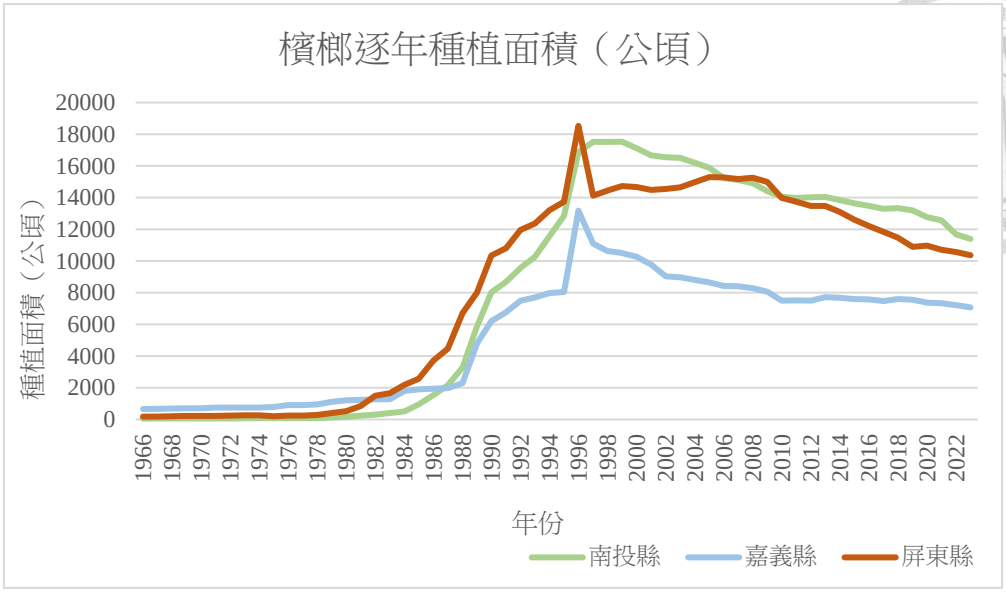
式媒介和具有療效的藥物。一直到 1970 年之後，隨著臺灣經濟起飛所帶動的都市化經驗與城鄉移動，與檳榔食用者相關的敘事和檳榔危害論述才隨之增生。進入 1990 年代後，這些負面論述進一步轉化成流行病學的公共衛生問題。流行病學將檳榔塑造成公害，也將財哥這樣的男性從社會中辨識了出來。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檳榔逐漸發展成一個備受矚目的公衛問題時，檳榔樹也正大幅取代屏東農村裡的稻作、成為農戶重要收益。

檳榔對農業地景的重塑與其公衛論述的滋生，除了時間上的貼近，還共享了多線交織的政經脈絡。在這個章節中，我嘗試分析全球供應鏈的位移、臺灣城鄉格局的變遷以及不同行動者之間的角力，如何造成檳榔樹和檳榔論述的共同增長。在這段臺灣整體社會鉅變的時代，檳榔複數並存的物質性逐步被收斂成流行病學的公衛問題。即便檳榔取代了許多農作物，成為許多臺灣農村重要的維生手段，但當它不可逆地以公共衛生問題進入國家治理體系，也就逐漸脫離了正規的農業體制，成為不受現代農政監護的生命。

一、檳榔樹的擴張與稻作萎縮後的重生

根據農業部門歷年的調查，臺灣檳榔栽培面積最龐大的產區是南投、嘉義、屏東三個縣。1980 年代以來，這三個地方的檳榔栽培面積迅速增長，到了世紀尾聲才趨緩。這樣的趨勢，首先和當時臺灣經濟起飛共同崛起的消費有關，關於這點，我會在文章後半段更仔細地討論。在此我想先聚焦農村那一端的經驗指出，檳榔樹的蔓延，揭示了現代化農業衰退後的集體遭遇與調適。接下來，我嘗試從報導人們的經驗出發，將屏東檳榔農業的消長放置在長遠的農業史脈絡當中。

doi:10.6342/NTU202601203



圖表 3　檳榔種植面積統計（1966-2023）[11]

我的報導人大多是1940-1970年代出生的戰後嬰兒潮。在他們兒時的記憶中，村莊所有家庭都是種植稻米，稻作佔去他們大部分的家戶勞動力。或許現在佇立於檳榔樹包圍的屏東農村中難以想像，大武山腳下曾經是一覽無遺的稻田。事實上，屏東平原從清代以來，就是臺灣的重要糧倉，甚至供應到稻穀收成不豐的華南地區。其中，我田野的客家農村位處沖積平原上水源和土壤品質最優異的沖積扇端，稻米產量驚人，同一面積稻田產量甚至高達沿海鄉鎮的三倍（李文良 2019）。

不過，我的報導人們在求學階段時，幾乎都經歷了農地稻田慢慢消失的過程。許多人回望那段時光，和我提及了相似的敘事：那時稻米已經沒辦法養活一個家庭，水田整地種起了有利可圖的檸檬、蓮霧和椰子。但是，檸檬價格不好、蓮霧照顧起來太厚工，椰子雖有段外銷熱潮，但幾年後東南亞的椰子取代了屏東的椰子，椰子樹亦失去了優勢。後來大家耳聞某個村子田裡的檳榔收益驚人，幾乎所有家戶都在短短幾年內把農地上的作物替換成檳榔。沒想到，以前用來標誌田地產權界線的檳榔樹產出的果實，既沒辦法餵飽人、甚至連豬都不吃，竟然一夕間

[11] 資料來源：台灣農業年報（1973-1998）；農業統計年報（1999-2023）

doi:10.6342/NTU202601203

成為搖錢樹。屏東稻作消失的速度相當驚人，1950 年代屏東稻米產量曾是全國第二，到 1980 年時已經低於雲林、彰化與嘉義，是所有農業縣市中轉變最快速的地方。其中從稻作轉作而來的檳榔園，又大多分佈在屏東的客家農村（鄭力軒 2014）。

檳榔為屏東農村帶來新契機。但換句話說，檳榔增長的背景，是稻作農業衰敗的故事。這個故事不是只發生在屏東，而是所有稻作農業共同經驗的歷史：1970 年代臺灣農村正因步入全球商品供應鏈，水田逐漸因產業重心轉移與區域發展失衡變得蕭條（Tsai 2019）。

這段歷史首先要從農地所有權的現代化談起。戰後台灣土地改革確立了以家戶自耕農做為農地所有權與生產的基本單位，結束了台灣長久以來複雜的土地所有權與租賃制度。這樣的「小農制度」理想是高度分散的農田，由家庭提供彈性且可以將成本內化的勞動力，源源不絕地生產米糧。接著，國家再透過肥料換穀等制度控制作物市場，也控制了自耕農家戶的生產活動，以廉價的糧價將農業剩餘轉移到國家整體發展計畫所需的其他部門（Tsai 2019; 柯志明、翁仕杰 1993）。

小農制度原本預言臺灣農業現代化的希望，國民黨政權亦藉由土地的再分配獲得暫時的社會穩定。然而，1970 年代的機械化使得小農自耕農被迫將農事外包給機器承包商，以跟上公共稻米收購系統的加速節奏（Tsai ibid.）；另外，1970 年代價格更低廉的東南亞秈稻，取代了臺灣米在日本市場的地位，而其他雜糧作物又在美國政府的壓力下進口臺灣，在這段全球糧食供應鏈重組的歷程中，台灣稻米便出現產量過剩的困境（王乃雯 2023; 鄭力軒 2014）。

稻作農業出現危機之後，原本栽培水稻的小農走向兩條主要的轉型路徑[12]：一條是歌手林強的〈向前走〉所描繪的典型軌跡，遷往都市成為受雇勞工。壯年轉變成兼業農或索性放棄農耕，將水田承租給代耕業者。當時臺灣正在崛起的代

[12]關於水稻衰退後的臺灣小農轉型，可參考蔡培慧（2009）、葉守禮（2021a）、柯志明、翁仕杰（1993）

doi:10.6342/NTU202601203

工業與服務業，提供了比農業更為豐厚的收入，技藝學成、資本累積後，更有變身老闆的機會；另一條路徑則是轉作其他勞動和資本密集但更具經濟前景的作物，這也是 1980 年代國家農政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13]。接下來的發展已廣為人知：轉作精緻果樹的農民，共同撐起了臺灣這座「水果王國」。

然而，檳榔樹的栽培，創造出一條介於兩者之間的獨特路徑。檳榔的栽培所需要的勞動力成本低，田間活動遠比大部分的水果作物都還要輕鬆，從事檳榔栽培的家戶不需要放棄農地的耕作，又可以讓年輕男性兼差高雄工業區和周邊城鎮的公務機關工作。但是，輕鬆不代表收益少。在臺灣「錢淹腳目」的年代，檳榔價格非常優渥，當時有趕上熱潮的農戶，都曾在數年間賺取百萬以上的收入，甚至高於公務人員或經營小型工廠的收益。臺灣工業發展的經濟紅利，就這樣悄悄地透過檳榔流向了農村。

檳榔的經濟紅利，創造出一個相當富裕的世代。許多家戶增建了透天，那些由檳榔收益所建成的房子被稱作「檳榔屋」；接著家長又將檳榔的收益轉換成小孩向上求學的資金。對客家家庭而言，教育是一項重要的投資，被視為家庭階級向上流動的途徑。有一次，我與兩位在外工作的報導人談天，他們這麼看檳榔與自身的關係：

> 銘春評論農村年輕人外移的問題：「有人說就是因為檳榔產業不好，年輕人不回來」林弘馬上以自身經驗反駁「這說法完全不對，就是因為以前檳榔價格很好，才有辦法讓小孩全部都去讀大學，你知道嗎？那時候我們家幾分地而已，我爸媽都是老師，只有暑假兩個月會去割檳榔，我大學的時候（民國 78 年到 80 年），你猜猜看，一年賺多少？上百萬欸，

[13] 如灣農政單位自 1983 年起實施為期 6 年的「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六年計畫」，及後續延長六年的「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後續計畫」，除了每期作每公頃提供約 1 萬 5 千元的補貼金額給付外，針對其生產之經濟作物，政府亦以優惠價格收購。計畫的主要目標是舒緩政府糧倉容量與財政支出壓力，並適度從水稻產業中釋出農地資源（陳昱安 2017）。

doi:10.6342/NTU202601203

我的大學同學都叫我『檳榔公子』。是檳榔讓我們家庭有能力送小孩去都市念書，生活，所以才會在外發展。」(20240517 田野筆記)

林弘的故事能夠引起許多同齡壯年的共鳴，對他們來說檳榔「養大了他們」、開展了階級晉升的可能。在重塑一片衰敗的農業地景同時，檳榔影響了許多家庭乃至個體的生命軌跡，使其無論在經濟上亦或是情感上都有著難以抹滅的重要性。

或許我們會認為，檳榔讓一個現代性農業衰退的地景重獲新生只是特例。但若追查其他地方檳榔樹崛起的故事，會發現檳榔樹總是巧合地在各種受單一化農業的衰敗與全球供應鏈危機所侵擾的土地上蔓延。那樣的地方，可能是被廉價供應鏈拋棄的種植園，抑或是遭受寄身物種感染後失去生機的小農園圃。

例如，嘉義中埔鄉的丘陵雖有著和屏東平原截然不同的環境條件和產業發展歷程，但兩地 1980 年代時命運交會，成為臺灣檳榔的重要產區。中埔的丘陵地形雖不適合栽培水稻，卻適合栽培柑橘作物的柳丁。柑橘、香蕉和鳳梨是戰後初期頗具規模的外銷果品作物，很早就受到農政機構的輔導，在 1973 年中央政府設立的四個柑橘專業區中，中埔就是其中一個。然而，就在中埔柳丁栽培最鼎盛的 1970 年代末幾年，臺灣柑橘產地接連遭遇了乾旱，乾旱提供了亞洲柑橘木蝨有利的生存環境，共生其上的柑橘黃龍病病原菌[14]隨著柑橘木蝨的爆發，感染了脆弱且集中栽培的植株。此後，中埔的柳丁產業逐漸衰落，原本僅零星栽種於山坡和河階地上檳榔樹取代了柳丁，佔據了整座丘陵（冷函君、蘇淑娟 2010; 黃阿賢、徐信次 1999）。

另外一個看似和台灣無關，但劇本相似的是巴布亞紐幾內亞低地。低地是該國許多出口經濟作物如可可、咖啡、椰子的產地。然而 1990 年代這些作物價格下跌，可可又遭遇蟲害，許多小農淘汰了出口作物，選擇了和全球供應鏈脫勾的檳榔。經濟作物出現危機之後，跨國供應鏈有時重新關注巴布亞紐幾內亞，國家

[14] 該病原菌的暫定名是 *Candidatus Liberibacter asiaticus (LAS)*，寄身於植物韌皮部篩管細胞。

doi:10.6342/NTU202601203

農政部門會鼓勵農民栽培某些有外銷價值的作物，但從檳榔獲得穩定收益的農民仍有策略地保留檳榔樹，以確保在出口作物失去競爭力時，握有維生的保障（Sharp 2012）。

即便檳榔已成為農村中相當重要的收益，栽培規模亦日漸龐大，臺灣和巴布亞紐幾內亞的政府仍相當排斥檳榔樹的擴張。檳榔位於農業體制的邊緣，從未如其他經濟作物一般，獲得農政單位對其生命的照顧或制度化的管理。在臺灣，政府對檳榔農業的態度被農政官員稱作「三不政策」，亦即不鼓勵、不輔導但也不禁止。簡單來說，三不政策就是「沒有政策」，國家刻意抽身、讓檳榔處在農政的眼界之外，任由農民自身承受檳榔栽培的風險，預期在市場消退之後檳榔樹就會自然減少。

但是國家並非不關心檳榔。只是檳榔鮮少以農業問題受到關注，而是以公衛問題進入國家的視角之中。檳榔被納入公衛政策的議程，和脫離農政系統是兩個相互關聯的事件，背後展現的是檳榔論述的萌生，以及權力對不同生命的差異化介入。因此我們有必要探問，檳榔如何成為一個公衛問題？又如何回過頭影響檳榔的農業政策？在臺灣的脈絡中，檳榔公衛問題的增長與前文所述的歷史過程有關：當人們從失去競爭力的鄉村移往都市，檳榔與城鄉移民的勞動生活相互交織，檳榔相關的公衛論述也隨之蔓延並形塑了國家的治理方針。然而，檳榔的公衛議題不是一夕間出現，而是經歷了漫長的演變才成為今日所見的樣貌。

接下來，我依循著檳榔從一個具有治癒功能的物，轉變成公衛問題的生命史，由此將視角從臺灣的農村轉向都市，了解檳榔如何在國家的現代化措施和各種經濟力量的交互作用中喪失其作為「農作物」的正當性。

二、從「治病」到「致病」的檳榔

檳榔被視為公衛問題的主因是其對人體健康的有害性。現今檳榔與口腔癌

doi:10.6342/NTU202601203

風險之間的連結，幾乎已成為一項不言自明的事實。然而，過往歷史中檳榔常運用於藥物，人們對檳榔的認識遠比今日所理解的「致癌性」更加多元。事實上，檳榔最初被視為公共衛生問題的原因，亦非源自人體健康風險的問題。因此，有必要簡要回顧檳榔與人類健康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如何浮現為公衛議題，其焦點又如何發生轉移？

（一） 檳榔藥性與南方經驗

人類與檳榔互動的歷史相當長遠。根據考古學、歷史語言學的證據，檳榔的栽培與其食用習慣最有可能從亞洲大陸的東南沿海或是太平洋的島嶼區，透過各種文化交流傳遞到其它太平洋群島、南亞、東南亞、中國南方和臺灣（林富士 2023:47）。即便不同時代和地方吃檳榔的習慣有所差異，但大多都是伴隨著石灰、荖藤的花或葉共同食用，這些物質經由嚼食會形成紅色汁液，經常嚼食會染紅人的雙唇和牙齒，因此才會在考古現場的人體牙齒留下檳榔食用的線索。

除了在人體上留下深刻的印記外，檳榔內含檳榔鹼，會在食用者身上產生明顯的生理反應，例如興奮、體溫升高。因此，檳榔的性質比起水果更接近酒精、大麻和一些咖啡因作物，常以禮物和儀式物的形式出現在人類生活中，又或者是被分類在具有成癮性的嗜好品範疇。

與許多毒品的軌跡相似，在檳榔被現代國家法律界定成有害的成癮物質之前，曾在醫療體系中扮演藥物的功能。以中國的脈絡來說，自漢帝國向南方擴張以來，檳榔的醫藥功能就已經進入了中原的知識體系，特別是它緩解南方瘴癘和瘟疫的效果，許多北方人進入嶺南、閩粵地區都會入境隨俗地嚼食檳榔預防疾病；到了唐朝以後，檳榔已被廣泛運用於臨床醫療，不僅用於緩解南方常見的溼熱病症，亦可見於針對五臟六腑的治療之中（林富士 ibid.）。

若將視角聚焦臺灣，亦可從清代已降的文件觀察到，檳榔的藥用功能是普及的知識。如編於康熙年間的《諸羅縣志》和乾隆年間的《重修臺灣縣志》分別記

doi:10.6342/NTU202601203

錄了檳榔解瘴癘、防治疾病的功能，因此無論男女皆好食檳榔（林富士 ibid:219）；到了日治時期，初次統治熱帶島嶼的日人尚未熟悉臺灣本土的身體問題，包含悶熱造成的食慾下降、蚊蟲傳染疾病，即便現代醫學已跟隨現代化國家進入臺灣，原生於熱帶地域的檳榔與其藥用功能，仍持續受到日籍和台籍醫學者的關注，包含檳榔增加胃液分泌增加食慾、驅蟲和防範流行疾病的效用，其治病能力甚至進入醫藥科學研究的領域中（沈佳姍 2011; 陳正維 2014）。

至戰後初期，跟隨國民黨政權來到臺灣的中國知識份子將臺灣人食用檳榔的習慣重新納入中國南方風俗的一部分，其中不乏對檳榔藥用性的肯認，類似的敘事尤其常見於 1950 到 1960 年之間的報紙，例如 1952 年的聯合報本報訊提到：

> 北港的檳榔生意頗佳，每條街總有檳榔攤，檳榔現已不是老人家的嗜好品，連年青人也稱謂「台灣橡皮糖」，久嚼不厭，有人說「吃檳榔可預防齲齒，又可撲殺一切的傳染病菌」，真是好處不少。（1952-12-20/聯合報/04 版）

另外一則 1954 年的報導則提及檳榔應用於熱帶地方的中藥療效：

> 檳榔的功用很多，中醫常與常山、草果、柴胡等合用，以作驅瘧藥。其果皮稱大腹皮亦可入藥，為治赤痢及消導劑，現今德日專用為家畜的蛔蟲驅逐劑。又有消滯去膩的功效，故酒醉飽食之後，可嚼檳榔助消化。此外據說檳榔能增加暗視的功用，熱帶地方白晝天氣炎熱，各種活動多在夜間，人們之酷嗜檳榔大概亦與此有關吧？（1954-03-26/聯合報/06 版）

由此可見，到了戰後初期，檳榔與人體健康的討論仍相當多元，檳榔有害的論點

doi:10.6342/NTU202601203

還沒有成為普遍的觀念。不過，從日本殖民的現代性國家治理進入臺灣之後，檳榔已逐漸浮現成一個公衛問題。

（二） 公共衛生問題的浮現與轉變

即便清代的文件就曾零星紀錄臺灣食用檳榔的風俗，官方並沒有採取任何約束措施。檳榔真正成為「公共衛生問題」並受到防制的濫觴是日治後期到戰後初期之間。

日治時期部分文人厭惡臺灣人食用檳榔的習慣，官方也在許多場合中禁止國民食用檳榔，他們主要關心的是食檳榔時的不雅和亂吐（紅）沫的問題。例如 1908 年為縱貫鐵路完成而舉行之鐵道全通式，邀請閑院宮等貴族來訪，當局公告的送迎和拜觀者應遵守「在拜觀或送迎之際。不許吸煙或嚙檳榔樹果。」；1910 年代也有「近來傳染病預防法普及，及台灣鐵道各車站放置痰壺，可吐『赤唾』，減少病菌」之說。到了皇民化時期，日本政府對檳榔的態度轉為積極，以衛生之名在原住民住地推動禁食檳榔的風俗改良運動（引自沈佳珊 2011），不過當時因中日戰爭與二次大戰爆發，政府的政策推行效果相當有限。

同樣地，戰後的文人也對台灣人吃檳榔的習慣相當不以為然，如《國語日報》總編輯夏承楹，曾多次在聯合報專欄評論吃檳榔所造成的美觀問題：

> 就都市清潔的觀點上說，隨地吐沫如血，比吐痰更令人怵目驚心。尤其是在車站一類公共場所，更是觀瞻所繫，似乎不可不加以相當約束，因為現在已經不是蠻煙瘴雨的時代了（1954-03-16/聯合報/06 版）。

1960 年代之後，包含台北在內，許多地方政府也為了維護環境衛生，開始取締吐檳榔渣的行為。如 1970 年台北市環境清潔處表示：

doi:10.6342/NTU202601203

台北市後車站一帶及其他公共場合，常發現部份市民一面嚼檳榔一面亂吐，影響公共衛生與觀瞻甚巨，該處已通知衛生警察隊即日起加強巡邏取締，一經發現即轉各分局依違警罰法處新台幣六十元以下之罰鍰。（1970-11-05/聯合報/06 版）

從上述的文件可以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無論是日本政府或戰後國民黨政府都曾以公共衛生為由制定檳榔相關禁令，而這些禁令中又有不少與大眾運輸設施有關。即便至今，高鐵車廂內的廣播仍反覆提醒乘客請勿嚼食檳榔。這或許反映了在臺灣的政治脈絡中，交通建設不單是運輸的基礎設施，更是統治菁英向內、向外展現治理成果的現代性空間。為了透過交通建設營造出一個乾淨又進步的形象，會設法排除掉不符合現代性想像的元素，其中便包含了「吃檳榔」的行為。

同樣地，巴布亞紐幾內亞官方也禁止國民在生鮮市場以及某些城鎮範圍內食用檳榔和吐檳榔汁。國家對檳榔的管制隱含著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的目的，其效果是塑造一種現代化、西方化，甚至是基督教化的公民身份（Foster 1992）。由此可見，檳榔被問題化為公共衛生議題，首先反映的是東亞與東南亞國家對現代化進步景觀的渴望。

然而，以上的文件也說明了一個重要的資訊：日治到戰後初期，檳榔主要是以都市景觀問題進入公共衛生的範疇，而非口腔疾病問題。社會對檳榔的關注亦相當有限，更別說國家的醫療部門，以檳榔為主題的病學醫療研究幾乎沒有。約莫要到 1970 年代之後，檳榔可能導致口腔疾病的問題才逐漸浮現而受到醫學界的關注[15]。即便當時的醫療知識產出仍有限，但公衛問題的尺度逐漸從公共空間

[15] 1970 年代，聯合報上開始出現了嚼檳榔可能導致口腔癌的醫療觀念，不過當時主要將口腔癌的成因歸因於嚼食檳榔時會摻入的石灰。例如空軍總醫院牙科醫師吳秀敏指出檳榔對人體有益，但摻雜在檳榔上的石灰卻對人體有害（不明人撰 1970）；張寬敏醫師則是對大鼠做口腔實驗，發現用石灰及檳榔加石灰的塗擦口腔的老鼠，其口腔有潰瘍、角化的情形（彭碧玉 1997）。

doi:10.6342/NTU202601203

轉變到人的身體，而大眾認知中具有「治病」效用的檳榔形象亦被拋棄，取而代之的是它引發口腔癌的「致病」性質。

在檳榔逐漸從「治病」演變為「致病」的時代，臺灣的電視逐漸普及，主流媒體播送起「紅脣族」罹患口腔癌的新聞和遍布農地與山丘的檳榔樹。檳榔的流行和危機透過新的媒體技術印入大眾的視覺中，原本習以為常的檳榔景觀和個人嗜好擴張成公共事務，潛藏著對國民身體有不可估量的侵害，甚至動搖國本。顯然，檳榔公衛問題的轉移，不單是物本身意義的轉變，還涉及了臺灣整體社會的變遷和知識的誕生。

接下來，我嘗試將檳榔公衛論述的發展，放在臺灣經濟起飛的工業都市化時空中：在臺灣的農村逐漸蕭條的同時，工業部門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在社會快速重組的時刻，城鄉秩序開始鬆動，人口流動變得頻繁。當舊有秩序逐漸瓦解、人群之間的遭逢變得密集，圍繞檳榔的各種論述逐漸擴散。即便臺灣迎向一個經濟前景繁榮的新興時代，檳榔承載了上千年的政治性意涵卻被重新運用、轉譯並滲入了看似中性的流行病學知識中；在改善人們身體健康的美意之下，潛藏著社會變遷中的衝突和權力的萌生。

以下的分析中，我並不是要參與檳榔致癌的醫學辯論，進一步確認或反駁檳榔對身體危害的真實性，而是要探索檳榔流行病學問題被敘說、研究、成為定論並為不同行動者所用的社會過程。就如同許多嗜好品被國家界定成毒品的歷史[16]所示，物的用途以及認識論上的轉變不是客觀的過程，其中需要知識來中介真相，而真相的產製勢必涉及權力的運作。為了要讓故事更加清晰，我不只關心那些支持檳榔公衛論述和政策運作的國家機構和醫學家，還關心社會菁英和資本家如何參與進檳榔流行病學知識生產的背景，他們的觀點和論說為檳榔的公衛論述提供柴火，角色相當關鍵。

[16] 有關毒品的政策，美國發展出相當豐富的討論。無論是海洛因、大麻等毒品被問題化和法治化的過程，都受到出美國長期以來種族衝突和隔離政策的影響，相關論著可參閱 Schneider（2008）、Musto（1999）。

doi:10.6342/NTU202601203

三、從「南方」的他者到「流行疾病」的他者

1970 年代以來，檳榔的公共衛生問題逐漸從景觀衛生的層次，轉向對口腔疾病的關注，但是醫學界對檳榔致癌性的討論仍相當有限，到了 1990 年代流行病學的系統化投入才受到詳盡的認識。流行病學的專業是透過統計分析，找出食用檳榔導致口腔癌的好發人口資料和成因。然而，將檳榔與特定的群體連結並不是這個時代的新發明，而是來自檳榔相當古老的「他者化象徵」，這層象徵經過變形，重新部署於檳榔食用人口病理化的公衛敘事裡，在新的權力與生命治理形式中發揮重要的效果。

前文曾提及，作為棕櫚科植物的檳榔盛產於「南方」，嚼食文化也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帶，包含東南亞、大洋洲、臺灣、海南島、閩粵一帶。然而，「南方」是個相對的視角和敘事方位，其主要來源是西方列強、不同朝代的中國和 20 世紀的日本。是這些帝國在南方地域的殖民歷史，共同堆疊出檳榔的空間政治意義。

對於北方的帝國來說，檳榔總是與南方的熱帶景觀和南方異族連結在一起。嚼食檳榔的「南方異族」，在不同的脈絡中，可能指涉六世紀相對於北朝的南朝人、相對於中原朝廷的臺灣「土人」，抑或是近代臺灣社會中相對於漢民的番人（沈佳姍 2011; 林富士 2023; 陳正維 2014）。一方面，檳榔的藥用功能緩解了帝國進入南方地域時氣候和瘟疫帶來的不適經驗，而檳榔樹景觀及相關的文化習俗，則透過官方文書、旅遊文學中的文字與圖像記錄，或是博物館的展示輸送回北方帝國，成為人們想像熱帶風土與人情的媒介[17]；然而，在欣賞熱帶風景的另外一面，南方人嚼食檳榔的嗜好被用以證明其墮落的象徵、紅唇與黑齒被貶抑為南方風俗甚或惡習。即便，檳榔透過交易和文化交流進入北方社會，吃檳榔的習

[17] 這個現象在日本殖民時代相當普遍。所有日本舉行的展示會、博覽會只要有臺灣館，幾乎都會展出檳榔或原住民的檳榔習俗。日本殖民前期的公共空間，也會刻意栽培檳榔樹以營造熱帶的感官地景（林富士 2023；陳正維 2014）。

doi:10.6342/NTU202601203

慣並沒有穩定的疆界，但是在許多時候檳榔卻用以製造一種刻板化的他者形象，藉此肯認帝國自身文明化的地位，以及政治勢力向邊陲擴張的合法性。

傳統帝國看似在 20 世紀逐漸瓦解，但是來自帝國的凝視與檳榔的南方化他者敘事仍在戰後臺灣延續了下來。關於此，我們可以從戰後的菁英言論來了解。前文提到的國語日報編輯夏承楹曾在聯合報上如此評論檳榔：

> 聽說中國是沿粵江流域和洞庭湖以南的人有此嗜好。往南，越南，寮國，暹羅等國人更愛吃。中國大陸上吃檳榔的風氣，民國後已經大減，紙煙盛行是一個大原因。近年更時興嚼口香糖，怕牙齒長長的人不愁沒事情作，這種「國粹」就慢慢兒的保不住了（1954-03-16/聯合報/06 版）。

其他讀者看了他的文章回應，想起了原鄉的遭遇：

> 讀了十六日何凡(夏承楹筆名)先生的「嚼檳榔」一文，馬上使我想起了我們家鄉那些嚼檳榔人的樸實面孔，同時也使我回憶檳榔的那股春味，於是我的涎水又流出來了……不嚼檳榔的人是不知道其中滋味的，吃慣了也許你就會像抽鴉片煙一樣的不能戒除了。尤其是別人正嚼得津津有味的時候，而你袋裡剛好一文不名，無法也買一枚來細嚼時，這時是非常難過的，甚至馬上會淌口水（1954-03-20/聯合報/06 版）。

當時的報紙還刊載許多類似的敘事，大多是跟隨國民黨政權來臺的菁英所撰。他們藉由臺灣的檳榔地景連結起中國南方故土的懷舊記憶，同時將其界定為不合時宜、應隨中國現代化進程而退場的風俗。這種觀點獲得當時知識分子的共鳴，一個大學生在聯合報刊載文章表示：

doi:10.6342/NTU202601203

我不吃檳榔，所以常想吃檳榔的人，一定是夠無聊的。鄉下人把檳榔塞在口裡細嚼，也許就只為了消磨時間吧！如果我也吃，和他們一樣是「朱唇」而「吐血」，那簡直是丟盡了大學生的面子（1955-04-14/聯合報/06版）。

戰後跟隨國民黨來臺的菁英，大多擁有較大的機會填補臺灣領導階層，透過國家的分配與安置，居住在與本省住民分離的空間之中。對他們來說，拒絕檳榔不僅隱含著對現代化中國意識形態的追求，也是要確保自身的身體與農民、臺灣普羅階層有所區隔，進而鞏固其在社會中的主導地位。

然而，到了 1970 年代之後，菁英與其他階層的生活世界失去界線。當時歐美工業部門從本土出走，向東亞尋求更廉價的環境與勞動力成本，將農村農業人口吸引到非農部門成為受雇者，取得比起家庭農場上更加充分的收入，許多鄉村和原民部落的壯年男性離開了家鄉到都會周邊與或代工廠打拼。同時，為了要促進產業升級，一系列重大的交通基礎建設也跟著啟動，其中高速公路的興建不僅讓人的移動和交換變得頻繁，還創造出一批專門往來各地的貨車司機。對這群新興的勞動階級而言，嚼食檳榔能使體溫上升、改變心跳節奏，緩解長時間勞動所帶來的疲勞，同時也可作為異鄉人之間建立關係的社交物。很快地，檳榔的消費量大幅增加，在 1980 至 1990 年代間成為炙手可熱的商品。檳榔攤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臺灣各地的建築工地福利社、交流道與省道周邊，檳榔的價格跟著水漲船高，最高峰的年代，一顆檳榔甚至要價 50 元；而紅唇族與檳榔西施，遂成為臺灣經濟起飛時期社會繁榮的風景。

當這群臺灣農村與部落的壯年進入都會周邊填補了經濟起飛的勞動力需求時，聚居城市空間的菁英階層，將城鄉移民引發的秩序重整與其帶來的焦慮，投射到對嚼食檳榔習慣擴散的不滿上。1981 年夏承楹又再次撰文，這次不僅批判檳榔不衛生，還進一步指控檳榔惡習跟著移民從南臺灣向都會區——特別是台北

doi:10.6342/NTU202601203

擴張：

嚼檳榔是一種不衛生的惡習，食者不但損傷身體，而且污染環境。世界上文明國家人民都沒有這種嗜好，研究檳榔問題的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稱之為「非知識階層的嗜好」，也是指知識份子不嚼檳榔。台灣的檳榔癮士南部多，北部少，和知識水準不無關係。北部人初次到南部，看見車站或其他公共場所地上一灘一灘的「鮮血」，會大吃一驚。等到知道那是檳榔渣以後，又會奇怪怎麼會染上這種嗜好。如果有僑胞或外賓問是什麼，更有難言之苦。近幾年台北嚼檳榔的人漸漸增加，十字路口檳榔攤越來越多，汽車停下等綠燈的時候，常常有人打開車門，伸頭「吐血」，有人說這是因為中南部北上謀生的人日多，把嚼檳榔的習慣帶來了。上個月底到高雄去，看見市街上的檳榔攤燈火輝煌，裝飾豔麗，不愧為先進業者，說不定台北不久也要跟進了(1981-11-12/聯合報/08 版)。

由此我們可以看見，過去北方人對南方人吃檳榔嗜好的貶抑延續了下來，不過演變成台北菁英對南部城鄉移民的歧視。夏承楹並不是唯一提出類似觀點的人，1980-1990 年代的聯合報新聞密集出現類似的報導，指出吃檳榔的習慣隨著城鄉移動，從勞動階層、臺灣南部和東部原住民部落蔓延到都市的中上階層：

這些年來，也不知怎地，檳榔如野火燎原般地在台灣蔓延開來，大街小巷、窮鄉僻壤，處處可見或大或小的檳榔攤，隨時隨地，都可瞧見滿嘴腥紅的男男女女，歪過頭來，打開積架汽車的車門，夾雜著國罵省罵，「呸」地吐出一地血紅，流風所及，就連許多原本厭惡檳榔的中上階層，也逐漸淪落為檳榔族了！（1990-07-23/聯合晚報/15 版）

doi:10.6342/NTU202601203

和 Foucault（2022[1976]）筆下的歐洲性論述和醫療技術向俗民階級擴張的歷史相似，工業都市化引發的社會衝突和對勞動力的需求，同樣在臺灣引導出檳榔相關的流行病學研究的孳生。1990 年代後，公共衛生與口腔醫學機構開始密集生產科學知識，嚼食檳榔的習慣逐漸被納入口腔流行病學的討論框架之中，不再只是城市菁英表達自我認同的敘事。

最具指標性的是 1996 年由國家衛生研究院所成立「衛生論壇」。論壇中的「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委員會」將檳榔與口腔癌納入其研究議程，並陸續出版具權威的論著，逐步確立兩者之間的致病連結[18]；到了 2003 年，檳榔甚至被國際癌症研究總（IARC）認定為一級致癌物。從 IARC 當時所邀請的國際學者名單，以及其決策文件中所引述的研究來源，可以看出臺灣國家衛生研究院學者的影響（林富士 2023:7）。

流行病學的研究除了以科學實驗和臨床統計證實了檳榔與口腔癌的關聯，對社會影響最深刻的，是生產出病理化的人口。其中，學者葛應欽於 1992 年發表的研究影響尤為深遠，後續多數口腔癌流行病學研究皆援引其結果。葛氏分別抽樣調查了高雄市居民與南臺灣原住民族群，比較不同年齡層的檳榔嚼食比例。他指出嚼食檳榔的行為，主要集中於教育程度較低者、勞工階級、已婚男性，以及同時具有抽菸與飲酒習慣的人群（Ko, et al. 1992）。這些看似客觀的調查，其實在抽樣的母體選擇和資料分類，就已預設了嚼食檳榔與南部人、原住民還有中下階級的關係。這樣的偏見更直接地反映在葛氏對檳榔文化傳播的論點：即便根據歷史考察，我們可以知道漢人在中國原鄉接觸檳榔的歷史長達千年，葛氏卻推論臺灣漢人嚼食檳榔的習慣，是明鄭時期移民臺灣後入境隨俗向原住民習得的風俗（葛應欽 2001:41）。

[18] 國家衛生研究院出版了三本具權威性的論著，詳論嚼食檳榔與口腔癌間的致病原理和流行病學現象。這三本書分別是賴淑美總編《檳榔嚼塊與口腔流行病學研究》（2000）、賴淑美總編《檳榔嚼塊的化學致癌性暨其防治：現況與未來》（2000）、賴淑美總編《嚼檳榔與口腔癌基因、抑癌基因的突變和表現》（2000）。

doi:10.6342/NTU202601203

除了葛應欽，許多學者又再進一步針對少年等群體進行抽樣調查，指出嚼食檳榔的習慣已經從南部與中下階層蔓延到北部與其他社會階層，甚至是擴張到青少年社群。例如，省立基隆醫院牙科醫師廖學謙指出：「以往吃檳榔的消費群大多是屬於勞力階層，但是根據學術單位的研究調查，吃檳榔的消費群已擴大到各行各業」，而長年推動檳榔防治的韓良俊 （2001）醫師更是嚴厲指控檳榔蔓延所帶來的國家危機：

> 根據多次流行病學的調查，亦知檳榔族已經由鄉間擴散至臺灣各大城市及社會各階層，而且年齡易有明顯下降的趨勢……嚼食檳榔這種惡習除了會使自己本人惹禍上身外，還會拖累家人和社會；甚至還可能禍延後代，謂其「亡國滅種」，實在一點也不假。

韓良俊認為，檳榔食用者和口腔癌患者集中於承擔家計的男性勞工，其氾濫的效應會從個人習慣溢出，造成社會最根本的單位「家庭」的崩解。此外，他更認為檳榔就如同原住民出草、漢人裹小腳的習俗，具有社會負面價值且沒辦法追隨社會進步的脈動。而檳榔文化的盛行和氾濫，代表的是「臺灣人民反智與墮落的心態」，因此全民都應該「自我反省、謀求改善」。韓良俊的呼籲，使得檳榔的防治，超越了個人成為公害問題，甚至從流行病學的課題，被提升為需要動員整體社會的道德工程。

整體而言，流行病學家所生產的疾病人口科學數據，呼應了早年居住於城市的黨國菁英對檳榔食用版圖擴張的恐懼。但透過醫療知識的建置與轉譯，檳榔複雜的政治性被轉化為客觀的流行病學現象。於是，臺灣經濟起飛的黃金年代中混雜著階級、族群、殖民歷史與經濟發展的衝突，透過檳榔的流行病理化隱身到公共衛生問題之中；公衛的改善措施立意良善，卻讓權力關係變得更加幽微，亦淡化了特定族群——包含原住民與鄉村外移男性食用檳榔所關聯的勞動條件和結

doi:10.6342/NTU202601203

構位置。



四、台塑：檳榔論述的企業隱線

透過上述的歷史爬梳，可以理解檳榔醫療論述生成的臺灣工業化與都市化背景。引人注意的是，韓良俊醫師曾意外地在文章中引用台塑集團王永慶對檳榔的批評。他提到：

> 台塑董事長王永慶先生有言：「沒有絲毫正面意義的檳榔，竟然大行其道，人人爭食，已經淪為文明社會的文化死角。」又說：「檳榔文化顯現我們的社會缺乏自我反省及謀求改善的機制與功能，就像人體免疫系統出了異常，無力抵抗侵入體內的病菌！」是耶，非耶？頗值得我們全國國民，不管是政府官員、或民間人士三復斯言，並迫切地加以省思！（韓良俊 2001）

所有國家計畫的起源都不是來自單一的起源，其中總涉及多重行動者的觀點和利益，每個行動者提出主張的目的有所不同，也不一定是服務統治階級的利益（Li 2005），但是不同來源的主張可能在特定的時刻匯集結盟。王永慶的現身，讓我們可以從國家的檳榔防制措施中拉出一條鮮少受人注意的「企業」隱線。

早在國家衛生研究院針對檳榔的流行病學展開系統性的研究之前，王永慶就多次發表他對檳榔的厭惡。例如在韓良俊引述的原文中，王永慶（1995）特別將臺灣的情況與香港、新加坡等在國際上與臺灣競爭的經濟體相比，指出這些地方如何受到西方文化薰陶，教化國民改善吐痰和丟棄果皮的衛生惡習。他藉由國際政治上的比較遊說臺灣領導階級應該也要跟隨腳步，由官方到企業主動落實教化民眾的責任，抑制嚼食檳榔的惡習、表彰正確的行為。的確，王永慶也將理念落

doi:10.6342/NTU202601203

實在企業的管理措施當中：台塑的工作空間嚴禁員工和包商嚼食檳榔，在六輕工業區中嚼食檳榔的員工甚至要承受比一般大眾在捷運上嚼食檳榔更嚴苛的罰款（張朝欣 2015）。

追蹤隨後幾年有關檳榔的論說行動，可以發現王永慶本人亦或是台塑集團針對檳榔的負面主張，其實會隨著時間推移而調整焦點。1997 年王永慶在聯合報發表了一篇社論，羅列了臺灣社會需要改善的三大問題，其中一項就是檳榔。他對檳榔的批判一改先前論點，指出檳榔不僅涉及道德問題，更進一步指控檳榔農業造成水資源問題：

> 種植一公頃的檳榔樹，每年將會造成五萬公頃地下水的流失，目前台灣約有五萬公頃土地種植檳榔樹，會導致每年地下水的流失量高達廿五億公噸，相當於十個石門水庫。由於濫植檳榔樹的結果，每當強大颱風來襲，都會造成山地水土保持的嚴重破壞，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因此不可單純以私德問題視之，而是應該將其問題置於有關公眾事務的法令規定之下，並且設法做到令行禁止（王永慶 1997）。

他還進一步獻計政府，提出一套以面積為單位剷除檳榔的政策：

> 衡諸事實，由於種植檳榔以後可以收成三、四十年，今天若要將之砍除，恐怕會遭到嚴重抗爭。我們認為，政府如果能夠兼顧情理法，每公頃可以酌量以一百萬元彌補農戶，一舉將檳榔樹全部鏟除。若論實際，一公頃一百萬元也許不是很夠的，但是請農戶們為了國家整體利益，以及後代子孫的福祉著想，大家能夠一起來配合政策。以十萬公頃計算的話，全部就是一千億元，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數目，可是如果因此而能夠消除檳榔種種危害，應該也是值得的。

doi:10.6342/NTU202601203

另外比較有影響力的，是和台塑關係密切的南海文教基金會自 1996 年起陸續推出的一系列「反檳榔運動」公益廣告。當時南海基金會發表的廣告數量多，又動員了許多企業界和政界人物參與實體公益活動，吸引了不小的社會關注，多位參與立委甚至決定跨黨派，比照菸害防制法，力促立法防治檳榔危害（何佩儒 1996），1997 年，行政院也的確在各方壓力下通過了臺灣第一個以檳榔為主軸的官方治理計畫──「檳榔問題管理方案」。南海文教基金的組成除了文教人士外，還由許多本土企業家，執行長是後來任台塑旗下台亞石油董事長的戴一義，戴一義政商關係良好，在台塑擴張石油供應版圖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於南海文教基金會與台塑關係密切，亦經常作為官方與王永慶之間溝通往來的窗口，引起檳榔從業人對台塑極大的不滿，其中，屏東的盤商特別集結了從業人到台北的台塑總部抗爭：

> 約近千名屏東縣種植檳榔的農民今天上午北上到台塑大樓前抗爭，拋撒上萬顆檳榔抗議台塑集團支持南海基金會進行「反檳榔」宣傳，並以「吃檳榔亡國」等口號使得檳榔市價從一顆 13 元降為 2 元，又在工作規則中規定台塑員工吃檳榔要記過處分。（1998-07-06/聯合晚報/07 版）

當年參與抗爭的盤商歷歷在目地告訴我，他們總共號召了上百台遊覽車，可見反應熱烈。屏東檳榔從業人的集結並非單一動機所致[19]，其中一個原因是屏東農民不滿他們身在平地產區，卻要承受水土保持的罵名。

2008 年王永慶辭世，象徵石化「經營之神」時代的落幕。然而，台塑的檳榔論述並未隨王永慶的離世終結，而是與 2000 年前後逐漸定型的檳榔流行病學知

[19] 當年號召抗爭運動的盤商還提到，台塑之所以如此積極地發表檳榔相關論述，與其在屏東南州糖廠投資八輕的規劃有關。彼時檳榔產業為屏東平原規模最龐大的農業部門之一，因此屏東地方上傳出，台塑之所以頻繁介入檳榔議題，是出於其企業布局的考量。

doi:10.6342/NTU202601203

識匯流，捲入 2010 年代六輕環境公害的科學戰爭之中。

自麥寮六輕營運以來，周邊鄉鎮罹癌得病的患者無數，但國家和學術界鮮少關注癌症流行與環境因素的關聯，而空氣品質與 PM2.5 的觀念亦不普及，地方居民們眼看六輕日夜排放濃煙，也不敢妄下汙染的定論。直到 2010，六輕連續工安意外，暴露六輕工安問題嚴重，也具現了污染，大量養殖魚隻、幼鴨死亡，引發千名麥寮、台西鄉民到廠區大門前抗爭（引自蔣宜婷 2018）。前後幾年，公衛和環境科學研究接連指出六輕營運對健康的顯著影響。例如，台大公衛學院詹長權教授 2009 到 2011 年間針對雲林縣沿海地區進行流行病學追蹤研究。結果顯示，距離六輕 10 公里內的麥寮、台西居民，癌症發生率不僅高於雲林縣其他鄉鎮，也隨六輕營運時間增加，而逐漸上升。在詹長權研究結果受到矚目的同時，PM2.5 的概念也逐漸為臺灣社會所認識，居民開始認知六輕汙染如何透過立體空間的蔓延影響自身的身體，台塑成為雲林沿海地帶癌症流行的究責對象（蔣宜婷 2018; 盧敬文 2016）。

這一系列的科學研究和輿論引發台塑嚴重的公關危機。為了要破解六輕汙染致癌的觀點，台塑集團控告了提出 PM2.5 問題的學者莊秉潔，又藉由不同的科學檢測、歷史數據，提出與居民經驗相反的辯詞，這些辯詞再透過台塑的地方刊物《親親日報》傳送到資源取得有限的居民手中（蔣宜婷 ibid）。簡單來說，台塑的作法就是質疑對自己不利的檢驗標準與方法，使那些控訴六輕汙染公害的科學數據失去有效性。

讓那些不利自身的科學數據失去公信力還不夠，台塑更設法轉移民眾的注意力。在台塑回擊輿論的科學戰爭中，和台塑集團友好，甚或是接受其委託研究的科學家，是將環境公害焦點轉移的主力軍。他們透過科學數據的推論，將居民癌症的流行歸因於個人飲食與生活習慣。其中一個具代表性的學者是國衛院的溫啟邦，他在 2011 年前後接受台塑「健康風險新觀念營造策略研究」計畫的延攬，研究石化產業周邊居民的健康與壽命，目的即是要化解石化產業汙染的疑慮。溫

doi:10.6342/NTU202601203

啟邦多次發表石化產業汙染未定的言論，例如在鄰近六輕的橋頭國小許厝分校遷校爭議中，溫啟邦與多位學者在中央舉行的專家會議中做出關鍵的發言，指出孩童尿液化驗的異常[20]不一定來自六輕的汙染。另外，在環保署關於 PM2.5 的專家會議中，溫啟邦為台塑辯護，指出 PM2.5 主要來源是吸菸，吸菸和嚼食檳榔同樣是癌症高風險來源，因此吸菸和檳榔防制比起 PM2.5 更治本（房慧真 2018）。

溫啟邦的論點始終如一：當地居民罹癌的主因是個人習慣，不是環境汙染。為了證明論點，他透過數據指出無論六輕進駐與否，雲林人的身體本來就比其他地方還要差，壽命也比較短，這是因為：

> 雲林縣男生的吸菸率與嚼檳榔率都是全國數一數二的，根據 2005 年全國健康訪視調查 (NHIS)，雲林縣男生 2005 年現在與過去曾吸菸的吸菸率是 57%，嚼檳榔率是 45%，幾乎每兩名成人就有一名吸菸嚼檳榔。所以所受到的菸害及檳榔害也是全國名列前茅（溫啟邦 2013）。

為什麼雲林縣民，特別是六輕周邊的沿海居民會吸菸嚼食檳榔呢？溫啟邦的解釋和先前檳榔流行病學的論述如出一轍，將嚼食檳榔連結於居民的低社經地位。相反地，他進一步指出，六輕員工因為習慣好，就比較沒有吸菸與嚼食檳榔致癌的問題。因此，若要防治雲林人的高癌症率，溫啟邦認為「最重要的是靠菸害防制、檳榔防制，提高收入，高談 PM2.5 於事無補。」（引自黃世澤 2011）。

除了溫啟邦，台塑的醫療機構亦透過科學統計佐證六輕周邊居民健康問題來自吃檳榔和抽菸習慣。如長庚科技大學師生及長庚醫院 2011 年分析麥寮居民不健康的原因，他們的研究指出麥寮居民口腔癌發生率在六輕設廠前後普遍高於全

[20] 詹長權研究團隊採集六輕周邊，包括許厝分校在內的五所小學學童的尿液和血液。化驗發現，距離六輕只有九百公尺的許厝分校，TdGA（硫代二乙酸）濃度是 193，明顯高於其他學校。而且距離六輕越近的學校，TdGA 濃度也越高，表示受到 VCM（氯乙烯）暴露程度也越嚴重。

doi:10.6342/NTU202601203

國平均，原因是麥寮居民有高比例抽菸、吃檳榔的習慣。研究進一步指出，有這樣習慣的人通常亦缺乏運動和口腔衛生維護等自我照顧的行為，且又好發於男性、低收入、學歷較低的居民（張蕙珍、莊雅婷等 2014）。

由此可知，檳榔導致口腔癌，且集中於低社經階級的觀點已成當時的定見，為台塑還有為其辯護的學者節省了流行病學的知識生產成本，可以直接將癌症的區域性流行推向當地人抽菸與嚼食檳榔的習慣。事實上，這樣的做法和論述方式並不是台塑發明的，全球各地的政府和高汙染工業企業經常使用類似的手段[21]，將居民疾病問題歸因於不良習慣，進而轉移環境公害的焦點。當癌症流行的起因，從環境公害轉向居民的習慣問題，而健康風險的責任亦從企業，轉向缺乏自我照顧能力的個人。

將癌症的流行被歸因於缺乏自我照護能力的居民之後，台塑遂順理成章地將自身從污染的始作俑者，轉化成回饋鄉里的善心企業姿態，透過學術與醫療機構深入當地。例如，自 2011 年起，台塑集團每年開設為期六週的戒菸班，並結合雲林長庚醫院的戒菸門診，進入社區協助居民戒菸；雲林長庚亦自 2011 年 5 月起提供牙科門診服務，加強麥寮地區的口腔保健；同時，台塑還進入麥寮地區中學，每週開設衛教課程，教導學生抽菸、飲酒與嚼檳榔對健康的影響。除此之外，台塑企業管理部出資委託長庚醫院免費為麥寮與台西兩鄉居民辦理健康檢查[22]，對受檢者進行菸、酒、檳榔防制的衛教宣導（張蕙珍、莊雅婷等 ibid.）。

雖然台塑醫療機構在雲林的介入別有居心，卻也呼應了 2000 年以來臺灣社會日益普遍的檳榔防治模式：將關注集中於檳榔食用者的身體，並引導其進入專業機構，壟斷檳榔食用者對自身身體的認識內容。或許正因這種作法已成常態，

[21] 經典案例是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化學與石化工廠林立的「化學走廊」（又稱癌巷 Cancer Alley）。當地非裔居民有高比例罹癌患者，化學工廠與政府機構將健康問題歸因於居民低社經地位所帶來的個人生活習慣，如吸菸、久坐和食用垃圾食物（Singer 2011）。

[22] 由於長庚醫院並不是公正的第三方機構，在敦親睦鄰表象之下，免費健檢隱含台塑建置居民流行病學資料庫的意圖。台塑刻意納入先前備受爭議的檢驗項目，藉此在日後訴訟與輿論爭議中選擇並動員相關數據，反駁不利於六輕的指控（盧敬文 2022）。

doi:10.6342/NTU202601203

台塑旗下機構的檳榔論述與相關醫療活動並未特別引起注目和討論。接下來，我將回到臺灣整體社會，說明在 1990 年代發展出來的檳榔流行病學論述如何形塑出國家的檳榔政策。

五、受到監護的人類身體和脫離監護的檳榔

臺灣政府對於檳榔的態度一直較為消極，然而隨著上述的社會菁英、流行病學家和企業界的呼籲，檳榔在 1990 年代躍升成一個具有政策規範急迫性的公害危機。同時，學者們亦要求農政單位檢討長期遵行的「三不政策」，以更積極的手段從生產源頭防治檳榔的危害。

就在 1996 年南海基金會邀請交通部官員、跨黨派立法委員參與檳榔防治廣告發表會後的幾個月，行政院決定「施鐵腕，全力整頓檳榔問題。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連戰在行政院院會裁示，可研究比照菸害防制法，以嚴竣的立法，革除民眾嚼檳榔的習慣」（引自馬道容 1997）同年四月，行政院核定通過了〈檳榔問題管理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方案集結了九個部會（衛生署、內政部、教育部、國防部、農委會、環保署、財政部、經濟部、國科會），著手彙整檳榔各面向問題並訂定相關執行目標，包括降低與預防兒童、少年嚼食檳榔行為、降低國人嚼食檳榔比例、加強查緝檳榔走私進口、將檳榔業納入公司行號以加強管理並予課稅，取締檳榔攤占用道路及僱用未成年少女穿著暴露服裝販售檳榔之行為、保育水土資源等。

〈方案〉總共執行三年[23]，是臺灣史上最具規模的檳榔政策。當時的政策執行內容不僅納入了農業部門，更動員了相當多行政部會，說明檳榔作為一個涉及不同社會範疇、需要不同行政部門共同治理的對象。那麼，〈方案〉的推動是不

[23] 關於〈檳榔問題管理方案〉的執行內容，主要參考的是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的〈「檳榔問題管理方案」實地查證報告〉（1998）及衛生署的《檳榔管理方案執行情形》（1998）兩份文件。

doi:10.6342/NTU202601203

是就代表檳榔正式進入農政單位的行政體系、如同其他作物一般受到規範和輔導呢？細究部門之間的權責和分配的任務，可以看出政府著力之處並不均勻，權力施加的對象和形式亦有相當的落差。

首先，擬訂計畫的部會是衛生署，由衛生署分配工作計畫給其他部門，也就是說，公共衛生依然是〈方案〉執行的主旋律。再者，各部門被分配到的計畫項目又可大致分成兩類：第一類工作較為細微且複雜，具體內容是在全國各地設置警察、醫療和矯正措施，旨在檳榔食用行為的防制、監護與宣導，主要交由衛生署、教育部與國防部執行；第二類工作則是負擔基本資料統計、從業人納管等任務，根據主管權責分配給掌管農業生產的農委會、課徵營業稅的財政部、監控水土保持的環保署等機關。這兩類工作計畫項目的差異，相當巧妙地反映出國家對檳榔治理技術的性質差異，和對社會不等的介入。

首先，衛生署、教育部和國防部的工作，是在國家各地佈置各種檳榔對身體有害的宣導媒介如海報、布條，張貼在民眾洽公的場所、交通設施、醫院，另外也在軍隊和學校課堂中撥放影片，這些四散各處的媒介簡而有力地傳達檳榔有害的論點，讓國民隨時都可以看見檳榔的害處，就如同冷戰臺灣無所不在的「保密防諜、人人有責」標語一樣，進入了人們日常活動，隨時都能經驗到國家對人民身體的凝視和規訓。另外，衛生署、內政部和教育部分別在在醫療、警察和教育機構中設置口腔醫療相關的措施，訓練專業人員進入執法、醫療或教學現場，將吃檳榔風險高的國民引導進入診間、家庭訪查還有學校的輔導室，成為受到研究、疾病檢驗和衛教的對象。其中學校對學生的監控最為徹底，檳榔被納入「春暉專案」，簡單來說，就是藉由軍訓教官及護理教師於校園執行學生生活輔導，針對有物質濫用可能的學生加以檢查和輔導。

就如同 Foucault（2022[1976]）對生命權力的考察所示：權力行使是將人類的性行為理性分類並讓反常成為可見，而不是要將性秘密化，更不是透過懲罰達到禁止的效果，而是要揭露秘密，框定出「性的反常」。國家對檳榔食用行為的

doi:10.6342/NTU202601203

防治，亦是透過教育和醫療機構的布建，讓有風險的身體走進診間和矯正機構受到觀察和監控。因此國家政策的執行目的並非禁止檳榔的食用，反而仰賴檳榔讓特定的人口可以被辨識出來，同時也藉此引導人們進入專業的醫療脈絡中認識自身的身體。如近年衛生福利部舉辦的檳榔危害防制公聽會議中，有牙醫師反對對檳榔進行嚴格的執法，這是因為嚴格執法會導致「吃檳榔的人，出現徵兆可能因此不敢就醫，這也不是醫界所樂見！」（衛生福利部 2022）

然而，當檳榔食用者透過國家所建構的網絡引導至醫療與教育場域受到觀察和輔導，〈方案〉中針對檳榔產業的管理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治理邏輯。攤開其他部門的工作項目，諸如財政部的營業登記、經濟部的攤位管理，以及農委會對山坡地檳榔種植的調查和造林計畫，都相當貼近於 Scott 所說的國家精簡化視角，亦即透過表格化的知識讓真實世界可供辨識，且主要聚集在視覺上的工程。這樣的治理邏輯是一種由上而下的視角，缺乏對社會細微且多尺度的凝視和介入，更總是因缺乏對真實世界的瞭解而造成政策失敗。例如 1998 年〈方案〉執行後一年的報告書提到，承租山坡地栽培檳榔的農戶大多還從事其他職業，農政人員根本難以聯繫到園圃主人，且農民大多拒絕農政單位的造林計畫，山坡地種植檳榔樹的問題並沒有得到改善；另外，經濟部原計畫要將檳榔業者納入公司、行號依法加強管理，但因為檳榔攤經營規模相當參差又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就連邀請攤商舉辦說明會都困難重重，要求攤商營業登記更是不可能的任務。或許可以說，〈方案〉針對產業的管理計劃看似旨在將檳榔產業鏈納入行政系統，以便國家介入管理或徵收稅收，更重要的目的或許是將產業活動轉化成可以理解的格式，向監督機關乃至社會展演政府在檳榔議題上的著力，但在計畫執行結束後，仍沒有成功將檳榔的產業納入行政系統之中。

不過，農政單位一直沒辦法深入檳榔的治理體系，還來自相當務實的制度限制：由於檳榔已明確被界定成致癌物，卻又不具有致幻或明顯成癮性，使其在臺灣的行政分類中長期處於一種曖昧的「準法律地位」（quasi-legal status）。在既有

doi:10.6342/NTU202601203

的行政體系中，檳榔無法被納入食品藥物管理署所管轄的毒品或管制藥物，也難以納入一般農政體系中的「初級農產品」，因而落在兩套制度分類之間的灰色地帶。理論上，若檳榔被界定為毒品，其栽培與流通行為即可依刑法或相關法規加以禁止；反之，若被視為一般農產品，則其栽培與交易活動應可比照其他果品作物，納入農政體系的產銷制度與技術管理。然而，正因為檳榔涉及公共衛生風險與實際的農業生產活動，將其納入毒品或農產品兩種制度框架皆引發爭議：

> 農委會表示，檳榔的問題的確很「矛盾」，一方面它已是台灣農民很主要的一種作物，但是又因為上述的負面因素而無法給予輔導、鼓勵，但是在另一方面，對於要禁止檳榔的種植又於法無據，因為它并不是大麻、罌粟之類的毒品（陳佩周 1994）。

結果是，無論食品藥物或農業主管機關，都僅能對檳榔的經濟活動進行基本的統計工作，難有充分的制度正當性來納管檳榔產業，使檳榔長期處於行政體系邊界的灰色治理空間，亦預言了〈方案〉的注定失敗。

另外，檳榔的準法律地位，還展現出公衛部門和農業部門之間一個相當具張力的治理交點——人的身體。雖然農政單位治理的對象主要是非人作物的生產與流通，但其制度目的始終與國民健康與人口的福祉密切相關。農政體系所關注與研究的作物，往往都被賦予特定的人口治理意義，像是能夠提升國民勞動力的糧食作物，或提供營養的蔬果作物。農政單位透過技術改良增加產量穩定性，並透過市場的建置監控作物的價格甚或有毒物質的殘留，因為這些作物的繁盛亦指向人口的繁盛。換言之，農政單位透過作物的改良、增產與流通管理，間接參與了國家對人口品質的經營。正因如此，當檳榔被確立為對人體健康具有風險時，農政單位的治理技術的邏輯便難以成立，亦缺乏適當的制度工具對其進行治理，使檳榔長期處於農政體系難以著力的邊緣位置。

doi:10.6342/NTU202601203

在〈方案〉之後，政府也注意到檳榔尷尬的行政地位難以適用〈方案〉那種依不同部門專業分配工作的跨部會治理架構，因此 2010 年、2025 年衛生署（後改制衛福部）曾兩次研擬檳榔健康危害防制法，計畫以「專法」的形式規範檳榔的種植和經濟活動。例如在 2025 年「檳榔健康危害防制法草案」規劃階段，衛福部會同農業部等相關部會，就行銷、場所宣導等研擬輔導規定；至檳榔原料部分朝向「比照作物管理，進入市場後則朝向比照其他後市場管理」。但是這兩次的草案因牽涉公衛之外的專業部門，「有外行領導內行之虞，亦與現行法制不符」（監察院 2021），並且在檳榔從業人的抗議下暫緩推行。因此到目前為止，從中央到地方農政機構對檳榔農業體系的介入仍相當有限。一個農業領域的專家就曾表示：

> 政府不鼓勵栽種檳榔，所以農業學術領域內，現在幾乎無人做檳榔的研究，農業單位開會時討論的都是「怎麼砍」。（余雪蘭 2016）

這段話生動地反映出農業部門對檳榔治理的基本方針，亦即將重點放在檳榔園面積的統計與縮減措施，而非生產管理或技術輔導。農委會和後來升格改制的農業部曾於 2007 年、2014 年及 2023 年辦理「廢園轉作」計畫，雖然補貼內容和規則略有差異，但同樣都是藉由廢園和種苗費補助誘因，鼓勵農民申請檳榔園廢園並轉作其他作物。然而廢園轉作計畫總是失敗收場：2007 年那一次計畫目標 5 年內縮減 3928 公頃，最後真正執行的面積僅有十分之一，減少的幅度甚至比沒有推動廢園政策還來得低（曾淑敏、廖安定 2009），因此轉作措施僅開辦一年就停辦；2014 年那一次則因執行效果不彰遭監察院要求檢討改進（監察院 2021），至於 2023 年的計畫（2023-2026）仍在執行中。

這些一再失敗又重新啟動的「廢園轉作」政策，其實未必真的達成縮減檳榔園面積的目標。更值得注意的政策效應是，它們透過一系列行政系統的安排，逐

doi:10.6342/NTU202601203

步將檳榔與檳榔農排除在農政體系之外。例如，在 2007 年的政策執行中，農委會辦理「專案種植登記」制度，規定農民若要在農地上種植檳榔，必須辦理登記。只有完成專案登記的農民，才能納入農業天然災害救助的對象，或申請廢園補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08）。到了 2023 年，農業部更進一步為配合廢園轉作政策，修訂農民健康保險（農保）的加保條件：除非農地曾辦理專案種植登記，或農民在 2023 年以前已經加入農保，否則將無法再以種植檳榔的農地作為加保依據（農業部 2025）。也就是說，現在農民若要投入成為全職檳榔農，幾乎沒辦法再享有國家的基本保障。

六、結語

透過檳榔公衛論述的歷史爬梳，可以看見 1970 年代逐漸蔓延、成熟的檳榔致癌知識產製的背景和效應，並非單純發生自醫學內部，而是來自社會中不同的權力關係。不同主張、利益考量的行動者透過流行病學這個介面穿透差異相互結盟、形構檳榔有害的論述，並且在不同的權力場域發揮效應。具體來說，流行病學的知識，打造出檳榔食用者的主體，讓吃檳榔的行為和個體相連結，使社會中曖昧不明、多元混雜的檳榔食用者被集合到統計工具上，透過職業、性別、教育程度的分類辨識出潛在的口腔疾病患者，接著以改善身體健康為名介入他們的身體。在如此美意之下，潛藏著對都市化勞動階級的馴服教化，甚或是企業轉移環境公害因子的企圖。

當檳榔對人體健康的危害逐漸被確立並納入公共衛生體系的政策的議程後，檳榔便難再以一般農作物的身分進入現代農政體系的治理秩序。因此，農業部對檳榔產業的著力相當有限，其對檳榔栽培知識的認識，至今仍停留在以面積為尺度的層次上，從未如其他經濟作物一般深入。同時，從 2000 年以降一系列廢園轉作政策的推行也可以觀察到，檳榔已經和正規農政體系的距離變得越來越遙遠。

doi:10.6342/NTU202601203

不只是檳榔這個作物本身，就連栽培檳榔的農民都逐步被排除在農政單位的監護範圍之外。

那麼，我們可能會好奇，既然種植檳榔已經沒辦法受到農政體制的關照，為什麼農民仍然不願意放棄檳榔轉作其他作物呢？又或者，我們應該更大膽地發問，當一個作物幾乎脫離於現代農政系統，會發展出甚麼樣的關係和農業實作？接下來的章節，我嘗試跟著檳榔農深入檳榔的產銷體系與園圃中的生活，闡述一個不受現代農政監護的生命，如何開展出開放且彈性的多物種關係與經濟活動，這些經驗不僅能進一步回應廢園轉作計畫總是失敗的原因，更能為當前充滿不確定性的處境帶來啟發。

doi:10.6342/NTU202601203

第一部 農政之外

doi:10.6342/NTU202601203

第三章 改良場之外的田間作業與時間韻律

2025 年春季，中部檳榔陷入嚴重短缺，許多消費地業者提早向屏東的行口（產地大盤[24]）尋找貨源填補市場的缺口。阿任的檳榔向來在過年後就會有零星的收穫，我們到檳榔園割了大約十苳[25]的檳榔後交到內埔的行口。

當天來交檳榔的農友還有來自高雄鳳山的老劉夫婦，老劉五年前從鋼鐵公司的主管退休，到萬巒買塊農地，展開退休生活。他聽從了原地主的建議，保留了檳榔樹，雖然檳榔勞動門檻較低，確實讓夫婦倆順利銜接了鄉村生活，方便他們在高雄屏東之間頻繁移動，但長期主導企業營運的老劉，對檳榔的技術頗有微詞。他認為每一棵檳榔樹的狀態差異太大，是難以標準化並進一步擴大規模的夕陽經濟。得知我的研究生身分後，他進一步向我建議：「你看市場上都要又『圓』又『早』的檳榔，這背後是甚麼？是基因學啊！你做研究的，應該要想怎麼去想怎麼跟屏科大之類的學校合作，用實驗室的技術把這些比較好的基因大量複製，如果有做組織培養，你想想看是多大的商機？」。

老劉獻策的這套「檳榔計畫」，反映的是他來自企業界的規模化邏輯：產線上要盡可能排除不可控制的多樣性，讓產品以同樣的規格大量生產。透過植物體內細胞層次的標準化工程，才能擴張規模、提升利潤。

雖然老劉的理想從未發生，但是他幫忙點出了現代農業脈絡下試驗單位和學院標準化工程的重要性。農業試驗單位（包含農業試驗所和各地的農業改良場）主要的治理標的並非人類，而是對國家而言具有經濟價值的非人生命和調控其生命的技術。在本文的討論裡，涉及到農業試驗機構兩個不同層次但互相關聯的標準化：一是「田間作業」的標準化，簡言之，就是界定「如何正確地栽培作物」，

[24] 包含檳榔產業在內，大部分臺灣農產業皆將產地檳榔的集貨、批發商稱為行口，因此本文中皆以行口稱之。

[25] 「苳」是檳榔花穗結成的果串所使用的單位，平均一苳檳榔果串會有約 150-300 顆檳榔果實。

doi:10.6342/NTU202601203

其內容包括修剪、肥料使用，以及農藥劑量的投入，藉此更精確地管控園圃中的土壤、水分、雜草與蟲害；第二層次的標準化，則是老劉所關心的、植物體本身的標準化，包含植物生理的改良，以及更微觀層次的基因內容改良。在上世紀遺傳學和作物生理學的革命下，農業科學能深入生命的微觀尺度，對動植物進行分子層次的研究。這些研究促成的育種與栽培技術，能夠規模化具有市場價值或能提升收成效率的性狀，如果實形狀、甜度甚至是本文所著重的生物時間。

然而，就如同老劉的困擾所闡述的：同為果品作物的檳榔雖然商業栽培歷史長，卻從未正式進入農業研究和試驗機構，變成農政單位治理的生命標的，所以檳榔樹缺少了田間作業規範和標準，也沒有被充分理論化的技術形式。因此，檳榔樹的生理特質、外顯性狀到生命時間皆缺乏現代農業所馴化出來的秩序。

在本章節中，我首先從農民的檳榔栽培實作經驗勾勒出彈性化且缺乏制度規範的檳榔田間作業；接著，我將聚焦在檳榔植物體內的生物時間性狀，探討檳榔農如何在缺少科學化育種技術的條件下，透過對檳榔樹身體上的物質化時間觀察來執行育種行為，捕捉屏東平原氣候環境所帶來的時間優勢。透過本章對農民田間活動與檳榔時間特質的描寫，可以發現農民的田間活動，雖然因游離於國家和市場的秩序之外而碎片化且充滿不確定性，卻也能提供我們反思當前逐漸超乎人類掌控的人類世農業危機。

一、未標準化的田間作業

自 1970 年代臺灣西部稻作生產衰退以後，小農體制下的農戶為了創造收益，許多小農投入專業化栽培、高經濟的園藝作物，成為小商品生產者（柯志明、翁仕杰 1993）。這些在上世紀才興起或引入的園藝作物往往嬌嫩脆弱，栽培過程除了基本的種植與採收工序外，農民還必須投入高度密集的勞力進行修枝、灌溉、施肥、病蟲害與土壤的管控，才能生產出具有市場價值的果品。這些從種植到收

doi:10.6342/NTU202601203

成之間的行為構成所謂的「田間作業」。田間作業大多難以依賴機械、必須靠人力完成，是園藝作物栽培技術開展的所在：為了迎合市場對美觀、高甜度果品的偏好，田間作業在歷史長河中演變出複雜的技術形式，例如透過調控肥料種類與施用時機提升果實口感、或利用修枝管理作物的生理節奏促成開花等。正如楊弘任（2014）在林邊蓮霧的研究中所指出的，投入園藝栽培的果農既是農人，也是「師傅」。

在田野工作期間，我很快便觀察到檳榔與其他作物的差異。若要在萬巒鄉找到種植百香果、苦瓜、咖啡或可可的農民團體相對容易，只需透過農會的產銷班資訊，或查閱屏東地方報章便能找到訪問對象；這些「明星作物」受到矚目，官方會提供資源輔導產銷班，而技術先驅往往能被地方居民乃至農政單位所辨識。然而，種檳榔卻像是一種屏東平原的「背景預設值」——幾乎所有家戶都有種植經驗，卻難以指認技術源頭或知識專家。社會上鮮少討論檳榔栽培，更找不到以檳榔栽培為主題的正式農業文宣。人們雖會口耳相傳誰的檳榔「顧得好」、誰「賺得多」，但比起精於蓮霧、可可或百香果的農民會被公認為某種專家，檳榔的栽培技術和專家的存在相當隱晦。當我詢問「種檳榔有什麼技術？」農民與資材行多半回以困惑：「檳榔哪有什麼技術？」他們認為檳榔的田間作業簡單、不繁複，只需參考其他作物最基本的照護方式，不具備像蓮霧那樣高深的工藝。甚至有客家農民開玩笑地和我說：「也許是我們客家人比較懶惰，所以到現在還在種檳榔，閩南人就會跑去種別的。」

檳榔田間作業的勞力密度和技術需求是比較而來的。和其他雙子葉的果樹相比，檳榔少了修枝、套袋等厚重的工作，也沒有瓜果類所需要的溫室、藤架設施，更沒有可可和咖啡所需要的後段加工程序，農民所需要投入的田間作業相對少了許多。但是當我細究不同檳榔農的田間作業，發現其實檳榔的田間作業型態相當參差：同樣面積的園圃，有些專業農民花費數十萬資材細心照料，發展出精湛的栽培技藝；也有兼業農民完全放任園圃，除了採收工作，完全不投入肥料和農藥。

doi:10.6342/NTU202601203

更近一步來說，農民投入檳榔栽培的規模、勞動力和資材相當彈性，缺少標準化的田間作業，亦少有單一理論和語言固定下來的技術論述和操作模式。在農業實作深受國家農政秩序和農產品市場規訓的當代脈絡中，檳榔田間作業的多樣化相當引人注意。

接下來，我將深入檳榔農的栽培實作現場。在描繪完農民田間作業的大致圖像後，我將聚焦在農藥施用和栽培技術兩個面向，描繪出檳榔栽培的規範和知識游移於正規農業體制和科學研究之外的處境。透過檳榔與其他作物栽培經驗的比較，便能發現檳榔充滿彈性、投入成本與技術內涵差異極大的田間作業，不僅源自檳榔作物本身的特性，還進一步映照出臺灣農政中的物種生命階序。

（一）檳榔的田間作業：可粗放也可集約的「顧檳榔」

在檳榔栽培的語境中，最貼近於田間作業的活動被農民概括為「顧檳榔」一詞。我在田野中經常聽到人們這樣評論彼此：「某某有沒有在顧檳榔？」、「顧得好不好？」、「去年價格不好，有沒有顧？」。這類說法常常用來表述農民投入園圃的勞力和資材密度，影響了整體園圃採收的時程和果實品質的整齊度。雖然檳榔農全年都必須投入施肥、灌溉與採收等園圃工作，但農民口中所說的「顧檳榔」，多半指涉檳榔樹準備開花到結果之間的一系列田間作業。這段時期並非產期，而是落在十月產季結束至隔年五月產季初期之間的屏東檳榔淡季。

入秋之後是屏東進入檳榔產季尾聲，嘉義、南投的產銷系統正蓄勢待發準備取代屏東的供應，此時價格如同產季初始時高時低，產農便要抉擇是否繼續採收檳榔供應市場，又或者是結束產季、進入休養。若選擇結束，就要放棄產季尾聲的收益；但若沒有放棄，檳榔樹容易疲勞而影響隔年的開花表現。這時就考驗檳榔農的判斷能力，能否在正確的時刻果斷結束檳榔產季，將檳榔樹上持續萌發的花穗全面割除，這個行為稱為「下花」，目的是要讓檳榔樹停止生產活動、好好

doi:10.6342/NTU202601203

休息，保留開花的體力。

檳榔樹休養一個月左右後，園圃中比較早開花的檳榔樹會逐漸萌發花苞隱藏在葉鞘之中，隨時間逐漸鼓起（圖 2），像是女性懷孕時的身形變化，所以稱為「孕穗期」、「大肚期」。此時的檳榔農就像是照顧待產的孕婦，需要幫它們建立出適合生產的環境，讓它們得以在隔年春季順利開花。於是檳榔農會積極整理草皮、調整肥料投入的內容與灌溉時機。隨著檳榔花穗從葉鞘迸出，檳榔農又會再持續調整田間作業，留意昆蟲的寄身，投入防蟲藥物。即便這些活動安排在檳榔產季之外，卻消耗了檳榔園所需的大部分資材成本和勞動成本，不僅重要的肥料都在這段時間投入，施肥和除草都需要較重型的機具施作，因此相當耗費體力。



圖 2 「大肚期」的檳榔樹。可以看見隆起的葉鞘，像是懷孕的女性身軀。

既然顧檳榔是投放肥料、施撒防（殺）蟲藥劑等多項田間作業所構成，為什麼農民會採用「顧」這個動詞呢？「顧」在台語和客語的農業語境同樣可見，最常運用於稻作農業中的「顧稻子（禾仔）」、「顧水」[26]。然而，「顧」不是直

[26]另外一個更常用的詞彙是「巡田水」。

doi:10.6342/NTU202601203

接指涉農民「要做甚麼」，而是在稻子對水分、營養最敏感的插秧初期，頻繁地到田邊進行日常性的檢視和巡守，留意田間的水路、秧苗的顏色和健康狀態，以及雜草和病蟲害問題，若發現異狀就要趕緊調整水利設施、投入施肥或除草。這些田間活動相當日常，在過去農村人還沒有那麼多閒暇時間去「散步」的時候，顧田水和散步常常是重疊的活動。

而顧檳榔的意義其實也一樣：農民需要在檳榔樹開花的階段，頻繁地到園間巡視。但和水稻不太一樣的是，檳榔農需要花費更多心思觀察每一棵檳榔樹的身體：他們要判斷和解析檳榔樹身體上的符號，透過田間工作的策劃回應檳榔樹釋放的訊息。所以，有沒有顧好檳榔，重點並不在於農民是否花錢買昂貴肥料，又或者是完成了施肥和澆灌的義務，而是看農民能不能在檳榔樹萌發花苞後，花時間進入園圃抬頭仰望檳榔樹，用眼睛仔細觀察檳榔樹狀態，跟隨著檳榔樹的身體週期，在不同階段給予不等比例的肥料、改變灌溉的時間促進養分吸收。這些田間作業的策畫都來自於檳榔農對檳榔樹生命狀態的細微洞察力。可以說，長時間、日常性地凝視檳榔樹生命狀態，是顧檳榔最根本的內涵。

例如，一位認真顧檳榔的檳榔農白皮曾經和我分析如何觀看檳榔樹的狀態並策劃田間工作，他因為從小就跟隨父母下田顧檳榔、「和檳榔一直有接觸」，所以相當了解檳榔樹的習性和身體的動態：

> 農民白皮指著家旁邊園圃的檳榔樹，說：「我看他（園主）平常沒有很認真顧，幾天才來一次，你看檳榔樹看上去奄奄一息，代表營養不夠，該吃的營養沒有吃進去」接著我們開發財車到他的園圃中，他指著其中一棵已經包裹著大肚花苞的檳榔樹當作舉例：「你看那個葉子的樣子，是不是比較堅挺，比剛剛的還要『壯』，那我就知道一個月前投入的營養它有吃到，夠壯的話，檳榔樹才有體力，開花才會好。過兩個月之後，檳榔樹『吐出舌頭』（檳榔花從葉鞘迸發的時候），要把施肥的時間改成

doi:10.6342/NTU202601203

15 天一次，磷鉀肥要多，這樣結果情況才會好。」（20251117 田野筆記）

對於我這樣外行人來說，即便深受白皮生動的解說所吸引，卻還是沒辦法分辨出檳榔樹差異。但是在白皮的眼中，這些檳榔樹就像是隔壁鄰居和家庭成員一樣的存在，雖然沒有動作和表情，卻像人一樣可以在日常互動中藉由氣色和姿態識別其身心狀態；同樣的，白皮透過檳榔樹體身上一些幽微的外顯特徵分析檳榔目前是健壯還是虛弱。若是發現狀態不佳，就需要趕緊思考檳榔樹的需求，即時調節肥料的施用策略。

不過，要如何投入肥料和農藥，並非完全來自於檳榔農與檳榔樹之間視覺的互動經驗，還仰賴資材行的諮詢和媒合。資材行對於檳榔的健康狀態有地方化且比較性的認識，可以幫忙檳榔農辨識園圃中未知的狀況。檳榔的專業化栽培的歷史經過了約半個世紀，已經累積出某些普遍的田間作業基礎，以肥培管理來說：開花前期和後期分別需要調控氮肥和磷鉀肥比例，才不會造成氮肥過量、影響開花時間和結出的果實口感。但弔詭的是，檳榔始終沒有發展出比較標準化的田間作業程序，各地的資材行所建構出來的檳榔栽培建議內容，多半都是借用其他作物既有的肥料使用方式，以及檳榔農多年來實際的栽培經驗所拼裝而來。2000 年前後，內埔鄉農會曾整理了檳榔樹的蟲害和肥培出版成刊物，但據資材行所說，那一本刊物空前絕後，再也沒有官方單位願意彙整檳榔栽培的資訊出版。

doi:10.6342/NTU202601203



圖 3 資材行透過相機記錄、蒐集農民田間的各種檳榔樹的疾病和生長變異

在缺乏標準化田間作業的情況下，與不同資材行往來的檳榔農自然會發展出各異其趣的照顧方式。個別農民從資材行獲取的建議不同，田間作業的習慣也因此呈現差異，而投入的成本更是分歧。並不是所有農民都像白皮那樣每隔幾天便下田，也少有人完全依照資材行的建議，投入全部的肥料與農藥。多數農民會評估前一年度的資材成本與利潤、農地運用的規劃，以及自身的身體狀態，調整田間作業的頻率與投入。

doi:10.6342/NTU202601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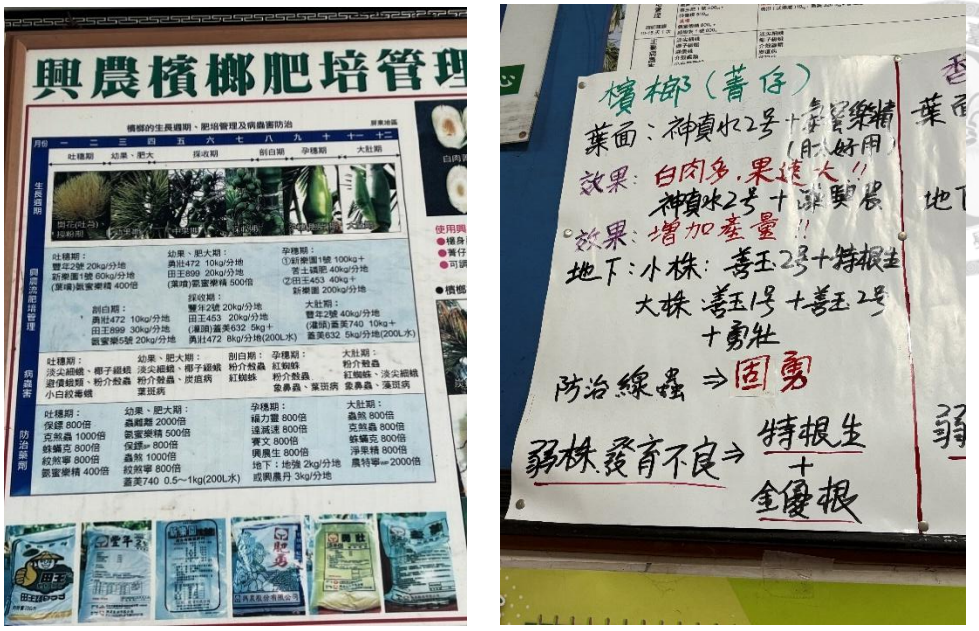


圖 4　不同鄉鎮資材行提供給農民的肥培管理指南

其中，檳榔價格的變化最可能在短時間影響到農民願意投入的資材成本，2024 年檳榔價格下跌時間早而普遍收入不佳，許多農民就減少了當年度冬季的資材投入，從肥料到農藥的使用量都有所下降。而當我們實際訪問資材行就會發現，許多檳榔田間照顧指南已是十多年前發行的版本，有些藥劑經歷數次的改版，甚至早已不存在。這是因為檳榔的價格長期下來的確有逐年下跌趨勢，農民願意投入的資材已經大幅減少，資材行也沒有再更新資料。屏東某興農公司營業所的藤店長和我提到：

之前每個蟲都會對應一個藥，我跟你講，他們負擔不了，而且他們會抗拒，所以我會順應他們現在的狀況，因為現在檳榔就不是一個很好作的東西，他的收入變少，以前他們很敢用，都照上面的作都 OK，一組藥七八支還加個營養劑他們都 OK，如果用得兇的話，應該一分地有破十萬，但還是有賺，現在不可能。現在用的藥很少，頻率很低，以前一兩個禮拜噴一次，現在一個月噴一次的大有人在。(20241230 田

doi:10.6342/NTU202601203

野紀錄）

藤店長的歷時性觀察，呼應了許多人對檳榔耕作「粗放」特性的認識。但藤店長點出了一個容易被忽視的事實：檳榔並不是一直以來都那麼粗放，而是隨著近幾年價格變差才「越來越粗放」。除了長期呈現的下跌的價格趨勢外，檳榔變得粗放還涉及了從業人口結構的改變：隨著上一世代檳榔農老化，罹患慢性病或老化的農民缺乏體力妥善照料園圃，田間作業的工序變得相當簡化。不僅如此，接手的年輕農會在檳榔園選擇兼作高經濟的作物，又或者是在高雄還有一份忙碌的工作，索性放棄「顧檳榔」，不再投入任何農藥和肥料，任期自然生長。

以上的趨勢，反映出檳榔田間作業投入極富彈性的特質。大部分果樹的田間作業若缺乏肥料和農藥的投入，會因為果況不佳或樹體死亡而難以參與進常規的市場，但是檳榔卻沒有這樣的問題。另外一個資材行的老闆和我說：

> 檳榔樹你可以不噴藥、不施肥還可以有錢賺，所以老人家當然就不會砍掉，只要去割就好，其他時間都不用下田，他們會慢慢放手。只有檳榔可以這樣，其他果樹這樣做就荒廢了。（20251118 田野筆記）

那麼，為什麼檳榔允許在集約和粗放之間變動、並跟隨著農民狀態彈性調整田間作業內容呢？長期觀察屏東農作物病蟲害的農藥行認為，相較於其他上世紀才引進臺灣商業化栽培的作物（特別是溫帶作物），檳榔馴化歷史悠久，熟悉台灣的生長條件和生態，在沒有肥料投入的情況下仍可以持續開花結果，而且鮮少昆蟲和鳥類將檳榔果實和羽狀複葉當作攝食目標，因此在缺少人為的管理下，檳榔開花結果的時間會比較不穩定、果況參差，卻仍有一定產量，不太會發生大規模的死亡。

doi:10.6342/NTU202601203

另外，檳榔在市場流通的物質性也很重要。昆蟲的寄身或啃食雖然不至於造成植物死亡，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還可能改變果實風味、提升甜度，但是現代零售市場極度重視水果的外觀與衛生，昆蟲啃食痕跡會使果實在標準化的蔬果分級制度中成為次級品或被淘汰。為了防止水果外表瑕疵，農民必須針對這些影響外觀的「害蟲」進行密集藥物防治；相較下，檳榔並不是流向都會超市的可口水果，而是被包進荖葉或夾著荖花販售。決定檳榔價值的因素，主要是大小和形狀，外觀缺陷如斑點、割痕並非主要評斷標準（有關流通的討論，請見第四章），所以那些被椰子綴蛾、介殼蟲寄身的檳榔果實依舊可以包進葉子上市流通，對其他果樹市場價值來說棘手的蟲害問題並沒有對檳榔構成致命威脅。換句話說，檳榔充滿韌性的生理條件，以及它市場流通的物質特性，共同形塑出檳榔田間作業中農藥投入行為的變異與彈性。

（二）「無藥可用」的生命階序

然而，在我深入檳榔的蟲害與農藥施用問題之後，我發現田間作業中的農藥施用充滿變異的緣由，不僅是檳榔的生物特性與市場流通的性質所趨，更根本的原因是，檳榔蟲害防治幾乎沒有主管機關核定的專用藥物，也缺乏標準化的施用標準。因此我也意識到，在當代食品與環境安全意識高漲並逐漸體制化的背景下，檳榔那種處於飄移狀態的田間作業，實則映照出臺灣農業中更深層的物種生命政治階序：關於哪些生命被配置成受照護的對象，而哪些生命則需要被精準地殺死。

具體而言，農藥的施用背後具有明確的物種生死配置關係，目的是要精準殺死那些被界定為「有害物種」的雜草、昆蟲與真菌。被界定成有害物種的昆蟲和真菌，是因為它們對國家在領土內扶持的生命構成威脅——無論是經濟作物、畜養動物，甚至是人類本身。因此，防治工作的目標是有選擇地扶持某些生命，同時移除另一些生命。然而，檳榔在臺灣的處境相當微妙，它雖然不是小花蔓澤蘭

doi:10.6342/NTU202601203

那樣被視作需要移除的外來物種，但又不是國家渴望保障其生產力的生命標的，而是一個生命地位相當不明朗的本土負面物種。在這樣的物種關係基礎上，檳榔的蟲害防治成為一個矛盾未解的命題。

觀察屏東農民的施作就能知道，無論是農民抑或是資材行在執行病害防治時，都缺乏制度化的農藥種類及使用方法。這幾年，農業部和地方農業局處開始關心起檳榔的農藥施用問題，亦發表了檳榔用藥的指示。然而，官方發布「用藥指示」的主要目的，並不是要協助農民改善蟲害問題提升作物產量，而是因為長期以來國家沒有建置出檳榔專屬的農藥和施作標準，社會輿論[27]指控檳榔的田間作業可能對其他生命造成非預期的風險，農業部門不得不回應檳榔用藥問題。2023 年農業部曾發表一篇〈檳榔田間有害生物綜合管理技術〉，文章開頭即開宗明義地說明：

> 國際癌症研究總署(IARC)於 2003 年宣布檳榔屬於對人類有致癌性之第一級致癌物，為維護國民健康，並不鼓勵食用檳榔。但近年來因檳榔栽培的病蟲害防治需求增加，為避免農藥亂用與濫用，增加檳榔對人體與非目標生物的影響，因此擬定檳榔田間有害生物管理規範。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檳榔雖長期處在國家農政治理體系之外，但在真實的世界中，並沒有和其他國家要保障的生命保持距離。國家的中空，反而讓檳榔以更未知且無孔不入的化學形式與其他生命交織在一起，像是檳榔園周邊的經濟作物、協助作物授粉的蜜蜂，以及——人類本身。所以，農業部在這篇文章中，特別提到了長期以來檳榔農慣用非檳榔防治用藥的問題，希望改善此問題：

[27] 詳細的討論，可以見《上下游》2019 年期期間長達 9 篇的系列報導：https://www.newsmarket.com.tw/areca-betel-nut/

doi:10.6342/NTU202601203

雖然檳榔被認為省工且容易栽培，但在栽培過程中仍然會發生一些病蟲害，然而檳榔並非政府推薦或鼓勵的作物，雖然栽培歷史悠久，一直没有較詳細的疫病蟲害生態與防治資料。在病蟲害發生時，農民未能確認原因也無適當的防治方法，以致部分農民使用非檳榔的防治用藥。

諷刺的是，翻開農業部門最新版的「檳榔病蟲害防治用藥摘要表」（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2025）就會觀察到，相較於香蕉、芒果、蓮霧等同樣常見於屏東的作物各自擁有近百種經過試驗並正式登記的專用藥劑，檳榔的合法登記用藥卻只有不合常理的十種，所以不是農民故意使用「非檳榔的防治用藥」，而是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核准農藥種類，幾乎無藥物可用。在這樣的條件下，農民與資材行之間流通的大部分用藥幾乎都是挪用水稻、蔬菜、香蕉等其他作物的登記藥劑。但由於作物生理條件不同，如何拼湊、調整並應用這些藥物，完全仰賴農民與資材行在田間試驗、共同討論後所累積的經驗。

之所以會形成如此不尋常的現象，是因為農藥商若要將自身開發的產品登記為某作物的合法用藥，必須投入相當成本與程序，包含試驗設計審查、田間試驗、藥物降解時間與人體影響等多項檢驗，最終才能通過正式登記。然而，檳榔並非法定農產品，長期游離於國家管控的市場交易體系之外，既不在國家藥物殘留抽驗的範圍內，也缺乏農政單位的調查。因此，臺灣的農藥商幾乎沒有意願投入資源替檳榔提出用藥登記，使檳榔的用藥持續處於灰色地帶。

另外，在我與農民、資材行互動的過程中，也觀察到近幾年來檳榔的蟲害問題有增加的趨勢，但因為檳榔缺少了農政與學術單位的研究，基本上沒有累積出蟲害問題的歷時性觀察與防治措施。我所訪問的藤老闆是少數關心這個議題的從業人，他大學是念法律相關科系，跟著太太接手岳父的資材行後，法律的訓練讓他能多查找外文資料，主動擴張資訊的觸角。他發現，近幾年來屏東檳榔椰子綴蛾的蟲害比以往更加嚴重，而這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東南亞其他棕櫚科植物上。他

doi:10.6342/NTU202601203

認為，這個趨勢很可能與氣候暖化有關：隨著氣溫上升，昆蟲的繁殖速度與世代更迭明顯縮短時程，原本應該緩和下來的季節也可以繼續繁衍，昆蟲數量就像銀行複利一般，變得相當驚人。而且因為氣溫增幅太顯著，過往設計出來的農藥降解速度也跟著提高，根本難以追趕昆蟲繁衍的速度。

然而，藤老闆也沒辦法肯定氣候變遷和蟲害之間的「因果關係」，他告訴我：

> 我不敢說椰子綴蛾的爆發是不是跟溫度有關，目前也只是我的推測，因為我沒有實際的科學數據佐證，像是溫度和蟲數量之間的關係，而且我想應該也沒有人要研究，老實說，檳榔根本沒有人要研究。目前舊的藥有沒有用、未來檳榔的蟲害管控還沒辦法掌握。（20241230 田野紀錄）

藤老闆的話，展現出現代農業的可辨識性與物種生命政治之間的張力。國家的農政單位會投注許多基礎設施，讓農業實作現場的現象和物種關係變得可供辨識，包含測量工具、統計系統等。然而，科學基礎設施，僅會有方向性地生產出特定生命的知識、形塑出特定生命之間的階序和生死的配置。檳榔從未成為受國家所眷顧的生命對象，它與其物種之間交互作用的線索也就停留在實作的現場，缺乏科學知識工具的中介與奧援。

（三）檳榔真的沒有「技術」？

檳榔的蟲害問題，彰顯出檳榔田間作業和國家農政系統的距離，如何造成元素之間因果關係的未知。這樣的處境更深刻地反映在檳榔栽培的技術創新和傳遞路徑上。在現代農業的脈絡中，「技術」不僅指涉農民和植物之間的實作技藝，更涉及了由多重行動者所構成的網絡：其中包括地方社會中的其他農民與資材行，

doi:10.6342/NTU202601203

也涵蓋了農村之外的國家機構與學院中的農業試驗單位，另外還有非人的技術設施，例如讓土壤分子與作物交互作用變得可見的實驗室儀器。若要了解農民和資材行為何普遍認為「檳榔沒有技術」，同樣不能止步於植物自身的特性，還需要將檳榔的田間作業放在當代農業技術得以生產和傳遞的社會條件之中。

關於檳榔技術的特性，我們可以再次回到檳榔田間作業常用的動詞「顧」談起。在我所知道的果樹農業語境中，極少有作物是以「顧」來指涉農民的田間作業；相反地，「田間管理」是更常使用的農業語彙。這樣鮮明的對比，凸顯了檳榔栽培的技術特徵。就如同前文所提到，「顧」強調的是農民與檳榔樹的身體感官交流，指涉的是一種持續性的日常投入，通常是一種以農民經驗為出發點的施為，不一定具有明確的計畫，帶有高度在地化與個人化的特質。與之相較，「管理」強調的是客觀的媒介和活動的可見性：農民可以參照明確的田間作業流程，像是甚麼時候播種、修枝、施肥、施肥量的控制等等，農民還可依循具體可評估甚至可量化的成效指標。而這些較具有固定形式的田間作業，通常都經由農政與學術單位抽離實作現場，將原本限定於特定環境和農民實作脈絡的技術歸納與演繹出普遍的理論，才能建構出田間作業的原則並加以傳遞。

例如，以屏東常見的香蕉、鳳梨、蓮霧來說，不僅農民栽培技術累積到一定的成熟程度，大多都歷經屏東科技大學和鳳山農業試驗所等科研機構長期且專一化的研究。投入的農民（特別是剛投入的新農）除了依賴資材行的諮詢輔助外，還可以參照許多官方出版的田間管理指南，像是農改場的技術專刊，或是田間照護手冊，這些文件會詳盡地提供田間管理的方法，例如適合的栽培環境、營養素的比例、作物修枝的技巧與原理。儘管這些栽培指南僅能提供較為普遍的知識，與實作現場仍有一定落差，仍然是經過農民長期的技術創新和學術單位的研究，才得以模式化成例行的田間作業內容。

這些作物並不是一開始就有如此完整的田間管理指引，其中隱含的技術內容更不是一個由國家農政單位由上而下實驗、指導和規劃的結果。相反地，過往的

doi:10.6342/NTU202601203

研究都已經指出：所有的作物真正發生技術創新的起始點都是第一線實作現場的農民與民間資材行來回往復的交流，裡頭充滿著各種依附在特定園圃環境以及社會關係的技術知識，乃至於意外的發現（楊弘任 2014；葉守禮 2021b；顏碧吟 2003）。以林邊的蓮霧為例：早期蓮霧種植技術和檳榔一樣是挪用其他物種的栽培技術，品質遠不如當前著名的「黑珍珠」，但是商業化栽培之初已經有農民可以產出甜度高、果色漂亮的蓮霧，後來透過農民的反覆觀察、推敲，還有農業試驗單位進行土壤化驗，分析出高品質的蓮霧其實是園圃周邊養鴨業者溢流出的有機質和鈣質共同作用的意外成果。當關鍵的元素被釐清，農民知道可以在既有的肥料上適量增添鈣、鎂、錳等微量元素增加蓮霧品質，而原本局限於特定空間於農民實作範圍的創新技術，逐漸嵌入了蓮霧田間管理內容中，成為基礎的模式（楊弘任 ibid:113）。

透過蓮霧的案例，我們可以知道：農業研究與試驗機構並不一定是技術的開創者，也不是像 James Scott 所形容的，是貶低農民實作與知識價值的科學官僚（Scott 2023[1998]）。準確來說，農業科學家通常站在一個後設的位置，在充滿複雜變異和意外的實作環境中找出讓差異發生的變因，諸如土壤中能讓果樹結果數量增加、甜度提高的重要元素，又或者是能促發果樹分泌激素、改變開花時程的物理刺激等等。進一步而言，農政機構和學院的實驗室儀器和科學知識是讓技術原理變得可見，接著得以嵌入田間作業內容的基礎設施。當作物栽培中默會的技術成為可供操作的語言，雖然沒辦法避免對真實農業世界進行一定程度的精簡化，但是科學的知識生產，能夠識別出技術的來源，讓原本模糊且集中在少數農民身體或社會連帶的技術有被分配的可能性。

除了學術機構投入的研究外，作物的產銷班在農業知識的傳遞上亦相當關鍵。產銷班作為個別農民、其他農民、農政單位與農藥商之間的互動中介，使小規模耕作者能夠透過集體力量降低生產成本，如向政府申請補助共同向肥料商採購肥料。而產銷班定期舉辦的會議與技術諮詢講習，也為初期投入農民提供病蟲害診

doi:10.6342/NTU202601203

斷與防治方法，促成作物栽培技術的交流與累積。

基於檳榔根深蒂固的公共衛生與環境負面論述，檳榔鮮少直接成為農政單位投入研究與技術輔導的作物，也缺乏像其他主要作物那樣的產銷班或技術團體，所以檳榔的田間作業缺乏一套共通的知識與技術體系。檳榔的栽培技術主要坐落於最草根的技術網絡中——由農民和資材行所構成的鄉民社會[28]。就如同臺灣果樹栽培的技術史研究（楊弘任 2014; 葉守禮 2021b）所指出的，農民與資材行互動所生產的知識和技術傳遞存在著「差序格局」[29]，技術通常會聚集在特定的產農和資材行之間，雖然會透過地方社會的關係向外擴散，並且推動整體技術的變化，但是在向外擴散的過程技術內容會隨之遞減和破碎化。

整體而言，年輕農友通常具備良好的資訊蒐集能力，能夠迅速吸收外界的栽培知識，並在此基礎上逐漸發展出自己的技術，檳榔的收成狀況也比較好。以返鄉照顧母親並接手檳榔園的資訊工程師阿宏為例：雖然檳榔栽培與軟體產業看似全然不同的世界，但從資訊系統維護轉換到園圃維護，其實同樣需要理解各種元素之間的交互關係，並在問題發生時找出背後的原理與解方。為了增進自己的園圃知識，阿宏投入大量時間透過不同管道學習栽培技巧。他在農民學校上課，學習其他作物的基本栽培知識，並從中尋找可以挪用到檳榔上的工具與方法；而更多實務上的啟發，則來自龐大的網路鄉民社群。他加入臉書相關社團、關注農友經營的粉絲專頁，仔細記錄他人施肥的時間、除草的不同「門派」、以及這些做法背後的理由。例如，母親交給他的傳統檳榔栽培方式要將草皮全部清除，但是阿宏發現草皮能協助土壤保濕、減緩水分蒸發並增加吸水能力，透過選擇適合的

[28] 在此，我特別避開使用「地方社會」一詞，這是因為當代有些農民的技術並非來自在地網絡內的傳遞，還可能是網絡上的農業社群（如下文中的阿宏），所以我將地方社會抽換成鄉民社會，鄉民一詞既沒有脫離於地方社會，但也保留了像是臉書社團這樣的線上空間。

[29] 差序格局是參考楊弘任（2014）的用語，而這個概念又是源自於費孝通論述中國人際關係的核心概念。費孝通指出，中國人的社會關係是建立在一套「差序格局」之上，這個格局如同同心圓，是由自我向外一層一層擴展的親疏關係（從個人蔓延到國家），每一種關係都可以被放在這個格局上的相對位置。同樣的，楊弘任延伸了差序格局的概念，說明蓮霧栽培的技術如何在有限的人際網絡向外傳遞，並且發生「擴散的遞減」。

doi:10.6342/NTU202601203

草種，可以避免水分被草吸走，還能減少割草勞力的耗損。同樣地，他也從線上社群學習到許多灌溉的新作法，例如在果樹旁打深洞並插入修剪下的樹枝，讓水沿著枝條深入土層，使根系能隨水向下發展，進而促進檳榔與其他果樹的扎根。透過這些實體與線上資訊與交流，阿宏不斷嘗試拼裝出一種既能讓園圃中不同作物和諧共生，又能減少資材與農藥過度使用的栽培方式。

另外，我的田野村莊中有一個頗具名氣的專業農，雖然只經營 7 到 8 分左右的檳榔園，但因為檳榔不只採收時間精準，還有很好的品質，一年能夠收穫近百萬，幾乎是其他農民的雙倍以上。這樣的成果來自於他和資材行的關係：他有一個經營農藥行的親戚，因此可以搶先掌握到一些特殊的肥料配方，調配出一種特殊的液態肥料，而且會在割菁後抓緊黃金時段施灑肥料。當村莊中的人問起他是如何辦到的，那位農民會因為人情壓力而將部分資訊透露出來，但還是會選擇性地保留最詳細的關鍵細節，他對技術的保留不完全是害怕競爭，而是因為適合他園圃的技術細節本身難以透過言語和文字傳達，也不見得適用於別人的園圃。

從前述兩位農民的案例，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作物栽培知識和技術傳遞的差序格局，還可以查覺到檳榔栽培技術發展路徑與其他作物之間的差異：農民的栽培知識與技術多半是從其他主流作物的管理方式攫取一些技術加以改良，或透過與資材行互動所累積的零散成果建構出一些基礎的田間作業模式。在這樣的情境下，檳榔的技術幾乎完全依附於農民自身的經驗，並透過農業資材行與小農之間非正式、去中心化的交流網絡而逐步累積。儘管所有作物的栽培都包含那些無法標準化、僅存在於特定環境與社會關係中的脈絡性知識與施作，但在農政單位缺席的脈絡下，檳榔的田間作業更明顯缺乏固定化且通用的技術形式。因此，與其說檳榔「缺乏」技術，不如說它至今從未被專一且系統性地研究，也未曾被精煉為清晰可見的技術原理並嵌入檳榔農的田間作業中。也就是說，檳榔的栽培技術的描述之所以無法從「顧」檳榔發展成「管理」檳榔，恐怕不僅僅是作物技術密度或栽培難度的差異所致，就如同農藥的施作爭議所示，涉及物種政治階序與資源的

doi:10.6342/NTU202601203

分配——特別是國家農業機構與學院體系在技術研究和傳遞上的差異化介入。

二、時間與育種

目前為止所觸及的技術，限於施為在植物體之外的田間作業，像是肥料的運用、植物外型的修剪等。然而，現代的農業技術還發展出對植物體內在更精細的調控，其中的關鍵是育種技術。育種並非現代農業的才發展出的新技術，但是上世紀遺傳學的革命使人類能解析出基因層次的物種密碼，並且透過營養繁殖、雜交等手段精確規模化具有市場價值，或能提升採收效率的性狀。

以臺灣的水果作物來說，早年育種方向多為豐產、抗蟲的品種，之後逐漸透過甜度、果形與口感的改良迎合市場變化（王德男、劉碧鵑 2005）。推陳出新的水果品系形塑臺灣人挑嘴的飲食性格，也讓臺灣果品作物在國際市場殺出血路，以少量但口味口感特殊的差異化商品和海外的種植園的果品搏鬥。

作物的育種，除了會往市場上的偏好的口感和外觀進行改良，還有另外一個較不容易被注意到的面相是「時間」的改造。事實上，作物時間標準化和機械化，是現代工業型農業中共伴的兩套革命。戰後隨美國霸權向外擴張的綠色革命，便是透過雜交、基因工程和化學肥料的施用共同縮短了穀物作物的生長週期，同時也標準化了生長時程。小麥和玉米等作物能夠像工廠產線一般，最大化單位時間產能，並且在同樣的時間成熟，方便機械進入園圃施用化肥和採收（Fitzgerald 2003; Kloppenburg 2004; Scott 2023[1998]）。工業化農業運作的效應是，農民耕作活動變得簡單，不再需要調和作物之間的生物時序，卻需要放棄長期栽培但干擾經濟作物採收時程的在地化物種，並且花費更多資本購買生產時間穩定的種／苗、投入化學肥料和機械以追趕市場的時間（Gupta 1998; Tsai 2019）。

臺灣自日治時期發展起來的現代化農業體系，便開啟了對稻作的科學化的選育和時序調控，但是針對水果作物較系統化的時間調控則較晚開始。一直到 1980

doi:10.6342/NTU202601203

年代隨著臺灣進入全球市場和國內消費結構的改變，許多果樹轉向商業化栽培取代稻作，水果作物的產季調節變成重要的議題：當時臺灣果樹盛產季都在夏季，冬春季的收成量少，農政單位有計畫地針對個別作物投入資源，利用人為的方式控制果樹生育，調節果樹收穫期，使其周年均勻分布（黃正華 1985）。目前大部分重要的經濟果樹，都經由農政單位對其生長時程與生理時鐘的「規律化」，農民更能夠在預期的時間採收作物進入市場流通，消費者也可以在不同時間購買到各產地的農作物。

在臺灣的國內農業市場中，屏東平原長期以來都因為時間的特性在市場上佔有獨特的位置。農產品的時間表現有時甚至比品質（甜度、外型等）更顯著影響了屏東農業的市場性質，所以自然也發展出複雜的時間調控技術。包含檳榔在內，前面段落所提到的各種果樹栽培技術，或多或少都涉及了果樹時間秩序的調控。然而，和其他果樹不同的是，檳榔沒有辦法透過田間作業的技術層面來改造甚或標準化其開花的時間秩序，農民能掌握的僅有「育種」這條路徑。但在缺少農政單位與學院資源投入的情況下，檳榔的育種顯然和基因科學技術下的育種有所不同，取而代之的是更接近於人類馴化植物的傳統習慣——「種子實生育種」。接下來，我將首先交代屏東平原的農業時間優勢的來源，以及檳榔時間調控技術條件如何不同於其他雙子葉果樹；接著我將闡述農民如何觀察檳榔樹身體上的物質化時間，依循長期與檳榔樹的互動來進行育種，捕捉屏東平原先天氣候環境所帶來的時間優勢。

（一）屏東農業中的檳榔時間性

若要了解屏東檳榔在臺灣市場中的特性和定位，必須從屏東農業特殊的時間性談起：屏東平原是臺灣農業產區中緯度最低、冬季氣溫最高的地區，不僅能種植其他縣市難以栽培的熱帶果樹，也賦予了時間上的特質——作物的生長速度普

doi:10.6342/NTU202601203

遍比其他地區更快，採收期也更早或更長。這樣的時間性造就了屏東農業得天獨厚的市場優勢：在早年稻作興盛時，臺灣西部平原大多是以一年兩獲為主，但屏東的六堆地區卻能一年三獲，成為台臺灣乃至於清代華南的糧倉。上世紀水稻被果樹替代，即便水果甜度和果肉質地大多不如中部高海拔水果，但因上市時間早，能佔據市場先機。舉凡遍布平原的香蕉、枋山鄉的芒果、林邊鄉的蓮霧，以及近年崛起的百香果、酪梨、黃金果，都與台灣其他產區，特別是擁有溫帶條件的中部丘陵錯開產季而具有市場優勢。

屏東氣候所形塑出的市場優勢，也深刻影響了當地農民的田間作業、農政單位改良技術的重點和資材行的商業活動。水果的甜度與外觀固然重要，但「上市時間夠早」才是屏東果樹突圍市場競爭的關鍵。我在資材行與老闆閒聊時，常遇到焦急的果農前來詢問，如何透過特殊藥劑、修枝技巧促使果樹提前開花、結果。不同作物的農民也會向我分享，他們如何選擇農改場推薦的果樹品種，即便栽培面積小、甜度不足，仍可憑藉「早上市」寡占批發市場，獲得驚人的收益。由此可見，作物的時間性是一種需要被技術化的對象。

事實上，屏東農作物的「時間」治理一直是農業試驗機構的重要工作，除了透過品系選育規律化產期之外，大部分雙子葉果樹的時間規律化工程是透過對田間管理進行技術改良來達成。農業試驗機構會調查不同品系生長週期、透過栽培技術的改良讓屏東果樹的時間提早、與其他產區全面錯開。例如：在特定時間點投入化學藥劑、調整肥料碳氮比，或是疏花剪枝，誘導樹體發生生理反應。這些技術的運作，是透過外在介入的方式，減少基因差異而產生的多重生長韻律，使園圃收成更為標準可預測，也能調整屏東與其他產區的生長時程，以發揮屏東熱帶氣候所帶來的時間優勢。

其中，屏東著名的林邊蓮霧（楊弘任 2014）和竹田檸檬（黃士玨 2021），都是改良場與試驗所的農業科學家從田間實作和其他作物的栽培經驗中找出變因，讓原本僅存在於特定產農、模糊且銘刻於身體的催花技術，乃至於意外發現

doi:10.6342/NTU202601203

的變因變得可見，時間的控制變成一套固定在栽培手冊之上的栽培技術，不僅增加了採收時段，也大幅減少了因為開花結果規律的不確定性所造成的崩盤危機。

同樣地，屏東檳榔也在市場中佔有時間上的優勢，其每年大約在四月底到五月之間進入產季，並主導整個臺灣夏季檳榔的市場。臺灣各地的產區都要等到七月底以後才開始紛紛進入產季，五月到六月間是臺灣檳榔市場週期中最早、產量也最少的時刻，因此能壟斷了全台灣春夏之交的市場。這段獨佔市場的產期特性，賦予了屏東檳榔另外一個名稱「早生檳榔」，訴說了它在市場中的時間地位。到了七月底以後，嘉義、南投的檳榔會開始進入市場，無論果形在怎麼漂亮、質地如何鮮嫩的檳榔都失去了價值。抓緊時間、讓檳榔進入高價的交易市場是檳榔農最在意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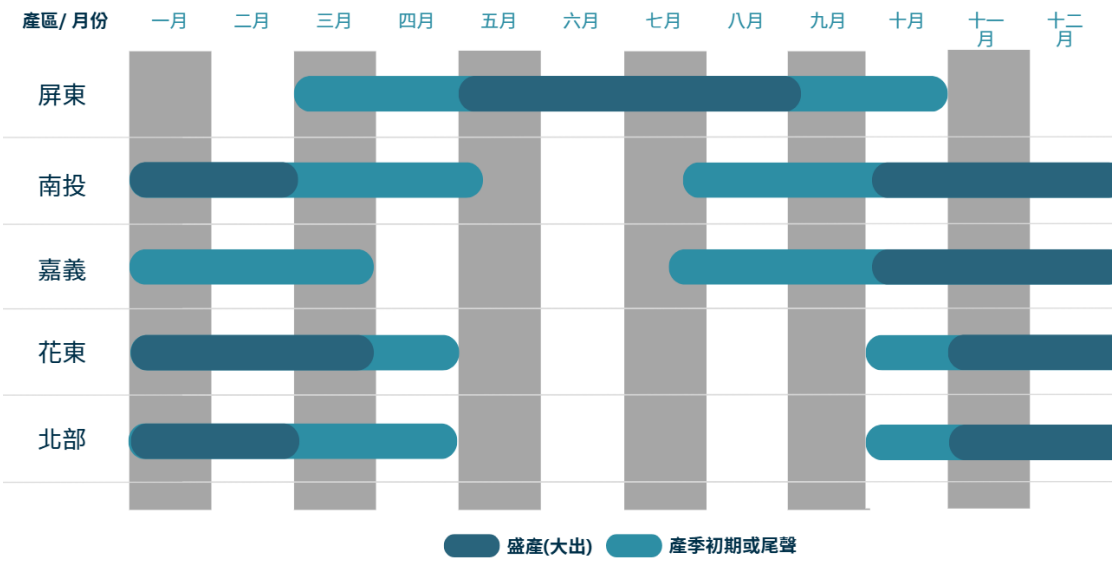


圖 5 臺灣檳榔產季表[30]

1980 年代，檳榔崛起的經濟效應已經被政府注意到，亦有農政官僚建議農業試驗所著手研究檳榔的生理特性，調節不同產地的檳榔產期，例如當時的台灣省農林廳農經科長胡宏渝就曾建議對檳榔產期和品質進行改良：

[30] 本表參照了薛玲（1991）以及林育建（2007）兩份研究的產季資料改繪而成。

doi:10.6342/NTU202601203

檳榔是全年性消費品，而國內生產有季節性，隨著生產與消費量激增，越來越有季節性供需失調問題，祇好靠走私進口來調節。其實，檳榔是很快會變質的高鮮度精緻農產品，進口檳榔在品質風味上實難滿足消費者。

胡宏渝還建議，由農試所嘉義分所、高雄及台東農改場多撥人力，加強研究檳榔產期調節、品質改良技術（魏錫鈴 1989）。

但是，檳榔至今仍未發展出標準化的時間調控技術。其原因一方面如同前文所言，檳榔從未像一般農作物被農政單位視為需要精進或改善的生命，因而缺乏時間調控技術研究資源的投入；另外也與檳榔本身的生理特性有關：許多人為控制植物時間性狀的技術，如嫁接、修枝、營養繁殖[31]，其操作的共同條件都是雙子葉果樹的形成層；然而，單子葉木本的檳榔樹缺乏了形成層，本身就不容易仿造其他果樹單一化特定的時間表現。也就是說，檳榔除了農民自身投入的育種之外，基本上沒辦法透過其他作物的栽培技巧標準化其開花的時間，檳榔樹的開花時間仍相當難以預料且高度分歧。而這也反映了前面提到，檳榔田間作業缺乏標準程序的時間因素，有一個資材行這麼告訴我：

其他果樹開花時間比較統一，整個園子在特定時程要用的藥都差不多。但是檳榔園就不一樣，今天這棵樹開花你灑藥，隔壁還沒開花，那等到它開花就沒有效果了。然後原本那一棵樹可能要結果了又有別的蟲，就要換種藥。後來我們跟檳榔農討論出來，如果要防制大部分的蟲可能就要大概一個禮拜用一次。(20251118 田野筆記)

[31] 過去曾有園藝研究（王翔峙 2000）透過檳榔的莖頂、胚乳、根部等部位開發組織培養技術，嘗試保持優良的單一品系。但組織培養相當困難，需要在嚴謹的實驗室環境才能進行，規模化不易，目前檳榔仍是以種子實生繁殖後代。

doi:10.6342/NTU202601203

說到這裡，我們可能會預期檳榔生長、開花的時間屬於統計學上的常態分布，每個農民園圃都錯落著開花週期不一的檳榔樹。然而，檳榔樹時間韻律雖不如其他果樹那樣整齊規律，卻也有農民擅於栽培出早生檳榔，顯然檳榔的開花結果時間並非全然取決於檳榔樹個體本然的特性，還涉及檳榔農的施為和技藝。

那麼，檳榔農要如何主動地調整園圃裡檳榔樹個體的時間，種出早生檳榔創造豐滿的收益？我多次向報導人問起類似的問題，以為他們會回應我應該使用哪一隻肥料、甚麼時候施肥，但一個報導人則告訴我「肥料有用啦，但重點還是基因。用講的沒用，只能用『看』的。」這段話非常重要，農民指出檳榔樹開花的時間早晚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本性，人為的介入頂多能促使檳榔樹發揮本性，卻沒有辦法改變本性。而這段話的後半段，則展現出農民介入檳榔生物時間的獨特實作路徑：農民仍認為透過「看」可以接近，甚至改變檳榔樹的時間韻律。這樣由外而內的認識與實踐顛倒了基因學的知識——就如同本文開頭的老劉所想的那樣——基因是包裹在細胞中「看不見」的特質，需要實驗室的基因檢測工具去生產檳榔的染色體資訊，若少了這些工具，基因的好與壞乃至於時間的早或晚根本不得而見，更別說過濾出特定的基因達到時間的標準化；然而這位農民卻認為時間是一種可以從外觀看到並加以影響的對象，我們有必要了解檳榔農的視覺活動。

就像是「顧檳榔」強調農民對檳榔樹的視覺觀察力，我們可以從檳榔農的實作經驗發現檳榔樹的時間之所以能用看的，是因為檳榔樹的時間有視覺上外顯的符號，成為檳榔農長期追蹤檳榔樹開花的索引，這樣的物質表現讓個體內在所形塑的差異可以被捕捉，並且透過後續的選種育種和前面提到的各種田間作業搭配，穩定園圃檳榔樹的時間韻律。接下來的段落，我將說明檳榔農如何透過視覺捕捉檳榔的開花韻律，並且透過種子實生的育種調和與穩定檳榔園圃的時間。

doi:10.6342/NTU202601203

（二）觀察開花的韻律

1. 「節」：檳榔時間的視覺化

我第一次被報導人帶進入檳榔園的時候是十一月，也是屏東檳榔產季早就結束的時刻，幾乎見不到檳榔花穗與果串，報導人卻能輕鬆地找出表現優異的檳榔樹個體，他所參照的依據是檳榔樹幹上的「節」。

在華語的脈絡中，「節」同時代表著分段與連結，包含有形的物質與無形的時間都會用「節」來指涉一個單位的斷裂、並且接著連接到下一個單位的所在，如關節、季節，兩者分別指涉物質和抽象時間上的分段。但在檳榔樹上，節同時指涉了物質與時間上的分段。

「節」這個構造可以見於許多棕櫚科家族的植物，植物學家稱它為「環形葉痕」（leaf scar）。而這個構造的出現要從單子葉植物演化講起：單子葉植物在演化過程中丟失了被子植物原有的維管束形成層（Zinkgraf, et al. 2017），像檳榔這樣的單子葉木本植物沒有辦法像雙子葉木本植物一樣進行次級生長，它們生命點只有頂稍的分生組織，並逐年往上生長，在向上生長過程中，綠色的葉鞘[32]會脫落，於莖部留下明顯的節痕。結果是，檳榔不像一般的樹木將年齡隱藏在樹皮內的年輪中，而是將其展示在外表的樹幹，只要細數莖部節數，就能推算樹齡。以屏東的檳榔樹來說，大約一個半月會脫落一片羽狀複葉，長出一節新的環紋，平均一年增加八節環紋（圖 6）。而這個速度會隨著季節往復變化，也會跟著檳榔樹個體的先天條件、年紀增長遞變。也就是說，檳榔的節不只是植物構造上的分節，更具現了一棵檳榔樹的時間本身，讓時間轉化成視覺單位，記錄在一節一節的樹身之上。

檳榔樹上的節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檳榔結出果實的肉穗花序（spadix）亦從節萌發。當肉穗花序結成果成串割下後，節上會留下明顯的傷口（圖 7），需經過

[32] 由羽狀複葉下部延成，包被枝梢幼嫩部分的苞狀構造，稱為葉鞘

doi:10.6342/NTU202601203

一至兩年才會自然脫落，檳榔農可以由此回推一棵檳榔樹近年來的開花歷史；此外，開花的早晚也和檳榔樹本身的生長節奏相關，若檳榔樹傾向將養分花費在向上生長[33]，會形成較寬的節距，拖慢開花的時間。因此，樹節不僅標誌檳榔樹的年齡，亦成為記錄開花情形的視覺索引。





圖 6（左圖）檳榔樹羽狀複葉的葉鞘脫落後的環紋

圖 7（右圖）檳榔果串剛割下來在節上留下的傷口

2. 學開花

檳榔樹的生命史較長，投入生產的年齡也比大部分果樹年長。通常從苗圃移植到檳榔園需至第三年左右開始吐花，第六年起才逐漸結出可供市場銷售的果實，但這不代表每棵檳榔樹都走向穩定生產的階段。農民大多認為一棵檳榔樹到了第九年左右才發展為一棵穩定的檳榔樹。

從檳榔樹開始吐花到九歲穩定之前的這個階段非常關鍵，每一棵樹會逐漸發

[33] 這樣的趨勢會受到兩個因素影響，首先是檳榔樹本身的先天的條件，再者農人施肥時氮肥過量也有可能造成這樣的問題。

doi:10.6342/NTU202601203

展出個體的開花時間韻律和結果能力，有些農民會稱其為「學開花」階段——簡單來說，就是從渾沌不明的狀態逐漸穩定下來，學會在固定時間準時開花並結出穩定的果實。檳榔農用「學」這個動詞來闡釋檳榔開花的過程相當耐人尋味，因為在一般農業語境中，植物開花多與人類的技術干預相關，諸如「調節」花季、「催」花，這些動詞皆將植物做為客體，透過人為技術介入，調整植物的開花時程，由此配合一套穩定的市場時間秩序。相對地，在檳榔的栽培語境中，開花的韻律很難依照人類的意志改變，開花行動被保留給植物自身，隨年紀增長還有可能出現變化，因此「學」既蘊含著難以被人類決定的個體自主性，以及隨時間流變的動態性。

「學開花」並不是檳榔樹獨立的活動，還需要檳榔農的雙眼投入——檳榔農在檳榔樹還在學開花之際，需要反覆環視檳榔，花費數年從「節」上的痕跡觀察檳榔樹學開花的狀態，才有辦法生產出學開花的生命歷程。

擅於栽培出早生檳榔，朋友稱為「檳榔博士」的阿任曾帶我走進園圃觀察三棵同一批栽培、樹齡六歲的年輕檳榔樹，透過樹節來分析個別學開花的狀態。阿任指向第一棵檳榔樹（圖 8），這棵樹相當挺拔，比同年份種下去的同伴還要高出不少，但是樹節上幾乎都沒有開花的痕跡，代表他很晚才學會開花、學習狀態並不佳，通常未來表現也不好；再來，第二棵檳榔樹（圖 9）雖然四歲左右就學會開花，但是中間卻有斷裂，代表它產季之間沒辦法連續開花，並非一棵個性穩定的樹，是一棵需要「留校觀察」的個體；最後一棵是阿任口中最完美的檳榔樹（圖 10），大約三、四歲左右就學開花，而且每年都會連續四節的開花痕跡，代表該樹一年中從產季開始到結束總共採收了四苳的檳榔，這樣的檳榔樹會在每年四到六月供應檳榔，若還能產出具有市場上喜好口感、價格最高的「白肉正子」，就是一株完美的檳榔樹。

doi:10.6342/NTU202601203



圖 8、圖 9、圖 10 三棵同齡的檳榔樹

阿任對三棵檳榔樹的觀察和評估，非常接近「球探」的工作，也就是到不同的青年聯賽，觀察球員歷次的表現，藉此評估他們的天分和潛力，檳榔樹就像校園裡的年輕球手，即使接受同樣的訓練、食用一樣的伙食，甚至是來自同個家庭的手足，卻展現出截然不同的個體性。同樣地，檳榔農雖然可以透過肥料灌溉、學習狀況追蹤，引導個體發揮潛力，但終究不能改變個體與生俱來的特質—也就是前面的檳榔農口中所說的「基因」。需要注意的是，檳榔農事實上並不知道檳榔細胞內的基因和其轉錄、轉譯出來的性狀，而是借用生物學概念的「基因」來描述檳榔樹內在所形塑、外顯於身體上的差異性：生物學將個體的差異歸因於染色體上的編碼，檳榔樹開花的時間和結果情況，也深受其先天條件所塑造。即便檳榔農不能確知檳榔樹內在的基因編碼，但透過檳榔樹上的節，可以推測出如基因一般的內在本性。

然而，觀察學開花階段的檳榔樹節，最重要目的是要從節上積累的紀錄捕捉年輕檳榔樹的變化、判讀它的潛力。檳榔樹雖具有先天給定的特質，還在「學習階段」的檳榔樹仍處在不穩定的搖擺狀態，不能太快斷定它的未來，就像是有些笨拙的球手會隨著時間累積逐漸進步或者突然開竅，也有一些很快就表現天賦的球手卻表現不穩、容易失常，因此一個專業的檳榔農就和專業球探一樣，需要仔

doi:10.6342/NTU202601203

細觀察檳榔樹每一次開花的表現，直到檳榔樹活到九年以後脫離學開花的不穩定階段：

> 六年的檳榔樹，還都很不穩定，要到九年才穩定，大部分檳榔樹會越來越好，結果品質到後面會穩定，也比較早，但沒有一定。有些檳榔樹很晚才學會開花，但是表現很好，但是也是有些樹很快學開花，年輕時那幾年表現好，後來表現平平，所以你就要去看它的變化（20240304 田野筆記）

不只是開花時間尚未穩定，結果也處在搖擺狀態。一棵優異的檳榔樹需要學會結出如捧花一般完整的花穗、果實要均勻且圓潤「正子」（詳見第四章），但是年輕檳榔樹通常結果較為參差，也容易結出一種客家話稱作「鬚仔籽」（xi´e` zii`）的果實，它們結於花穗末端，形狀雖然是圓形、食用起來多汁卻相當苦澀，幾乎沒有市場價值，也容易搶走整苞花穗的營養。會結出鬚仔籽代表該棵檳榔樹尚未學會妥善分配營養、結出漂亮的果實，因此檳榔農也會留意這些結出鬚仔籽的檳榔樹，是否有逐年改善的趨勢。

既然這個階段的檳榔樹是在「學」開花，那麼就不是只有檳榔農會單向地進行觀察活動，正在學習開花的檳榔樹也會觀察外在的世界。例如，有農民認為，檳榔樹會觀察農民的行為改變開花節奏：

> 我爸爸有一年把太慢的檳榔樹淘汰掉，把葉子全部落下，變得光禿禿的，打算補上新的檳榔樹。結果隔年要種新的檳榔樹時，發現去年竟然遺漏了一棵檳榔樹沒有砍。沒想到，那一棵樹竟然提早開花了。我告訴你，這是因為檳榔樹看到我們把旁邊的「慢菁仔」砍掉，它被嚇到了。聽說植物也有心跳，這是真的，它一定是在我爸砍掉它夥伴的時候緊張到驚

doi:10.6342/NTU202601203

了一下，隔年趕緊開花。這一招屢試不爽，我後來也試了好幾次，如果檳榔樹太慢，可以砍一些騙它們。（20251118 田野筆記）

也許，我們沒辦法知道檳榔樹是不是真的感受到同伴生命的消亡抑或是農民的意圖而調整了開花的步調，然而透過這位農民對於檳榔樹改變開花韻律的描繪，我們可以了解：檳榔樹開花韻律的形成，和大多數經由農政體系規律化的作物相當不同，檳榔樹開花韻律和結果能力的養成，就如同所有生物的學習歷程一樣，需要與外在世界反覆地互動、吸收資訊，透過經驗的累積超越生物本身的靜態設定，這段過程是一個開放的個體化經驗，需要時間的積累才能穩定下來，沒辦法透過人為的強制介入改變它的時間韻律。也正是植物這樣的不可預測性和潛力，召喚檳榔農投入長期的視覺勞動。





圖 11（左圖） 宛如捧花的花穗

圖 12（右圖）長在花穗末端的鬚仔籽

doi:10.6342/NTU202601203

（三）育種：改造開花的韻律

但是我們可能會好奇，既然人類無法直接從生物體層次改變個體檳榔樹的時間步調，為什麼檳榔農仍要投入數年甚至十年以上的心力，細緻地觀察每一棵樹學開花到成熟的生命動態？這便是為了「育種」的安排。

檳榔的育種方式是挑選出具有偏好性狀的母樹進行培育繁衍，是檳榔農主動調整、改造檳榔園圃時間秩序的方式，也是人類馴化植物的起始。在人類馴化物種的歷程中，都會有意識地挑選出符合自己需求的品系進行育種，但是上世紀的育種方向變得更加精確且一致（Scott 2023[1998]:456-457）。驅動育種方式產生劇烈變化的，是遺傳學的發展與應用：傳統的育種大多只能針對整個生物體做出育種選擇，在孟德爾遺傳學被重新發現後，科學家能夠掌握調在生物體內細胞層次的基因組合，開始能有系統地透過「雜交」等手段組合基因，產生具有特定特徵的新品種，甚至能繞過有性生殖讓特定的基因型複製（Kloppenburg 2004），基因和適應能力具有多樣性的地方品種逐漸被基因上趨同化的雜交品系取代，成為收成時間和品質都更加穩定可預期的單一品系。

遺傳學與基因工程的另外一個效應是讓作為生產資料（means of production）的「種子」，從農民分離出來成為商品（Kloppenburg ibid.），農民原本可以透過耕作自主再生種子，現在卻需要向外購買基因純度高的種子，才能保持園圃生產的整齊和參與市場運作的門票。而原本包裹在植物體內、可以自我再生產的基因組合也變成可以被佔有、壟斷的智慧財產。

脫離農政體系的檳榔，育種亦走在現代農業的標準化路徑之外：前面曾提及，檳榔因為缺乏雙子葉果樹的形成層，難以透過營養繁殖等方式選育優良品系，在缺乏農政單位介入的條件下，檳榔農唯一能掌握的方式就是人類最傳統的育種方式——「種子實生繁殖」。另外，由於沒有機構或企業能研發出保證早生和品質優良的檳榔品系，檳榔農大多都是自己育苗，鮮少向陌生的店家購買檳榔苗。也

doi:10.6342/NTU202601203

就是說，檳榔育種的勞動成果並沒有被專業單位或企業所壟斷，而是保留著與農民難以分割的關係，並且保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性。

那麼，檳榔農要如何選育呢？他們會根據每一棵檳榔樹學開花的歷程物色樹的潛力，等到十歲之後，農民會將開花時間準時、早生且結果品質優異的檳榔樹挑選出來育種。被挑選出來的檳榔樹大多介於十到十五歲之間，被選上育種的那一年，它第二或第三把花穗會留在樹上八個月（一般三至四個月就會採收進入市場），等待成熟割下來曝曬成上百顆黑色的乾燥果實後，即進入育苗階段（圖 13）。需要注意的是，因為果實留在樹上的時間比平均時間長許多，擔負育種任務的檳榔樹需要提供許多營養給果實，就像是被派出去比賽的選手會大量消耗能量，檳榔樹那一年會特別「累」，造成隔年開花時間的延遲，沒辦法發揮早生檳榔的優勢，所以檳榔農若選擇讓優異的檳榔樹育種，必須跟著承擔一棵資優檳榔樹隔年產量的波動。



圖 13　被選育的檳榔果實，經成熟呈黃色，需要曝曬成黑色狀態後進行育苗。

因為留種子會傷到優異的成年檳榔樹，讓它離退役又更近了一些，加上這些種子濃縮了檳榔農十多年來仔細的觀察和選拔，可說是「十年磨一劍」，由其育出的苗更是需要細心呵護。多數檳榔農不會直接在檳榔園中育苗，一方面擔憂遭

doi:10.6342/NTU202601203

竊，一方面則要提升育成的比例，因此將發芽後的檳榔幼苗安置在家屋周遭的空間──例如花園、伙房[34]後方的晒衣場等。這些空間接收的陽光較為溫和，可避免幼苗曬傷的風險，更重要的是，這些場所是檳榔農日常移動與活動的區域，幼苗得以隨時被看顧、照料。

勝堃是我田野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他將剛發芽的檳榔種子放在家屋門口屋簷下的保麗龍箱裡育苗，而稍大的幼苗則栽種在屋旁芒果樹下，芒果樹下是一方小巧的園圃，陪伴檳榔苗成長的生物有百合、九層塔，甚至還有寵物土雞。在那棵芒果樹前，還擺放了一組長桌，長桌是勝堃每日生活時間最長的地點，包含工作、吃飯、休息、招待客人都離不開長桌。對勝堃來說，育苗不是園圃中的生產前置作業，而是與日常生活連成一氣的時間節奏，除了睡眠和出門，檳榔苗幾乎都在他的眼簾之中。



圖 14 勝堃在家屋門口屋簷下的保麗龍箱裡育苗，接著再種植到芒果樹下。

由於檳榔苗相當珍貴，通常只會投入自己的園圃，取代退役的檳榔樹，偶爾才因有人相求而賣出。買下種／苗的人通常都會是檳榔農熟悉的親友，而那些收下檳榔種苗的農人到了數年後，仍可以指認出那些成年的檳榔樹源自於哪一位親

[34] 客家話中的傳統家屋稱為「伙房」（fo` fongˇ）

doi:10.6342/NTU202601203

友。因此，檳榔園中的每一棵檳榔樹都有自身的歷史和關係系譜，有一些檳榔樹來自於家戶中的上一代傳承，可以在園圃中追溯到特定的早生母株、有一些則是來自親友的分享。也就是說，檳榔樹不僅帶有個體化表現的植物體，還各自乘載了檳榔農的一部份，包含他的勞動投入，還有社會關係。

不過，即便檳榔苗經過細心呵護，還是難以達到標準化的目標，因為檳榔園和試驗場不同，田間園圃沒辦法做到封閉的生殖隔離，那麼就沒辦法阻隔環境中的各種非預期的遭逢，例如昆蟲的異花授粉。因此從優異母樹選拔出來、經由幼兒般呵護的種苗，仍然具有基因的多樣性。有一位檳榔農和我說：

> 植物這種東西很難講，它會變，你不要想說有那麼好的事，種下去都是早跟圓的。我婆婆很認真，都會特別留圓的檳榔，但是第四年結果，哇！怎麼還是長出尖的。

檳榔農相當清楚的是，同一棵母樹栽培出來的檳榔新樹只能繼承上一代的「潛力」，不保證全部都是早生檳榔樹；即便是早生檳榔樹，也不一定結得出市場偏好的果形，栽培檳榔樹等待育成就有如拆禮物一般難以預料，檳榔樹還需要在既有的先天條件上，透過數年學習開花才得以發揮潛力，所以檳榔農又會進入一個新的時間輪迴，持續關心年輕檳榔樹的動態。

三、結論：放慢的演化時間

在農業操作和物種生命深受國家政策與市場形塑的當代，檳榔獨特的生物特質和生命政治處境，使其蜿蜒出一套國家和市場標準化工程缺席的生產型態，不僅栽培方式更具開放性，也連帶地讓植物的生理狀態與生命時間具有現代農業少見的多樣性。即便這樣的情境造成檳榔栽培技術的碎片化，也因為農藥施用造成

doi:10.6342/NTU202601203

了消費者和其他作物的潛在風險。然而，這樣的開放性卻有可能讓我們在現代性農業造成的危機中，提供一條「繞開正軌」的途徑，思索和變遷、失序共處的哲學。在本章的最後，我想從演化的時間性思考檳榔栽培提供的啟示。

許多檳榔商品鏈上的從業人員和我提到，檳榔樹雖然是耐天災的作物，但這幾年極端天氣事件如長時降雨和乾旱，變得比以往頻繁，造成檳榔結果狀態更加參差不齊，檳榔的產量週期相較他們從業之初更難以捉摸。除了短時間的天氣災害，長時間尺度的氣候變遷也變得越來越棘手：嘉義和南投高海拔的檳榔產期隨著氣溫升高而逐漸提前，壓縮了屏東檳榔的產期。整體而言，臺灣的檳榔產期地圖正在緩緩位移和重整當中。

不只是檳榔，氣候變遷正改變臺灣農業既有的生產時序與空間秩序，不同產區之間生長與採收時序逐漸洗牌，為農政單位的產期調節工作帶來相當大的挑戰。氣候變遷不只是挑戰了農政單位與農民的適應能力，也挑戰了上世紀工業型農業中單一化種植模式。單一化種植既受惠於又排除了生物的多樣性，其中遺傳技術讓人類可以從生物的個體變異中找出有競爭能力的基因組，卻也壓抑了讓變異存在的個體差異，即便達到了機械耕作與規模化的目標，卻大幅減少了對氣候變遷的調適能力。當單一化逐漸失控時，仍須向單一化的圍圃外尋求多樣性的救援。

當前的農政單位與科學研究除了持續研究新的催花果技術來調節生產時程外，也積極投入分子遺傳學的研究。從農業科學界的研究進程中，我們可以知道分子遺傳科學是應對氣候變遷下相當關鍵的工具。遺傳技術的革新[35]，大幅增加了基因的解碼效率，縮短育種工作的需要時間，育種研究人員可以從全球化的基因庫中快速鎖定能克服氣候變遷的基因組合，不再困擾於長時間的實驗與選育

[35] 例如在傳統的雜交育種中以 DNA 基因型鑑定來選拔子代，稱為分子標誌輔助選拔（markerassisted selection, MAS），因為能快速掌握預期性狀的來源基因，可以大幅提升選拔效率，縮短育種時程；另外則是以遺傳工程組合不同來源的基因導入作物基因體，像是基因改造或稱基因修飾（genetic modification）技術，將挑選的目標基因連接於載體 DNA 形成重組 DNA，再將此重組 DNA 轉殖（transformation）入宿主中，可以達到跨物種間基因平行轉移的基因交流（鍾萍 2021）。

doi:10.6342/NTU202601203

（林子凱, et al. 2024），縮短育種時程的目的就是要讓物種演化的速度追趕、甚至超越氣候變遷的速度。這樣的演化時間性，呼應了 Kloppenburg （2004）對遺傳科學史的觀察：他指出，新興的遺傳技術，如 DNA 的重組工程徹底改變了演化的時間，人為操作的物種演化不再需要數百萬年、數千年，甚至不需數百年，而是在短短幾天之內完成。這些轉變並非隨機發生，而是源自人類有意識、直接的工程設計與干預。人類超越了物種演化的時間限制，成為演化議程的主導者。

正當農業科學家著手解密各種經濟作物的生理與基因線索，嘗試改變其演化進程之際，檳榔完全被遺漏在這條加速的集體演化路途上。可以說，檳榔正是當代社會中「不符合進步的時間表而遭到忽視的事物」（Tsing 2024[2015]:50）。而這樣的處境和生物技術的空白，也讓檳榔的種植呈現出很不一樣的演化時間感。我有次向檳榔農提問氣候變遷會如何改變檳榔的生理狀態和生長週期，他深具啟發性地借用地層堆積的時間感知告訴我：

> 地層不是會有白堊紀、侏儸紀，每一層的自然氣候都不一樣，但是每一層都是好幾百萬年。相對於地層來說，每一棵檳榔樹僅是存在於這個世界中短暫的時間片段，所以我有點難回答你，因為檳榔也許會受（大尺度的氣候變遷）影響，又好像不會受到影響。

追問這位檳榔農後，我進一步理解這段話的含意是：從地層歷史來看，氣候變遷是個緩慢但勢必發生的事件，個體檳榔樹的生命史尺度雖不會遭遇讓自己死亡的劇烈變遷，但是從世代的時間尺度來說，檳榔樹這個物種會遭逢不斷流變且沒有方向性的氣候環境。檳榔農作為生命長度比檳榔樹略長的同伴，任務是不斷觀察個別檳榔樹的生命樣態，知道哪一棵檳榔樹更適合當前的世界（包含氣候，以及人類的市場活動），並且透過種子的育種改變園圃中檳榔樹的集體演化的路徑。但是檳榔園圃是個對外界世界開放的空間，沒辦法隔絕外在的遭逢，也沒有辦法

doi:10.6342/NTU202601203

封閉其基因的組合，所以演化的路徑勢不具有單一的方向，而是充滿變異、差錯和驚喜的過程，檳榔農仍需要對個別的檳榔生命步調投入細心的照護。

因此我認為，前文提及農民觀察檳榔樹「學」開花，不只是一種異於現代農業的育種技藝，更能延伸為一種隱喻，表現出檳榔這種充滿不確定的演化關係。而這樣的關係不只是發生在檳榔農與檳榔樹之間，也可以套用在人類長久以來馴化其他物種、但隨著工業型農業發展逐漸失去的能力：學開花這件事表面上可以理解成個體檳榔樹從混沌不明的生理狀態固定下來的過程，但卻是在具有開放性的互動關係中萌生，其中的關鍵是檳榔農的**注意力**——透過觀察、紀錄檳榔樹隨時間的流變，才能共作出檳榔樹和整座園圃的生命史。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學」開花的主詞是檳榔樹，因此檳榔樹也在不斷變動的環境中觀察、學習並累積經驗。換言之，在檳榔園圃中，檳榔樹和人類同樣都在變動不居、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裡，不斷調適、改變自身的生命節奏，學習與遭周世界共處。

檳榔園圃中的演化時間性，以及由此萌生出來的關係，並非導向一種進步的未來，或是對抗氣候變遷的成功敘事，而是拒絕人類單向馴化、改造非人物種的進步敘事。在本質上就是充滿流變的現實處境中，生存仰賴與其他生命共同學習、共作存活的技藝。而學習是個緩慢且未知的過程，仰賴生命歷史一節節的堆積。

不過，極端的天氣事件和變化莫測的氣候型態，仍然是個立即且棘手的問題，無論是檳榔樹或檳榔農都無法單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他們還需要他者的交換和協作，才得以在充滿變動的情境中靈活作出調適。接下來的章節，我將會把視角跳離檳榔樹與檳榔農之間，關心檳榔交易鏈結與檳榔園生態中的其他組關係，這些關係有助於我們瞭解由檳榔所串起的社群，如何共同應對當代複雜且多重的風險。

doi:10.6342/NTU202601203

第四章　江湖：正式市場外的檳榔交易

農產品交易量和價格的波動，經常溢出農政領域成為朝野攻防的議題，接著演變成大眾矚目的政治事件，左右臺灣政治版圖。例如 2016 年台北菜價高漲，引發了民進黨民代段宜康、王世堅和當時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韓國瑜之間的激烈攻防，原本已經淡出政壇的韓國瑜在這幾段攻防中敗部復活，造就了 2018 年的政治海嘯。

高麗菜、蒜頭、香蕉，都是歷年來常登上新聞版面、撼動政壇的作物。相較之下，農業主管機關不曾因檳榔價格變動而向社會大眾說明，更少見檳榔的生產者或消費者將價格波動的矛頭指向官方單位。因為檳榔不僅非民生消費品，甚至不屬於《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所規範的「農產品」，它既不會進入由國家監管的果菜批發市場，主管機關也沒有責任調節其供需與價格。若要描述檳榔交易的處境，以及它與主流社會和國家規範的關係，「江湖」是個相當貼切的描述。

在前現代的帝國中，「江湖」在國家權力鞭長莫及的邊緣地帶萌生，人們透過各種非正式、遊走在法律邊界的群體如兄弟會、幫派來尋求支援和互助，填補了國家缺席所留下的權力真空[36]。然而，「江湖」並未隨現代國家的形成而消失，而是以多樣的面貌持續存在於治理的邊界上，與國家所構築的秩序不斷角力與辯證。檳榔的交易便是這樣的存在：檳榔被排除在法定農產品之外，其交易完全仰賴民間自發生成的「場外秩序」，國家持續對活潑又靈活的交易活動進行追蹤，嘗試將其納入常規的市場經濟體系中，卻始終難以深入其中。

[36]關於江湖的概念，是參考歷史學家 Antony（2016）對清末廣東的研究，當時國家財政緊縮、官僚體系逐漸失控，廣東地區人口大量增長，出現許多以零工、小販維生的人口，國家也難以控制所有人口，這時候逐漸萌生出自主運作的地方社會秩序，同時也出現許多非法組織和人群以兄弟會等方式集結、犯罪，也就是江湖的社群組成。但是，他所描述的江湖並非完全被排除在主流社會之外，他們可能搶劫貨品，卻也流通那些深入邊區的物資；他們違反國家法律，但也可能和基層官僚結盟，維持地方社會的安定。整體而言，江湖的世界與主流社會截然不同，但同時又以許多複雜而微妙的方式與之糾纏在一起。

doi:10.6342/NTU202601203

在常見的敘事中，「江湖」往往象徵著脫離國家保護傘的危險領域，意味著失序與暴力的陰影。的確，排除在農產品範疇外的檳榔，價格由盤商組織訂定，缺乏農政單位對交易人與價格的直接監控，農民更沒辦法因為價格崩跌和災損申請補貼。然而，看似危機四伏的檳榔交易，卻是許多農民參與的農產交易經驗中，價格和交易秩序最安全的作物，鮮少發生供應難以吞吐或是嚴重的崩盤事件。更令人驚訝的是，檳榔產銷體系佈滿了不同規模的交易夥伴關係，看似參差不齊的交易線路，實則媒合不同生產特質的農民與不同需求的消費者。檳榔園圃田間作業投入參差，生產力較低、品質較參差的「混作農」或「老年農」並沒有被排除，而是透過彈性的交易關係媒合進市場，而尋求廉價檳榔的消費者也能找到適宜的通路。

檳榔的交易秩序並非來自國家市場交易制度和批發市場的規約，而是來自人與人之間的義務和信任所生成的道德秩序，是農政單位積極監控、調節的作物市場難以達到的效果。本章節的書寫目的，並非主張國家應該要退出農產品交易市場、交由民間自由交易，而是要重探檳榔如何被排除在國家建置農產交易體制之外？接著進一步探問繞開了批發市場的檳榔如何流通？如何允許規模參差的從業人共同投入？又能為充滿風險的當代農業市場帶來甚麼啟發？

關於本章的分析，我將以檳榔交易的中間人網絡為中心，探討檳榔交易鏈如何在不同對象之間以及時間點，透過差異化的交換形式界定出不同的社會關係。這樣的分析延續了經濟人類學對市場（商品）交換／禮物交換兩者的關注，透過對交換形式的分析，不僅能揭示檳榔交易體系與國家制度化市場經濟之間的差異與摩擦，也能理解人與人如何在交換過程中建立長期的義務與連結。這些關係既形塑了檳榔交易體系的韌性，也形塑了地方政治的倫理情境，使我們得以重新反思臺灣農產品運銷體系的運作，特別是不受國家直接管理的「場外交易」在農業經濟中的重要性。

doi:10.6342/NTU202601203

一、現代農產運銷體系的人與物

農作物從農民田間採收、流通至消費者手中，跨越了社會關係與地理空間的疆界，涉及人與物性質的多重轉變。若要了解檳榔交易活動的特殊性質，我們首先需要了解那套規範農作物交易的「現代運銷體系」。

在現代國家的脈絡下，農產品的流通制度化且專業分工，農產品集貨、選別、包裝、運輸、加工、儲存、批發、零售、市場資訊收發，構成農業經濟學中的「農產運銷」。正如本文開頭所指出，農產品既關乎民生需求與社會穩定，又比工業製品更受時效性影響，經濟活動規模龐大的現代國家，往往透過制度設計，使農產品流通更加有效率且透明。運銷制度一方面讓原本離散在各處的交易活動和價值衡量方式（如不同的測量單位）統一成固定形式、成為可監控和計算的對象，國家由此基礎理性計算農業產值，並且對商品鏈上的人進行徵稅（Scott 2023[1998]）；另一方面，運銷制度也促成定價市場普遍化，讓市場機制取代原本農作交換所鑲嵌（embedded）的社會關係與制度（Polanyi 2020[1944]）。

以臺灣來說，戰後初期（1950-1970）國民政府農政單位政策著眼於土地改革、農作增產等生產層面的社會工程，也形成了小農生產的農業結構。由於小農的生產面積小，大多透過農民自己銷售，少數農產品則須仰賴販運商（俗稱行口）匯集農民的作物到市場批售給其他消費地的中間人。當時臺灣城市規模不大，公路運輸也尚未完備，蔬果菜交易範圍較短，行口大多是將鄉村蔬果菜媒合到鄰近的城鎮。這些行口不只交換農產品，在收集農產品的過程中還收穫許多關於價值與人際的資訊，包含消費地價格的漲跌、個別農民和零售商的家庭變故甚或是身體狀況。也就是說，散落在產地到消費地之間的各種中間人不只是讓物資順利流動，更是資訊交流的節點，形成連綿的關係紐帶。在缺乏現代化市場空間與交易制度之前，中間人沒有法定的稅籍身分，而市場周邊商販林立，僅能提供交易空間，卻沒有辦法透過交易制度來調節商品流通秩序（《臺灣農產運銷發展史》編輯委

doi:10.6342/NTU202601203

員會 2016; 熊中果 1991）。

1970 年代以後，隨著臺灣經濟復甦與工業化、臺北都會區迅速擴張，城市近郊蔬果已無法滿足新興市場需求，中南部產地逐漸走向專業化。隨著商品鏈的空間範圍拉遠與轉手次數增加，價差也跟著擴大。雖然中間人仍被視為現代農產運銷的必要「成本」，但他們連綿的社會關係可能勾結或壟斷農產品的流通和價格秩序，被國家市場治理視為潛在風險。於是，1970 年代以來政府展開農村發展計畫與運銷制度改革，首先在各地區創建現代化的農產批發市場，接著在批發市場空間的條件上推動制度化的農產運銷系統，最具指標性的是 1974 年成立之台灣區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臺北農產運銷公司前身，以下簡稱北農）經營的臺北果菜批發市場。有了批發市場的這樣的基礎設施，政府進一步組織農民團體辦理共同運銷，亦即把一個地區內的小農集結起來，經由農民團體如農會或合作社，協助將這些小農的產品集中到地區型的集貨場，再統一送到交易平台（如北農）銷售。這樣的設計是為了減少交易跨越地理空間和社會關係的中間成本（陳寧 2023），特別是取代販運商的角色，他們跨越產地與消費地，最有可能壟斷資訊來賺取利潤。

1981 年，中央政府進一步制定《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簡稱農產交易法），這是台灣農產交易體系至今所依循的中央法規，規範了批發市場中的交易秩序。在農產交易法的第一條明訂「**為確立農產品運銷秩序，調節供需，促進公平交易，特制定本法。**」其中，供需率與公平交易的概念顯現出批發市場的運作，是奠基在經濟學中的市場經濟模型。就如同 Polanyi（ibid.）所說，即便資本主義的市場交換看起來是個體之間的經濟行為，實則和禮物互惠、再分配同樣都是制度化的經濟過程（instituted process），需要社會制度的支持才有可能成為穩定的整合體。以運銷體系來說，需要有市場制度的存在，農民、盤商等個人層面的交換才能形成價格。經濟社會學者 Callon（1998）的「構框」[37]（framing）概念可以讓我們

[37] 在 Callon（1998）的討論裏，構框（framing）、解糾葛（disentanglement）和溢出（overflowing）

doi:10.6342/NTU202601203

更準確了解市場制度運作的邏輯：國家建造批發市場並制定農產交易法，目的便是要形成市場制度的構框，排除掉商品交換之外的交換形式，解除糾葛（disentanglement）於農產品之上的社會關係。為了要打造這樣的構框，除了需要實體的空間、法律規範、會計知識的支持，還需要號召一系列的技術設施來構造市場中的人與物的性質，使其個別成為分離的理性經濟人與商品。

當前臺灣的果菜除了農民產地直銷或流向本地市場，大多會透過批發市場的「門前議價」和「拍賣」兩種交易方式流通，亦即所謂的「場內交易」。所有參與批發市場交易的販運商與盤商都需要登記成為農產交易法所定義的「承銷人」、繳納保證金與行政費用，交易活動需要開立收據，國家能依此營業資料進行課稅。兩種交易形式中，門前議價系統較貼近傳統的農產交易方式，農民會將農產品交給委託的集貨商／販運商，接著運送到批發市場門口與消費地承銷人交易，和傳統的交易不同之處在於農政單位的仲裁與監控角色：批發市場的員工會到現場進行藥物檢驗，並依照行情做基礎議價、收取行政費，並且監督開立收據；拍賣[38]則是另外一種更接近「完美自由市場」的交易形式，拍賣的關鍵在於「分級」，農民送到集貨中心的蔬果會依據農產交易法下的《農產品分級標準實施辦法》標準，將參差的農產品，依據大小、重量、品質（甜度、酸度、口感、外觀等）分類，接著裝入規格化的紙箱運送。蔬果送達批發市場後，由拍賣員做核定，最終形成蔬果「上、中、下」三個級別（焦鈞 2024）。在包裝上，供應農民的資訊以代號呈現，使拍賣員與承銷人得以在匿名情境下交易，提升公平與穩定，減少偏袒與哄抬。近年電腦拍賣系統與監控設備更進一步阻斷人為干擾，確立交易的客觀性。

是一組相互連貫的概念。他指出構框是市場活動的基礎條件，需要透過昂貴且持續的社會技術投入才有可能將複雜的社會和物質關係解糾葛，從而創造一個可計算的空間。然而，構框總是伴隨著著不在預期內的溢出發生，如經濟學家稱作外部性的影響，又或者是非市場的交換，這使得市場結構需要不斷地被重構和重新協商。

[38] 北農 1974 年開始執行人工拍賣制度，1990 年代開始發展出電腦拍賣機，承銷人可以透過無線競價器競價，大幅減少了人為干預因素。

doi:10.6342/NTU202601203

整體而言，我們可以觀察到從蔬果送到產地集貨場的分級機進行標準化分級到電子拍賣的所有設施運作和制度規範，目的都在於去除關係脈絡：包含農民與農產品的關係，還有交易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當農作物從既有的世界抽離成純化的商品，價值的衡量方式只來自於標準化的分級和供需，不受到人情、勾結、壟斷等各種因素的干擾，個體的自由競爭才有可能發生。

或許對於習慣生活在資本主義世界的人們而言，「自由競爭」早已成為一種理所當然的交換倫理。這種倫理被視為最公平的制度，因為商品的價值似乎只取決於物本身的客觀性質與個體的努力。然而，批發市場第一線的從業人，乃至於深入實作現場的農業經濟學家都深知，徹底自由化的市場交換對於有時效性且深受氣候環境影響的農產交易來說既缺乏彈性，也潛藏風險。這也是為何農產運銷制度發展多年，北農仍保有門前議價的交易形式，也沒辦法杜絕那些跳過批發市場的場外交易，畢竟比起拍賣制度，門前議價和場外交易的交換關係都是奠基在長期的夥伴關係中，這些交易人能夠在農作物產量變動之際相互協助調動物資、彈性調整交易內容。

事實上，除了門前議價和場外交易的盛行，批發市場的交易也不會完全依照自由市場的邏輯運轉。許多市場經驗研究透過交易現場的田野材料挑戰了市場經濟的宰制。他們指出，看似理性的現代化的農產運銷體系，其實沒有辦法阻止非市場的交換以及社會關係從現代化市場的構框溢出（overflowing）。不同的交換形式，以及價值的衡量方式仍然存在，只是位移到市場經濟舞台的後台，蔓延出更加活潑的社會關係。例如北農的拍賣員和盤商之間仍然透過各種禮物的贈送、場外交陪形成社會關係影響交易的過程，拍賣人可以彈性地訂定底價、改變成交次序等方式照顧自己熟悉的承銷人，而承銷人也需要在貨量龐大時協助拍賣員吞吐過量的蔬果菜。因此，看似客觀的電腦拍賣系統會發展出各種非市場的交換關係，而拍賣員也並非中立的市場官僚（林毗螗 2019）。

同樣的現象，也可以在日本的築地市場看見：築地是全球規模數一數二龐大

doi:10.6342/NTU202601203

的漁獲商品鏈中心，在這個高度展現全球化和商品化的交易現場中，第一線的拍賣員其實相當熟悉不同的供應商與批發商的特性，可以透過漁獲拍賣順序的安排，又或者是私下協商的方式完成交易，同時，這些批發商彼此之間的交易關係也是從各種市場之外的社會關係發展而來，會透過日本文化脈絡的慣習來協商交易秩序（Bestor 2004）。這些案例都共同指出了：國家和全球資本市場所打造的市場經濟體制，不僅沒有辦法排除掉人與人之間錯綜複雜的聯繫，其他的經濟活動如禮物的互惠、再分配仍存在於市場體制下的灰暗地帶。這些不整齊的經濟活動，通常被經濟學者放置在市場的外部性或者是非正式經濟來討論，甚至被視為公平交易制度的設計缺陷，但在許多時候卻也輔助並維持市場經濟表層的運行。正因如此，農產交易現場並不會無限擴張成為全然商品化的社會型態。

二、如何思考繞開市場制度的檳榔？

從上述關於農產交易制度的爬梳，我們可以觀察到國家所建置的市場制度和設施永遠充滿漏洞，而交易人也經常繞開市場空間依照文化慣習和非市場的社會關係進行交易，充分展現了市場經濟制度與非市場經濟之間的辯證關係。然而，當我們要思考檳榔交易鏈上各種不同的交換形式如何配置、相互填充運作，首先需要留意這個農作物被國家市場制度「踢出場外」的獨特脈絡。

現代農產品的交換深受國家作為中介的制度設計所形塑，但制度設計往往存在著差異和排除的可能性。檳榔就是如此：它被排除在國家的硬體（如市場空間、電子拍賣系統）和軟體（如農產交易法）基礎設施所支持的常規市場制度外，也鮮少參與全球化市場。這樣的處境倒不是因為檳榔在我們的社會中具有某種不可交換的神聖象徵，而是負面的象徵所造成的結果。

第二章曾提及，因為檳榔是一個對健康有害的公衛問題，所以它在國家行政體系中一直懸浮在模糊的準法律地位（quasi-legal status），即便交易活動並不違

doi:10.6342/NTU202601203

法，卻也沒辦法準確納入任何一種主管機關的權責中。因為在當代國家之中，不同類別的物和服務交易活動會被安放在特定治理範疇，例如食藥署規範食品以及藥物毒品的流通，農政單位規範農作物的流通。但是政府擔心將檳榔納入農產交易法中的「農產品」範疇，或是以菸酒或藥品等特殊形式納入財政部或衛生部門的管轄，都會賦予檳榔正式的法律身分，也就肯認其食用的正當性。結果是，檳榔交易活動始終難以妥善安置於任何國家治理的物質範疇之中，即便 1990 年代開始有社會輿論主張政府應該要將檳榔交易納入管理，並且對交易鏈上的人徵稅[39]，但到目前為止檳榔交易與國家市場規範的關係仍貌合神離。現在政府是透過規範一般商業行為的《公平交易法》來處分檳榔的交易活動。但是農產品究竟和其他的商品性質不同，因此在實務上仍難以規範，且持續與國家產生摩擦，關於此點，後文將進一步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檳榔介於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特性，以及遊走在國家規制的經濟體系之外的狀態也存在於巴布亞紐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 以下簡稱 PNG）[40]，且共享了相當接近的政經脈絡。透過比較的視角，我們能觀察到檳榔被排除在正規市場體系的跨國歷史情境。臺灣與 PNG 的檳榔食用習慣同樣在 1970 至 80 年代間迅速擴張並走向商業化，成為遍布全國的重要經濟活動，但至今卻仍以相似的原因（諸如都市美觀、公衛等問題）被國家禁止進入官方市場，檳榔交易成為在主流市場外高度流動的草根經濟。

回顧兩國檳榔交易活動增長的時期，皆和融入全球商品鏈的歷史有關，60 到 70 年代間，PNG 政府開啟了高地勞動計劃（Highlands Labour Scheme），高地的壯年成為低地礦場、種植園的勞動力；臺灣則是進入了出口擴張的黃金年代，農村和部落的壯年離開鄉村移往都市和代工廠工作，兩個國家的人口流動頻繁，原

[39] 例如農產運銷學學者黃萬偉（1994）投書指出，政府應將檳榔生產者、各級運銷商納入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的規範；環保和衛生單位宜對檳榔採行和菸、酒之同等輔導地位；經濟和財政單位應將零售商納入工商登記管理；內政單位應依少年福利法禁售予未滿 18 歲青少年；衛生單位需就食品衛生管理法規範零售商配料及其衛生標準。

[40] 關於 PNG 的研究，參考了 Sharp（2012）及 Sharp（2016）兩篇論文。

doi:10.6342/NTU202601203

本侷限於特定地區的檳榔食用習慣也隨之擴張地理疆域；差不多的時間點，兩國都興建了高速公路，既促進人、貨與資本的快速流通，也孕育出長時間奔波於運輸線上的勞動群體。對這些長途運輸的勞工而言，檳榔成為維持專注與提振精神的興奮劑。於是，在不同的社會文化條件下，臺灣與 PNG 都出現了專門經營檳榔事業的商販與中間人——前者將農村生產的檳榔輸送至勞工聚集的都市近郊、工業區與交通要道；後者則把低地出產的檳榔帶入原本不食用檳榔的高地社會。

就在兩個國家逐漸進入全球資本供應鏈之際，建造現代化的交易市場變成重要的社會工程，而農作物流通市場不只是要讓民間交易活動變得可見，還隱含著參與全球市場體系的渴望以及發展的意識形態。PNG 的官方市場是為了出口作物和新鮮食品和勞動力交易而建，對統治菁英來說，市場空間革新象徵著貨幣流通和參與現代世界的能力。同樣地，臺灣的農產運銷制度幾乎都是放在農村建設的計畫之中，當時由農漁會聯合出版的農訓雜誌[41]曾提及：

> 台灣經濟發展即將進入現代化開發國家之林，國民所得已超過四千美元，並朝一萬美元的目標邁進，國民生活、衣著、交通、資訊、早已達到現代化水準，飲食方面水準雖高，但農產品自收穫之分級、包裝、加工、貯藏、運輸、銷售、交易，仍極落後，特別是農產品批發、零售交易以及農產品市場設備，均未能滿足現代化國家需要。台灣國民大量出國旅遊，而來台觀光客也很多，各種國際會議相繼在台舉辦，台灣居民早已國際化，農產品運銷貿易，勢必要與現代化國家看齊。

進一步來說，農業市場制度的形成，應該置於臺灣與 PNG 戰後現代化的政治氛圍之中。我們可以發現，現代化脈絡下的市場體制不僅設法排除掉非市場化的交

[41] 出版農訓雜誌的單位是 1980 年成立的農訓協會，這個單位是由內政部等相關部會輔導，聯合全國各級農漁會所成立。

doi:10.6342/NTU202601203

換形式，還會排除其它背離現代化意識形態的物質與慣習。而檳榔就如同前現代的幽靈，糾纏兩個國家邁向現代化國家的路途，被排除在受國家肯認的交易活動之外。對檳榔食用慣習的貶抑和改造，不單是對國民（特別是勞動階級）生命的評估，也製造出農產品的定義與階序：關於甚麼作物有資格成為「農產品」，參與進合法的市場交易空間、成為國家農業產值計算的一部份，哪些則不行。於是，檳榔脫離了現代化的經濟體制，走入江湖。

顯然地，檳榔本身被排除在一般農作物的市場體系外，所以我們不能將檳榔活潑的交易活動視為從批發市場「逃逸」的場外交易，更不是一組從市場經濟制度內部溢出的前現代交換形式。那麼，我們應該要如何討論檳榔交易中市場交換與非市場交換的關係？被國家市場經濟制度排斥在外的檳榔交易，是不是就不存在商品交換和市場機制的邏輯呢？

事實上，無論是臺灣或是 PNG 的檳榔交易都能看見資本主義市場的輪廓：檳榔的交易存在著定價體系，有考參照的分級和價格，所以交換是可以計算的（calculated exchange），參與其中的人理所當然渴望累積利潤，交易也時常隱含著個人利益、機會、競爭甚至是欺瞞；在公平的市場拍賣設施缺席下，人們還是會引用經濟學的概念如供需法則來預測和分析當前的價格。即便如此，檳榔的交易在大部分時刻是依附在特定的關係脈絡中，人們相當重視關係的維繫、創造和由此而生的義務，而關係的維繫不是來自於法律契約，而是來自於檳榔交易裡與外的禮物交換，避免了檳榔交易全面的市場化。

也許檳榔交易中的交換倫理和社會關係，會讓我們聯想到「道德經濟」：Polanyi（2020[1944]）指出前市場的經濟體制（如互惠和再分配）鑲嵌在親屬、鄰里等社會制度中，一旦市場和商品化力量擴張，很可能會遭遇抵制市場的反制性運動（引自蔡侑霖 2017）， Scott 則是透過東南亞農民的集體運動，說明互惠性的價值觀所發展的互助經濟體系如何成為抵抗殖民剝削的動力（Scott 1976; 鄭陸霖 2020）。

doi:10.6342/NTU202601203

道德經濟的觀點，能夠幫助我們觀察社會文化既有的人際關係和倫理觀念如何抵抗市場擴張的力量，但是道德經濟強調社群對市場擴張的道德性抵抗，沒有辦法表現出檳榔交易被國家制度所排除的處境，以及檳榔交易線路上的個人如何在不同的時空依循著異質的倫理情境（如熟人或陌生人之間、本地與外地人之間）操作不同型式的交換。我認為，若要思考脫離了國家批發市場的檳榔交易脈絡，人類學對商品交換[42]與禮物交換的基本討論可供重要的分析線索。

人類學累積了許多討論，批判了商品交換和禮物交換的二元對立觀念，指出每一個社會都會存在著差異化的交換形式——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著許多禮物交換的邏輯，而市場體系和商品交換邏輯也早在西方殖民者進入之前就已經存在。同樣的，檳榔的交易體系也在兩個極端之間不斷位移，因此商品交換和禮物交換不能視作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社會之間的差異，也無法擴展成市場制度內交易和制度外交易的差異。

即便商品交換和禮物交換的二元分類不能武斷地擴張成對於社會的整體認識，也不能視作界線分明的經濟活動，卻是一個相當有用的分析工具，讓我可以進入特定的交換脈絡中，觀察交換過程中物的性質，以及由物所媒介的社會關係（Gregory 1982; Mauss 2016[1925]; Sharp 2016; Weiner 1992）：在商品交換的形式中，交換的是可異化的（alienable）物或服務，生產者的特性可以被抽除，而交換的雙方通常是對等的陌生人，兩者追求的是對價的回報，且會盡可能立刻結清，避免因為時間的延遲產生債的關係和義務；而禮物的交換形式中，物通常沒辦法從生產的脈絡和交換雙方的社會關係異化，交換過程也更可能會因為時間的延遲產生債的關係和回禮的義務，而這樣的交換也會生產出持續性的社會關係。

[42] 在本文中，並沒有嚴格區分或界定「市場交換」與「商品交換」的差異。但是兩者所要偏重的內容略有不同，所以我在行文中也會依循著分析論點採用不同的詞彙：市場交換是依循著 Polanyi 的觀念，強調其制度性，指涉以市場供需為原則的交換形式，交易人可以在自由不受其它社會關係影響的條件下自由交易；商品交換則是依循政治經濟學的概念，更強調人與物之間的異化關係，也就是說人們與交換的物彼此分離，價值的衡量並非來自交換者的特質，而是它的交換價值。

doi:10.6342/NTU202601203

若需要進一步分析「檳榔」如何在禮物和商品兩種屬性之間移動，另一個可行的方式是從「物」思考。Arjun Appadurai（1986）的「物的社會生命」（social life of things）深具啟發性地指出：商品不是在生產階段就被給定的物質類別，而是在不同的交換情境（certain situation）中不斷透過社會協商、競奪而被賦予意義。所以 Appadurai 認為人類學要關心的問題不是「甚麼是不是商品」，而是關心生產者到消費者之間的知識政治如何轉變物的意義。也因此，在交換線路上的物也不會僅存在商品或禮物任一方的意涵，而是被交換脈絡中的文化概念、價值秩序所形塑。不過，Appadurai 的論點相當著重於交換脈絡所處的抽象文化概念、知識、權力關係，這些抽象體系固然重要（例如臺灣消費者食用檳榔的品味偏好），但交換過程的「物質操作」也會改變物的性質和人的社會關係。就如同前文所描述的農產批發市場中，讓蔬果成為可異化的商品，不單是知識政治的運作，還需要分級機器、電子拍賣系統來將物和人從既有脈絡抽離才有可能。也就是說，讓物轉換意義的各種技術／技藝也相當重要，是驅動交換形式差異的來源。

依循著這樣的討論，Anna Tsing 對於松茸供應鏈的觀察，更能夠協助思考檳榔交易的動態。Tsing 觀察到松茸從北美到日本、經過多重中間人轉手，是一個「始於禮物，終於禮物的資本主義商品」（Tsing 2024[2015]：165），在她稱之為開放票現場（Open Tcket）的北美松茸交易中，松茸的價值並非來自資本主義的交換價值，而是它乘載的自由的價值；當松茸抵達日本則變成建立或修補關係的禮品。然而，Tsing 認為松茸之所以仍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商品，是因為它在商品鏈空間移轉的過程中變成日本的存貨，為出口商創造積累。這一切的物質生命歷程變化來自於中間人的「轉譯工作」——交易鏈上的不同位置會安插著不同勞動型態的中間人，並且透過分級來改變松茸的意義。例如，在開放票現場的第一線買家依循自己的五感，透過戲劇性的分級展演出松茸的自由價值；但是當松茸從買家轉手到運貨業者的倉庫時，又會在透過完全異化的勞動力根據日本市場標準進行再一次的分級，如此松茸才被轉譯（Translation）成異化的商品。

doi:10.6342/NTU202601203

Tsing 的研究啟發之處在於讓我們重新思考「分級」的重要性，在前文提及的農產運銷制度中，分級的目的是標準化——讓物從原本的生產情境和社會關係抽出，透過統一的標準衡量價值使其成為商品。但在松茸的供應鏈上，「分級」是一種「認識」的轉譯方式（Tsing ibid.：164），也是讓松茸進入不同的交換關係中的「交換技術」，差異的分級方式既可能讓物品轉變成商品，也能生產禮物的價值；另外，Tsing 所描述的分級也給我一種特殊的視角檢視商品交換和禮物交換的關係：分級讓松茸順利轉移到下一組交易關係，這些關係橫跨了異質的國家與社會文化，在這段商品鏈中，兩種形式的交換不是單純的並存關係，而是佈署在跨國供應鏈的不同空間上，而松茸正是仰賴這樣的空間佈署打撈（salvage）出資本主義的價值。

同樣地，分級是檳榔交易過程的精髓，中間人透過分級媒合不同地理空間的交易伙伴賺取利潤，同時還透過分級創造出檳榔的禮物屬性，賦予交易關係延續下去的倫理情境，這樣的關係是檳榔交易鏈穩定運作的關鍵因素，也挑戰了將自由競爭與公平交易視作農業交易倫理的普遍預設。接下來，我將順著 Tsing 的啟發，專注於交易現場中分級活動的差異，觀察檳榔如何具有商品或禮物的成份，並釐清檳榔交易鏈上不同的交換形式所界定的社會關係。

三、屏東檳榔交易現場

（一）交易線路、組織與定價

在進入檳榔交易現場的描述與分析之前，我們必須先理解檳榔流通線路和定價分級的機制。在此要了解的是：在國家農產交易制度和農業經濟學官僚的缺席下，定價市場如何運行？秩序的來源為何？

產農割下檳榔後，會交給產地大盤，也就是地方上俗稱的行口或菁仔行。接

doi:10.6342/NTU202601203

著這些行口會對檳榔進行分級後透過「拖車行」出貨到消費地的中盤商，盤商再分配給當地的檳榔攤業者。另外也有一些商業規模較大的連鎖檳榔攤，資本額足以投入冷鏈設備和貨運業，會跳過消費地中盤直接向產地行口進貨。

在這些位於產農與檳榔攤之間的中間人網絡中，本地行口的角色最為關鍵，他們跨越了地方的疆界，將檳榔從產地轉手到外縣市，一方面需要照顧地方上的產農，又要到外縣市擴展陌生交易夥伴的版圖，是整條商品鏈上最高風險的事業。在臺灣檳榔還被稱作「綠金」的年代，許多行口將手上的高額金錢發給農民後，被外縣市的中盤開空頭支票，投入資金一夕間虧空，最後黯然倒閉。因此同業之間的資金、資訊、貨品調度非常重要。1970 年代臺灣檳榔產區的盤商紛紛逐漸成立民間團體聯誼會或公會，作為同業聯繫的組織。盤商組織除了交換資訊和調貨外，還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收集彙整產銷情報，為每次交易制定分級標準和價格。其中，屏東是臺灣檳榔產季最早、產期和其他產地相差最大的產區，長期以來便發展出獨立於其他產區的盤商組織和定價方式。每年秋冬產期是南投、彰化與台中成立跨區域的菁仔聯誼會負責控盤[43]，到了五月左右中部檳榔產量萎縮，全台檳榔產季進入尾聲歉收期，屏東檳榔則開始進入產季，壟斷全台產量，嘉義南投盤商的控盤權轉移到屏東的聯誼會[44]，控制大半年的檳榔盤價到中秋節才轉移回中部。

諷刺的是，由於檳榔被排除在法律定位上的「農產品」範疇，少了《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的制度規約，價格的秩序調節的責任才會落在民間的行口身上，但是行口組織聯合制訂分級、價格的行為卻違反了《公平交易法》，2009 年和 2012 年屏東檳榔批發商組織便因為共同定價、變更交易付款方式而被公平交易委員會判定為「聯合行為」遭受處分[45]。公平會開罰是為了保護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

[43] 關於其他產區的盤商系統與定價方式可參閱涂函君、蘇淑娟（2010）。
[44] 屏東的盤商聯誼會早期曾以「屏東檳榔同業公會」申請立案，2009 年因為公平會開罰而解散，後來以「屏東縣檳榔產銷協會」的名義持續運作。
[45] 詳細內容可參閱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公處字第 101098 號及公處字第 098145 號處分書

doi:10.6342/NTU202601203

讓交易人可以自主定價不受外在條件干擾。但實際上，公平會忽略了農作物受氣候與時效性影響的現實。特別是檳榔相當不耐儲存，所以需要非常穩定且迅速的市場流動，才能避免交易風險，而檳榔市場的穩定高度依賴行口之間即時的資訊共享與協調。

有盤商曾建議農委會派員參與各地聯誼會定價會議以確保公平性，但是邀請官員必須提前十天發出公文，而檳榔產量卻是瞬息萬變，需要行口們緊盯市場狀態、當機力斷，僵化的官僚體系根本沒辦法配合。正如嘉義一位聯誼會長在與公平會座談時所言：

> （檳榔）價格變動是要馬上決定，市場不會等你。像是採收時下大雨，大家都沒辦法割菁仔，就要考慮漲價了。等到他們（官員）下來開會，我們的飯都要臭酸掉了。（引自鄭傑憶 2019）

這段話生動地指出，國家雖然試圖追蹤並規範檳榔的交易活動，但第一線官僚體系的僵化與程序化，使其難以回應市場的即時變化。相對地，聯誼會憑藉長年累積的交易經驗與人脈網絡，往往能在短時間內完成價格協調，其訂價結果甚至比許多正規農產品更為靈活且穩定，極少出現市場崩盤的情形。據說，在公平會對其開罰的那一年，反而造成盤商人人自危、無人敢出面定價，導致價格崩盤。

目前屏東的檳榔固定在每周日、三收購檳榔。決定價格的操盤人大多是經營規模龐大且資深的行口，除了核心的操盤者以外，其他行口會分區域推派代表負責統整進出貨量，接著再由操盤人決定隔日的分級和相應的進出貨參考價格。在過去，參考價格是以電話通知各大行口，行口再以此向農民與中盤交易；臉書和 LINE 等社群通訊軟體出現後，價格資訊則是發佈在手機群組和臉書社團，只要加入社團就能夠閱讀價格資訊（圖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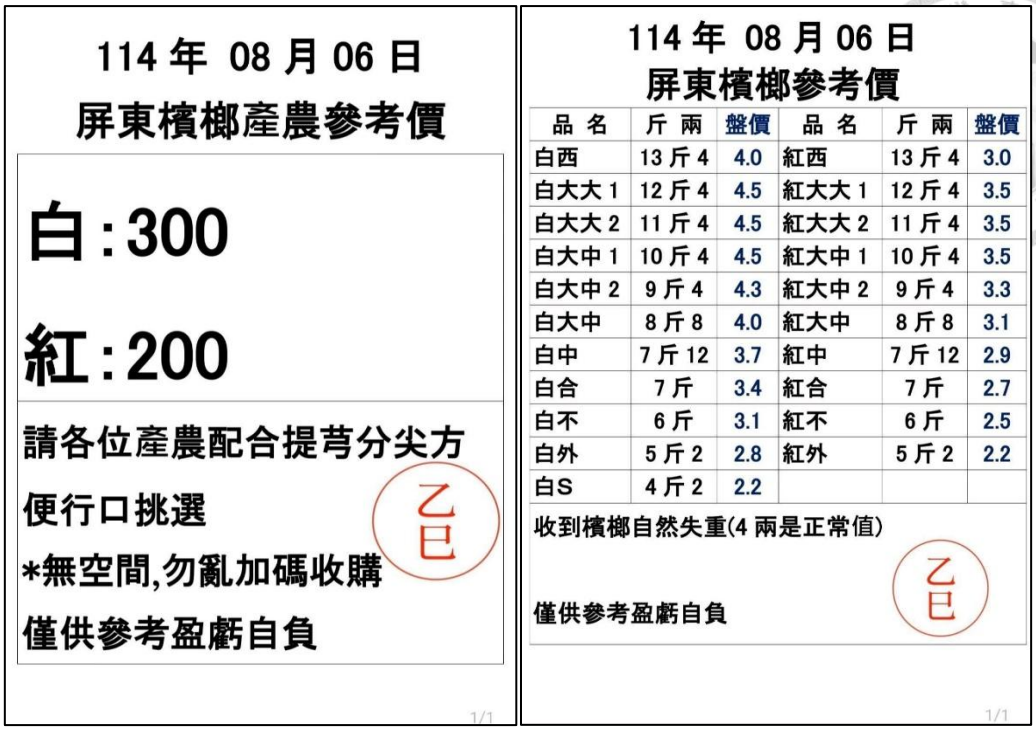
若細究聯誼會公開訂出的分級，就能看出這套體系靈活性的來源。與批發市

doi:10.6342/NTU202601203

場的固定分級規範不同，檳榔的分級首先會區分成向產農收購與販售給中盤的分級，兩種分級還會跟著產季遞移、供需多寡每周滾動調整，變動的分級讓檳榔的價格能迅速調節市場供需。簡化地來說，四月底到七月中之前是臺灣檳榔最少的時候，行口向檳榔收購的檳榔會根據外型、大小分級，價格最高的是形狀圓潤、尺寸剛好的「正子」，形狀較尖的「尖仔」，以及尺寸過大和過小的「超大」與「小顆」價格較低（圖 16）。這些粗略秤斤、分級的檳榔會隨著市場情況再依重量細分成十到十一個等級[46]，加上利潤後以「粒」計價出售給中盤。接著，在七月以後屏東檳榔進入盛產，南投、嘉義檳榔紛紛進入市場，分級的內容會更加仔細、精確，藉此調節供需，較次等級的「尖仔」、「超大」的檳榔價格會非常低，甚至不再進入市場，另外分級還會加入「纖維粗細」的要素：「正子」檳榔根據果實內部的纖維分為較細緻多汁的「白肉」，以及纖維多、食用起來刮嘴因此價格較低的「紅（黑）肉」。紅白肉的分級需要剖開果實才能知道，行口會指派師傅進入農田協助農民剖果分級，因此這段時間又被稱為「剖白期」。接著紅肉和白肉同樣再依大小分級後以不同價格售出。

[46] 等級從重量最重到最小分別是西、大大 1、大大 2、大中 1、大中 2、大中、中、合、不、外、S。白大中的三個等級大小最剛好，市場需求最大。

doi:10.6342/NTU202601203



114 年 08 月 06 日
屏東檳榔產農參考價

白：300

紅：200

請各位產農配合提苧分尖方便行口挑選
*無空間,勿亂加碼收購
僅供參考盈虧自負

乙巳

1/1

114 年 08 月 06 日
屏東檳榔參考價

品 名	斤 兩	盤價	品 名	斤 兩	盤價
白西	13 斤 4	4.0	紅西	13 斤 4	3.0
白大大 1	12 斤 4	4.5	紅大大 1	12 斤 4	3.5
白大大 2	11 斤 4	4.5	紅大大 2	11 斤 4	3.5
白大中 1	10 斤 4	4.5	紅大中 1	10 斤 4	3.5
白大中 2	9 斤 4	4.3	紅大中 2	9 斤 4	3.3
白大中	8 斤 8	4.0	紅大中	8 斤 8	3.1
白中	7 斤 12	3.7	紅中	7 斤 12	2.9
白合	7 斤	3.4	紅合	7 斤	2.7
白不	6 斤	3.1	紅不	6 斤	2.5
白外	5 斤 2	2.8	紅外	5 斤 2	2.2
白S	4 斤 2	2.2			

收到檳榔自然失重(4 兩是正常值)

僅供參考盈虧自負

乙巳

1/1

圖 15 發布於公開社團的檳榔價格資訊[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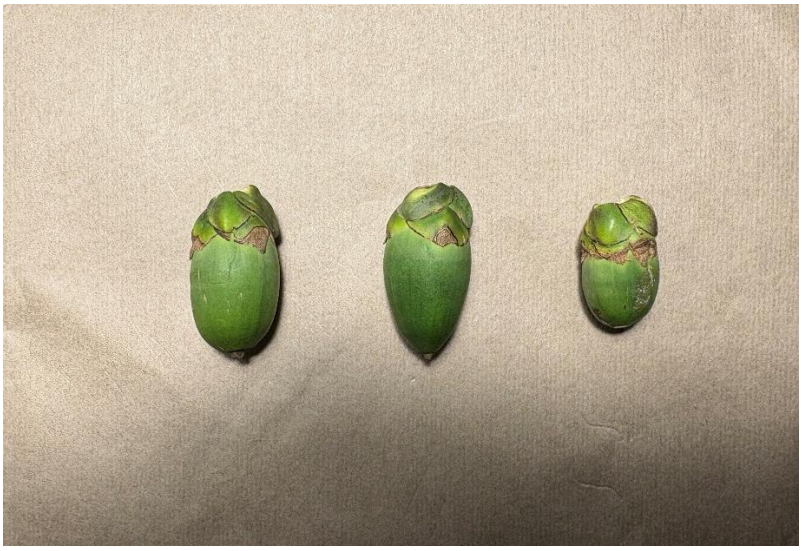


圖 16 從左至右為正子、尖仔、小顆

[47] 目前屏東檳榔固定在每周一、四早上 9:30 開盤，通常會有人將當日盤價製作成表格張貼在臉書社團上。盤價表格會分成行口向檳榔農收購的分級和價格（以斤兩為單位交易），以及行口販售給中盤的分級和價格（以粒為單位交易）。以 8 月 6 日這一天為例，當時檳榔進入剖白期，行口向農民收購白肉檳榔一斤 300，紅肉一斤 200。白肉、紅肉檳榔還會各自透過行口的分級機分成 11 級和 10 級，算粒數販賣給下游中盤。

doi:10.6342/NTU202601203

有趣的是，定價市場的存在其實也是鑲嵌在關係之中。不斷變動的分級訂價體系背後，是操盤手相當複雜的社會技藝操演。控盤需要熟悉產量、交易量數字所釋放出來的訊息之外，還需要掌握人性，更需要有抗壓性。曾經負責操盤屏東檳榔的張晏曾告訴我，他二十多年來床頭必須要備妥安眠藥才能入睡。每到了春天，他要緊盯著中部逐漸萎縮的產量，還有屏東逐漸冒出來的檳榔產量，抓好時間開出當年第一盤。屏東檳榔最特殊之處在於前一章所提及的「時間」性質：春季的早生檳榔非常稀珍，全臺灣各地的檳榔生意人都會想要搶到那批炙手可熱的屏東檳榔。特別是檳榔生意最旺盛的 1990 年代，各地的盤商都有可能抱著大把的鈔票到屏東開價格搶檳榔，因此像張晏這樣的控盤者需要有能力掌握全局，精準判讀當年開盤的時間點、分級與對應的價格，才有辦法壓制外來的盤商，也說服屏東地區的農民和行口和各地中盤跟隨價格交易、催出屏東的產量。尤其是屏東的盤商系統沒有中部聯誼會那種透過層級體制與遴選制度建置的嚴密組織（冷函君、蘇淑娟 2010），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被地方行口形容成「眾星雲集」的社會，交易線路龐大的「大咖」也有權力合法性出來開價格。這幾年來，操盤手除了要面對產業鏈上的其他從業者，還要承擔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與開罰的風險。因此，操盤不僅考驗控盤人斡旋與交涉的能力，也考驗其和國家協商的能力。

另外，行口們也向我提到，過去價格資訊較難流通，資訊落差讓他們有更大的空間調整收購出貨價格，在農民和各地中盤之間賺取較高利潤。但隨著線上通訊工具的出現，已經大幅減少了因社會關係和地理空間造成的資訊落差，檳榔的價格資訊不僅不再能被少數人壟斷，太嚴重的價格波動還可能引起產業鏈上群眾的線上抗爭。整體而言，我們可以從張晏和屏東行口們的操盤經驗看出，聯誼會的聯合定價並非公平交易委員會所認定的壟斷行為，也不全然是經濟學中的供需法則所決定，而是需要協商、競奪和妥協的社會過程。

儘管聯誼會會公佈價格與分級標準，第一線的行口還會在聯誼會所給出的分

doi:10.6342/NTU202601203

級／定價標準上，根據自己的交易夥伴特質、需求作出個性化的調整。因此，聯誼會給出的公定標準，在第一線的交易會轉變成一種社會關係衡量的參照標準，藉由分級的操作可以表達彼此的交情以及對關係延續的渴望或拒絕，同時，也促使檳榔往禮物那一方移動，抑或是轉化成純粹的商品。

（二）季節性的市場經濟

Anna Tsing 的研究說明了，松茸的性質變化主要來自全球供應鏈中的空間效應；相較之下，檳榔商品鏈的交換形式與物質屬性則深受「時間」影響：在平常的屏東檳榔產季時（五月底到十月），人與人的交易關係大多依附在沒有法律契約的夥伴關係，交易的倫理深受長遠的社會關係所影響；但是在春天，屏東與其他產區產季交界之際，會短暫進入一個曖昧不明、脫離社會關係基礎的交易脈絡。這時主導交易活動的邏輯更接近經濟學定義的自由市場，檳榔則更像是商品。即便這段時間的交易對於屏東的檳榔交易體系來說是一種例外且非正式的情況，卻形塑了屏東不同於其他縣市的交易慣習與風險性質。

春季是臺灣檳榔產業中相當特殊的時間點。在春節過後至五月初之間，中北部檳榔進入尾聲、屏東產量青黃未接，只有少部分的早生檳榔能夠銜接市場，供需相當不穩定。有些檳榔商人沒辦法從既有夥伴買入足夠的檳榔，需要向外尋求貨源，而中部和屏東的操盤人也還在各自評估收盤與開盤的時機，兩邊的定價權正彼此消長，定價市場的權力處在不明朗的時刻。這時，手上握有資金的中間人（包含外地盤商和本地行口）不見得會參考聯誼會訂出的價格，而是會把握時機到地方上放出價格資訊，以高價競奪珍貴的早生檳榔。此時，檳榔價格會逐漸水漲船高，屏東檳榔成為人人爭搶的珍貴物資，交易會瀰漫著機會主義的自由氣息。由於價格落差很大，田裡已經有早生檳榔可供採收的檳榔農會開始待價而沽，四處探聽價格，若價格不錯、判定出價格高點，就會割下檳榔送去兌換現金。即便

doi:10.6342/NTU202601203

是長年合作的行口已經開工收購檳榔，檳榔農也會評估價格高低，若不滿意價格會欺騙對方說自己的檳榔樹「晚了」、「割不出來」，實際上是將檳榔交給出價更高的陌生對象。由此可見，這段時間穩定的交易關係尚未成形，彼此皆處於觀望與試探的狀態。

就如同前一章所說，每一棵檳榔樹結果品質分歧，所以這段時間的農民，都會將割下來每一苧的檳榔分袋裝好送給中間人，但是中間人仍會攤開檳榔，仔細檢查檳榔農是否有暗自混雜不同樹的檳榔，這個行為稱為「挑檳榔」，也就是挑出次級品分開計價或是丟棄，是常見的檳榔初步分級方式。挑檳榔是檳榔交易現場中最具有張力的時刻，一旁的農民會目不轉睛盯著師傅挑選自己的檳榔，整段過程鮮少發生對話、氣氛相當緊湊又緊張，就像是在機場被海關攔截檢查行李一般（圖 17）。分級、秤重完之後，行口會立刻寫下收據，清楚交代收穫的各級重量對應價格，立刻將收據和現金遞交給農民點收（圖 18），農民確認無誤之後便會離開。

這樣的交易活動，是典型的市場經濟的交易方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疏離甚至帶有敵意，不需要為關係作打算，可以自由選擇交易的對象，結束即可離開。2024 年三月，我曾和阿任一起去隔壁鄉鎮交檳榔，結束後正想恭喜他以好價格賣出檳榔，但是他卻開口抱怨：

> 「我實在不想交給他，就是會挑，小氣。」我接著問「那開盤之後他還會收嗎？」，他告訴我「等到真正的行口出來開價，他就不敢出來了，現在就是任他宰割。」

阿任的氣憤不來自價格過低，而是對方仔細挑檳榔的行為，代表他對檳榔品質的懷疑，對農民來說極具羞辱性，通常是發生在彼此之間完全沒有信任基礎的一次性交易上。

doi:10.6342/NTU202601203

此外，三到五月之間也是檳榔偷竊事件最頻繁發生的時期。當價格高漲、產量稀少，且農民與行口之間的合作關係尚未固定，有人會趁機潛入他人園圃偷割檳榔，藉由迅速出手換來可觀現金。由於此時的買賣多為一次性的現金交易，且多數發生在彼此陌生的對象之間，行口沒辦法判讀交易農民的檳榔來源，讓偷竊行為更加難以追查。



圖 17（左圖）行口仔細挑選檳榔農的檳榔，檳榔農則在旁緊盯

圖 18（右圖） 檳榔農離開時立刻確認收據，避免自己吃虧

我們可以發現，由於這段時間檳榔價格非常高，供應又相當不穩定，使得交易具有明顯的投機性質，無論是檳榔農、中間商甚至是歹徒，都短暫地進入一段不太受社會關係約束的交易，所有人都允許遊走倫理的邊界，在其中尋求最佳利益，有些人甚至渴望透過這段時間的交易大賺一筆就收手。即便這樣的交易氛圍會在操盤手開盤後逐漸平息，但卻在歷史過程中，形成了屏東檳榔交易方式上異於中部、東部的「不成文規範」。一個行口和我說：

doi:10.6342/NTU202601203

屏東檳榔每年是從價高慢慢跌價，其他地方的檳榔倒過來，他們秋天開盤都是從低價慢慢上漲。屏東開盤之前，行口就會開始來搶檳榔上市，有辦法拿出現金開出價格的人才能搶到產農的檳榔。以前檳榔價格好的時候競爭很激烈，我們屏東的行口為了要守住客戶，就養成每次收檳榔馬上結帳的習慣，這樣才能跟別家競爭，但是開盤之後不可能改成月結，產農會抱怨，所以還是習慣當場結帳。嘉義那邊固定都是跟產農月結，他們資金比我們安全，我們有時候把錢都發給產農，結果下家開空頭支票，壓力很大。（20240713 田野筆記）

從行口的敘述我們可以得知，不同於中部檳榔交易每個月結一次帳的習慣，春季期間屏東市場經濟主導的交易，形成農民和行口之間依現有盤價結帳的習慣，這個慣習逐漸變成一種規約，一直到前幾年聯誼會才制定交易隔日開盤、隔次結帳的折衷方案。即便制度稍有變革，既有的交易習慣，常使得行口需要在產季初期就流通大量資金，長期以來仍造成屏東行口龐大的金融風險。因此，行口若要永續經營，就需要向上游產農和下游中盤發展出長期、穩定的合作夥伴關係，才能避免陷入資金危機之中。而行口與上下游交易關係的維繫，也是檳榔市場的秩序來源。基於此，接下來的分析將焦點移往五月開盤後的時期，以這些行口為分析節點，分別描述行口與農民之間、行口與中盤之間的交易活動，探索行口透過哪些交換的手腕讓建立起交易的夥伴關係與義務，降低商品鏈的交易風險。

（三）行口與農民之間：根植於地方社會的交易關係

檳榔農與行口在春季間不穩定的交易關係，通常會在屏東開盤後第四次、也就是大約兩週後（約五月底），逐漸趨於穩定。即便那個時候檳榔還在短缺、價格高昂，檳榔農仍有義務跟緊特定行口，到產季結束前都將檳榔繳交給對方。若

doi:10.6342/NTU202601203

檳榔農總是自由選擇交易對象，不顧忌人際關係會發生甚麼事呢？這個農民可能會遭受行口集體抵制，拒收來自那個檳榔農的檳榔。某位報導人的哥哥就是個會試探價錢、在產季間突然更換行口的人，其他家族成員知道後為避免名聲敗壞，再也不讓他分擔交檳榔的任務。當然，檳榔農也樂意在產季上將檳榔交給固定行口，這能夠形成一種債的關係——在檳榔產量不豐的時候，檳榔農把自己的檳榔交給對方，行口也因此欠農民人情，等到檳榔盛產、價格崩跌的時候，行口就有義務買下檳榔，不能拒絕。所以七八月之間許多行口會義務性收購過量的檳榔，若沒有同業協助調貨吞吐，就只能倒掉無法出貨給下游的檳榔，自行吸收成本。也就是說，行口和檳榔農之間的關係類似於「契作」，但是沒有契約約束，完全是一套約定俗成的倫理。

大多數的行口和檳榔農都會發展成長期合作的關係，那些長期合作的農民被稱為「班底」，確保行口一整年都會有穩定的供應。有一年屏東剛開盤，我在行口遇到一個農民，他和行口老闆娘說：「我們就像是牛郎織女一樣喔，一年固定時間來見面」。的確，行口和農民之間有著牛郎織女般恆定的週期性羈絆，是一段難以終結的關係。在我所認識的檳榔農中，只有一位檳榔農田阿慶每年都會更換行口，他是北台灣客家移民第二代（第五章還會提到這群人的故事），年輕時又長期在北部都市工作，一直到兩年前才因為父親生病返回屏東接手檳榔園，也就是說，他在屏東的社會網絡相當薄弱。相比之下，其他本地交易夥伴關係通常都是鑲嵌在各種社會關係之中，例如同宗親戚、姻親、同學或鄰居，所以行口不僅清楚農民的園圃面積、檳榔品質、產量波動和交貨時間，也洞悉對方的生活細節，像是某人田裡除了檳榔還種了咖啡、農忙之外的時間喜歡釣魚，或者是某人家中有幾兄弟、兒子要結婚的消息。這樣的夥伴關係會維持一生，即便年紀增長生產力降低、檳榔品質下降，行口還是會持續「照顧」對方，甚至是跟著土地財產一起繼承到第二、三代。可以說，檳榔交易被賦予了關係紐帶維持的力量，有時甚至超越了賺錢的動機，屆臨退休的吳姐就和我說：

doi:10.6342/NTU202601203

其實，我早就可以退休了，也不是缺錢，現在檳榔利潤很低，之前就想收掉，但是很多產農都跟我很久，有的甚至是從他阿公開始合作到現在，我實在捨不得收掉。中盤也是一樣啊，慢慢經營到現在我們都是可以互相開玩笑的那種關係耶，收掉的話大家就結束了。（20240713 田野筆記）

接下來，我們可以從交易現場的互動，了解行口與檳榔農的關係如何藉由檳榔交易維繫下來。和三到五月的陌生人交易現場不同，此時的行口大多會在交易的現場設置茶水區，準備特定數量的冰涼茶飲或綠豆湯，迎接那些準時到來的交易夥伴。檳榔農交出檳榔後，會滯留在一段時間，和行口與其他農民閒聊（圖 19）。他們閒聊的內容大多圍繞著日常的瑣碎分享，如地方政治、家族旅行等等。當話題轉向檳榔，人們會謙虛地表示自己割不出品質好的檳榔、吹噓其他農民的檳榔多麼美。但是在甜湯冰飲與日常碎語所營造的輕鬆氛圍之中，農民其實會悄悄從側觀察行口的「分級」作業，分級是交易的精髓，像是初步蘭島的庫拉（kula）一般充滿各種禮儀和展演，影響到關係的延續與否。



圖 19 六月的交易現場

doi:10.6342/NTU202601203

阿任和雄仔交易的例子，最能彰顯檳榔分級的「眉角」。同一年份的六月，我和阿任到他長年配合的行口雄仔那兒交檳榔。這次阿任不再將檳榔分苳分袋盛裝，而是簡單把一些沒辦法進入市場的次級品挑除後全數裝袋送去給雄仔，裏頭混雜著正子和價格較低的尖仔、小粒。阿任早年幫雄仔引介了許多班底，彼此關係親密如兄弟，所以對阿任特別寬待，不會嚴格要求將次級的尖仔、小粒細分出來。接過檳榔後，雄仔沒有經過挑選，簡單看過就整袋檳榔放到秤子上，最後寫一張收據交給阿任，阿任完全沒有看過收據，就立刻對折收到口袋裡。當時我對這樣的分級方式相當好奇，便在現場向阿任索取收據，阿任有些猶豫，彆扭地將收據從口袋掏出來小心遞給我。我看了一下數字，發現雄仔把總重量其中一小部分算為尖仔、大顆，其餘都算成正子，接著阿任很快又將收據收回。這樣的分級型態稱為「扣重」：行口並不會現場挑選分級，而是從總重量中扣除部分比例算作次級品，後續才會再仔細進行分級。扣重必須建立在產農和行口間的默契，一方面行口要洞悉且信任檳榔農的生產品質，檳榔農也需要為行口把關品質，主動過濾掉品質不佳的檳榔，相信行口能夠給出合理的價錢。正因為這樣的心照不宣，阿任離開行口後提醒我，現場「拆禮」是一件失禮的行為，代表著不信任：

> 他剛剛給我收據的時候，我沒有打開來，我會收到口袋裡面，要等到出來之後才能看，你看！（在車上攤開了收據）我交了 30 斤的檳榔，他尖的只算我 2 斤左右，這不是很『漂亮』嗎？

扣重是一門高技術門檻的分級方式，行口需要在不損失利潤的條件下衡量彼此的交情，以優惠的分級給足產農面子。另外，這段時間的結帳方式也和三月那次不一樣，雄仔給完收據後詢問阿任「需不需要拿現金」，阿任揮揮手表示不需要，雄仔了解他的意思，等到明早盤價開出，再以最新盤價計算，過幾天將現金送去

doi:10.6342/NTU202601203

給阿任[48]。利用延遲的結帳，雄仔還可以順便到府和產農搏感情。

不過，以上對於阿任和雄仔交易的描述，僅能代表一個特定的時間點上、發生在這兩個人之間的交易型態。除了兩人之間的交情外，檳榔的交易情境還會因為產季節奏、行口規模而充滿著變異。

到了七月下旬左右，檳榔產量大增，行口裡的師傅到田中協助產農剖白，對檳榔做更仔細的分級（圖 20）。這個時候的分級像是精彩的特技，師傅會帶著一把自己獨有、專用來切割分級的「檳榔刀」，摘下每串檳榔果串的檳榔，俐落地從種子中央切下，檳榔留下光滑的切面，種子、果肉、果皮彼此界線清楚，檳榔子葉的水分、顏色，以及果肉纖維的紅與白、粗細一覽無遺，就好像是一幅完美的檳榔果實標本（圖 21）。精準、迅速判讀檳榔品質，是一門需要時間練就的技藝，若剖白不夠俐落、判讀慢，會被檳榔農認為是在挑剔檳榔，斤斤計較。另外，有一些纖維介於白肉與紅肉之間，被稱做「兩路」的檳榔，若師傅能較寬鬆地將其分級到白肉那一端，便能給產農優待的感受。這些下刀俐落之餘能適時給予一些彈性的師傅會受到產農青睞，透過年復一年的互動累積人脈，學成之後有機會帶著人脈和技術成立自己的行口。

[48] 不同產區的交易方式略有不同，中部行口和檳榔農間採月結方式，而過往屏東檳榔則是先開盤、現金當場結清。但因行口和下游中盤通常採取月結形式，和農民當次結清的交易方式造成行口極大的風險，又由於屏東夏季溫暖、多雨，產量變動大，操盤手不好預測產量，容易發生俗稱「堵市」的供需失衡問題，因此聯誼會二十年前左右決議將屏東檳榔改為隔市結帳，也就是交易日隔日開盤、下一次交易才會用該價格結清前一次的帳。雖然產農大多對於這種交易方式感到不滿，認為盤商壟斷了價格的決定權，甚至導致聯誼會在 2009 年遭公平會開罰。但這樣的交易型態的確較能保障交易鏈的穩定性。在此，雄仔是採取了比較折中的方案，若產農有需要現金，他會先結清部分，等到隔日開盤再結清其餘部分。

doi:10.6342/NTU202601203



圖 20　師傅利用自己專屬的剖白刀對切檳榔果實，確認分級



圖 21　剖開的檳榔。纖維泛紅（上）屬於紅肉，纖維嫩白（下）則屬於白肉。

doi:10.6342/NTU202601203

當然，並不是所有行口與農民之間都那麼講求人情。規模龐大、以穩定供貨與優良品質聞名的大型行口，對檳榔品質嚴格把關、分級較為標準化，所以會對農民交上來的檳榔仔細挑剔。有一位老年檳榔農的交易夥伴是自己的姪子，姪子事業版圖橫跨屏東和花蓮，在檳榔品質管控上相當嚴謹，在產業界頗具名氣。為了要保持檳榔品質的標準化，就連叔叔交上來的檳榔都會仔細挑選，老年檳榔農對此相當不滿，常和親戚揚言要把檳榔樹砍掉，讓姪子失去他的貨源。儘管如此，大型行口擁有完整穩定的出貨線路，能吞吐不同級別的檳榔，又能一路收購檳榔直到屏東產季結束、嘉義接棒開盤，對於不擅長生產早生檳榔的業餘產農來說，是有保障的合作對象。也因為這樣，許多農民會悄悄經營兩條以上的交易關係：他們會保留一條大型行口的線路，但是當大行口不再收次級品時，就會將部分的檳榔轉送至其他有交情、收貨條件較寬鬆的行口。這種策略在倫理上有些曖昧，且需要同時經營不同夥伴關係，相當考驗檳榔農對關係的臆測和拿捏能力。所以有農民和我說「比起種檳榔，賣檳榔才是檳榔真正的技術所在」。

雖然，檳榔的交易充滿變數，但我們仍然可以從大家理想的交易型態中發現共享的禮物特質，首先：交換必須是「大約等值」，若對分級和價值的計算斤斤計較、追求分毫不差的等價就會導致關係的破裂；再者，檳榔交易有合理時間差，也就是債的形成，債的存在讓關係展向未來、彼此都有延續的義務。

那麼，我們可能會好奇產季之外夥伴關係又是如何？事實上，檳榔農和行口的關係並不會隨著產季結束暫停，許多農民都告訴我在檳榔價格高昂的年代，行口每逢年節會贈送高級禮品，如鮑魚、水果禮盒，甚至會在產季結束邀請產農去團體旅遊，借此穩固自己的班底。除了交易夥伴之間物質上的贈予，平時行口也會積極參與、贊助地方公共活動，他們被認為是靠著收村民檳榔賺取利潤的生意人，透過公共事務將收益分配回到村莊是受到期待的行為。最明顯的例子是宗教活動，地方廟宇的運作常能見到行口在神明生日時捐獻、提供用品支援辦桌。

doi:10.6342/NTU202601203

除了參與宗教領域，許多行口也參政。許多客家村莊都有行口出任村長的紀錄。有一年我恰逢田野村莊的村長選舉，其中一個候選人是個檳榔行口，也是我房東家族多年來合作的交易對象。即便房東和其他候選人亦有好交情，最終仍投票給那位行口，當我詢問起原因，房東竟然並不是擔心交易關係發生危機，也不是稱讚對方平常做生意有多大方、給自己多少好處，而是告訴我：「我媽生病的時候，是他載我媽去醫院，所以我當然投票給他。」

檳榔行口與地方的互動，提供我們重思農業中間人的在地角色。在臺灣社會的普遍印象中，產地販運商有著頗具爭議的形象，他們常被認為操控、壟斷產地和消費地的價格資訊來進行兩面剝削、造成交易中間成本，「菜蟲」一詞便是指涉刻意壓低買入價格、哄抬賣出價格的中間販；許多中間人將交易所積累的經濟和人情社會資本轉換成地方社會中的政治動能，從村里長到民代，甚至縣市長[49]都有可能借用根植於農產交易的社會關係形成臺灣農業縣市頗具影響力的基本盤，左右選舉的結果。在這些關於中間人的普遍形象中，農民則被視為缺乏能動性、深受中間人剝削的被動者，無論是在現代性的農產交易或是民主政治場域中。但上述的經驗恰好說明了：中間人之所以能在地方上形成政治能量，不一定是因為控制了農民的交易線路和經濟利益，而是因為他們與農民之間會在交易之外持續發生日常的互惠，形成地方社會中相當重要的基層關係，而且無論是中間人或農民，都需要為彼此付出，而非單方面的宰制關係。

[49] 關於農產交易如何影響地方政治的運作，可以參考陳寧（2023）的研究。不過在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就如同臺灣小農會因為作物類型走向市場分殊化（蔡培慧 2009），作物市場的分殊化也帶來了地方政治邏輯的分殊化。根據我在屏東檳榔農業的觀察，可以得知行口雖然會因為檳榔和金錢的流動而擴展社會網絡，但政治影響力通常局限於村里或鄉鎮等級，鮮少跨越事業版圖的地域空間，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檳榔少了產銷班、批發市場等正式組織的運作，檳榔產業的資源分配通常和國家與縣市行政單位保持距離。不過根據同業人的觀察，花蓮和嘉義一帶的確出現了少數無論在業界或地方政治上權力聲望皆高的行口，他們認為這是因為屏東檳榔產業無論是檳榔產農或是行口規模都相當參差，主要仰賴小產農和資本額較低的行口維持商品鍊的運作，他們建立起來的是一個範圍有限且去中心化的社會網絡；不過嘉義和花蓮有更多資本額龐大的行口，特別是嘉義有許多行口一條龍地承包了大面積的檳榔園，並且向下經營檳榔攤，因此出現了業界寡頭，影響力甚至橫跨到南投一帶。不過，屏東和中部、花東檳榔產業型態的差異如何形成，以及各地行口與地方政治、國家農業機構之間的關係有何差異，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doi:10.6342/NTU202601203

同樣地，地方的檳榔商人獲得政治動能的現象也可見於 PNG 的高地檳榔批發商。這些中間人從低地批貨轉手高地賺取財富，但比起關心利潤的累積，他們更在意如何利用檳榔帶來的財富改變社會地位。他們會購買車輛、興建新型商店，公開展示自己的社會地位，享受由此帶來的權力。而當這些批發商展示自己的財富時，當地居民也能合理地向他們尋求經濟和勞力的協助。也就是說，批發商透過檳榔生意成為了美拉尼西亞傳統脈絡中的大人物（Big man），在展現自己地位的同時，也要承擔再分配的社會壓力（Sharp 2012）。

整體而言，我們可以觀察到，行口和檳榔農的交易活動佈滿了禮物交換的邏輯，且和日常生活的其他交換活動相互交織，他們的互惠關係其實是鑲嵌在地方社會的各種關係之中，包含親屬、鄰里和同儕關係，因此檳榔交易中的禮物交換不僅是要維繫交易夥伴的義務，更是要避免既有關係的破裂。另外，行口被認為是依靠著地方農民提供的檳榔向外賺取價差，所以農民也會期待行口能透過折扣、不挑剔的分級來將利潤再分配，並且在村莊公共事務中分享資源。在地方上做生意的行口，需要相當高明的社會手腕，保障自己收益的同時，透過禮物交換和再分配來顧及村民的人情。正因為這樣，也有不少臺灣和 PNG 的在地中間商策略性地避開和「本村人」發展交易關係（Sharp 2012; 林育建 2007; 童元昭 2001），而是專門經營周遭村莊甚或不同族群的生意，讓交易的活動不受村落中既有的人情壓力所困擾，也避免交易活動反過來影響自己和鄰里的社會關係。

（四）大盤與中盤之間：跨地域的交易關係

相較於行口與農民之間深植於地方社會的長期合作關係，行口與消費地中盤之間的交易跨越了地域，少有血緣、地緣等社會網絡的約束，交易風險高了許多。在過去，經常發生下游中盤開立空頭支票、或是在結帳時消失蹤影，導致行口短時間內慘遭倒帳，損失數百萬元。因此，和下游生意夥伴的關係關乎到風險管控，

doi:10.6342/NTU202601203

決定了行口的存續，他們必須透過分級與出貨的操作，妥善評估和維繫與外地中盤之間的關係。

檳榔農交上檳榔經過初步分級後，會進入圓形分級機（圖 22）依照重量分級，接著從秤斤兩變成以「粒」為單位計算數量，準備轉移到另外一組交易關係之中。此時，行口的腦袋、手機和電腦同步運作，忙著聯繫下游夥伴、評估進貨和出貨量，構想每一批貨分配的對象。行口的交易夥伴橫跨全臺灣，可能是導入條碼追蹤、講求標準化管理的北部連鎖店，也可能是規模較小、偏好人情交易的地方中盤商。有的中盤合作多年、叫貨穩定、從不殺價；也有中盤反覆議價、要求不斷，交易充滿不確定性。這時，出貨粒數、分級和價格的彈性操作，既是行口從中創造利潤的所在，同時也調和不同出貨對象的性質與需求，藉此管控交易的風險。接下來，我嘗試透過幾組交易夥伴關係的例子來說明行口面對下游的交易技巧。



圖 22 運轉中的圓形分級機

doi:10.6342/NTU202601203

萬巒阿志老闆擁有大約一百多個農民班底，是一個相當具有規模的行口。數年前，他請工程師設計程式統計交易價格、進出口量，電腦還連結一台出貨單印表機和熱感應標籤機，印刷出貨資訊給下游的交易夥伴。像阿志這樣規模比較大的行口，通常不會只和消費地中盤做生意，還會有大型連鎖檳榔攤直接跳過中盤向他批貨。阿志老闆每周收完檳榔後，就會開始估算要流向連鎖通路和其他中盤的貨量，平均而言，連鎖檳榔攤大約佔九成出貨量，他們當日就會派出公司的冷藏貨車來載貨，而剩下一成才留給零散的中盤。

連鎖檳榔攤的特性是要求品質的標準化，但他們的優點是財務比大部分中盤更加穩定，不容易倒債，所以才會成為阿志主要的通路。阿志出貨時會透過標籤機列印標有出貨等級、品項、日期以及一維條碼的標籤貼在包裝上，條碼旁印上代表阿志的商標「志」，此外還有些會放上聯繫資訊（圖 23）。一維條碼和個人資訊是為了要讓連鎖店的電腦判別產品存貨，追蹤上游行口出貨的銷售量和品質。也因為這樣，阿志較難隨意變動出貨的數量和品質，需嚴格把關品質避免失去生意夥伴。即便如此，阿志也提到長期合作下的雙方都是老手，默契十足，能給予對方一些彈性的變化空間：

> 他們(連鎖檳榔攤)基本上不需要跟我說這一期要出多少量，他們不說我都知道，只要跟其他年份同期比較就知道，他們也都知道我會微調出貨量。舉例來說，我出貨單上都是打 10000 粒，但是如果產量很大，我這一期可能會多寄 1-2000 粒，那下一次就會少寄 1-2000 粒。如果產量少就倒過來。絕對不可能說每一次都要寄那麼硬。要拿貨拿那麼硬的人，我們沒辦法合作。（20240730 田野筆記）

也就是說，即便追求標準化的連鎖檳榔攤，也需要給上游的夥伴一些調整空間。保持出貨數量的彈性相當重要，因為屏東產季期間天氣溫暖，又適逢雨季，檳榔

doi:10.6342/NTU202601203

生長速度相當快，經常一期交易過後產量暴增。若操盤人來不及調整盤價，就仰賴第一線的行口與下游間彈性協商出貨量，才能快速調節市場供需。

或許我們會認為，既然連鎖檳榔攤如此穩定，為何阿志還是會保留其他零星的中盤伙伴呢？這個問題可以從盛產季的檳榔流通找到解答：2024 年七月底因為颱風帶來豐沛降雨，降雨並沒有減低檳榔產量，反而因久旱逢甘霖而產量大增，正子白肉的檳榔價格跟著下降，許多行口和下游的中盤都不再收購等級較低、果形不漂亮的「尖仔」，但阿志還是向農民收購少量的尖仔，尖仔雖沒辦法銷往連鎖檳榔攤，卻能應付恆春半島中盤的需求。不只是阿志，許多行口都會特別建立恆春半島和原住民區域的交易線路，那裡的消費者品味和臺灣其他地方不同，特別喜歡大顆、纖維較粗的檳榔，這使得原本價格不高、在盛產期失去價值的尖仔和大顆有了流通的方向。也就是說，即便中盤大多都是外縣市的陌生網絡、交易風險較高，但卻帶給行口交易夥伴的多樣性，媒合不同地域、性質的檳榔攤和消費群眾，協助流通不同類型的檳榔。

中盤的性質和需求較為多元，彼此的交情亦有所差異而具有潛在的風險，因此出貨給各地中盤的數量、分級和定價方式需要更多技巧。過去，阿志會私下將下游中盤客戶分等級。這個分級是依據中盤叫貨的穩定程度、交易信用，還有合作關係的時間深度來區分。合作久且穩定的甲級客戶會依照約定數量完整出貨，其他較不穩定、特別是會挑剔殺價的中盤，則會在約定的交易量上略打折，例如 1000 顆包裝袋實際僅裝入 900 顆檳榔。不過每次出貨需要滾動調整，避免讓客戶發現自己被虧待，如此便能維持夥伴關係，亦可以降低地理空間和社會關係距離所帶來的交易風險。

除了出貨數量外，出貨給中盤的檳榔分級也充滿彈性。有一些中盤專門送貨到一般的傳統檳榔攤，這些檳榔攤是派遣勞力負責收貨販售，第一線的工作者眼力不敏銳，也不會秤重檢查，中盤在與大盤批貨會時也比較多變動空間。例如中盤原本要叫貨較高價的品項卻不夠賣，阿志可能就會以比較便宜的價格將低價品

doi:10.6342/NTU202601203

項批貨給中盤，但中盤仍可以用原本的等級轉手。這些分級、議價的操作過程，是非常私密的資訊，只有這兩方知道。

另外，阿志出貨給消費地中盤的包裝上標籤資訊和出貨給連鎖店的完全不同，上面僅標有顆粒數，分級和品項被簡化成派遣勞力和消費者所認識的分級，像是「大多」、「小多」、「幼」[50]等。最重要的是，包裝標籤上的行口資訊會被抽掉（圖23），如同批發市場的拍賣過程一樣將生產資訊抽去轉化成商品，在此檳榔也變成了匿名的商品，除了中盤本人外沒人能判讀檳榔的來源。但是，將檳榔變成匿名的商品，和果菜批發市場拍賣中的去辨識化目的不同，阿志這麼做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讓中盤自由配貨，不讓下游的檳榔攤可以透過標籤循線跨過中盤找到阿志探問價格，藉此轉向中盤再議價。簡而言之，阿志許多行為的目的都是讓交易資訊盡可能保留在他和中盤之間，讓產地的交易知識止於合作夥伴，保障中盤向下的議價權和利潤。如此一來，才不會導致信用破產。



圖 23 出貨給不同對象的標籤[51]

[50] 大顆和小顆的檳榔較便宜，幼仔則是大小介於中間、口感最嫩的檳榔。檳榔攤檳榔是以五十元為單位分級販售，其中大顆和小顆會包裝較多粒，高價的幼仔則會較少粒。

[51] 左側的標籤是出貨給中盤時張貼的標籤，右邊則是專門出貨給連鎖檳榔攤的標籤，後者會包含比較多的細節，也會有追蹤條碼。

doi:10.6342/NTU202601203

另外一家行口同樣在出貨時將標籤上的個人資訊抽除，不過他還向我補充說明這其實是行口逃離國家徵稅的策略：依據《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規定，農產品買賣原則上可免徵營業稅，但檳榔並未被歸類為農產品，因此行口依法屬於「營業人」，必須納入稅籍並繳納營業稅。然而，檳榔的交易在批發市場體系之外進行，國家難以直接監控營業行為；再加上多數行口的營業空間是由家屋改造而成，小規模者甚至利用社區廣場或土地公廟等公共空間進行交易。這些場域沒有正式的營業登記，外地人若無在地人引導，也無法找到行口的所在。如此一來，基層稅務人員難以直接向行口徵稅，只能從各地檳榔攤沿線追查上游。對此，交易量較大的行口通常選擇保持低調，盡可能在流通末端隱身，以避免被查稅人員循貨源線索追查至產地端課稅[52]。

除了像阿志這種容易被國稅局盯上的大型行口外，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屏東還遍布著許多規模較小的行口。他們運作的資本小，流通的檳榔也少，往往維繫著有限但緊密的交易夥伴關係。除了自己既有的上下游夥伴外，他們還透過行口同業的結盟來調度不同等級的檳榔，穩定自己的交易通路。不僅如此，他們的交易對象鮮少大型連鎖店，幾乎都是在外地、規模不一的中盤，所以特別需要和「拖車行」維持緊密關係。這些運輸業者是交易鏈上點與點之間的線，也自然成為跨地域交易的知識傳播者。他們將檳榔運送到各地，同時吸收消費地的訊息，例如哪一個中盤有倒債紀錄、資金流通有問題、哪一個中盤會欺騙下游，行口能夠從這些資訊判讀交易關係的安全性。曾有一個行口就和我說：「拖車行讓我們行口的眼睛變亮，找到比較能相信的下家，就比較不會發生倒債的問題。」

規模小的行口和大型行口有著不一樣的生態，但對屏東檳榔有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們維繫了一條條由人情所構成、規模小巧的交易關係，專門匹配一些難以被商業規模所照顧的買賣關係；即便交易量雖少，卻能為不同條件的產農媒合

[52] PNG 的檳榔交易中，交易人也會在某些交易段落保持匿名性，目的也是要讓交易關係不容易被回溯，保障情報的壟斷，也避免法律的追訴甚至人身安全風險。

doi:10.6342/NTU202601203

到適合的下游夥伴。例如，和阿志同村的信昌，從高雄的公務員職務退休後接手了父母的行口事業，同時兼業養豬，忙碌的他只經營大約 25 位左右的上下游交易夥伴。不少合作產農是年邁老農，耕作的也是年邁的檳榔樹，這些檳榔樹開花時間較晚，已經失去了屏東早生檳榔的優勢，老農透過這些檳榔加減賺取零用金。信昌經營了幾組願意在嘉義檳榔季初期持續收購檳榔的中盤，專門幫忙流通這些失去時間優勢的檳榔。另外，他還有一群夥伴是專營低收入消費地的中盤，他們的消費者群眾不追求品質，而是低價。這樣的需求反而讓信昌班底中業餘的農民有機會讓品質參差的檳榔參與市場。

為了要和那些分布各地性質歧異的中盤打交道，信昌每年產季結束後，都會開一台車走遍臺灣西部，帶著伴手禮沿途拜訪那些中盤夥伴。週期性的會面，能彌平地理空間造成距離和不確定性。久而久之，這些盤商也變成信昌在外地的朋友。當他遇到外縣市的賓客（像是我）到來，就會侃侃而談起在對方家鄉的「那個交易夥伴」。

從以上資訊可以看出，行口與外地中盤之間的交易雖然多發展自跨地域的陌生人之間，但實際的交易並非依循自由選擇對象的市場交換邏輯。正如行口與農民的關係一樣，雙方仍需透過不同形式的交換來建立並維持長期的夥伴關係。然而，相較於行口與農民之間的交易，行口與中盤之間交易的脈絡和交換的性質相當不同：行口和盤商的社會關係少了血緣、地緣關係作為背景，甚至鮮少面對面交流，主要是透過中間的貨運業者連結彼此，因此他們的交換更涉及了跨地域信任關係的建立。

首先，行口會依照與中盤的需求、合作關係的深度媒合特定農民的檳榔，並在此基礎上調整價格和出貨數量，即便雙方交易沒有碰頭，卻藉由檳榔傳達了彼此的交情和默契；另外，中間人最重要的資本是價格、貨物流通的相關知識。若要保持穩定的夥伴關係，須要謹慎地為中盤考量其貨物流向，讓交易的私密資訊保持在夥伴之間，也應該避免涉入對方的交易關係中，保障彼此在各自交易關係

doi:10.6342/NTU202601203

裡的議價權和利潤。例如阿志透過分級和包裝，主動讓他個人的特質和檳榔農的特質一起從檳榔抽去，讓中盤能在下游的消費地自由分配檳榔。檳榔在此環節看似失去其禮物的特性，事實上是將行口和中盤協商出來的分級方式隱蔽在模糊的商品標籤之下，藉此將議價權利讓渡給下游中盤。其實就和所有的商業往來一樣，商業夥伴不只對價地交換物，還交換了物之上的權利／權力。

四、結語：檳榔交易對農產運銷的意義

自臺灣發展現代化農產運銷體系以來，進入批發市場交易的農產品數量逐年增加。《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 21 條也明文規定，農民團體與販運商（行口）之間的第一次批發交易應於農產批發市場進行。然而，即便有此法條規範，農政單位始終無法杜絕「場外交易」的存在，亦即和檳榔一樣脫離批發市場的交易行為。場外交易興盛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不需要繳納批發市場行政費用，又不需要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盤商可藉此減少交易成本。另外一個原因是，臺灣農產交易仍依賴熟識的社會關係，販運商會在批發市場外圍經營其他組長期的交易夥伴關係。農政單位雖未嚴格取締，但仍普遍將場外交易視為「問題」，擔憂其中潛藏「不法商人」藉此牟取額外利潤，甚至擾亂市場行情（余韋蓁、蔡惠琦等 2020; 許文富 1997）。

然而，當國家缺席於市場治理時，農產品交易秩序是否就必然陷入逐利與失序？本章所探討的檳榔交易，提供了一個「永遠都只能場外」運行的故事，能夠讓我們重思農產交易中人與物的性質：檳榔交易活動，是臺灣逐步納入全球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同步茁壯的經濟活動，卻在現代化的熱情中被拋離了制度化的市場經濟運作。這樣的命運，恰好讓檳榔的交易得以揭示市場制度以進步與現代化之名向全球擴張的過程中所伴生的縫隙與生存方式。從以上的田野材料，可以觀察到儘管檳榔完全游離於農產運銷制度之外，其交易活動卻並未因此走向混亂；

doi:10.6342/NTU202601203

相反地，檳榔的流通與價格往往比許多受制度規範的正規農產品更為靈活且穩定，鮮少出現交易體系崩潰的情形。

我並非意圖將檳榔交易描繪成一個沒有剝削、壟斷或個體理性動機的道德經濟體系，也不是要主張國家應退出農產品交易市場，走向全面自由化。而是藉由檳榔交易的多重形式，挑戰將「去關係化」的市場經濟視為唯一經濟形式，並將自由競爭與公平交易視作農業交易安全來源的普遍預設。

我們可以觀察到，檳榔的交易形式並非限定在單一的經濟形式，而是會在不同的關係、時間周期擺盪於市場交換與禮物交換之間。其中，禮物交換所形成的社會關係與倫理對於檳榔交易鏈的運作最為重要。事實上，檳榔在人類社會中一直都有很明顯的「禮物」性質，當人們拿出檳榔時，經常是要與另外一方建立、修補關係。建立關係的對象可能是愛慕的人，也可能是尊敬的神和祖先，甚或是另外一個渴望結盟的帝國（林富士 2023）。也就是說，檳榔是人類社會的延伸，難以從社會關係剝除。即便 1970 年代以來檳榔已經走向商業化的路徑，但是當前維繫檳榔交易鏈結運作的基礎仍具有「禮物經濟」的特性：人的交易主要是由相互的責任和義務所構成，物的價值也不完全取決於標準化的單位和市場的供需，還取決於人的關係，以及他們想要建立的關係。商品鏈上的人大多認為個體化的自由交易僅存在於短期非正式的交易活動中，而且是充滿風險的。以檳榔農的立場來說，隨意脫離交易的夥伴關係不僅更容易受人宰割，也被視為一種倫理上的問題；而那些往往被大眾視為自私又剝削農民的中間人，最需要練成的能力並非讓檳榔在生產鏈上有效轉手賺取利潤，而是關係網絡的維繫。

最後，我想以兩種檳榔在交易鏈上的生命史，點出檳榔帶給當代農產品交易中的啟發。在交易現場中，可以發現產農與行口之間，還會流通一些不具公開盤價的檳榔。其一是前文提及，好發於年輕檳榔樹上的「鬚仔籽」，這樣的果實代

doi:10.6342/NTU202601203

表著檳榔樹營養分配狀況不佳；其二則是俗稱「哈噠籽[53]」的次級果實，指同一芎果串上因授粉不全而無法順利填果的「侏儒」，果實內缺乏水分，常見於春季旱災或夏季長時間降雨之後。近年來，旱災與豪雨的頻率升高，也使「哈噠籽」的比例隨之增加。





圖 24（左圖） 結於花穗末端「鬚仔籽」（xi´ e` zii`）

圖 25（右圖）：剖開果實後水分乾燥的哈噠籽

這兩種果實小、口感乾又苦澀，市場價值極低。在一般的農產交易市場中，分級等級最高的蔬果價格最高，也最有可能在商品鏈的最後一端轉變成禮物（想像精美的水果禮盒！），而像哈噠籽與鬚仔籽這樣的瑕疵品大多會被淘汰，又或者是需要加工才有價值。但令人意外的是，這兩種次級檳榔並沒有因此被排除在檳榔的交易線路之外，而且在許多情況下，它們並非商品，而是以「禮物」的形式流轉：行口會主動開出價格收購，在盛產時期收購次級品能表現對農民的照顧；之後再將這些次級品以低價格，甚至免費，轉送給下游中盤商來經營人情。中盤商再以相似的方式，將它們送往檳榔攤，檳榔攤會將這些果實兩顆一組包葉成「双

[53] 「哈噠」並非客家話，而是日文外來語直譯，原文為「畠（はた）」，意思為無水旱田。

doi:10.6342/NTU202601203

子星」，贈送給熟客或購買數量多的客人（網路上常說的買一百送兩粒的原意，就是指兩兩成雙的双子星）；而原住民部落的檳榔攤則是將其以低價賣給族人，最終流向社群中的公共空間，作為款待賓客的共享之物。換言之，這些次級檳榔在整條交換鏈上，都承載著款待對方、維繫關係的責任，無論是交易的夥伴或是其他社會關係，這就是它們的價值所在。

現代性農業體制的理想中，植物和農民大多作為市場上競爭的個體，植物需要有完美的單一化性狀才有價值、農民有能力獨立自主議價才能有穩定市場。而鬚仔籽與蛤仔籽的「禮物之旅」，捕捉了檳榔產銷體系多元而動人的一面：無論是資質優異或平庸的檳榔樹、投入資本懸殊的檳榔農和盤商，抑或消費需求不同的消費者，都能在這條交易鏈中找到自己安身所在，只要願意在關係中嘗試付出、進入交換的鏈結中，就有機會覓得夥伴，不會被排斥在檳榔的鏈結之外。

檳榔的生產和交易並非沒有危機，就如同其他農產品，要面對越來越多變且嚴峻的氣候環境，同時還要面對市場的衰退，以及交易線路上各種潛在風險，這些危機都為檳榔交易帶來難以預期的未來光景。但這些危機卻正好凸顯了夥伴關係在當代農產運銷的重要性：在充滿變動的世界中，經濟活動上結交的夥伴可以協助彼此在面對複雜且充滿變化的實際狀況中做出因人、因地制宜的反應，而不至於在各種變遷之中迷航，這也說明了臺灣運銷制度永遠無法杜絕場外交易的原因：越是活在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人們就更加依賴夥伴而存活。

doi:10.6342/NTU202601203

第二部　檳榔樹冠下的世界

doi:10.6342/NTU202601203

第五章　檳榔樹的多物種夥伴

檳榔不活在國家農政體系的照顧清單上，當它出現在官方的政策中，大多面積縮減的廢園轉作計畫。為了要減少檳榔園的面積，農政部門二十年來已經執行了三次的廢園轉作政策，即便提供高昂的獎勵金，為什麼願意放棄檳榔樹和檳榔園的農民這麼少呢？政策檢討相關的報導和文件的說法是：政府提出的替代作物經濟誘因不足，相較下檳榔仍然是有利可圖的作物，難以引導農民轉換作物。若要農民汰換檳榔，便需要由試驗改良場所、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提供無產銷之虞的作物選擇（石桂鳳 2019; 陳柏文 2021）。

然而，廢園政策以公頃為尺度量化的檳榔園圃，是一種去關係化的平面世界觀。當我們走進屏東的檳榔園可以發現，隨著時間向上生長的檳榔樹冠，會在農地上疊映出立體的半遮蔭空間，這裡風速和緩、陽光溫煦，將園圃轉變成適合人類和植物共同生活的熱帶空間。因此，檳榔與其他作物之間，不見得是競爭關係，無論是園圃中的其他物種與人類本身，都習慣且需要檳榔的存在。在這本論文的第二部分，我將把視角從檳榔樹本身轉移到它周邊的園圃世界，透過兩個章節談討農人、檳榔樹與其他物種群聚的經驗，這些故事將能告訴我們，農民為什麼堅持在園圃中留下檳榔樹。

一、棕櫚科植物的多元混植習性

廢園轉作政策最為人詬病的缺失是：申請補助的農民僅允許「轉作」，而不容許「間作」，即便最新版的廢園轉作計畫[54]降低了過往的門檻，允許農民先轉作其他作物，不需要一次將檳榔砍除，仍然規範農民在一定年限（至多三年）將檳

[54] 112-115 年檳榔廢園及轉作方案

doi:10.6342/NTU202601203

榔園全面廢園，轉變成另外一種市場價值能取代檳榔的作物。這樣的政策設計，其實是將檳榔從關係中抽離的現代性農業敘事，假定檳榔園圃為單一作物的經濟生產空間，作物之間是競爭的關係，而不是其它類型的關係。

然而，檳榔樹在演化的歷史上，是一個習慣結伴的物種。它與椰子、椰棗、油棕一樣，皆屬於棕櫚科植物。儘管棕櫚科物種繁多、分布廣泛，每種植物都有其獨特性，但它們也共享一些生物特性：首先，它們普遍適應力強，能容忍不同的土壤條件與鹽分變化，具備在多樣環境中生長的潛力。另外，棕櫚科不像一般喬木擁有龐大的樹冠，取而代之的是簇生於頂端的羽狀複葉。這種樹型將陽光讓渡給林下空間，形成半日照、光線柔和的微氣候環境。垂直空間結構與環境適應性，使棕櫚科特別適合與其他物種伴生，像是半日照植物與攀藤作物都可能共存在樹冠下，形成多層次的混植地景。

例如，中東與北非的椰棗便創造了人類與其他物種聚集的條件：椰棗擁有深根系，可從沙漠地下水層汲取水分，其軀幹又能改造成水利建材，為乾燥地區建立穩定的水源環境。半日照的林下可以栽培無花果、杏樹、芒果、棗、葡萄，最底層還可栽培一年生作物如香草、菸草或穀物。如此多層、多樣的農業形態，創造出乾燥氣候原本沒有的生計彈性，讓定居成為可能（Brunner 2022[2021]:13-23）。

檳榔如同其他的棕櫚科植物，其羽狀複葉簇生於細長但柔韌的莖部頂端，陽光從葉間灑落、給予林下萬物充足但柔和的光線。在人類的園圃中，檳榔經常與其他物種相伴而生，鮮少單一化種植。例如，在檳榔被栽培之前，台灣的檳榔樹經常會栽培於不同家戶的稻田之間，以此劃定所有權邊界。這是因為稻米是一種對日照相當敏感的作物，檳榔是少數不會遮蔽光線而可以和稻田共生的木本植物。另外，與檳榔搭配嚼食的荖葉也是典型的伴生物種，它是一種半日照的攀附植物，喜歡潮濕穩定的環境、溫和散射光。檳榔樹冠遮擋過強的陽光，並且讓雨水順著單一枝幹留下，剛好提供一個相當適合荖葉生長的環境。人類將兩者共同馴化的歷史悠久，根據考古學的紀錄，至少在 2500 年前的東帝汶遺址中，就可發現了

doi:10.6342/NTU202601203

檳榔與荖葉種子的共伴出土（Glover 1986）。

或許我們會認為單一化的栽培已經占據當代農業地景，而稻米、荖葉與檳榔之間的陪伴已成過往。然而當我們走入屏東平原的檳榔園，便能看見檳榔園並非靜態的單作空間。檳榔在不同年代都有與不同的植物共生經驗，近幾年隨著檳榔價格下跌，它與別的植物共植於園圃的情況幾乎是常態，且有多樣化的趨勢。

檳榔林下常見的作物包含種植歷史較悠久的香蕉以外，隨著台灣高經濟農產消費市場擴張，農民紛紛投入種植「新興作物」，屏東比較常見的新興作物包含酪梨、紅毛丹、黃金果，以及需要加工程序才具有商品價值的可可、咖啡。在這些作物之上保留檳榔，不是單純對收益的比較和衡量的結果，因為隨著小規模生產農戶涉入跨地理尺度、多元化且充滿不確定性且高門檻的農產品市場，檳榔能夠降低許多園圃與外在世界遭逢的風險。這也正解釋了為何國家積極補貼農民轉作，且檳榔價格也逐漸下跌之際，農民仍堅持在農田中保留檳榔樹。

接下來，我想從檳榔園圃中常見的間作作物案例，說明檳榔樹如何與其他植物發展混作關係，以及這些關係如何回應當代農業所面臨的多重危機。另外，這些植物共生的歷史還擴展了檳榔園的時空尺度，敘說園圃外的政治經濟事件如何牽動檳榔園的物種關係，包含全球化脈絡的在地產業變革、近代臺灣農村間的移民，甚至是太平洋兩端種植園相互糾纏的命運。

二、從外銷市場淡出的香蕉

深入屏東平原鄉間，檳榔與香蕉錯落栽培的園圃是相當普遍的風景。事實上，臺灣香蕉主要的產區——如南投淺山、嘉義梅山、中埔、以及花蓮縱谷，皆與檳榔產區高度重疊。兩種植物的共伴，孕育出參差不齊的熱帶地景，完全不會讓人聯想到整齊劃一的種植園。然而，這個混雜的景觀，正是與遠方種植園彼此連結的結果。若我們考察臺灣從香蕉王國的地位跌落神壇的歷史，其他種植園就能走

doi:10.6342/NTU202601203

入這片混雜地景的背景中。

香蕉是台灣歷史上相當重要的外銷經濟作物，自日治時代始即為主要出口作物之一，到了戰後仍然透過貿易協定和台日中間人的流通佔據日本市場，是臺灣歷史上除稻米和糖之外最重要的出口作物。其中，屏東作為臺灣香蕉最主要的產地，產量凌駕於以旗山香蕉著名的高雄地區（鄭力軒 2014），可見香蕉在屏東農業史上的重要性。

但是，臺灣香蕉（臺蕉）的榮景在 1970 年代出現轉變：菲律賓種植園的香蕉大舉進入日本，臺灣失去了在日本香蕉市場的主導地位，出口數量亦跟著逐年銳減，到了現在，臺蕉大多在本土市場流通，在跨國的供應鏈中失去重要性。

由於香蕉在臺灣農業外匯中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1970 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及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共同出資成立了「台灣香蕉研究所」，多年來致力分析臺蕉生產與流通的問題，並且多次前往菲律賓實察，研究人員觀察到：

> 台蕉的小農制栽培方式，不但增加單位面積生產成本，也使台蕉品質無法標準化.....常為日本業者詬病，但礙於蕉園過於零星分散，多年來一直無法改善。本省小農制的香蕉栽培，小蕉園零星分散，欲提高香蕉品質、降低生產成本著實相當困難。數 10 年來始終無法改善嚴重的擦壓傷問題即為一個明顯的例子，目前全世界生產外銷香蕉的國家亦幾無小農制的栽培方式，概因小農制所生產的香蕉，不但成本太高，而且品質無法標準化，除非享有進口國家的市場保護政策，否則無法與跨國公司的企業化集團蕉園競爭（黃新川 2001）。

簡單來說，讓臺灣蕉園失去競爭力的根本原因是小農生產的「多樣性」：臺灣香蕉成本高，生產品質也歧異，難以和價格低廉又標準化的菲律賓香蕉抗衡。對於

doi:10.6342/NTU202601203

農業科學家來說，若要重回跨國供應鏈，就必須要將臺灣小農的土地打造成標準化的園圃，由此達到日本市場所需要的標準化。

然而，臺灣的香蕉園目前為止並沒有如預期地被改造成標準化的種植園，多樣性依然存在，包含農民栽培慣習、品項到產銷系統都依然相當活潑多元。其中，最能反映台灣香蕉種植型態的多樣性，是香蕉與其他物種間作的施作慣習，尤其是檳榔——在臺灣失去香蕉供應鏈的那個年代，恰好是工業生產鏈轉向臺灣尋求勞動力的時刻，許多農村年輕人外移尋找非農部門職業，農村逐漸變得蕭條。留守家戶的蕉農為了補償失去的收入並解決勞動力的空缺，開始在園內栽植勞動力門檻低且有利可圖的檳榔，南投與屏東的香蕉園地貌越來越參差（Yoshiyuki 2006）。研究人員認為，這種栽培方式可能對香蕉的品質產生不利影響，使得台蕉品質的標準化越來越困難。例如 2002 年的產銷改善報告提到：

> 近年在高屏地區有部分香蕉植在檳榔園內，面積逐年增加。蕉園條件差異性大，導致香蕉品質參差不齊。香蕉與檳榔間作，日照不足，蕉果品質劣化...應向農民宣導香蕉勿與檳榔間作。(黃新川、蘇鴻基等 2002)

事實上，我所訪問的農民都和農業專家一樣清楚檳榔樹與香蕉的混作，會同時影響到兩種作物的收成。但是對農民來說，香蕉若走向單一性和標準化的栽培雖然可以提升整體品質，卻也蘊含風險。檳榔與香蕉的混作並非追求園圃的最大效益，而是要緩解臺灣香蕉栽培潛在的不確定性。

但在進一步分析檳榔如何緩解香蕉栽培的風險之前，或許需要稍微岔題，回顧菲律賓的香蕉園是如何達到廉價又標準的生產方式，這能協助敘說單一性和多樣性農業之間的張力和歷史上的連結。在這段彼此聯繫的故事中，臺灣檳榔與香蕉混植就不僅是一個失去競爭力的失敗故事，而是從一系列殖民與毀滅的連鎖之中脫軌的邊陲結盟。

doi:10.6342/NTU202601203

這個故事涉及太平洋兩端的種植園消長[55]。1950 年代控制拉丁美洲香蕉種植園的美國大型農企業面臨了病蟲害、結盟軍事政府的倒台。對於拉丁美洲新興國家菁英來說，抵抗種植園的擴張，亦是抵抗美國帝國主義的擴張，諸如聯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等歷史悠久的農企業為了規避政治風險開始尋覓新的空間，他們將目光轉向菲律賓民答那峨島南部。該地在戰前由美國和日本移民將大面森林轉變成製造軍事纖維的馬尼拉麻（abaca）種植園，馬尼拉麻是一種與香蕉同科的作物，在尼龍取代這個植物纖維原物料之前，民答那峨島就已經變成跨國貿易前緣，成為理想的香蕉種植園新基地（Paredes 2020）。

美國企業在轉移種植園基地的時刻就鎖定了日本市場，他們深知臺灣產能已經無法供應戰後工業快速發展的日本消費需求。聯合果品公司遊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向日本政府施壓，要求臺日停止記帳辦法（何欣潔 2016）並放寬對前殖民地台灣獨家出口權的限制，日本遂於 1963 年開放香蕉貿易的自由化。

在聯合果品公司進入日菲香蕉貿易後，都樂（Dole）、台爾蒙食品（Del Monte）、日本的三菱、住友商事等紛紛進入民答那峨島。美國企業為了避免過去與拉丁美洲的衝突再次發生，不再以公司的名義收購土地，而是把生產部門外包，這個策略也和日本貿易商長久以來經營跨國供應鏈的手段相似，其具體作法是投入資金並與菲律賓當地代理人、軍警力量合作收購土地並成立子公司，管理種植園的人不再是美國人或日本人，而是菲律賓自己人；再者，這些企業與菲律賓北部移民而來的定居小農[56]簽訂合約，並且提供土地開墾的貸款和昂貴設備的租賃，農民既是公司的股東，亦是債務人（Paredes ibid.:27）。透過這種供應鏈的安排，香蕉的價格完全由市場所驅動，以近乎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進入日本的市場。這條取

[55] 關於菲律賓香蕉種植園的歷史，主要參考 Paredes（2020）的作品。

[56] 菲律賓政府 1912 年開展的安置計劃鼓勵呂宋島和維薩亞斯群島(Luzon and Visayas)的移民搬入民答那峨島，透過《綜合農業改革計劃》（CARP）或《原住民權益法》（IPRA）發放免費的土地，包含 Ilokanos（伊洛卡諾人）、Ilonggos （伊隆戈人）、Cebuanos （宿務人）都成為了小農。菲律賓政府向北方貧困人口分發免費土地，雖然被視為「發展偏遠地區」的一種方式，但實際上是菲律賓政府控制北方農民動盪，同時透過移民壓制民答那峨島原住民莫洛人（Moro）的戰略（引自 Paredes ibid. :25）。

doi:10.6342/NTU202601203

代臺灣香蕉的供應鏈，逐漸對民答那峨島內陸、高地展開殖民活動，包含原住民的生活空間和各種逃離國家掌控的社群庇護所，以及多樣化的農業地景都逐步被捲入供應鏈而消失——民答那峨島沿海到高地上原本混雜著稻米、咖啡、可可、椰子和榴槤的園圃，這些碎片化的耕作成果大多貢獻國內市場，農民參與尺度不一的國內市場而充滿韌性，但當這些碎片化的耕作全部被香蕉給佔據，農民成為了單一作物的生產者和企業債務人。即便農民生產的香蕉穩定外銷日本（如臺灣所渴望的），卻因為脫離了多樣化、多尺度的市場而變得相當脆弱。

透過這段連結美洲、菲律賓與臺灣的香蕉歷史，我們可以發現臺灣小農和菲律賓種植園生產的差異不是技術問題，而是不同的殖民脈絡和所有權形式交織出來的多物種關係。菲律賓小型農戶大多被企業的契約與債務所限制，且為了要迎合外銷分級標準，必須提高單一種作的生產量，無論是香蕉或是小農都是被跨國供應鏈所綁架的對象；但臺灣農戶不同，他們往往對自己農地的處置、種作和商品流通的選擇具有更高的自主性，比起配合國際貿易規範，他們更傾向挑選利潤和勞動力分配合宜的作物，以及把作物賣給熟悉的中間人而非陌生的交易對象，因此難以被供應鏈給馴化[57]。

當我們仔細觀察混作園圃中的實踐，就會發現檳榔不只是填充了臺蕉失去外銷通路的收入空缺，透過這組跨物種的結伴，香蕉與農民都更能夠調適外在的不確定性，持續參與國內差異化的市場。

具體而言，檳榔降低了香蕉兩個互相關聯的風險：天氣災害與市場的波動。首先，和全球大多數的香蕉種植園不同，台灣地處亞熱地帶易遭遇颱風和霜害，而香蕉又是一種大型草本植物，根淺且葉形大，抗風能力相當差，若缺少防風措施，香蕉園可能在一場颱風下完全摧毀[58]。農政單位很早就發覺香蕉在面對強風

[57] 關於臺灣小農對農地的處置和種作的自主選擇，涉及了臺灣漢人移墾的所有權特性、現代化土地政策的制度化過程。經典的討論可見柯志明（2003）有關臺灣日治時期「米糖相剋」的研究。

[58] 綜觀過往臺灣外銷香蕉數量，數量大幅減少以及價格劇變必定伴隨強烈颱風危害（古閔喜之 2017；李念宜 2020）。這也說明了臺灣為何不能成為穩定的香蕉種植園基地，以日本最大宗的

doi:10.6342/NTU202601203

時非常脆弱，宣導農民正確使用防腐的竹製支柱降低倒塌機率（林俊彥 1963），後來則使用更加堅固的鋅管當作支柱。但是農民發現，香蕉樹旁的檳榔樹柔軟度適中，且根系深入土壤，是相當優良的香蕉支柱，更重要的是，檳榔還能省去大量資材費和勞動力搭建人造支柱，對於低度投入的老年農來說，這是很理想的種植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香蕉的種植地點選擇並非隨機，農民在籌劃檳榔與香蕉的混作配置時，是奠基在對檳榔樹個體生命長期的觀察和實作經驗中：就如同前面的章節所言，檳榔樹因缺乏農政單位的標準化，個體生產能力差異大，那些被挑選出來與香蕉比鄰栽培的檳榔樹通常是開花較晚、結果狀態不好而提早退役的檳榔樹，它們雖然不是檳榔收益的主力隊伍，卻留在園圃中透過與生俱來的柔韌身軀扶持林下的香蕉樹生命，緩和了香蕉單一化栽培引發的不確定性。

2024 年，屏東除了遇上凱米颱風強勁的西南氣流，還遭逢難得一見從高屏登陸的山陀兒颱風，由於臺灣已經許久沒有連續強颱登陸的經驗，該年度風災為屏東帶來嚴重災害，若農民的農地周遭恰好沒有檳榔園緩衝，或是沒有利用檳榔樹固定的香蕉樹幾乎全軍覆沒。檳榔雖不可能保護香蕉免除颱風侵害，卻作到了減災的效果。

香蕉是所有熱帶果樹中對強風最為敏感的作物，不過屏東平原的其他作物同樣會借用檳榔樹的防風能力減低颱風災損，種植 900 棵可可樹的勛哥和我說：

> 近幾年其他縣市都想要來種可可，前幾年是彰化，最近臺南也有人說要來種。但他們是平原，颱風來少了緩衝，可能會倒掉很多。像這次颱風，如果迎風面那一側完全沒有檳榔樹，就會傾斜得個別嚴重。（20241020 田野筆記）

香蕉來源來說，包含菲律賓南部或是厄瓜多都位處赤道周邊而少了颱風的影響，供應也遠較臺灣穩定。

doi:10.6342/NTU202601203

事實上，颱風的侵害一直是臺灣農業最主要的風險來源，尤其是上個世紀才從全球赤道熱帶移植而來的熱帶作物，對於颱風這種天氣型態相當陌生，屏東平原上連綿的檳榔築起一道道緩衝林，減緩了短時強風對它們的侵害。

颱風除了造成香蕉樹的物理性災損，還會造成一段時間的價格波動，價格有高有低，對農民來說就像一場賭注。這是因為颱風會造成香蕉短缺、價格高漲，但隨著農民接連投入，隨之而來便是價格的崩跌。相反地，檳榔屬於多年生，且檳榔莖部柔軟、耐風性強，對颱風的耐受性較好，即便沒有保證收購的制度，其產量仍遠較香蕉穩定。檳榔樹的穩定性相當重要，它保證了園圃的基本收益，農民不至於因為香蕉崩盤而失去收入。以一畝五分面積的檳榔園來說，一年大約可以保證 8-10 萬的基本收入（根據其投入的照顧而定），很少年度偏離於該收入區間。

諷刺的是，政府為了要減低農民種植檳榔的意願，在 2008 年制定〈檳榔產業專案種植登記作業要點〉，規範檳榔園必須辦理專案種植。沒有辦理登記的檳榔園，無法在遭遇風災等自然災害時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予以救助，這個政策將檳榔栽培的風險轉為農民自主承擔，目的是說服農民轉作其他農作物。然而對農民來說，和其他物種共同栽培的檳榔，本身就是一種面對風災的「天災風險管理技術」。

doi:10.6342/NTU202601203



圖 26 2024 年山陀兒颱風後的香蕉園[59]

（照片來源：李月嬌女士拍攝）

另外，和菲律賓種植園單一性相當不同的是，屏東檳榔與香蕉間作的園圃有明顯的「業餘」性質：因為檳榔收益的可預期性，農民將檳榔收益視為農地的基本收益，更願意承擔市場與栽培技術的不確定性，栽培不同的香蕉品種，甚至不會特別排除園圃中生產力不佳的香蕉樹個體。有別於菲律賓種植園以單一品種北蕉為主，我所遇到的屏東蕉農，都會在田裡種植超過兩種以上的香蕉，如在五分農地種植香蕉和檳榔的阿嬌夫婦和我說：

> 香蕉品種很多，我甚麼都種一點。我有種大北蕉、台蕉一號、台蕉二號、台蕉七號(玉泉)、烏龍蕉、台蕉五號(玉山)，還有零星的旦蕉、玫瑰蕉、南華蕉。香蕉價格不好的時候，烏龍蕉還有玉山還會有人收，比其他品種多一點。旦蕉、玫瑰蕉種很少，比較少賣，我們自己吃比較多。(20241006 田野紀錄)

[59] 利用竹竿固定的香蕉災情慘重，與檳榔混值的香蕉災情稍輕。

doi:10.6342/NTU202601203

阿嬌夫婦種植不同品種的香蕉，可以參與國內規模不一的市場活動，避免種作單一化的風險。例如旦蕉照顧較不容易，對黃葉病也較不具抵抗力，不適合大面積栽培，但是它的口感極佳，非常適合流向市場距離短的小規模市場，成為地方化的物產。

事實上，阿嬌夫婦的園圃香蕉品種的多樣性，不單是來自香蕉技術人員的育種成果，而是濃縮了數十年來臺灣香蕉研究所技術人員與蕉農密切交流與嘗試育種的努力。即便臺灣香蕉研究中心長期將蕉農缺乏標準化的園圃栽培方式視為待改善的問題，將小農栽培的園圃稱為「野外環境」，也就是缺乏試驗環境對特定變因控制的園圃。但是，這些難以標準化的園圃少了有系統且科學化的育種計畫，能夠保留了科學育種園圃所沒有的複雜變項和多元個體，進而擾動精簡化實驗園圃中的香蕉基因庫。許多新香蕉品種的誕生其實是來自高屏地區農民蕉園中的個體變異，例如抗黃葉病的「台蕉三號」即是從農民田中發現的變異種。更令人訝異的是，多年來專業農藝人員與小農戶之間的合作所發展出來的「地方化」抗病香蕉苗，甚至透過臺灣的新南向政策中流向了那些取代臺灣供應線路、正因單一化栽培而遭遇致命蟲害的東南亞種植園中。專研品種改良的工作人員深知，若不到田間與農民建立友誼關係交流知識[60]，單靠實驗園圃的試驗無法達成改良品種的目標（鄧澄欣 2020）。

三、新興作物的落地

香蕉和檳榔共同栽培的時間相當久遠，也是典型的間作作物，其間作的歷史

[60] 如香蕉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柯立祥指出，非常多香蕉產/銷實務上的問題必須和農民一同討論，也為了能夠順利推廣，經常得與農民互動，為了能夠與農民搏感情，從完全不會抽菸喝酒的拘謹研究人員，逐漸轉變為一個豪邁的香蕉推廣專家（引自柯立祥 2020）

doi:10.6342/NTU202601203

闡述著這些小型園圃與跨國供應鏈之間的連結。但現今檳榔林下的混雜地景還不僅如此。走進屏東的檳榔園中，會發現園中植被層次越來越複雜，包含酪梨、紅毛丹、黃金果等不同科的熱帶果樹，果樹之外有咖啡、可可兩種飲料作物。這些「新興熱帶作物」不少是在日本殖民時期就已被農學家或企業引入栽培，戰後因缺乏市場和國家資源的挹注而沉寂，然而近幾年隨著國內都會消費品味的變化，這些作物又再次被栽培[61]。

這些熱帶作物的興起還反映當代臺灣進入全球化市場的處境：隨著臺灣加入 WTO 等自由貿易組織之後，各類國外農產品在關稅降低的條件下進入臺灣國內市場，打破了本土作物的市場，尤其是溫帶水果被農政單位判定遭受國際是場嚴重打擊，反而是熱帶作物有較大的市場空間（楊弘任 2014）。在此脈絡下，如何開發新興作物、為地方農產品建立差異化的市場空間，變成臺灣農業區地方政府的重要業務。熱帶農業發達的屏東縣縣政府與鄉鎮層級的公所，近幾年透過標案讓外部公關公司承接地方物產品牌化的工作，透過實體的主題園區、節慶[62]、市集與網路宣傳將特定作物與地方做連結，打動都會消費者的注意力，鼓勵都會大眾購買低食物里程的本土食材替代外國進口農產品，也將假日前往墾丁的遊客攔截在屏東平原上消費。同時，這些新興熱帶作物不僅被地方政府視為具有消費潛力的農產品，更被中央農政單位列為檳榔廢園轉作的建議作物，只要農戶將檳榔園廢園，種植這些新興作物，就可申請廢園補助。

在地方政府熱情地打造在地化物產品牌的同時，我們需要留意的是：和檳榔、香蕉、水稻等在臺灣已有上百年馴化歷史的作物相比，原生於全球熱帶地區的新興作物要遭遇的是陌生的土壤環境、氣候，以及陌生的生產者和市場。新興作物在地化的進程，相當仰賴農業科學專家和農政單位的輔導，讓農民可以養成新物

[61] 比較顯著的例子如近幾年興起的咖啡和酪梨。近二十年來，隨著國際咖啡連鎖店進入台灣，透過降低售價以及製作調味咖啡後，打開台灣咖啡市場，接著超商、評價本土咖啡連鎖店進入咖啡市場，更是讓咖啡進入不同階層的日常消費習慣中；而酪梨則是隨著低碳、生酮等新飲食法的崛起，成為健康飲食的理想食材，因此近幾年不少屏東農民選擇栽培酪梨。

[62] 類似的案例可見黃士玨（2021）有關檸檬的討論。

doi:10.6342/NTU202601203

種的栽培、加工和產銷知識。另外同樣重要且容易被忽略的是，物種在進入屏東平原這塊新生環境時，還會遭遇異質的多物種網絡。

有一回，我在一個專辦給可可農的巧克力品評訓練課程中遇到曾先生，他和我分享檳榔園中物種網絡的互動與消長。曾先生三年前才剛種下 100 棵的可可，身為可可新手，最近常參加縣政府舉辦給農民的可可發酵與風味品評課程。除了可可，他還有種三種品種的咖啡樹共 150 棵、檸檬約百棵。這些作物有一個共同點：都在檳榔樹下生長。在他的園子中，檳榔和檸檬是產銷比較穩定的傳統物種，檸檬是近幾年竹田鄉相當流行的作物，但檸檬田間管理並不如想像中容易，尤其是星天牛危害的控制。星天牛和傳統的天牛習性不同，他會從土裡向上跑，在已經離開的天牛鑽出的傷口上繼續寄生，傳統的防治方式是在樹幹上包塑膠，現在已經對付不了，檸檬的健康狀態正逐漸失控。最近他砍去檸檬，嘗試新的作物。他想過香蕉，香蕉是一個很常見的間作作物，在上一世代特別受歡迎，但香蕉相當厚重，容易把固定它的檳榔樹弄傷，所以他嘗試了近幾年才興起的可可和咖啡。這兩種作物有全新的市場通路，為曾先生帶來新的機會，而且兩種樹枝幹更輕，綁起來比較不傷檳榔。最後，在咖啡和可可之間，還有老邁死亡後倒下的檳榔樹、腐生菌共同群聚的堆肥，他在堆肥上種植香草，死去檳榔樹的營養持續供應養分給這些真菌和香草莢，生機盎然，幾乎不需要太多的照顧就能有收成。

曾先生的栽培物種之多，恐怕讓人誤以為他經營了一個大型農場。然而，這些果樹、可可、咖啡、香草全部都安排在僅有五分大小的檳榔園圃中。隨著臺灣步入全球市場，臺灣西部平原稻作逐漸被多樣化的經濟作物取代，但是像屏東這樣變動快速、物種混雜的園藝農業在西部平原中相當特殊。這是屏東農業轉型的特徵：屏東農民對作物的選擇高度市場化，作物的變動相當快速，一旦作物獲利豐碩，栽種面積迅速成長，當市場變差或栽培環境不利就快速減少（鄭力軒 2014），因此現階段流行的新興作物可能會和其他舊作物輪替栽培。

就如同曾先生園圃所揭示，快速更迭的園圃既帶來機會，也帶來各種充滿不

doi:10.6342/NTU202601203

確定的新遭逢，這些不斷重組的多物種網絡會衍生衝突、競爭、感染，也有可能是意外的合作。而被國家和地方政府視如敝屣的檳榔樹，其實創造出不同於原本預設的環境，支持各種新興物種生長的條件，可以說檳榔正是這些多物種關係得以發展、調和的關鍵。

以近十年在屏東平原崛起的可可和咖啡來說，它們是典型的雨林林下植物，喜歡和緩的陽光和風。拉丁美洲、非洲和東南亞的小農，習慣將咖啡和可可種植在其他具有遮陰能力的作物之間，像是甜橙、酪梨、油棕，以及香蕉等，這些植物不但供應家戶各式各樣的營養，也幫可可或咖啡遮蔭（Akrofi, et al. 2015）。原本作物之間能夠交換養分、維持地力，然一旦可可和咖啡脫離林下世界轉向單一化栽培，失去遮蔭的葉片就容易灼傷、免疫能力也下降，像是銹菌（rust fungi）這樣的真菌孢子容易聚集跟擴散，造成植株大量死亡（Tsing, et al. 2024）。

當這兩種植物來到屏東平原時，同樣脫離了原生的多物種網絡。這時，檳榔恰好提供了這兩種陌生植物的庇蔭所在：檳榔樹羽狀複葉遮去屏東平原長時間的日照，成為半日照的空間。這個林下空間類似熱帶雨林喬木下的環境，也接近赤道週邊海拔稍高、氣溫較平地涼爽的丘陵地帶，原本不適合在熱帶平原生長的咖啡、可可，意外找到合適的棲身之處。

說到這裡，我們已經能理解為何屏東平原的新興作物不斷推陳出新，申請廢園轉作的農民比例仍然相當低，這不是因為其他作物的收益真的比檳榔差，而是因為檳榔與其他新興作物之間不見得是競爭關係，反而是合作的關係較常發生——許多新興作物和香蕉一樣，仰賴檳榔所創造的園圃空間，才有辦法活下來。

但是，農民選擇讓檳榔在園圃，不只是作物間生態共生的考量。新作物栽培初期，通常需要等待約三年以上，才有辦法收成，這時檳榔能夠填補轉換作物時的收入空缺。更重要的是，新興作物無論是種植／加工技術、產銷和極端氣候的適應能力都比傳統的作物更加不穩定，農民需要檳榔面對轉換作物時遭遇到的不確定性。例如從高雄返鄉務農五年左右的曾先生和我說：

doi:10.6342/NTU202601203

我的咖啡還在試品種，藝妓也種了 100 棵，不知道哪一個比較適合。我現在都用檳榔『養』可可、咖啡，在找到咖啡的銷路之前，檳榔的收入就很重要，還是需要檳榔樹，而且檳榔和其他作物不太會衝突。（20240520 田野筆記）

事實上，咖啡和可可這兩種新興作物和一般的果樹相當不同，它的新鮮果實本身沒有經濟價值，也不容易保存，必須將果莢取出經過發酵、烘焙加工成具有特殊風味的且沒有發芽能力的食品（如可可豆、可可粉），才能成為商品。像是可可的油脂在發酵過程帶來新的蛋白質，透過烘焙的梅納反應帶來獨特風味，這個過程帶出來的風味占加工製成的巧克力九成風味來源。而風味會因為發酵的地點、溫度的控制、與空氣接觸的時間點而改變菌叢，造成風味的差異。這套加工知識和需要的基礎設施相當複雜，超出田間栽培的範疇，因此幾年前農民大多僅進行田間生產，將可可果莢交給內埔一帶比較早投入加工與販售部門的巧克力店。然而，隨著種植可可的農民越來越多，收購可可的廠商不斷壓低價格，甚至會從外國進口品質標準化且較廉價的可可豆、混入本土可可進行加工，結果是收購價格幾乎比農民田間管理成本還要低，許多農民決定改變策略，不再將可可果莢販售給具有加工能力的中間人，而是自己加工可可成產品販售。因此，現在種植可可的農民幾乎都需要準備超越傳統田間管理的技能和資本，例如學習製造適合微生物的發酵環境、烘焙加工，甚至要學習產品包裝和行銷、食品相關的法規和檢驗體系，設法將可可產品販售至高雄、台北兩地的都市中產階級。

因此，曾先生才會說需要「以檳榔養可可、咖啡」，這幾年他為了養成加工技術、尋找銷售管道，投入相當高成本購入設備、參與專業的風味品評課程，這時檳榔的收入就是他的資金來源，類似創業基金一般的存在。

在轉變作物的同時，曾先生指出了檳榔和其他作物之間不容易產生衝突，這

doi:10.6342/NTU202601203

其中隱含檳榔不同層次的彈性：因為檳榔所需勞動力低，可以釋放許多勞動力投入許多異質的作物，再加上檳榔對土質類型接受度很高，從河川邊的沙地，到適合水稻生長的泥質地都有辦法生存，就算在檳榔樹底下利用木屑、砂質土重新配置土壤質地種植其他作物，檳榔樹都還是可以繼續收成。

另外，檳榔樹還有一項優勢，使其可以和其他新興作物共同栽培：第三章曾提到，檳榔可接受相當廣泛的田間管理計畫。許多在檳榔林下投入新興作物的農人，會降低檳榔施肥與除蟲藥劑的投入，甚至不再對檳榔樹施肥用藥，若要持續對檳榔使用肥料或除蟲劑，則會配合其他作物的食品治理規範整檳榔照顧的韻律，種植三甲可可的阿文爸就提到：

> 檳榔樹是田裡最高的樹，灑藥沉降會影響可可，為了要讓可可送去產銷履歷檢驗時零農藥檢出，我現在檳榔樹只會灑一次藥，12 月檳榔樹正要開花的時候灑藥，這個時候是可可的淡季，這段時間長出的可可果莢就不採收，等到過年後那一批開花，就不會受到藥物汙染。（20241229 田野筆記）

倘若其他作物的投資失敗，檳榔園提供轉圜的機會，讓農友獲得變動的籌碼。相當多的農民發現新興作物的收益不佳或耗損過多的勞動力之後，會逐步砍除檳榔樹下的果樹，試作其他作物，甚或乾脆補回檳榔樹。也就是說，檳榔的保留提供園圃變動的潛力，讓農民可以在遇到市場風險的時候較迅速且負擔較少成本地作出回應。甚至有農民和我說，若自己無力耕作而計畫出租田地，一畝只種植檳榔的農地，會比起種其他新興作物的田地更容易出租，因為對於承租戶來說，檳榔園技術門檻低，不僅能保障基本收益，能夠較彈性地運用。

除了產銷方面的風險外，包含可可、咖啡、酪梨等新興雙子葉木本果樹作物，因對極端天氣極為敏感，使得產銷的風險不僅來自市場價格波動與技術門檻，也

doi:10.6342/NTU202601203

來自災害的不可預測性。多位可可與酪梨農都曾向我提及：近年來乾旱日漸頻繁，而降雨則多為短時強降雨。例如，在可可栽培風潮興起之初就投入栽培的阿能發現：

> 去年（2023）可可的收穫明顯降低，落果的問題較嚴重，而且比較容易在採收前就發芽。現在天氣很麻煩，跟以前不一樣，很常遇到乾旱，乾旱一結束一下雨又是狂雨，果樹遇到這種天氣最麻煩。（20240520 田野筆記）

不只是可可栽培深受氣候變遷影響，種植上百棵酪梨的宏明跟我說：

> （2018 年）823 雨災那次屏東的酪梨幾乎死光，真的死光喔。那次降雨是短時間快速降雨，除了落果，更嚴重的是積水沒有排開，根系一旦長期淹水就會泡爛。（20240517 田野筆記）

由於果樹枝條不如檳榔柔軟，較難緩衝強風與強降雨的衝擊力量，特別是果樹不少是透過嫁接技術繁殖，嫁接之處相當脆弱，遇到強降雨容易斷枝。因此在檳榔樹下種植新興作物，需要學習各種和極端氣候共存的能力。例如宏明透過果樹栽培的臉書社團中發現，傳統施作方式習慣拉開果樹間距，讓樹冠向上擴張，藉此增加單棵果樹產量，但這種施作方式的缺點是單棵果樹承擔較大的風險。他後來與其他果樹栽培者交流，學會將果樹修枝成矮身，並且增加種植的密集度，將果樹塑造成如同圍籬的形狀，這麼做雖然會讓單棵果樹產量降低，卻能分散個別果樹所承擔的風險。

就如同香蕉園需要檳榔幫忙緩衝強風、填補風災收入空缺，在極端天氣事件越來越頻繁的狀態下，檳榔作為新作物風險管控的角色更是明顯。雖然檳榔在極

doi:10.6342/NTU202601203

端天氣事件（包含強降雨和極端高溫）中也有災損[63]，但較少發生大規模死亡的事件，如同許多栽培新作物的農民常描述，檳榔樹是所有作物中最「粗勇」的植物，能夠在新興作物大量死亡的時刻持續維持園圃的收益。檳榔的耐受性來自於它的生理特質：棕櫚科植物缺乏形成層，只有一個莖頂初級生長點，當莖頂的細胞在分裂的時候遇到乾旱、低溫或者葉子被摘除等等的不利情況，莖頂的生長會被抑制，渡過短時的環境變遷。不僅如此，檳榔的根部對積水的耐受能力強，在遭逢短時強降雨時，可以挺過數日的積水而不死亡。

透過新興作物栽培的經驗，我們可以發現當代的農民面對的是更大尺度的危機，包含全球化的農業市場，和變化多端且越趨惡劣的氣候條件。技術的精進、作物的改良雖有助於農民和植物回應這些危機，但是僅關注單一物種的生命力或技術的提升，難以回應瞬息萬變的園圃處境。而屏東平原的農業經驗反應的是，檳榔所支持的關係網絡，維持了一個對變化反應更迅速因而更具韌性的多樣性，即便它的市場價值早已不如過往，卻仍在園圃中提攜、庇蔭新到來的物種。

四、底層植被

前文所討論到的香蕉、可可、咖啡都是屬於木本果樹。除了這些經濟果樹外，檳榔園中有許多生命尺度較微小的一年生草本或藤本植物，包含茎葉、香草、蔬菜還有雜草。這些植物中，有些是高昂稀珍的作物，有的則不直接進入商品市場，也不被納入國家農業統計的資料當中，卻構成了一個豐富紛雜的非正式經濟網絡。

沒有直接經濟價值的草本植物分布在檳榔園圃的底層，容易被人們所忽視，

[63] 例如，高溫少雨的乾燥氣候會造成檳榔品質下降。而冬季高溫也會造成椰子綴蛾蟲害增加，進而影響收成。

doi:10.6342/NTU202601203

但有經驗的農民卻相當重視底層草本植物的養護。其中一個年輕的農民宏明和我解釋了檳榔園中的草本植物扮演的角色：

> 老人家會把草全部除掉，但這是不對的，草能幫土壤保濕，水分下來不會太快蒸發，保留水分，選擇適當草讓它留下來，就能避免水分被草吸光，像是檳榔這種樹冠面積狹小的植物，就一定要留下草，不要用除草劑全部清除，不然土壤會直接曬太陽、太乾燥、太硬，園圃會不健康。（20240517 田野筆記）

宏明點出檳榔獨特生物特徵的一體兩面：檳榔羽狀複葉樹冠狹小，將陽光留給林下的作物，提供適合其他植物生長的空間，但並不代表檳榔是一種可以單一化生存而完全不仰賴其他生命的植物。反之，正是因為它的樹冠面積小，不容易攔截陽光和水分的特點，使得底層植物的共生相當重要。其中，雜草往往被視為單一化農業中的殘餘和需要剷除的生命，但在檳榔園裡，草本植物的根系可以打穿土壤層狀構造，讓水分流到較深之處，草皮也可涵養地面水份，使土壤保濕、溫度更恆定，從而提升檳榔樹的健康，抵抗劇烈的天氣變化。也就是說，檳榔雖然對極端天氣事件有相當良好的適應能力，卻是以與其他物種的結盟為條件。

除了宏明，不少檳榔園中的年輕農友都有類似的觀點。他們剛接手檳榔園時，學習長輩將檳榔樹下的雜草全面清除，避免營養的競爭，但除草耗費勞力和除草劑成本，也容易讓土讓過度乾燥。年輕農友參與臉書上的檳榔交流社團、果樹農事交流社團，發現「養」草可以打造一個節省勞動力、幫助土壤養分循環的檳榔園。「養」說明著農人並非讓草隨意生長，而是需要辨識不同的草本植物種類，並且積極地打理、修整，甚至是施肥，因為「雜」草其實是複雜的生態，裏頭包含著不同的物種，將部分適合與檳榔共生的草留下、適時的修整，才能讓草皮保持健康的狀態。

doi:10.6342/NTU202601203

兩代檳榔農農法的差異，也訴說著生產典範的移轉。他們上一代大部分都經歷了稻作轉作的歷程，其施作慣習深受戰後綠色革命的單一生產典範所形塑，仰賴化肥、除草劑來維持單一稻作的生產力，而轉作檳榔之後也盡可能維持園圃的單一性，盡可能避免檳榔園雜草蔓生。新世代的檳榔農則是在檳榔林下重新學習不同檳榔與非經濟用途的植物間的開放關係。

除了雜草，食用蔬菜與檳榔樹的共生是相當有趣的現象。前文曾提到，綠洲農業中的家戶會把椰棗樹下的空間打造成菜園，種植一年生的蔬菜，成為乾燥氣候中重要的葉菜營養來源。但在屏東平原上，蔬菜與檳榔樹共同栽培的景象不常見，這是因為大部分家戶會在檳榔園圃中種植經濟果樹，而檳榔樹與果樹大多需要施灑肥料與防蟲藥物，農藥沉降於藥物耐受性不同蔬菜上，可能造成家戶食用風險。因此，家戶通常會選擇在家屋周邊的畸零地上種植蔬菜，而非檳榔園中。

在田野期間，我偶然走進萬巒兩大聚落泗溝水、五溝水之間的微型聚落，該聚落約有十戶人家，僅有一條聯外道路連接主要幹道，從幹道走過很容易錯過這個被檳榔林圍繞的聚落。當我走進聚落時，才發現這裡的檳榔園和屏東大部分的檳榔園都不同，正值春季的檳榔園樹下有各式各樣的蔬菜瓜果，像是南瓜、青江菜、茼蒿，生機盎然。這個與周遭檳榔園不同的地景喚起了我在北台灣客家農村的成長記憶：農戶會在二期稻作收割（大約是中秋節後）到隔年一期稻作插秧（農曆年後）前在田中撒下各種蔬菜的種子，將水稻田轉化成短暫的菜園空間，這些生命週期短暫的蔬菜有些具有固氮能力，能夠幫助稻田休養，也能維持水稻田的地力。

後來我遇見一名婦女正在採收南臺灣少見的「大菜」，我才驚覺檳榔樹下的菜園，就是北部客家庄菜園的移植。原來，這個聚落被周遭客家聚落稱為「台北寮」，居住著上世紀才從北台灣客家庄遷徙而來的移民，其中包含新竹芎林的上山、倒別牛等沿山聚落移民，還有少部分居民來自新竹的新埔鎮。經過時間的洗禮，這些移民的生活習慣大多已改變，就連祭拜祖先的廳堂空間都和北臺灣原鄉

doi:10.6342/NTU202601203

親戚不太一樣。檳榔園圃中零星種植的蔬菜，還有夥房稻埕上曝曬的鹹菜，是少數留存下來的原鄉生活痕跡。

我在聚落中結識了第二代移民田阿慶，偶然的對話中發現他是我遙遠的同輩份宗親，兩百多年前我們的祖先一起從廣東遷台後，我的家族分支落腳新竹的沿海定居，他們的家族落腳芎林的丘陵。田阿慶的爸爸 1960 年前後為了要找地來耕，和一群朋友尋覓到萬巒的農地，把芎林的農地賣掉，換成面積較大的農地。

除了萬巒鄉外，屏東平原上還散布著許多被周遭人群稱為「台北寮」的同名聚落，聚落中有無數個與田阿慶家族類似的故事。這些移民主要是來自日治時期的新竹州客家人（包括現今的桃園、新竹及苗栗），他們在 1930 年代至戰後初期透過連鎖移民的方式遷徙至屏東平原，將北台灣丘陵的農田轉換為沖積扇良田。當時日本殖民政府整治河川後形成的河道新生地，常成為移民定居的新空間。幾十年後，隨著台灣水稻價格下跌，他們又轉作檳榔。

田阿慶爸爸南下「找田地耕」是許多新竹移民南遷的敘事，為什麼他們都在特定的時間離開家園、向外尋找可耕農地呢？透過經濟史的爬梳，我們可以推測他們的遷徙可能和近代台灣稻作商品化的歷程有關。

日治初期，日本本土的稻米供應因一戰爆發而嚴重短缺，為了確保供應鏈的穩定，日本以殖民地臺灣與朝鮮的糧食增產為目標，特別透過品種改良與技術革新，將臺灣稻作轉化為集約化、商品化的生產模式（林美珠 2015；王乃雯 2023）。1920 年代起，臺灣農村由自給迅速轉向市場導向，至 1930 年代，逾七成稻米流入市場，其中近半輸往日本。隨著耕地捲入出口導向經濟，農民承受市場波動與競爭壓力，若無法持續提升生產力，便可能被淘汰（柯志明 2006）。

與嘉南、屏東平原不同，新竹州的客家庄多為丘陵與台地，冬季又受東北季風影響，破碎農地不利於機械化耕作。然而為了支援市場需求，1920－1935 年間仍有大量旱田與坡地被翻整為良田，多樣化生業逐漸被商品化稻作取代（林美珠 2015）。同時，新竹州土地高度集中，1921 年佃作率高達 70.4%，遠超全島平均

doi:10.6342/NTU202601203

（李維修 2014）。被迫轉向稻作的破碎耕地與高佃作率，迫使許多農家戶離鄉，轉往屏東、東台灣尋找稻作耕地，又或者接受招募到南部糖業農場、樟腦業尋求生計。

戰後國民黨政權實施土地改革，表面上終結了不平等的租佃關係。然而，政府實質上仍透過各種政策手段壓榨農村生產剩餘：如透過公糧收購等制度控制稻米流通，還有以肥料換穀制度取得廉價稻米、以較高價格出售稻米來創造外匯收益，藉此支持戰後工業發展的資本實力，又兼顧隨國民黨遷台的龐大軍公教需求。結果是，佃農雖擺脫了地主的剝削，卻落入了國家掌控的困境，生活水平並未得到顯著改善，小農從土地所獲甚至比戰前還要低落（Ka and Selden 1986）。除了稻米經濟外，隨著樟腦替代原物料的出現，以及東南亞茶葉的競爭，過往新竹丘陵興盛的產業變得蕭條，像田阿慶這些戰後遷徙到屏東的家戶，即是希望將丘陵地帶的土地兌換成較大面積、適合稻作的平坦耕地，藉此維持家戶的生計。

因此，北臺灣客家人遷徙的經驗反映的是百年來臺灣農村資本主義化的效應。家庭農場雖然逐步獲得自己的耕作土地，卻一步步被吸納進商品化市場和不平等的交換之中，需要不斷增加農地的稻米生產力以換取現金，才有辦法支應家庭的開支。其中一條路徑就是遷徙。

在這些農民被吸納進商品化市場和不平等的交換的過程中，有一些不被國家、資本家視為有價值的生產活動，這些生產活動的價值計算不會呈現在正式的土地租賃契約中，也不會如同稻米、蔗糖、茶葉一般以面積、價格等形式留存在國家的統計資料中[64]。其中，「蔬菜」就是這樣的存在[65]：家庭農場會在二期稻作與

[64] 例如葉淑貞（2001:109-110）研究指出，日治時期地主在租土地時，也會無租提供一些附屬物給佃農，例如田寮和佃農自家用的菜園，菜園和田寮通常依附在水田之中，但在租佃契約上並非要繳納地租的項目，因而缺少詳細的面積和生產力統計。

[65] 需要注意的是，近代臺灣蔬菜也進入正式的市場中，例如呂紹理（2020）的研究指出，隨著日本現代營養學論述的建構，蔬菜逐漸被視為提供維生素的營養來源，因此日本殖民政府 1920 年代以來開始較有系統且有規模地輔導栽培蔬菜，到了戰爭動員時期蔬菜更是拓展輸往滿州國及日本本土，供應前線營養需求。不過，撇開計畫性的蔬菜栽培，近代臺灣蔬菜的生產和流通仍相當依賴農戶間的非正式的管道，特別是在戰爭物資稀缺之際，家戶之間蔬菜的交換與餽贈是相當重要的食物來源（王文昕 2008:87）。

doi:10.6342/NTU202601203

一期作插秧間的空檔播下菜種子，又或者是在畸零、不適合機械行動的土地上打造一方暫時性的蔬菜園圃。當大部分的食物逐漸仰賴現金交易取得，蔬菜仍是少數自給性的作物。換句話說，高度流動性的菜園填補了臺灣農村商品化的時間與空間縫隙，即便難以透過農業統計資料接近其價值，卻支持逐漸步入商品化市場的家戶維生。

如同畸零的菜園一同被掃進故事的殘餘的，還有女性的勞動力。在一般的認知中，男性被視為家庭農場的主要生產者，肩負了家庭生計與國家發展的責任。的確，國家政策中也隱含著這樣的性別意識形態：戰後國民政府的土地改革引用了美國技術官僚的意見，將土地所有權轉移給佃農，預期他們能像美國自耕農一樣，成為熱愛自由、自力更生的農民，藉此成為對抗共產主義擴張的基石。同時，政府限制家庭土地持有上限為 3 甲，而 3 甲的農地面積，是假定一位男性農民養活一家人所需要的勞動力和生產力而制定的（Tsai 2019）。

但是，稻田邊破碎的菜園照顧、採收、加工成餐桌上的食物相當仰賴女性的勞動，是家戶不可或缺的食物來源。我在台北寮所見的大菜和包心芥菜（姑腰菜）是北台灣客家鹹菜的原物料，構成客家飲食文化中相當重要的元素，家戶中的女性會在春季採收大菜或姑腰菜，醃上一層鹽巴後用腳輕踩（這常是家戶中的女性和小孩共作的活動）接著放入陶甕利用礫岩[66]壓實曝曬發酵。調整發酵時間和製作程序會衍生出不同的食物：如發酵程度低、當作年菜的「長年菜」、經過曝曬乾燥後長時間保存的梅干菜等等。這些蔬菜本身生命週期短，但透過客家女性複雜的發酵技藝，延伸了食物的儲存時間。在過往食物稀缺的時刻，這些鹹度高的醃漬菜會與米飯、肉調和成餐桌配菜，填補經濟狀況不穩定的家戶所需的營養，降低挨餓的風險。雖然蔬菜並非糧食作物，卻可以透過發酵技術長時間保存、調和家戶在食物支出上的比例，是家戶之中相當重要的物資。

[66] 北台灣客家庄大多位於頭嵙山層的沉積環境，這個地質層堆積大量礫石，因此處理和應用礫石成為北部客家人生活技藝之一。日治時期許多北臺灣客家人被招募到南部的河川新生地進行開墾，也與他們擅於處理河川地礫石有關。

doi:10.6342/NTU202601203

隨著時間的演進，食物在臺灣家戶花費的占比已不如過往，增長食物保存時間不再重要，而這些移民家戶也早已在臺灣稻作價格下跌之際轉作經濟價值更高的檳榔，蔬菜的種植和保存不再是一種必要的維生方式，但這些移民仍維持原鄉的習慣，每到了過往二期稻作與一期作插秧間的時刻，在檳榔樹下種植需要遮蔭的葉菜作物，並保留檳榔園中的小碎塊種植大菜或包心芥菜。大菜和包心芥菜發酵而成的梅干菜依然保留在家戶中食用，或是在移民家戶之間流通。除了交換蔬菜和梅干菜之外，家戶之間還有獨特的種子交換迴路。從新竹新埔鎮移居而來的彭女士告訴我，新竹的家戶偏好種植大菜、苗栗的家戶較偏好包心芥菜，而搬來萬巒的新竹移民和苗栗移民會互相交換兩種蔬菜的種子，因此他們的園圃中可見兩種蔬菜並存，蔬菜種子的交換保持園圃經濟的再生產，也延續了移民社會內部的關係。田阿慶曾經告訴我一個故事令我印象深刻，也說明了梅干菜在這些移民網絡中的重要意義：

> 我們聚落想要辦農地重劃。但是老人家真的很難說服，他們很擔心土地會變小。我為了要說服他們，你知道我送出去多少罐梅干菜嗎?最後好不容易才說服他們。（20240127 田野筆記）

這個故事引人之處在於，田阿慶為了要結盟台北寮的村民作農地重劃，並不是送出高價值的禮物諸如糕餅禮盒或茶葉，而是家戶之間最普遍也最熟悉的梅干菜。對於這些在地方上居少數的移民來說，梅干菜雖是一種家常的食物，但家常食材的共享反而能表現親密關係，說服村民的共同行動。更耐人尋味的是，「農地重劃」是國家的理性規畫政策，其目的是為了改造台灣小農體制下農地破碎的問題，透過地籍整理、耕地型態的調整來改善排水、農路系統紊亂的問題，以及機械化耕作的困難，進而促進土地的利用和農業增產。然而，大部分農地重劃都會因為地主意見不同而難以動員，台北寮農地重劃的經驗點出了國家正規計畫的執行，

doi:10.6342/NTU202601203

如何仰賴在地化且非正式的動員，也展現檳榔林下非正式的經濟活動在農村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



圖 27　檳榔樹下的大菜

五、結語

廢園轉作計畫以面積和單一物種為單位規劃檳榔園的未來，但是真實的檳榔園樹冠下，是多層次物種共生的立體空間。在這個章節中，我嘗試透過檳榔樹冠下多層次的植被，重思檳榔園圃多樣性的意義。首先，檳榔樹冠下陽光和煦且潮濕的環境創造出物種混作的條件，比起單作栽培的種植園，檳榔園圃種作的多樣化降低了病蟲感染、劇烈天氣與市場不確定性的風險，為小農生產活動帶來靈活的韌性。

另外，檳榔林下多層次植被共生，亦是多重歷史交疊的結果，賦予檳榔園圃時空尺度上的縱深：檳榔與香蕉的共生關係，隱含了太平洋兩端種植園消長的命運；近年來熱帶新興作物的崛起，則展現臺灣在全球農業市場競爭中的機會與縫

doi:10.6342/NTU202601203

隙；而檳榔園圃最底層綠意盎然的草本作物，不僅維持園圃的濕潤與生態健康，也透過非正式的經濟活動，在屏東平原上形成一個個細碎而活躍的社群斑塊。

值得注意的是，檳榔園中每一種混作的形式，除了反應農業市場的更迭，更可能深植在特定的社會文化關係上。如同 James Scott 觀察非西方社會的農業混作所指出的：

> 每一種作物都深植在一系列特殊的社會關係之中。家戶中的每一個成員可能都對不同的作物有一定的權利或責任，換句話說，種植的制度反映了社會關係、儀式需求以及烹飪品味；這種制度超越企業家直接從新古典經濟學文獻中找到的生產策略，亦即只追求利潤的最大化。（Scott 2023[1998]:479-480）

的確，臺灣農業生產以小規模家庭農場為主要型態，而非大型農企業的經營。因此，檳榔園圃的生產活動必然與「家」的組織形式與運作邏輯相互交織。前文著重於呈現檳榔園圃的生態多樣性，尚未進一步處理「家戶」作為生產單位的分析。再下一個章節中，我將會從檳榔林下經濟活動與社會關係，分析家庭農場的當代樣貌。或許，屏東平原日亦紛雜多變的檳榔地景，不僅反映農業結構的轉型，也指向家庭制度的變遷。

doi:10.6342/NTU202601203

第六章　檳榔園裡的家庭與老後餘生

1955 年出生的英梅，來自地方上曾經的大家族。她們家的伙房與一般人家大不相同：洗石子的牆面、結合日式建築元素的屋樑，以及雕刻精美的和風格局，訴說著她們日治時期作為地方菁英的歷史。在客家庄中，伙房象徵父系繼嗣的大家庭，正身中央的「廳下」（tang ´ ha ´ ）供奉父系祖先，是家的心臟；兩旁的橫屋則住滿了父系家族的各房家庭，這些成員組成大型的「聯合家庭」[67]。

在過去，父系成員共組的大家庭是華南與臺灣漢人相當典型且理想的家型態，不僅支持了南方社會的稻作經濟的勞動需求，更在帝國邊區的華南地域中，扮演了社會倫理和基層政治體系的基礎（Freedman 1958）。對客家庄來說，父系繼嗣的大家庭意義尤其深遠。在臺灣歷史上，客家移民在臺灣各地都透過父系繼嗣的宗族凝聚彼此，形成緊密甚至排外的地域社會。即便屏東的六堆客家庄宗族組織不如北臺灣客家庄興盛，但以姓氏為基礎的公業，不僅是讓客家族群可以在清代閩南移民掌握「大租權」的地權劣勢中累積財富，也成為後續六堆地域軍事結盟和政治動員的基本單位（陳秋坤 2004; 陳麗華 2010）。

不過，隨著六堆組織失去了地域結盟的功能，以及戰後臺灣稻作農業的衰落與工業現代化，不僅使宗族的意義改變，父系的大家庭亦出現危機：1970 年代以來農村壯年大量遠離既有的社會組織移住都會，小規模的核心家庭和三代同堂的折衷家庭成為台灣社會中相當主流的家庭形式（王增勇 2014; 黃應貴 2014）。在這樣的家庭型態中，扶養小孩的壯年世代是家庭運作的核心，像英梅這樣年齡的

[67] 「聯合家庭」是參照 Cohen（2016[1976]）研究美濃客家社會所描繪的家庭類型，聯合家庭成員包含父母、已婚兒子與他的子女。若父母去世則為兄弟聯合家庭。聯合家庭並非限於所有成員居住在一起的家戶，而是一種經濟共同體，兄弟共同開發利用家產（如農地和菸寮）、管理財產。這樣的「大家庭」往往被其他漢人研究視為一種仕紳階級才能追求的理想型態，而 Cohen 從美濃的經驗提出不同的見解：他指出家業的型態、生產作物種類和規模會更明顯地影響聯合家庭的存續，例如菸草的種植需要大量勞力，且有高報酬，更容易讓有能力種植菸草的家族維持聯合形式。同樣的，在本文英梅家的案例也是因為可可的栽培具有高報酬、需要勞動力的特性而維繫了聯合家庭的存續。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和 Cohen 當時所描繪的社會氛圍不同，當代父系家庭男性雖有較大主導權和家的權力象徵，但是越來越多女性成員對家業的運用、財產的分配有決定權。

doi:10.6342/NTU202601203

人，則準備成為受到照護的老年成員。

然而，若我們僅隨著人口流動將視角集中於都會區中因應工業化而生的核心家庭，可能會忽略農村的動態。事實上，農村中的家庭究竟在社會經濟迅速變遷之際發生了甚麼轉變，一直是臺灣農村/農業研究的重點。其中，最啟發我的是莊英章（1972）和胡台麗（1986）的研究。就在臺灣的出口工業崛起之際，他們兩個分別進入了臺灣中部的農村進行調查。他們觀察到，隨著農業機械化，許多家戶將稻田大部分的勞務外包，由父母掌握少部分的田間工作和收益，接著那些從農業釋放出的青壯勞動力，選擇外移到周邊城鎮發展，又或者是學成後回鄉投資小型代工廠。然而，大家庭並沒有完全瓦解成核心家庭，而是出現許多兄弟分居的新型聯合家庭，以此適應臺灣工業化的社會變遷：分居型的聯合家庭一方面能維持父輩的權威、田業的經營和家庭照顧的義務，另一方面透過父子、兄弟之間的融資，降低代工廠事業投資的門檻。莊與胡的觀察，補充了後來柯志明與翁仕杰（1993）對臺灣農民分化研究的觀點——簡單來說，由水稻栽培的家庭農場演變而來的「半農半工」家庭的確是重要的生產單位，但是我們不能單從生產關係、生產作物商品化程度、雇工性質等要素來認識這些家庭的生命史，需要考量的是家的意識形態、世代乃至於性別如何牽動家庭型態的變革，並且進一步形塑臺灣本土的資本主義發展途徑。

和莊英章與胡台麗在臺灣中部農村的觀察不同的是，屏東客家農村因為水源保護區政策的限制，少了農地小工廠的發展條件，而有著不同西部其他縣市的工業現代化經驗。如同第二章許多報導人經驗所示，稻作衰退後迎來檳榔樹的繁榮，創造出一批向上求學後離農發展的中壯世代，許多青壯年選擇從事公教職業，或是到中鋼、中油等國營企業工作，家中的檳榔園則主要交由上一代父母照顧。因此，檳榔的景觀，和西部各地的農地小工廠雷同，但以不同的形式指向臺灣近代工業現代化的政經變遷。在我進行田野工作的當下，當年離鄉的青壯年紛紛到達了退休的年紀，不少人從工作崗位退下後，從上一代接手檳榔園圃，正著手改造

doi:10.6342/NTU202601203

園圃的環境，摸索出適合老後餘生的生活步調和空間。然而，隨著時代的輪轉，這些人所重組和預計重組的家，已經不是胡台麗和莊英章筆下的聯合家庭，因此，有必要追問的是，由這些回流人口所構成的家是甚麼樣的家？和他們的父母輩的家庭理想有何差異？他們內部之間又如何因為性別、工作經驗等差異，而有著不同的家庭安排期待？

就如屏東檳榔園圃植被的參差多元，參差的園圃也照映出當代家庭的多樣性：隨著傳統脈絡的地緣和血緣組織沒落，當代的家透過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產生空間上的重組，成員比起過往更具流動性，可以在家屋、土地上不斷進出。不過，在以上的過程中，家並沒有從社會中消失，而是在其社會意義上發生了轉變。相較於過往以血緣、親屬原則及人際間權利義務關係為核心的組織形式，當代的家更常作為個人生命經驗與情感的承載節點（黃應貴 2014）。因此，當代的「家」不再有單一範式，無論是象徵漢人社會傳統的父系大家庭，又或者是象徵現代性的核心家庭和折衷家庭，都已經沒辦法回應當代多變的新自由主義化政經條件，亦沒辦法展現這些經歷臺灣政經鉅變的人口返回農村後深具開創性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經驗。在接下來的故事中，我嘗試從檳榔園的生活群像，勾勒出屏東農村家庭正在發生的改變。

在我分析檳榔與家的關係之前，我想先從英梅自身，還有她家伙房的故事出發，點出傳統父系家庭瓦解的內在的動力與掙扎，以及逐漸發展為主流而受到嚮往的家庭型態——「退休夫妻戶」。這樣的家庭型態，不但呼應了檳榔園圃存續的條件，更形塑著屏東平原的農村地景。

一、檳榔園與豪宅並存的農村地景

1970 年代之後，英梅家和許多屏東的家戶一樣，把水田變成檳榔園。檳榔園收益驚人，比農地工廠還要賺錢，這些錢讓她們可以在橫屋最外圍加蓋出兩層樓

doi:10.6342/NTU202601203

的透天厝，也讓包含英梅在內的同世代獲得資金向上求學，接著就能離農。現在兩層樓的透天厝和伙房人去樓空，只剩她、患病需要長照的姊姊與高雄公務員退休的大弟。她們是少數返回／留在伙房的人，即便早已分配過家產、各自照顧園中檳榔樹，但過世的母親欠下的醫療債務，讓他們不得在分家過的檳榔園中栽培經濟價值較有前景的可可樹以償還債務。可可需要投注相當多的勞動力，上世紀跟隨稻作經濟一同瓦解的聯合家庭被重組了起來，兄弟姊妹共同分工、分享可可的生計——小弟負責田間工作、英梅負責加工，而小弟負責銷路。在這個聯合家庭中，英梅成為了家長，負責協調兄弟姊妹之間的事務。

人去樓空的伙房，如今被可可的加工設備填滿，空氣中瀰漫著發酵的氣味，而家庭內部的矛盾也隨之逐漸發酵。住在高雄的大弟阿堂與弟媳，原本只需在檳榔產季經常往返高屏，園圃收入也能自行保留；但可可栽培加重了阿堂的田間勞務，須花更多時間定居屏東，收益卻流向長年定居台北從事跨國貿易業、肩負母親醫療債務的小弟。這樣的分配使得一向溫和的大弟愈來愈常向英梅發脾氣，甚至揚言要砍掉可可樹、補上檳榔，再把戶籍遷回高雄，和屏東的家分離。

作為姊姊的英梅，認為是弟媳在暗中慫恿，才讓性格溫馴的阿堂站出來反抗，破壞了兄弟之間的情誼，造成家庭破裂的危機。的確，英梅的弟媳秀香時常向我抱怨先生過度勞動、收益卻給台北小弟一家繳貸款，所以持續和兒子合作說服丈夫放棄栽培可可。儘管如此，阿堂仍覺得自己不能貿然決定園圃的生計，一方面必須顧及小弟先前在母親照護上的付出，而主動違背自己的經濟角色、分化兄弟的家庭關係也有違家族倫理。有一段時間，阿堂的怨言明顯減少，英梅解釋說，那是因為前陣子祖先託夢給堂妹婿，警告家人應該團結避免衝突，大弟聽聞後特地到廳下上香。英梅猜測，阿堂或許是因為羞愧才收斂了情緒，顯得比以往冷靜。然而過了一陣子，阿堂仍時不時在 line 的家庭群組中表示自己打算結束可可栽培的心聲。由此可見，來自祖先的象徵性權威，還有傳統的家族倫理已逐漸失去約束的力量。

doi:10.6342/NTU202601203

隨著爭執一再上演，英梅的內心也悄然動搖。她體悟到，自父親離世、母親生病後後，自己被推上家長的位置。為了照顧長期生病的母親與姊姊，並協助其他弟弟安排人生大小事，她幾乎沒有餘裕規劃自己的人生，更在不知不覺中犧牲了青春。如今，當周邊同齡人開始享受清閒的晚年時光，英梅卻日復一日地承擔各種家族勞務和可可的加工，協助兄弟償還債務。所以當英梅看見弟弟阿堂如此任性地拒絕承擔家庭分工的責任時，也意識到自己同樣有權拒絕某些理所當然地加諸於身的義務。

於是，已步入老年的英梅開始渴望起愛情，著手研究了網路上的中年交友管道，打算跟隨有經濟能力的丈夫搬到新的家，設想有了婚姻關係就不用擔負原本的家庭責任。當我問起為何想要尋找伴侶，英梅和我說：

> 很多人年輕都覺得自己一個人很好啊，我以前也這樣覺得。到了老了才知道，沒有結婚真的不好，尤其到了老一點如果生病就完蛋了，你才不用指望那些兄弟姊妹啦，如果他們有自己的家庭，才懶得理你了，生病真的就完了。你看醫院做手術，出來會問說誰誰誰的家屬在嗎？沒有人就麻煩了。(20240303 田野筆記)

事實上，這段敘述反映出漢人女性對於老後處境的焦慮。在漢人社會中，女性預期透過婚嫁成為另外一個宗族的成員，老年生活受到對方宗族成員的照顧，死後成為夫家子孫祭祀的祖先[68]。像英梅這樣未曾婚嫁的女性，其老年與身後的位置難以被漢人親屬制度容納，常被原生家庭視為額外的負擔。

但是，英梅的焦慮亦不完全來自漢人文化的傳統觀念。她既不渴望也不可能進入一個子孫滿堂的大家庭，而是渴望一段「夫妻關係」。她認為夫妻是老年生

[68] 關於漢人社會的親屬制度以及未婚女性死後安排的詳盡討論，可以看焦大衛（David K. Jordan）的經典作品《神．鬼．祖先：一個台灣鄉村的民間信仰》(2012[1972])。

doi:10.6342/NTU202601203

活的依靠，需要有丈夫陪伴經營老年生計、共渡長照生活。隻身一人的老年生涯讓她感到迷茫與焦慮，但要從現實生活中找到伴侶不容易，才會到網路上尋求潛在伴侶和希望。

老年生涯想像的成形，也與隔壁鄉鎮內埔鄉的地景變化相關。這樣的地景轉變說明了，英梅對伴侶關係的渴望，並非單純由家庭內部的衝突所引發，還受到一種逐漸主流的生活方式與居住安排所召喚。

內埔鄉自古以來就是屏東平原的商業集散地，商業機能相當完善（李文良 2019）。近年來，由於鄰近快速道路和縱貫公路，內埔可以更快速地連結到周邊的醫療設施，以及更遠一些的屏東市區和高雄都會，因此成為一個城鎮和農村交界的區位，引來建商投資新建案。這些緊鄰農地的低樓層住宅或精緻農舍，外觀設計時尚，搭配便利的商業與醫療設施，為英梅提供了一幅「兩老生活」想像藍圖。在她的構想中，未來可以與丈夫搬進內埔的透天厝，買菜、料理只需步行即可完成，不必再騎著摩托車跨鄉鎮採買，同時又能與原生家庭保持不遠的距離。

有一次，她在路途上向我指出自己理想中的建案，案件透天樓高三層，要價上千萬，偌大的看板上主打「美式別墅，附加開心農場，免奢侈稅」，在地人都知道這些超出屏東鄉間正常價位的建案，瞄準的是外地，特別是高雄都會區的退休夫妻。在田野中，我也遇到許多本地和外地移住的退休夫婦。這些夫妻誕生於戰後嬰兒潮，享有 1970-1990 年間台灣經濟奇蹟的紅利，從穩定的工作退休、小孩相繼成家後，他們將早年積累的財富投資到老年生活，透過購屋或翻修老家打造退休生活空間。從內埔新建案的空間設計，以及各類以老年生活為主題的報章雜誌論述中，可以看出「退休夫妻」所想像的理想老年安排，不僅是農村與城鎮交界的低密度田園生活，更強調與子女分居，在日常生活節奏與經濟活動上維持自主性。

英梅家庭內的衝突，以及內埔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建案，共同展現出我在屏東農村中觀察到的家庭型態轉變：客家伙房裡的父系大家庭瓦解，脫離正式職業

doi:10.6342/NTU202601203

的退休夫妻戶或獨居戶成為主流。事實上，這樣的現象不僅見於屏東農村，根據衛服部調查[69]，無論是鄉村還是都會區，都有越來越多熟齡人口（55 歲以上，網路上又暱稱為 X 世代）希望退休後與子女分居，且同樣的現象在人口老化嚴重的日本更加明顯（Platz 2011）。在戰後，三代同居是臺灣和日本理想的現代化家庭型態，其折衷了傳統家庭制度與西方核心家庭的特性，既能回應工業都市化的社會變遷，又能保留傳統的親屬倫理。但是，在三代同居的家庭中，老年人通常被當作依附於家戶的受照護者而鮮少受到充分的討論，更鮮少作為家庭制度變革的主要行動者。然而，隨著上世紀推動臺灣經濟奇蹟的中堅世代從工作崗位退下，主動與年輕子女保持距離的年長獨立戶越來越普遍，而這樣的新型態家庭有待我們進一步探索。

若要了解屏東退休夫妻與年長獨居者構成的家庭，檳榔園圃是個相當合適的觀察地點。由於檳榔所需要的勞動力密度低，相當適合從正規勞動市場退休的社群，現在他們已經構成了屏東檳榔產業最主要的勞動單位。早在 1970 年代，Cohen （2016[1976]）就以美濃菸草業的例子告訴我們，在稻作逐漸凋零的農村一端，種作的選擇會驅動著不同的家庭生命史與人生選擇，既影響大家庭瓦解的速度，又開展出異質的家庭型態。同樣地，在當代屏東平原農村的脈絡中，檳榔經濟亦相當關鍵地與退休人士的家庭安排緊密相連。可以說，農村人口高齡化、家庭類型的轉變和當代屏東檳榔經濟是相互交織的事件，而遍布屏東平原的檳榔園和高級透天也是相互呼應的當代農村地景。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樣的家庭與檳榔之間的關係呢？表面上看來，這似乎呼應了臺灣農村研究的主流敘事：隨著臺灣工業都市化，農村人口大量外移，居民逐漸老化，年邁凋零的農民將農地種作轉變成粗放照顧的作物，又或者是連同農地和房屋出售興建高級農舍，藉此換取都市代際再生產的機會（Tsai 2019）。

[69] 根據衛福部 2017 年和 2022 年的抽樣統計，55-64 歲及 65 歲以上的夫妻，不和子女同住的比例從 15.61%上升到 19.16%。另外，55-64 歲及 65 歲以上者希望與子女同住的比例也從 55.45 下降至 51.85%（衛生福利部 2024）

doi:10.6342/NTU202601203

然而，英梅和那些購買昂貴退休宅的社群經驗卻提醒著我們，如此「農村人口老化」的普同敘事，往往遮蔽了個體在城鄉間位移的動態和複雜的生命細節。如果我們只停留在家庭型態學的描繪，難以擴展我們對於農村老年生活的想像、看見栽培檳榔的人們如何在其中生活、想望與安身。

為避免落入農村人口老化的簡化敘事，接下來我將透過其他 1950-1970 年間出生、準備邁入或已經進入退休階段的社群生命史，探討檳榔園圃所支援的家庭佈署與各種老年的生活圖像，從中了解屏東檳榔地景在集體層次上所反映出家的意義轉變，以及個體層次的生命際遇伴隨的思考與情感。然而，人們的性別、婚姻狀態乃至於階級因素都會影響他們與檳榔園甚至檳榔樹之間的關係。因此接下來的分析中，我將分別從已婚的女性、已婚男性，以及離婚喪偶的人依序討論檳榔與家的關係。

二、女人與檳榔

除了英梅與弟弟之間的不愉快之外，英梅家中更主要的矛盾，其實發生在女性之間—從過去的婆媳，到如今持續上演的姑嫂與妯娌，這些衝突都正催化著家族的分化。在漢人社會相關的影視和文學作品中，女性彼此之間家務上的不合與勾心鬥角，常被指控煽動、破壞大家庭統一的和諧。然而，人類學的研究說明了這些發生在女性間的衝突，往往隱含著家族結構中兄弟間競爭與分裂的可能性。妯娌會比較彼此與子女得到的待遇是否公平，並透過各種行動來維護自身與「房」（自己、丈夫與未婚的小孩）的利益。相對地，作為丈夫的兄弟們，則為了維持兄弟和諧與經濟合作，試圖壓抑女性的不滿與分裂的危機；但當摩擦長期積累，最終仍導致兄弟間的對立與分家（Cohen 2016[1976]; Freedman 1958）。

即便漢人研究指出了女性間的衝突，是父系家庭中男性間緊張關係的具現，但這樣的家庭圖像中，女性的情緒、選擇與行動被化約進父系親屬結構之中。她

doi:10.6342/NTU202601203

們必須透過生育並維護丈夫與子女的利益，才能成為「完整的人」。女性的行動多半被解釋成為了家裡的其他成員的生活福祉、而非出於自我意志。也因為這樣的集體處境，女性之間的關係經常被描繪成為了競奪資源和男性的親密連結而互相敵對，其中婆媳之間尤其緊張——女性期待透過「媳婦熬成婆」的過程來取得權力，最終安身在父系的家而不再是外人（Wolf 1972）。

但是，當代檳榔園圃中的女性，可能會呈現出和上世紀漢人研究不太一樣的圖像。我在田野中遇到的女性大多是與英梅年齡相仿的已婚女性，她們年輕時嫁入夫家，正好經歷了社會的劇變：當時是臺灣工業都市化與屏東農業從稻作轉向檳榔的年代，她們的丈夫多半在婚後脫離農地，平日白天前往周邊城鎮或高雄工作，田裡的勞務與家務便落在她們身上。在那段臺灣經濟迅速變化的年代，她們與夫家其他女性共度大半日常，或者在城鄉之間來回移動，支撐起農村的生產與家庭運作。

在我認識她們的時候，已經從早年受家庭勞務綑綁的狀態步入花甲之年，在上一代相繼離世之後，迎來「媳婦熬成婆」的年齡階段。但令人訝異的是，這些女性雖有著不同的生命軌跡，卻擁抱著類似的未來家庭願景——盡可能自力更生的老年生涯，當一個和兒子的家庭保持距離的媽媽／婆婆。在這樣的願景與安排下，檳榔園便成為相當重要的經濟活動。年輕時綑綁她們勞動力的夫家園圃，在這個年齡階段有了意義上的轉變，讓她們比男性更堅定地主張在農地上保留檳榔樹。那麼，隨著年紀的增長、生命階段的遞移和家庭格局改變，檳榔的經濟在她們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甚麼轉變？

接下來，我想要以兩個不同年紀的女性為例，從她們的經驗探討檳榔樹的經濟如何支持老年的生活安排，而檳榔園所連結的生計活動又如何回應她們身為女性的人生際遇。兩個女性分別是年紀稍長、一生都在農村度過的阿嬌，另外一個則是前文提及、英梅的弟媳秀香，她早年和丈夫移居高雄，準備要從正職工作退休。她們的故事，一方面訴說了女性集體的抉擇如何驅動當代屏東農村乃至於東

doi:10.6342/NTU202601203

亞社會家庭型態的改變，也展現了檳榔經濟高齡化背後涉及的高屏城鄉結構和異質的生活方式。

（一）阿嬌

2024 過年前幾天的早晨，阿嬌找我來廟裡聊天。她見到難得的年輕人，想要問問有沒有女朋友？她打開 line，大頭貼合照的是念大學的孫女，如果我沒有女朋友的話可以介紹介紹。阿嬌和許多田野中的女性長輩一樣，小孩全部在外，會和我細數每一個子女定居在哪、在哪裡讀書、作甚麼工作，分享中流露出一種成就感。過幾天兒女要回屏東過年，她會自己殺雞開一桌，過完年到菜園摘蔬菜分給每個兒女。

七十多歲的阿嬌，和許多同齡女性一樣，早年沒有獲得向上念書的機會，年紀輕輕就被媒人介紹來這個村子，嫁給一個公務人員。公務員丈夫每天往返隔壁鄉鎮上班，沒辦法照顧農地，於是夫家家務和農地的主要勞動便落到阿嬌身上。婚後她和丈夫育有四個小孩，夫家並不富裕，單靠公務人員的薪資難以養育四個小孩，還好當時檳榔價格相當高，靠著阿嬌所賺取的檳榔收益，順利養大了四個兒女，每一個都取得大學的學歷，並且在阿嬌的期待下全數離農、在都市就業。

隨著公婆離世、先生退休還有子女相繼離開屏東到外縣市成家，阿嬌夫婦轉變成屏東農村中典型的家戶型態——子女不在家的退休夫妻家庭。家庭規模的縮小之後，她大量減少家庭中的勞務，也不須為了養兒育女而擔憂經濟收益，所以阿嬌仍然保留住園圃中價格逐漸下跌的檳榔樹。她說：「現在家裡若有小孩要養，就不能只種檳榔跟香蕉，這樣會入不敷出。但我們兩夫妻現在這樣就剛剛好」而且隨著退休先生加入檳榔園的工作，兩人逐漸發展出穩定的田間分工，本身勞動需求不高的檳榔園變得輕鬆，阿嬌空了許多的時間和體力餘裕在檳榔園中兼作各種她喜歡的香蕉品種，林下還有養了一窩雞，雞的排泄物灌溉了檳榔園和她菜園

doi:10.6342/NTU202601203

裡的蔬菜。另外，身為料理好手的她還製作客家米食賣給村民或到市集擺攤，每年端午節都會累積不少外快。光靠這些林林總總的兼差，阿嬌一年就賺進屬於自己將近數十萬的收入，不僅可以支應牙科、復健等醫療費用，還能運用農閒時間報名屏東科技大學的樂齡學院——即便是大學專辦給年長者的課程，而不是一般的大學課程，但阿嬌告訴我自己終於有機會體驗大學校園生活，彌補年輕時沒有辦法繼續念書的缺憾。

阿嬌的孩子們也曾經想過不要再讓媽媽辛苦，一個兒子把她接到都市方便照料。阿嬌說：「我去過土城跟台北跟兒子住幾天，住幾天我就跟她們說我哪受得了？他們公寓大樓實在很難習慣，我連他們家的鑰匙都不會用喔，很好笑！早上出來散步不知道怎麼回家。」對於阿嬌來說，屏東有她熟悉的活動空間和社會網絡，若隨兒女搬去都會區會需要重新適應。更重要的是，屏東農村多了生活的自主性，不需要考量小孩的工作與日常起居，可以自由安排生活步調。

在此，我們已經可以觀察到，檳榔樹在阿嬌的晚年生活扮演了相當重要角色：檳榔樹的栽培不耗工，再加入退休丈夫的奧援後，能釋放時間與身體的流動性來從事多元生計，這些多元生計的收益主要流向自己，維持阿嬌經濟生活的獨立。這麼作，也讓散落在各都會區的核心家庭子代同樣具有獨立性，不需要在都市住房、育兒、教育等私有化服務之外多負擔父母的照護費用。阿嬌就和我說：「我覺得這樣的生活很好啊，我和小孩各過各的，因為他們賺他們的，我們也有自己的收入，他們不用養我們。」

許多同齡女性都和阿嬌透露出類似的心願，她們對於老年家庭生活的想像，並不是漢人社會典型的「三代同堂」，而是希望經濟活動、生活軌跡都能和小孩保持距離，這樣的分離並不會讓她們覺得自己被拋棄，反而帶來更多關於老年生活的想像，無論是透過生產活動保持身體的持續勞動和收入的自主性，又或者是走出家門參與各種社群網絡。

值得注意的是，阿嬌努力保持兩代人經濟和居住的獨立，更是一種對自己女

doi:10.6342/NTU202601203

性身分經驗的投射。她說：「我以前真的做得太辛苦了，小孩可以不要作農就不要作農。我是希望媳婦不用像我以前那樣做那麼多事情，也不用分工要照顧。所以大家都沒有婆媳妯娌問題啊，過年過節見面感情多好。」在過往三代共居的生活，男性較有可能被釋放出農村從事其他職業，而家裡的各種隱形的照護責任幾乎落在女性身上，造成女性之間關係的緊張。所以當婆婆離世、兒子相繼到外縣市成婚，阿嬌並不期待自己「媳婦熬成婆」，而是有意識地維持獨立生活的能力，避免早年加諸於自己之上的壓力繼續複製到下一世代。

阿嬌的經驗，讓我們捕捉了東亞社會家庭型態轉變中的「性別化」動力：日本的家庭研究裡，同樣觀察到老年女性傾向和子代家庭分居，且意願比她們的丈夫更加明顯。其原因之一是婆婆認為媳婦不一定能像傳統的日本折衷家庭那樣分擔家務，反而會因為同居生活的家庭空間配置、家務勞動的分工與日常生活習慣產生摩擦；另一方面，她們也出於同理，期望媳婦能夠藉由獨立的居所，自在地維繫與原生家庭之間的互訪與連結（Platz 2011:262-263）。整體而言，老年世代留守農村、小孩成立核心家庭散落在都市的現象，雖然可以歸因於政治經濟結構的變化，如東亞戰後都市化或新自由主義下國家照護政策的安排等。然而，這樣的變革也可能部分來自於不同世代女性的自我意識，和彼此之間的同理所引導出來的結果。

（二）秀香

秀香是英梅的弟媳婦，年輕時曾在工廠上班，在同事的作媒下，秀香1980年代嫁到我的田野村莊中。十多年前，秀香婆婆癱瘓，丈夫阿堂提早從高雄市政府的公務退休，一人接手三甲的檳榔園圃，園圃中還有900棵可可，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屏東，和秀香分隔兩地。周末若剛好遇到檳榔、可可農忙，秀香就會帶著早餐、涼水從高雄騎機車到屏東幫忙農事。兩

doi:10.6342/NTU202601203

三年後秀香也要退休了，她正在思索著老年後的生涯……。

1960 年代出生的秀香，是一個細心料理家務的人，廚房、客廳到房間一塵不染，還會隨著丈夫和兒子的身體健康狀態調整料理菜單，難以想像她是一個有全職工作的女性。而穿梭在各種勞務之間的能力是嫁來夫家後養成的：她的娘家沒有農地，夫家卻是一個有許多土地的大地主。她一嫁來夫家時才剛從稻作轉作成檳榔，先生凌晨割完檳榔後會開車到高雄上班，秀香除了負責全家大小的伙食外，還和婆婆一起接替丈夫的任務到田裡工寮剪檳榔，因為土地面積大，檳榔數量也多，她會一路忙碌到中午，回家休息片刻後還要作電子零件的家庭代工貼補收益。為了要讓所有工作都銜接上，她會一早就先煮好白飯和一鍋湯，中午再回來準備配菜，太忙碌而忘記煮飯時，婆婆就會擺出臉色表示不滿，所以秀香必須要隨時保持清晰的腦袋，避免遺漏任何一個工作。

大兒子升上國中那一年，秀香和先生為了讓孩子到高雄念書，到高雄市區買房搬了過去。秀香習慣過去被勞務填滿的日常，搬去高雄那年，突然脫離了屏東家戶到田間奔波的勞動規律，一時間難以適應。但是搬離屏東之後，她找一份正職工作，賺取自己的收入，不必再為那麼多家人料理三餐、整理家屋，只需要在周末返回屏東幫忙檳榔園的農務，就可以回去高雄。這樣的生活的確讓她多了喘息的空間，也逐漸習慣了高雄的步調。當我問起她，退休後會不會想要回到屏東農村？秀香和我說自己比較喜歡屏東的老家，在那裏打開門就能看見藏青色的大武山。但是她思考了一下又和我說「但如果回來的話，我會很累」。她想到回來老家生活需要和小姑們共處，光是過年期間回夫家共用廚房、分攤家屋清潔就經常發生衝突，更何況是回來生活呢？所以秀香還是希望兩夫妻退休後可以待在高雄養老。

但就如同前文所說，夫家為了償還債務而投入可可栽培，丈夫阿堂提早退休後大部分的時間都住在屏東照顧園圃，只有週四到周六會固定待在高雄，當秀香

doi:10.6342/NTU202601203

的兩個兒子相繼到外縣市工作、服兵役，秀香頓時失去原本的家庭生活節奏，陷入了一個人生活的憂鬱狀態，還好那個經歷過產後憂鬱的外甥女陪秀香講電話，才讓她心情舒緩下來，逐漸接受了一個人獨處的生活型態。就在兒子各自脫離了原生家庭之際，秀香也開始思索著自己退休後下一個人生階段的規劃。特別是她丈夫年紀越來越大，逐漸出現勞動傷害，已經不堪負荷可可的栽培工作，若缺少秀香的投入根本沒辦法持續下去。於是秀香希望能發展出兩夫妻較適合的退休生活節奏和營生方式。

這幾年秀香在同事的邀請下加入了高雄某保健食品傳銷公司[70]，裡頭的商品強調對身體長期的養護，改善了丈夫因為可可栽培造成的腰傷和腸胃問題。身體健康的維護，回應了秀香即將步入老年的健康焦慮：她不希望自己和先生會像婆婆一樣因為身體出狀況需要長期照護，造成下一代的負擔，所以需要趁早養護身體。更重要的是，傳銷組織投入的資本門檻相當低，主要依賴的是社會網絡的擴張，秀香計畫把傳銷事業經營成退休後的收入來源，搭配檳榔的收益，形成自力更生的老年退休生活，她說：

> 我是希望這個事業做起來家裡不要再種可可，我們就種回檳榔，先生也就不用那麼忙，他做到快要倒下，而且我也是希望我們兩夫妻可以多保養身體，也多賺點自己的收入，未來不需要勞煩小孩長照，不然我們像婆婆一樣生病，小孩會非常辛苦，我做起來後，這個位置還可以給我們家小孩繼承，變成他的事業。

換言之，秀香和阿嬌呈現出類似的觀點：檳榔的勞動力門檻低，又不需要像可可一樣擔心產銷的問題，對於難以擴張勞動力和營銷能力的業餘老年社群來說，更

[70] 傳銷公司是俗稱的「直銷」，成員會邀請新成員成為「下線」購買產品，賺取利潤，為了要增加利潤，加入的人會持續向外擴展下線。

doi:10.6342/NTU202601203

能保障晚年生活的穩定。不僅如此，退休後的夫妻合作照顧檳榔園，釋放出許多生活時間和空間的自由，讓秀香都能夠彈性安排老年生計，不會被綑綁在農村的園圃中。

傳銷組織不只是秀香貼補退休金和檳榔收益的生計管道，還創造出老年的社交網絡和社群生活。進一步認識秀香的傳銷系統，便能觀察到裡頭幾乎都是 55 歲以上的已婚婦女，這些女性通常是透過職場牽線，有些會邀自己的丈夫加入，但主要的成員仍以女性為主，她們透過直銷建立都市的社交網絡，也為自己賺取額外收入，打算將其當作退休後的老本。在幾次的拜訪後，我發現這個傳銷組織有許多和銷售無關的聚會活動，女性成員利用碎片的時間聚會、分享近況，有時也相邀到各地旅行。她們的聚會並不像其他的傳銷系統一樣發展出階層關係，而是重視女性夥伴之間對等的心情交流，透過這些交流磨練傾聽與敘說的能力。這樣的能力可以精進她們行銷口說能力、拓展事業版圖，也無形中讓過去不善於和外人談話的女性更有自信。

秀香在傳銷體系中最要好的朋友是比她早加入的彩雲，彩雲和秀香有著類似的背景，很快便成為交心的朋友。她們都是客家農村出生的女性，在不同的時間從封閉的農村會網絡來到都市，從零開始建立自己的社會關係，她們要同時兼顧職場，又要照顧都市家庭中的丈夫、小孩，還需要學習與丈夫家的公婆、妯娌們共處。像是彩雲嫁給閩南家庭，和婆婆間有著難以跨越的語言和習慣隔閡，在科技廠工作的丈夫是溝通橋樑，但丈夫並不了解彩雲的煩惱，彼此關係也相當緊張。對於彩雲來說，早年的人生中無論是職場或是家庭，都是陌生且壓抑的環境，這樣的遭遇讓彩雲變成一個缺乏自信、難以主動開口說話的人。但在加入傳銷組織之後，她透過經驗的累積，學會談吐技巧和與陌生人溝通的能力，不再懼怕於發表自己的想法，甚至改善了自己和丈夫的關係，因此彩雲說她在傳銷經驗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踏實與身為女性的自信**」。遇到背景相像的秀香，彩雲告訴我：

doi:10.6342/NTU202601203

我看到秀香，我就看到自己，我們這些客家女人做媳婦總是要替別人多想、多服務別人一些，卻忘了要如何在照顧別人的同時也照顧自己。

秀香和我說，她現在不只能讓家人維持身體健康，也在工作和家庭之外找到合拍且能了解自己心情的朋友，當丈夫和孩子都不在家的時候，這群朋友便能給予許多情感的支持。我們可以觀察到，秀香和彩雲加入傳銷組織所發展出來的個人認同，主要建立在女性傳統的角色上，包含在家庭中分配保健食品照料家人身體，成為一個理想的家庭照護者，又或者是學習圓融的夫妻相處之道。但與此同時，傳銷組織也允許她們探索那個被傳統家庭所壓抑的自我，例如：透過事業挖掘自己的潛力，還有暫離家庭擴展社交空間，在相似背景的女性之間尋找共鳴。

從以上阿嬌和秀香的故事我們可以得知，檳榔樹釋放了勞動力和工作時間，也將女性身體、時間、經濟活動，以及社會關係從傳統父系家庭中解放出來，形成一定程度的獨立自主性。值得注意的是，這兩位女性嘗試建立的獨立性涉及三種不同層次的親屬關係，一是夫妻，二是代際關係，最後是父系大家庭。在家庭規模縮水之後，檳榔經濟形成退休夫妻互補的分工和共同的生活節奏，女性可以向外尋找額外的收益並發展自己的生活空間，不受丈夫約束。另外，檳榔的低勞動需求，降低了退休夫妻對父系家族成員的勞動力依賴，也延長了老年工作年限，使夫妻能保持與原生家族、子女核心家庭在經濟、照護，甚至是居住空間的獨立性。對於女性來說，這三層次的獨立性不僅是要保障自己與子代核心家庭的福祉，更來自於她們身為女性長時間的掙扎與對主體性的渴求。

另外，相較於阿嬌主要的社會網絡都圍繞於屏東的農村，早年移居高雄的秀香，已在都會中發展出一組脫離農村、亦相對獨立於丈夫與子女的社會網絡。她的案例進一步說明，檳榔經濟所支持的跨城鄉生活，不只讓女性得以跨越父系家族的束縛，也跨越了地方性的組織和資源分配方式。在許多客家庄之中，宗族與宗親組織是地方網絡的核心，也是人們獲得資源的組織節點，所以宗族對於個人

doi:10.6342/NTU202601203

性別化的規範，也影響了他/她怎麼與其他社會組織互動。在這樣的條件中，女性若要找尋農外維生管道、參與民間團體或地方政治運作，往往難以脫離父系家族的影響──無論是提供協助或造成阻礙。但是秀香的經驗表現了屏東客家庄的女性如何藉由檳榔經濟搭配的夫妻生活步調與城鄉生活型態，繞過「性別的在地性」（姜貞吟 2020），獲得自己營生的資源管道和社會支持。

即便如此，秀香的經驗或許也進一步指出家庭型態的偏好如何帶來農村地方社會的變化：當退休夫妻得以透過低勞動密度的檳榔經濟鬆動原本與父系大家族及農村社會的連結，其實形成一種可在城鄉之間彈性移動且相對原子化的家庭型態。需要留意的是，這樣的家庭型態又被這些夫妻自身，還有當前的媒體描述成所謂的「假日農夫」，亦即只有在農外職業的休假時間來到鄉村經營農業活動的移動式家戶。即便假日農夫表面上帶給人們一種田園懷舊想像，但就如同秀香所展現的：假日農夫夫妻的社會網絡通常是建立在跨越城鄉界線、不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鬆散連結上。即便是本地出生、透過地方鄰里媒合的夫妻也可能逐漸淡化與農村社會之間的連結，若是外地移住的夫妻更有可能只會在都會和農村園圃之間來回移動，完全不參與農村社交活動。可以預期的是，隨著這類脫離父系家族的家庭比例增加，農村的社會生活樣貌與公共領域的運作也將逐漸變化、重組。

三、男人與檳榔

阿嬌和秀香的故事，和我們展示出檳榔經濟如何成為女性年老後多線營生管道開展的線索。但是，檳榔經濟和檳榔園圃對於男性來說有不太一樣的意義。

首先，在漢人的親屬制度中，男性通常是土地的繼承者，對土地的照顧和對家的照顧是共伴的責任，他們肩負著維持作為「家業」之土地運作，甚至是保持其美觀與體面的責任。即便當代宗族的影響已經減弱，仍有檳榔農告訴我，若檳榔園長期缺乏照顧而雜亂無章，會引起父母輩的指責，也會引起宗親的議論甚至

doi:10.6342/NTU202601203

是影響繼承的權利。因此，檳榔園的維護並不僅僅是出於經濟考量，更承載著家的倫理與義務。

再者，就如同阿嬌和秀香的先生所示，相較於女性，男性在年輕時更有機會進入穩定的農外職業;在客家庄的脈絡中，上一代亦偏好投資年輕男性完成學業，進而投入公教和公營企業等具有穩定薪資與退休制度的工作。這些男性在退休之前，會利用假日回鄉兼顧檳榔；退休之後，若沒有債務等經濟壓力，便可以將退休金作為主要的生活支出來源，檳榔收益雖也補貼生活開銷，卻不承擔主要的營生功能。相較於女性透過檳榔支撐多重經濟活動，對這些男性而言，勞動門檻低的檳榔照顧，更像是退休後新生活展開的依據，其園圃的活動也貼近不以維生為目的的「嗜好性耕作」(引自蔡侑霖 2017)。

在長時間與報導人共度檳榔園內的生活時光後，我逐漸意識到，對於這些準備步入老年階段的男性來說，從上一代承接而來的檳榔園不僅轉變成退休後的「開心農場」，還會因為生命軌跡而乘載多重意義。檳榔園是退休生活的基地，也是家和自我的延伸，不是由單一作物種所佔據的經濟空間，更不能被化約為廢園轉作政策中的以面積來計算的平面空間。

首先，我們需要認識一下置身於檳榔園中的身體感受。大部分的果園栽培的是雙子葉果樹，需要透過修枝和藥劑來「矮化」樹體，以低矮的樹型增加農人採收的效率，也避免植物向上生長搶走結出果實所需的營養。然而檳榔樹不同，它只有一個頂端分生組織，隨著檳榔樹逐年生長，會在園圃在形成連綿、疊映的樹蔭空間，所以比起果園，檳榔園更像是樹林。但又與樹林不同的是，檳榔樹的羽狀複葉叢生於頂部，不會遮去所有的光線，也不會長出樹枝佔據軀幹周邊的空間，所以檳榔園是一個陽光充足又相當寬敞的空間。這樣的空間，創造出其他植物適合的生長環境，也給予人類一個比水田、果園都要大的活動空間。於是，許多農戶，特別是退休男性將林下空間轉化成生活棲地的延伸。

有一次，我在田野的村莊外圍發現一畝相當工整漂亮的檳榔園圃，園圃中有

doi:10.6342/NTU202601203

各種灌木、喬木和花卉。起初我將這個檳榔園誤認成一座草皮公園。後來才知道，這方園圃的主人是村莊中我鮮少接觸的獻章家。獻章才剛申請退休，偶爾仍要回公司幫忙交接業務，還沒有辦法專心照料兩分大的檳榔園。他與太太透過非正式的勞雇關係把檳榔樹園交給同村的老農民，但傳統的施作方式會灑除草劑增加效率，夫妻擔心土壤可能會被破壞而難以復原。後來他們將檳榔園包給割草班的朋友三哥，他們用檳榔的收益交換三哥的勞動力，雖不向三哥收租金，卻要求他必須以不灑除草劑、定期修剪草皮的作業方式養護園圃，檳榔園成為一個完全不用藥、可以散步和休憩的空間。

在檳榔園中央，憲章請朋友運一些砂石堆積出一條漂亮的石子路，也打造一方小型的砂質園地，過去這塊農地是適合種稻的黏質土壤，他們作出一個精緻的砂質小斑塊，可以種植適應砂質地的西瓜，旁邊還有一棵芒果樹、荔枝樹，檳榔園圃逐漸在他們的巧手下被打造成熱帶果園。但是和一般果園不同的是，憲章把果樹當作盆栽在照顧，也不打算販賣收成，所以與其說是果園，這個園圃更像是花園。

雖然憲章夫婦目前並不打算在老年時依賴檳榔園的收益維生，仍持續在工寮後方育種新的檳榔苗，檳榔苗和健康的園圃，為他們老年生活和家庭帶來多元選擇：一旦家庭遭遇變故，或著年輕人返鄉務農，新的檳榔樹可以保障收益；而檳榔樹與林下健康的園圃可以帶來轉圜空間，只要他們重新配置園圃生態和物種組合，就可以帶來新的營生管道，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

doi:10.6342/NTU202601203





圖 28（左圖） 獻章家的檳榔園圃

圖 29（右圖） 砂質土壤上的荔枝樹

雖然獻章目前的「半退休狀態」還不允許全面投入園圃活動，他仍在檳榔園中動工搭建一棟精緻的工寮，半開放的屋簷下放茶几、休閒桌椅，茶几上備有咖啡、茶葉，天氣好的時候，憲章夫妻會到這裡渡過優閒的午後時光，儼然就是一個小型的別墅。

事實上，憲章的經驗展現了「工寮」空間的多樣性：這個隱藏在園圃中心的小空間容易被農地的經濟功能所遮蔽，使人遺忘它除了提供資材存放和農間休息外，還可能作為農戶的日常生活空間。而作為日常活動空間運用的工寮，和接下來要談的退休男性經驗密切相關。

工寮大多在園圃深處，透過一條聯外道路連結到馬路，如同園圃心臟那樣的存在。每一個帶我進入園圃的農民都會邀請我參觀自己家的工寮，是我認識檳榔園圃的起點。起初我以為工寮是一種暫時性的空間，用以堆放農具或提供農民短暫歇息的空間，但是農民會像房仲業者帶人賞屋一般介紹工寮的格局（有時候甚至有一到兩個隔間）、齊全的設備如炊煮用品、過夜床鋪、夏季降溫系統，甚至有農民會在過年時為工寮張貼「五福符」[71]。就如同憲章夫婦一樣，工寮對他們

[71] 五福符是一種剪紙，六堆客家人會在過年前，張貼五福符在家屋的門窗上緣，舊時一般張貼五張，目的是祈求平安、除舊布新。

doi:10.6342/NTU202601203

來說是家屋的另外一個延伸空間，不是農忙中短暫歇息的暫時性空間。

在此必須短暫繞開主題說明一下工寮為何會如同家屋一樣「五臟俱全」。檳榔園大多距離農戶長居的家屋有距離，甚至在不同村莊。在檳榔被大家稱作「綠金」的 1990 年代，竊賊偷割情況非常嚴重，常有一夜之間整園檳榔被竊，一季收入虧空的事件。為了要防範偷竊，農戶需要在檳榔價格高昂的期間輪值顧守檳榔園。許多男性都在高雄都會區擁有正式職業，他們採收檳榔前會通勤高屏，晚上在工寮過夜，清晨割下檳榔後交給父母後再去高雄上班，工寮很有可能變成他們春夏兩季從都會區返回家鄉時最熟悉的地方。

但是顧檳榔的人總會短暫離開園圃，又或者是因睡著而沒有留意動靜，為了避免竊賊找到空檔下手，各個家戶想盡辦把把工寮營造成「有人在家」的樣子：例如 24 小時撥放收音機、為工寮點燈，又或者在工寮門口擺放一台腳踏車。



圖 30　放在檳榔園中塑造有人在工寮的腳踏車

現在的檳榔價格不比 1990 年代，小偷潛入檳榔園偷竊的案例雖偶爾上演，卻已經少了很多，鮮少檳榔農會像過去那樣長時間顧守在檳榔園，工寮的重要性不在像過往那麼重要。但是當這些早年往返園圃守護檳榔的男性年過半百，屆臨

doi:10.6342/NTU202601203

退休回到屏東老家，工寮的意義和功能開始轉變。

退休前夕，不少男性會緊鑼密鼓地整理園圃，並重新規劃、設計工寮空間，打算像憲章那樣把檳榔園打造成一個園藝空間，從園藝活動摸索出退休後的個人興趣、填補那些空間下來的時間，甚或還有人打算擴建工寮後搬進去。無獨有偶，許多日本同齡男性也在退休前後投入園藝活動，在家裡的院子或村莊打造出園藝空間，避免退休後突然斷裂的生活節奏。另外，日本男性和我的報導人一樣，年輕時獻身職場，鮮少時間待在家中，家屋空間的使用、配置主導權便落在太太手上，當先生退休後會需要和太太、小孩重新協商出自己的獨立生活空間，甚至是騰出一個新的空間。在日本，提供訪客暫居的和室空間，經常成為這些退休上班族的生活空間（Platz 2011:265）；在此意義上，工寮結合了日本社會中的和室和庭院的意義，接納了重返家庭生活的男性。

例如，任教於高雄市區國中的郭主任，在我與他相遇時正忙於採購建材，準備搭建一座可供日常起居的工寮，作為幾年後退休的生活空間。郭主任的父親是公務人員，在台灣各地輪調，所以他的大半人生都跟隨著父母在外縣市渡過：在臺北出生、高雄長大，成年後就業成家仍定居高雄。但是郭主任的生命並沒有完全脫離屏東的農村，國中的時候祖父將檳榔園交給了父母，周末和暑假跟著父母親回到萬巒照顧檳榔園，那時候檳榔價格非常高，他和許多同年齡的檳榔農一樣，因為家裡的檳榔創造的收益，填補了父親的公務員收入，讓自己和兩兄弟可以一路念書到大學和研究所。前幾年，他的母親也卸下了園圃的勞務，將田地交給郭主任和台南的兄弟，他們周末輪值回家照顧母親和檳榔園圃，郭主任逐漸熟悉了園圃的工作步調，發現屏東老家其實比高雄的家更讓他感到親切和自在。這幾年反覆移動的過程，也喚醒出他對萬巒老家的歸屬感，回鄉度過退休生活的慾望更加明確了。

在他人生的經驗裡，檳榔構成了老家記憶的週期性片段，那些片段除了有和家人共渡的園圃勞動經驗，還有五感編織的記憶。他告訴我，被社會撻伐的檳榔

doi:10.6342/NTU202601203

樹，每到冬季與春季的開花時節就會四處擴散香氣，清晨的時候香氣最為澄澈，從窗戶飄進他的房間伴隨他甦醒，在大武山下香氣飽滿的氤氳中跟隨父親進入檳榔園工作。檳榔花香的香氣非常深刻，是一股瀰漫在所有屏東客家鄉鎮居民腦海的氣味地景。氣味的地景貫穿郭主任的老家成長記憶，所以他和家人討論後，打算在檳榔香氣最濃郁的園圃中好好修建工寮，規劃在兒子考上大學不再需要他接送、供養，就從教職退休搬回萬巒的工寮中長期定居。

有時候，工寮少了家屋的功能性，卻成了更加私密、盛裝個人生命軌跡的處所。例如，比郭主任略長的鍾順泰，1990 年之後受到野百合學運的影響投入社會工作和地方社造。從上一代接手檳榔園之後，他把檳榔園變成一個實驗基地，搭建了有如工作坊一般的空間，在園圃中嘗試栽培了各種新興作物外還有過往農村常見的果樹和藥草，透過實體導覽和社群媒介向大眾推廣屏東客家人的生態知識；接著，他將工寮打造成和居住的家完全不同調性的空間。工寮裡頭堆放了自己參與社會運動和屏東公共行動的資料、旗幟、照片，另外他還製作書架，收藏那些對他生活哲學深有啟發性的全套漫畫書，檳榔園的工寮比家屋多了一種年輕氣盛的氛圍，儼然是一個以個人的生命經驗所打造出來的小宇宙，也是一個將自身的歷史妥善歸檔分類的小型資料庫。

無論是郭主任或是鍾順泰，都會將檳榔園和工寮的言談擴展到對家鄉土地的關懷。像是郭主任和我提到，他每周固定回萬巒的任務不只是要去照顧檳榔樹，還會去村內的「泉水窟」取水載回高雄，比起高雄的自來水，他更信任家鄉的地下水。泉水窟是大武山的伏流湧出的地方，流進了萬巒客家村莊的水圳。因為是伏流湧泉，泉水窟的水清澈沁涼，小孩會在溪邊戲水釣魚，婦女在水旁洗衣，因此成為聚落的公共空間。泉水窟在他心中連結了山、溪水、記憶和自己的身體，更是整個聚落的風水基礎。前幾年台灣旱災缺水，他從高雄回來發現泉水窟乾涸，這是從小到大第一次見到乾枯的湖泊，擔憂整個村子的風水都被破壞，趕緊聯繫村長，建議公家機關整治泉水窟，挖深地基，加裝馬達，保持水的流動。

doi:10.6342/NTU202601203

透過這些中生代男性檳榔農向我娓娓道來的故事，都讓我更能了解檳榔園所乘載的集體經驗。這群人的上一個世代不再耕作水稻，轉作了更適合兼業的檳榔，許多男性跟隨著父母的正職工作遷徙到城市。長時間居住在外地的他們，無論是對原生的家或是家鄉地方社會都有一定程度的斷裂，而檳榔園和其中的活動反而成為他們往返城鄉之間最熟悉的時空領域。所以當他們老年計畫返鄉定居的時候，檳榔園既是他們開啟後半段經濟活動的家產，也象徵了「家」本身，裡頭蘊含了個人與家人記憶的沉澱，甚至是對原生家鄉土地的重新認同。

四、另類的家：失婚者與檳榔

以上所提及的退休生活案例，大多來自經濟和身體健康狀況尚可的夫妻。他們不見得雙方都曾進入勞動市場，但大多是先生退休前有穩定職業、退休保險充足的階級。若子女工作穩定，自身亦沒有慢性疾病和長照需求，老後生涯算是相當平穩。然而就如同上述的案例所展現的，這樣的家庭型態通常失去和地方社會、傳統親屬體系的緊密連結，形成了對外在社會相對封閉的家庭單位。當人們年紀增長逐漸失去勞動能力或需要醫療照護，夫妻理所當然變成第一線的照顧人，或是照顧服務的購買者，若非不得已才尋求子女的協助。正因這樣的封閉性，造成了英梅對於老後生涯的焦慮，她不僅務實地擔憂醫療照護的問題，也擔心自己會因為沒有丈夫而落入孤獨的存在境地中。

那麼，我們可能會想要知道，其他與英梅類似處境的人如何在沒有伴侶的關係中生活下去呢？接下來，我想從其他喪偶和離婚的失婚人士為例，說明檳榔如何參與他們的老後生活。這些故事一方面能突顯出檳榔經濟作為老年社會安全保險的意義；另一方面，這些人們頗具開創性的生活方式和社群關係，還能讓我們在照顧、陪伴等任務從公共社會限縮到小規模的家庭的此時，突破家的既有分類，想像外在於血緣連結的奧援與可能性。

doi:10.6342/NTU202601203

我的思考是受到人類學晚近的新親屬研究啟發。這些研究分別透過東南亞、亞馬遜以及都市性少數族群的經驗材料指出，親屬在每個社會中有不同的意義，而人的親屬關係也不只由是血緣、婚姻所界定的先驗範疇，還可能是透過日常照顧、飲食／物質的分享和互惠，以及身體與情感的共感才能「成為」（become）彼此的親屬（Carsten 2003; Haraway 2008; Weston 1991）。新親屬的觀點解構了以生物性繁衍和血緣系譜為基礎的親屬概念，除了使我們得以解析並對話不同文化的親屬化（kinning）過程外，還進一步擴張了當代「家」的社會性，讓原本不屬於親屬範疇的他者——包含人與非人——可以透過日常的實踐和互為主體的交涉納入廣義的家之中。如此一來，家也不再是單純的生育、社會繁衍單位，還是人們獲得認同和存有的所在（引自黃應貴 2014）。

即便以下案例中所關注的關係形式都不是來源自漢人文化脈絡中既存的親屬化過程，當事人也未必認為這樣的關係屬於親屬範疇，但是新親屬的討論，讓我們可以檢視他們如何透過各種付出和交換擴展關係，使其晚年生活跨出血緣和婚姻的親屬界線，在原生家庭解體後重建照顧和陪伴的網絡，進而為個人的存有狀態找到可被妥善安放的位置。

（一）廟宇重組的家

即便過往以血緣、地緣為基礎的農村地方社會變得薄弱，但地方社會仍是留在村中的高齡人士聚集與照應的所在。例如介於國家行政和民間社會的社區發展協會和守望相助隊，是許多退休返鄉社群重新聚集的自願性結社團體，特別是社區發展協會運用了國家資源組成白天的照護站和銀髮樂齡課程，支援了部分家庭照護的任務，填補了國家和家庭空缺的位置。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人群集結基礎是宗教。毫無疑問地，農村缺乏青壯年的奧援，地方廟宇行政、誦經團、進香活動以及慶典的運作，主要依賴的是村莊中

doi:10.6342/NTU202601203

有時間餘裕的老年人。有時候這些地方庄頭廟的社會關係會超過宗教本身，而具有親屬的功能和意涵。

我曾經在內埔鄉的媽祖廟結識一群好客的年長者，他們年約八十，有一半都已經喪偶，小孩孫子又大多不在家，或是只有晚上才會回家，因此血緣家庭的生活大部分是一個人度過。年事已高的他們，已經沒有辦法下田工作，只能運用村莊零碎的土地種植蔬果。少了農事工作的他們，白天會相繼來到廟前的茶桌聚會，男性負責泡茶，女性則負責準備盤花（pan ˇ fa ´）等廟宇裡的例行工作，初一十五則分工籌備頌經儀式。中午時分，他們不一定會各自回家吃飯，而是準備自己種的蔬菜到小吃攤請店家代客料理，再額外請店家料理面帕粄（mien pa ban ˋ）、番豆豆腐（fan ´ teu teu fu）[72]、肉餅，大家湊一桌共同分享午餐。如此一來，他們就不需要大費周章為自己一人採購食材開伙料理。

這些年長者不僅透過廟宇聚集、陪伴，他們還會在檳榔產季化身為「老人工團」，幫農民或行口代工剪檳榔。剪檳榔是在檳榔送入分級機前需要將果實從花穗剪下的工作，雖然不需要大量的身體移動和力量來完成，但沒有發展出能替代人工的機械設施，相當適合那些沒辦法再下田工作的老年人投入。在屏東檳榔盛產時相當仰賴各地老人工的投入，技術熟練的他們能邊聊天邊處理上百斤檳榔，整段產季結束後可以獲得上萬元收入貼補生活。產季結束後，他們繼續到廟前聚集，並且將產季間賺到的錢集資組進香團到各地旅遊。也就是說，即便衰老的身體沒辦法再投入大部分的勞動市場，檳榔產業仍釋放出專屬於高齡人的勞動需求，讓他們在身體缺乏移動能力和體力的情況下獲得自主的收益。

細究這群老年人的生活軌跡會發現，廟宇的例行聚會和檳榔產季的工作，讓他們的日常相處時間遠比與血緣家人還多，所以可以透過每日的動態掌握對方的身體與情緒狀態；再加上同齡的夥伴比家中的子代更能夠同理彼此的需求和生活

[72] 六堆四縣客語中的面帕粄、番豆豆腐，分別對應華語的粄條和花生豆腐，兩者皆為南臺灣客家名菜。

doi:10.6342/NTU202601203

步調，久而久之便成為農村中密切的照護夥伴，若觀察到對方和平常生活不同的異狀，像是沒有在該出現的時間來到廟前，也能及時向家中的青壯年反映。另外，從共食與勞動共享的角度來看，他們或許也構成了一種類型的家，在當代家庭規模逐漸縮小且跨越城鄉空間的情境中，像他們這樣透過地方社會其他社群機制重組的家相當值得我們注意。

（二）隻身一人的家

媽祖廟的例子揭示了那些不以親屬為名的關係如何在人們老後扮演互助與支持的角色，填補了家庭成員的空缺。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在原生家庭逐漸萎縮解體後，照顧的網絡不一定限於夫妻和血親，還可能是其他朝夕相處的同齡夥伴。那麼，既然家的界線不限於狹義的親屬，有沒有可能涵蓋到「非人」的檳榔樹呢？

事實上，檳榔樹的生命史相當長，從進入園圃到退役大約二十年以上，經常橫跨檳榔農的大半人生，甚至是兩個世代的生命史，因此許多檳榔農自然而然會和檳榔樹產生感情。曾經有位報導人這麼描述自己母親和檳榔樹之間的關係：

> 在我們客家人文化裡面，對老人家來說，檳榔有一個很崇高、不可抹滅的地位。今天如果颱風來，整片酪梨田泡水、倒下，我媽媽看了不會心疼喔，覺得再種就好啦。但她如果看到「一棵」檳榔樹倒下，她就會覺得心痛。但我跟你說，老人家如果是看到還沒種下去的檳榔苗泡水比較不會心痛，那種種很久已經長大的檳榔樹倒下才會心痛。（20240520 田野筆記）

對於這位年邁的母親來說，檳榔樹不只是一種提供收益的生產工具，也是跟著她一起變老的夥伴。不過，我們可能會好奇，在長時間的共處與照顧之中，檳榔樹

doi:10.6342/NTU202601203

有沒有可能承載並引發類似親屬關係中的情感投射與共感，使人與植物之間形成一種超越經濟活動的互為主體性？曾教導我認識檳榔學開花的「檳榔博士」阿任（見第三章），他的生命故事彰顯出檳榔樹如何走進一個危殆的人生當中，成為隻身一人的生計依靠與存有線索，甚至是陪伴其渡過老年生涯的親屬。

進入阿任的園圃數一數檳榔樹上的「節」，可以推算最老的一群樹，大約十四歲。2010 年前後，他向好朋友那邊借來一批優異的早生檳榔種子種在祖產農地上，一人獨自照顧檳榔園，現在那些檳榔幼苗已經變成高聳漂亮的成年檳榔樹。細究他與檳榔樹之間交纏的生命史，會發現檳榔樹不僅接納了他日漸衰敗、生產力快速遞減的身體，還有那起伏跌宕的家庭與人生。即便阿任不會將檳榔樹稱作「家人」，卻是這個只剩一人、支離破碎的家得以存續並望向未來的條件。

很久以前，阿任在內埔街上擁有一棟當時少見的高級透天，和太太、五個小孩住在偌大的大宅中，家裡還有一台歐系名車代步。但後來龐大債務把豪宅和名車奪走，他和太太的關係也在龐大的壓力下生變、破裂，而小孩也紛紛因為婚姻或工作到外縣市生活，僅有小兒子因為工作不穩定，較常留宿家中。在欠下龐大債務後，阿任回到萬巒祖厝，在父親留下兩分大的田耕作，成為獨自一人的全職檳榔農，目前的生計幾乎全部靠兩分大的檳榔園。田裡的早生檳榔樹是他的生存線索，他還要透過檳榔樹的收入支付之前累積的債務，所以遲遲沒有辦妥去世父親的土地繼承，最好不要被銀行發現他手上還有土地。

那麼，這一切怎麼發生的呢？阿任年輕的時候曾經在外地工作一段時間，後來把賺來的錢投資在內埔開超商。那時候內埔連鎖超商不多，他的超商生意相當不錯，接著開了兩三家分店。後來開始有連鎖超商的競爭，腦筋靈活的他發現賭博遊戲機台雖成本高又需要躲避檢舉，但只要擺在店門口，就能把人留在商店前。那幾年光靠這些沉迷於賭博機台的人就賺取了數百萬的年收入，累積到千萬的存款後，阿任在內埔街上買了一棟房子，也進入股票市場。他以融資、融券進行交易，在內埔這樣的小型城鎮，成為了資本龐大又大膽的投資人，每天中午證券交

doi:10.6342/NTU202601203

易所會有人幫忙他準備免費午餐，招待他專心觀察個股動向。對於那段時間，阿任最津津樂道於「當日沖銷」（day trading）等短期投資賺快錢：

> 有一次，我看一支股票不斷下跌，就快要跌停了，但一般人不知道，大勢要來了。我發現那時還有人拋出、買進，所以一次買了好幾十張，後來價格開始高漲，到漲停。（20240518 田野筆記）

那一次的交易，阿任只花了 20 分鐘就賺進百萬。短線交易造就了他參與金融交易的時間感：投資的未來性常是無跡可尋的，股票交易沒有保證增加的收益，而是有輸贏的賭注。他告訴我能「贏」的關鍵，是因為有敏銳的雙眼能觀察股票市場的消長、賭對時間買入潛力股並賣出。

然而，金融市場好景不常，金融資本主義能讓他在 20 分鐘賺進百萬，也能一夕間帶走一切。在 2008 年前後的金融風暴中，他的資產蒸發三千萬，房子、車子和超商只能脫手，一切成為泡沫。更糟糕的是，當時已經有年紀的他還罹患了糖尿病，事業不容易東山再起，所以回到萬巒整理家裡的田地，以農業的收益維生。除了檳榔之外，他也想嘗試檸檬等較高收益的作物，但很快就放棄了，這是因為阿任和太太離婚、和子女分居的他只能憑靠一己之力耕作園圃，再加上糖尿病患的體力會隨著年齡衰退，阿任現在每工作 30 分鐘就需要休息一個小時，不可能從事其他需要密集投入的經濟果樹，低勞動密度的檳榔樹是他唯一可以憑藉的收益來源。前陣子，阿任還把其他塊長期承租給外人的祖產地要回，計畫多栽培一到兩百棵檳榔樹，他告訴我這麼作是為了「自保」，因為他的兒子們也紛紛陷入債務危機，檳榔樹就是他的老年保險，保障他晚年可以不受到兒子影響，持續透過低密度的工作供養自身。

在與阿任長時間相處後，我發現檳榔樹不僅接納了阿任因家庭破碎與身體疾病所帶來的低生產力，更縫合了他過往與當前的人生處境。那麼，過往在股票市

doi:10.6342/NTU202601203

場的風光經歷，和當前孑然一身的檳榔栽培有甚麼可以「縫合」之處呢？關鍵的連結就在於「時間」。前面曾提及，缺乏國家農政標準化生長時間的檳榔樹，具有各自「學開花」生命歷程，檳榔農透過長時段觀察和育種工作才能了解每一棵檳榔樹的時間性。也因為這樣，檳榔樹在檳榔農眼裡往往不是同質的作物，而是帶有歷史，甚至是性格的個體。那麼檳榔農究竟如何和這些參差多線的檳榔樹互動並理解之，則關乎於他的個人生命史。

經濟跌落谷底的阿任，想要重回金融市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但若當日不需早起割檳榔，他還是會打開手機分析當前股票市場、預測個股潛力，就好像過去的生活如常。仔細觀察阿任栽培和交易檳榔的性格，能觀察到檳榔和股票之間互為表裡的關係，對他來說也是一種對過往的反芻，這一點首先顯現在他對檳榔交易活動的投入和詮釋。

第四章曾提及，每年五月屏東檳榔會進入短暫的投機時刻，價格有機會推上全年度的最高價，也是檳榔農一整年最主要的收益來源，若能在檳榔價格高的時候，割出大小最剛好的正子就能成為賺取高昂收益。但是，甚麼時間點會開始跌價或漲價難以被預測。行口和操盤人知道檳榔農會在價格高昂時觀察價格，保留檳榔不割，等待高峰再釋出。所以操盤人可能會技術性調降價格，讓檳榔農誤以為市場流通的檳榔變多，趕緊將樹上的檳榔割下賣出，這麼作就能成功將貨逼出市場。若農民沒有仔細觀察市場動向，就容易被價格資訊牽著走，順著操盤人的意圖割檳榔。但是阿任不同，他擅長運用自己獨到的眼光觀察市場細節和蹊蹺進而做出判讀。具體的策略是到處結交農民和行口朋友，在交易當日待在行口閒聊，閒聊的同時觀察農民割出來的數量和行口出貨量。那麼要如何知道出貨量呢？他告訴我：「你去看一整個早上有多少台貨車開進行口，每一台車大約載走有多少斤檳榔，這樣你就知道了。」當他觀察到農民割出來的檳榔仍供不應求，就會保留樹上的檳榔等待時機。但若發現農民割出來的數量有增加的趨勢，即便樹上的

doi:10.6342/NTU202601203

檳榔還有增加重量的空間，還是會果斷將檳榔割下，趕緊賣出[73]，這樣的操作與過往短線股票交易的手法相當接近，所以阿任曾如同回到證券交易所的大銀幕前一般，告訴我：「賣檳榔和買賣股票用的是一樣的邏輯。」賣檳榔和賣股票都需要從交易人的動向判讀時機，看準最高點將手上所擁有的賣出，若判讀錯誤地待價而沽就可能失去時機。

若說檳榔交易可以和股票交易類比，那麼觀察個別檳榔樹學開花，就相當類似於在股票市場中觀察個股潛力；留種子育種則像是對潛力股的投資行動。在我所認識的農民中，阿任最認真觀察檳榔樹節上逐年累積的開花紀錄。透過樹節的痕跡，分析哪一棵樹有潛力成為早生檳榔樹，能夠在每年的價格高點結出豐碩的果實。每當我跟著他進入園圃時，便能感受到他氣質的轉變，他會以穩定而溫和的語氣，仔細地分析一棵棵檳榔樹的生命狀態，和可能的潛力，這是平常在他身上少見的氣質，隱含他對年輕檳榔樹懷有深厚的興趣與情感。也因為他掌握了每一棵檳榔樹的時間秩序，歷年留下的種子也相當高比例是表現優異的早生檳榔。

由於阿任長時間對檳榔樹的環顧，不僅對檳榔樹的生命歷程瞭若指掌，還能夠記得檳榔樹身體的細節，甚至是已經從樹體身上脫離、離開園圃的花穗果串外觀：有一回我隨阿任下田割檳榔，我被分配的任務是將阿任割下的果串整理到貨車上，回到家後我們從車上將成堆的檳榔一苳苳卸下，阿任任意拿起一苳檳榔，問我「你知道這是從哪一棵檳榔樹割下來的嗎？這是下去田裡斜坡旁那一棵」當時我很驚訝，這些檳榔割下來之後由我負責整理成堆、完全沒有經過阿任之手，他卻能精確判讀檳榔從來自哪一棵母樹。接著我再隨手拿起一苳，阿任瞇了眼看了兩秒自信地回答我「中間老樹。剛剛割下的時候，不小心在樹上留了一點傷口。」阿任的自信來自於他的熟悉，打從檳榔樹種下、開花到能結果這段時間，他都在各種角度仰望觀察，對外人來說長得一樣的檳榔樹其實都有一些可以辨別的差異。

[73] 這個行為稱為「割小」，指農民預期價格下降，策略性地將小顆的檳榔割下賣出。農民這麼作是認為即便秤出的總重量會較少，單價卻高，最終總價仍不錯，若產量增加批發單價下降可能損失更高。

doi:10.6342/NTU202601203

即便檳榔和股票有許多相似之處，卻有一個關鍵的差異：檳榔樹能夠給予一個能夠展望的未來、將過去與未來連結並堆積在可以憑藉的樹身證據上。一棵成熟的早生檳榔樹，不會背叛檳榔農的預期和投入，只要檳榔農持續觀察、照顧、澆灌肥料、整理園圃，隔年仍然是棵早生檳榔樹，直到它老化功成身退。但股票市場的投入，卻可能在一夕間付之一炬、把他所擁有的全部奪走，且毫無脈絡可循。正是這樣充滿波動、隨時可能背離過往經驗的金融時間，造就了阿任前半身的運氣與美好家庭生活、也打斷了他的生命節奏，形成一個毀滅式的斷點。有一次阿任將在農村的耕作生活與離開農地的都市生活做了一個深具時間哲理的比較，雖是城鄉生活的對比，卻也貼近於金融投資和檳榔栽培的生命哲學差異：

> 在都市生活大概都是問明天、頂多問這禮拜要怎麼活，要看收入。但在鄉下的種田生活，除了和朋友喝酒聊天之外，大部分的時刻我都是要展望未來，計畫這一整年每一刻要做甚麼、甚麼時候留種，必須要努力才會獲得回報。（20230825 田野筆記）

阿任的故事讓我們看見，早年金融交易所蘊含的競爭、運氣和觀察技術嵌合進他對檳榔樹的理解和相應的經濟行動。而檳榔時間韻律的觀察、調和和主動的創造，卻又帶給阿任在金融交易中頓失的、對時間的主控權。即便檳榔樹仍然具有難以預料的不確定性，卻比股票更有辦法以長期的觀察度量未來。檳榔樹的生命不僅成為他後半生重要的生計來源，更接納他進起伏的人生和破碎的家庭構成，既是對斷裂的生命經驗的修補，也是讓時間得以繼續向前推進的指引。

五、結語：檳榔園裡的人如何安老？

本章嘗試從步入老年階段的案例闡述檳榔園所交織的晚年生活，即便這些案

doi:10.6342/NTU202601203

例沒有辦法窮盡所有人的遭遇和家庭型態，卻能將屏東農村逐漸典型化的老年家庭型態放置在更大的政治經濟脈絡中，同時容納異質的生命史與情感。

本章節的各種生活圖像與願景，展現出東亞社會中相似的家庭變遷傾向，也就是與其他家族成員、子女分離的老年夫妻家戶。這樣的家庭格局首先源自城鄉發展的不均衡：在東亞工業都市化的發展歷程中，壯年子女不得不離鄉前往都市尋找工作機會，造成老年父母與子女核心家庭分隔於城鄉的現象。另外，從上述幾位報導人的經驗中，我們還能發現，這樣的家庭型態或多或少與新自由主義的體制相關。在他們的壯年階段（1990 年代到 2000 年代），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仍被視為漢人社會的理想，也被國家挪用為新自由主義化的社福政策的意識形態，用以訴諸家庭倫理、凸顯子女作為照護者的角色，實則是將照護責任轉嫁到私人家庭領域中。即便當時臺灣社會、政治與經濟環境已然改變，國家仍努力維繫傳統家庭的存續（王增勇 2014）。因此，當這個世代步入老年，他們希望降低子女在都市生活與代際再生產的壓力，進而選擇以經濟生活和居住空間的獨立來減輕子女負擔。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女性比男性更嚮往與子女保持距離的家庭型態，因為她們正是新自由主義化的照護制度犧牲者：例如本章開頭的英梅在母親生病後承擔了家長的角色，長時間在家照料家人、安排家庭內外的事務；而進入婚姻的阿嬌和秀香在夫家家庭生活中，承擔了大量隱形的照護工作，即便逐漸走向家庭外的生活，也難以卸下家庭責任，所以在她們步入老年之際更傾向創造自主營生的生活，避免造成年輕一代的負擔。

英梅、阿嬌、秀香與阿任的焦慮與對未來的願景更進一步揭示，當老年照護工作脫離子女之手後，責任最終落回伴侶與個人身上。在退休金不足甚至缺乏的情況下，他們必須延長勞動年限應付金融債務、醫療與照護的開銷。此時，低勞動成本的檳榔生計便成為一種「老年保險」，讓農戶透過低密度勞動維持基本收入。這一點在健康條件衰退的失婚者案例中特別明顯：阿任因慢性病而快速衰退的身體，使他在體力尚可時積極擴張檳榔園，以保障日後的經濟生活。而內埔媽

doi:10.6342/NTU202601203

祖廟的老年人雖然沒辦法在進入園圃耕作，仍透過剪檳榔的老人工賺取額外收入。另一方面，檳榔園圃的經濟具有高度彈性，既能改變作物安排以增加收益，也能釋放出時間和勞動力的餘裕，帶給老年農戶更多元的非農營生管道。這一點對女性來說特別重要：許多女性沒有進入勞動市場或勞動年限較短，退休後不像丈夫一樣擁有維持生活基礎需求的退休金，於是她們透過檳榔園所釋放的勞力和時間從事多元的生計，獲得經濟的自主性。這些收益可能投入晚年醫療花費，也可能挹注其餘個人的興趣上。由此可見，檳榔栽培所折射的家庭型態變遷背後，實則反映了老年社會安全不足與不均的困境。

同時，本章的案例還說明了檳榔經濟不僅帶來老年經濟的安全想像，也是農戶「安老」的依據，裡頭乘載了人生軌跡所蘊生的自我認同、情感和對未來的希望。對於阿嬌和秀香兩位女性來說，檳榔栽培為老年生活帶來自主性，因此具有從家庭，乃至於農村社會解放的意義；對於郭主任和鍾順泰來說，檳榔園則是他們安放早年記憶和自我認同的所在；阿任則是透過檳榔樹的生命交流縫合、療育了金融資本主義所造成的人生斷層。在資本主義化的現代社會中，「老年人」意旨從家庭和國家勞動力的貢獻者，轉換為生活空間受限於家庭的受照護人，這樣的轉變代表著他們就此從人生舞台退場，將自身的權力、身體的活動乃自於主體性讓渡出去。以上的故事挑戰了這樣的老年路徑，展現了多樣的安老想像。而在這些安老的想像中，檳榔是所有敘事的交點：這一個作物既使他們能在熟悉的家（鄉）安老，又讓生活與社會網絡擴展到血緣家庭之外的空間。

doi:10.6342/NTU202601203

第七章　結語：開放的多樣性

1970 年代以來，隨著臺灣稻作的衰退與工業都市化，各地小農發展出多樣且地方化的農業轉型路徑，嘗試在自由化的全球市場與本土都會的新興市場中尋覓契機。這些轉型包括投入高勞力與高技術的園藝農業（葉守禮 2021b），或是調整稻作的農法與生產規模以另闢市場（王乃雯 2023）。在這些轉型路徑之外，農民轉作檳榔的現象亦相當普遍，是許多臺灣農村重要的維生手段。即便如此，由於檳榔 1990 年代之後以流行病學問題進入國家公衛治理體系，不僅使其脫離了正規的農政體制，更在臺灣農業轉型的議題中長期缺席。

在這本論文中，我嘗試透過屏東平原的經驗，訴說不受國家農政體系眷顧的檳榔，如何在熱帶環境中開展出活潑且具韌性的農業多樣性。首先，檳榔因缺乏農業試驗機構與批發市場等標準化秩序的介入，無論是農民的田間作業、交易活動甚至是檳榔的生物性狀都相當多元；其次，當我們深入檳榔樹冠下的園圃，亦可發現這一被排除於正規農政體系之外的作物，實際上與各種主流經濟作物、非正式的作物共生栽培，從而允許靈活的生計安排，不僅調節了充滿不確定性的當代農業市場參與經驗，也支援了當代以老年夫妻為軸心的農村家庭安排。這樣的家庭安排，展現出橫跨於城鄉之間、社會關係較為鬆散的原子化傾向。換言之，低勞動與低技術密度的檳榔農業，發展出來的社會關係既異於過去因應水稻而生的宗族社會（Freedman 1958），也和果樹栽培那種高技術與資本密度所形成的工藝社會（楊弘任 2014）相當不同。

雖然，檳榔農業所呈現的社會關係，並不是我們刻板印象中一片緊密相連的農村社會。但我認為，或許對台灣農業來說，檳榔的存在正如我在第四章所提出的「江湖」隱喻：主流社會和檯面上的政治對江湖的存在視若敝屣，但若少了江湖，社會不一定能有效且安定地運作。特別是屏東客家庄，檳榔園圃經濟與其多樣性一方面讓臺灣工業化的紅利涓滴進入農村，也陪伴許多家庭農場應付農業市

doi:10.6342/NTU202601203

場轉移、氣候變遷與家庭生命史更迭等多重因素交織的未知數。然而，在我多次向報導人表達自己對多樣性的欣賞時，不少人卻給了我不同的看法。其中最常見的，是向我表達從農是「選擇有限之下的不得不」。這樣的觀點提醒我所關注和追求的多樣性，並不一定是當事人所期待的。因此，在這本論文的最後，我嘗試叩問，檳榔的多樣性對於我的報導人，甚至臺灣農業實況究竟有甚麼意義？

例如，第六章提到的英梅大弟阿堂，長年苦於多種作物的栽培，不斷向我抱怨農民遭受壓榨的可憐處境，他認為不管是檳榔還是可可的定價，都還是受制於中間商或加工業者。即便現在從事可可栽培的農民逐漸掌握加工、販售的自主性，增加勞務負擔的同時，競爭力仍不敵外國進口的廉價可可豆。畢竟，對大多數消費者來說，價格遠比產地風土重要。因此，滿園盛產的可可樹，在他所見是過載的勞務負擔，不是豐滿的收益；而對我來說複層的檳榔園圃，對他來說則代表著加倍的勞動。他希望農民的命運可以在他這個世代終結，所以鼓勵小孩從事科技業和公務職業，同時積極尋求農地重劃的機會，因為「**重劃過的農地更方正，以後小孩要賣，價格更好**」。

阿堂的心情，準確地呼應了近年來東南亞與臺灣農民研究的批判：過往農業研究時常塑造出田園牧歌式的小農想像，亦即透過日常農業實作與土地維持和諧關係，並以此對抗資本主義的擴張。然而，將農民化身為土地守護者的小農敘事，時常壓抑了農民進入工業化和商業化經濟的慾望，在特定脈絡中——就如同阿堂的期待——農地轉移他用甚至失去農地，都被視為機會，而非威脅（蔡侑霖 2017）。

另外一個報導人永光，更是積極地找尋農村商品化的契機。打從政府開始推動社區營造的時代就投入許多熱忱，進入社區發展協會擔任總幹事、推動農村再生。不過當他發現社區營造淪為地方政治頭人資源分配的平台，就離開了一陣子。這幾年社區營造的政策熱潮被「地方創生」取代，他又重回公共領域，與外部團隊合作寫計畫案，這些中央級別的計畫讓他可以跳過複雜的地方生態，以企業行銷的方式將農村的歷史故事和生活包裝成小旅行、手冊與市集，嘗試把來自高雄

doi:10.6342/NTU202601203

都會區，以及那些快速通過平原、直達墾丁的過路客攔截下來。他認為國家發展長期著重北部，造成屏東幾乎沒有甚麼發展的機會，只剩附加價值低落的農業，而地方創生為農村引入了企業化的品牌經營模式，為蕭條的農村帶來新的希望。「地方創生為村子帶來一線生機，年輕人也可以回來，大家不要只是種檳榔。」他這麼說。

阿堂和永光，共同點出全球分工下，臺灣產業與大型發展計畫布局的區域失衡，如何限縮屏東農村的選擇。對他們來說，無論是藉由農地重劃將檳榔園轉換成更有市場價值的方正農地，又或者是投入地方創生販賣地方感，都是希望能在資本快速流動且資源分配不均勻的結構中把握一些商品化的契機與可能性。回過頭觀察檳榔園圃的多樣性，其實亦具現了這樣的處境：當農民沒有辦法分享到區域發展的果實，就盡可能壓榨家庭農場的勞動力、運用檳榔樹下肥沃的熱帶空間，開創出多元的生計，並且在市場變動時快速替換作物。換言之，複層多樣的檳榔地景，是區域發展失衡、農業市場的不確定與屏東熱帶環境共同交織出來的抉擇，而這也是農業部門推動廢園轉作政策所未能注意到的事實。就如同阿堂所說：「如果農地種別的、做別的很好，屏東縣一棵檳榔樹都看不到了。」

那麼，身受資本市場與大型開發計畫所眷顧的農地空間，命運又是如何呢？我和永光提及，自己的家鄉位於新竹竹北，也有社區夥伴申請類似的地方創生計畫，只是目的不太一樣，是要復興農業活動。永光訝異「新竹怎麼也需要地方創生？」他認為新竹受惠於科技產業，錢財流動熱絡，科技移民又多，不怕年輕人沒工作或做生意沒客源。然而，新竹的經驗對照，恰好說明了北台灣土地高度商品化的困境，同時也凸顯了屏東檳榔農業的多樣性，究竟有甚麼值得珍視的意義？

近幾年，新竹的郊區農村發展出相當活絡的新農運動，參與的行動者匯集了從事友善耕作的農友，以及近二十年來投入土地徵收抗爭運動的本地農戶，甚至是跟隨半導體產業移住新竹的新居民。這些社區農業的公共參與背景，是 1990 年代以降因應新竹科學園區而起的土地開發熱潮。在農業發展條例與區域計畫法

doi:10.6342/NTU202601203

的解套，以及區段徵收的法制化之下，農地得以變更使用項目，並以相當驚人的速度轉變成炙手可熱的金融商品，接著在都市計畫中逐步消失（莊雅仲 2019）。

當前在新竹城鄉邊界所剩不多的農地上活絡的新農運動，可以看做早年臺灣反農地徵收運動的延續，雖然參與的行動者、結盟其中的價值觀與利益關係越來越複雜，但同樣都是對抗土地的全面商品化、守護農業空間的價值與必要性。那麼，人們究竟要守護甚麼樣的東西？若臺灣破碎化的農業生產已在全球市場中失去競爭力，為何有人想要謹守農地呢？蔡侑霖（2017）在新竹園區三期徵收案的觀察，幫我們解答了土地開發最切身的本地「小農」在思考甚麼。

蔡侑霖觀察到，農地的運用遠比想像的多元。許多農戶在投入代工業或自身住房需求增加時，就會挑戰農地農用的制度，將一部分農地挪作他用，逃離國家土地制度的監控。除了將農地挪作他用，破碎化的農地還扮演了社會安全瓣的角色：在非農收入下降、科學園區勞動關係日益派遣化且不穩定的情況下，家戶中的中老年成員傾向保留農地，維持自食其力的可能。透過農地的生產能力與物質交換，家戶得以補貼收入，同時也將農地視為支撐下一代就業與居住的保險。相反的，若農地以區段徵收形式開發，許多地主擔憂捲進金融化遊戲的風險之中，因為農地替換成高價值建地的承諾，很有可能因為計畫投標廠商的財務困難而讓他們一輩子的投入血本無歸；即便成功換回土地也可能因面積過小難以運用，最終在開發商的壓力之下被迫出售。換言之，那些抵抗農地徵收的農民，不見得是對抗資本主義擴張的小農，但也不是價而沽的理性經濟人，更貼近的理解是，他們如同屏東的農民一般，在其所處的結構位置與有限的選擇之中，透過農地多樣化運用的潛在能力，為自身與後代在無常的當代情境中，保留最後的保障。

回到屏東的檳榔園圃，或許比起將檳榔園打造成多元生計的空間，許多農戶更渴望著大型開發計畫的奇蹟降落與土地的增值。然而在發展的夢想兌現之前，檳榔園已在無形中成為他們面對新自由主義風險的重要支持。例如，真正壓垮阿堂與英梅家庭的，是為了母親疾病在台北與高雄之間奔波所累積的醫療費用，以

doi:10.6342/NTU202601203

及負擔醫藥費的小弟因產業外移東南亞而突然中斷的貿易商收入。利用檳榔的林蔭栽培可可樹，雖然增加了他們的勞務負擔，卻是他們償還債務最終手段。這樣的故事並非特例，許多栽培新興作物的青壯年，同樣因為都市長照的負擔和工作的變動，選擇回鄉改造檳榔園內的生計手段。另外，從前幾章的故事我們也可以發現，隨著年紀增長和身體狀況的衰退，檳榔園圃允許了極低的勞動力投入，拉長了許多人的工作壽命與維生管道，確保跨世代經濟的安定。

即便屏東與新竹的產業地景相當不同，但看似命運殊途的農地同樣允諾了人們在產業位移、金融風險與都市照護等多重壓力中的一些轉圜的可能性。這樣的可能性從何而來？關鍵就在於多樣性：即便臺灣農地尺度相當狹小破碎，但是農戶總在大社會變遷之際，運用手頭上僅有的資本挑戰國家對農地的安排與制度，創意地改造農地的用途獲得新的生計機會。無論是在熱帶的環境中增加物種的多樣性、或是在全球供應鏈的外緣興建小型代工廠，都展現了農地的多樣化潛力與其在地性。

那麼，除了擴展農地生計的多樣性，檳榔究竟有甚麼特別之處？給予我們甚麼啟發？在這本論文中，檳榔延展了多樣性的意涵：在現代性的農業體制難以介入之處，檳榔允許了更加開放的關係，讓異質得以自由地聚合，包含基因與生理時間分歧的個體、不同的作物照顧型態、多尺度的共生物種，甚至是不同的經濟規模。有一名資深盤商在 2025 年「檳榔健康危害防制法草案」制定的消息沸沸揚揚時接受我的採訪，他告訴我，由於國家鮮少將注意力放在規模過小的檳榔攤，讓許多二度就業人士與單親女性能經由極小的資本門檻進入行業，他們的生意規模雖不如跨縣市的連鎖店，卻能以沒有稅籍身分的狀態在都會的街角、城鎮的騎樓與村落的貨櫃屋獲得維生的縫隙。「再怎麼困難的人，都有辦法生存」他這麼說。

當然，多樣性不見得為所有人帶來好事。對有些人（如第三章的企業家老劉）來說，多樣性難以被規模化，不容易累積資產；又如檳榔農藥施灑的爭議所揭示

doi:10.6342/NTU202601203

的：多樣性會溢出實作的邊界、造成意料之外的風險。但是，在各種現代性創制計畫的美好願景難以實現的時候，檳榔樹敞開它的樹蔭，分享陽光和雨水，讓聚居其樹冠下的生命暫時免於危險的暴露。

檳榔樹的韌性，與它對異質的開放，不禁讓我聯想起它遠在印度尼西亞西的棕櫚科親戚：西米棕櫚（sago palm）。人類學家 Sophie Chao（2022）指出，西米棕櫚提供了巴布亞（Papua Barat）原住民 Marind 人澱粉的營養和濕潤（wetness）的生命力。人類透過日常的交涉、身體的親近、食物生產的勞動，與西米棕櫚形成汗水、樹汁與泥土的共享。這些流體形式的共享，讓人與樹跨越皮膚的界線，也跨越了物種的界線，成為彼此的森林親屬（forest kin）。

即便社會文化脈絡相當不同，但 Marind 族人與西米棕櫚樹的互動，亦有些類似於屏東農戶與檳榔樹的互動：例如，西米棕櫚樹林如同檳榔園，是一個平靜、涼爽的空間，不僅是 Marind 人們集體勞動、休憩和交流故事的所在，更接納人們暫時躲避警察、政府官員與企業監視。另外，就如同屏東的檳榔農依循著檳榔樹「學開花」步調的主動性，給予植物有限的照護，Marind 人也尊重植物個別的野性和自由，給予西米棕櫚克制的照顧（restrained care）。

對比於生長在開放的森林中的西米棕櫚，另外一個跟隨農業發展計畫引入的棕櫚科植物「油棕」，則被 Marind 人視為侵入其生活世界的加害者，無法納入其跨物種親屬之中。因為單一化栽培的油棕拒絕與其它物種共同生長，亦拒絕與其它生命交換養分，而是吸乾了土地與河流的所有水分，導致原本濕潤的森林變得枯萎。

事實上，大部分的棕櫚科植物，都生長在南北迴歸線之間的熱帶空間，與其重疊的是深受殖民主義與全球化政治經濟剝削的全球南方。就好似一枚雙面透鏡，棕櫚科植物折射出全球南方的絕望與希望。一方面，某一群棕櫚科如油棕，能適應不同的生長條件，因此可輕易地移植、複製到不同的地方，拒絕別的物種的共生和互惠，成為大型農業跨國企業掠奪土地、榨取資源的跨物種軍隊。但也有一

doi:10.6342/NTU202601203

些棕櫚科植物如檳榔，還有西米棕櫚，發揮了棕櫚科植物潛在的開放性和交換的慾望，為不同生命提供生存所需養分，亦提供人們得以休息、沉思與躲藏的空間。陽光穿透棕櫚科羽狀的葉子，在其下形成斑駁的光影縫隙，這些縫隙同時也是敘事的裂口：訴說著樹冠之下活潑的生命群落，如何透過互惠性的結盟，回應全球政治經濟力量與環境變遷交錯的脆弱性。

doi:10.6342/NTU202601203

參考資料

《臺灣農產運銷發展史》編輯委員會

2016　臺灣農產運銷發展史。臺北市：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

不明人撰

1952　〈嚼檳榔老少皆歡喜　暴風後欣度小陽春〉。《聯合報》11 月 24 日：第四版。

不明人撰

1970　〈隨地吐檳榔　罰金六十元〉。《聯合報》11 月 5 日：第六版。

王乃雯

2023　《「永續」？「發展」？農法變革中的論述與實作：以玉里稻作為主的分析》。國立臺灣大學博士論文。

王文昕

2017　《日治時期台灣媒體中的營養知識——以蛋白質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碩士論文。

王永慶

1995　〈台灣文化的死角——從嚼檳榔聯想台灣的文化發展〉。《長庚醫訊》16(6)：3–5。

1997　〈實事求是解決當前三大社會問題〉。《聯合報》6 月 11 日：第 17 版。

王翔峙

2001　《檳榔的組織培養》。國立臺灣大學碩士論文。

doi:10.6342/NTU202601203

王增勇

2014 〈福利造家？國家對家庭照顧實踐的規訓〉。刊於《21 世紀的家：臺灣的家何去何從？》。黃應貴編，頁 33–65。台北：群學。

王德男、劉碧鵑

2005 〈台灣熱帶果樹之育種成果〉。刊於《台灣熱帶果樹產業發展研討會專刊》。王德男、劉碧鵑編。台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石桂鳳

2019 《農業特別收入基金 109 年度預算評估報告》。立法院預算案評估報告。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998 〈「檳榔問題管理方案」實地查證報告〉。八七管查字第 08 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2008 《檳榔產業專案種植登記作業要點》。「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index.do，農糧字第 0971030209 號，2008 年 3 月 12 日上線。

行政院衛生署

1998 《檳榔管理方案執行情形》。入藏登錄號 028000004029A，典藏號 028-010300-0111。「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https://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Archive。

何凡（夏承楹）

1954 〈嚼檳榔〉。《聯合報》3 月 16 日：第 6 版。

1981 〈知識青年嚼檳榔〉。《聯合報》11 月 12 日：第 8 版。

doi:10.6342/NTU202601203

何佩儒

1996 〈向檳榔宣戰！南海基金會拍攝公益廣告導正紅唇族〉。《聯合報》12 月 1 日：第 12 版。

何欣潔

2016 〈蓮舫的身世裏，藏着台日香蕉的百年歷史〉。「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20160922-taiwan-banana/ ，2016 年 9 月 22 日上線。

余韋蓁、蔡惠琦等

2020 《我國農畜產品產業概況、生產結構、運銷通路及交易制度之研究》。公平交易委員會發展研究報告。

余雪蘭

2016 〈檳榔產業沒落，業者發起組黨〉。《自由時報》，https://www.ltn.com.tw/，2016 年 4 月 21 日上線。

呂紹理

2021 〈帝國的溫室：產業、營養、認同與殖民時期的蔬菜園藝〉。《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2(2)：138–144。

李文良

2019 《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1680–1790）》。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李俊宏

1997 《東港溪流域水文特性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doi:10.6342/NTU202601203

李維修

2014 〈增產的困惑──內海忠司的新竹州「產業五年計畫」〉。《竹塹文獻》58。

沈佳姍

2011 〈戰前臺灣黑齒習俗流變初探〉。《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10)：67–94。

房慧真

2018 〈六輕污染無定論的「科學煙霧彈」〉。「報導者」，https://www.twreporter.org/a/fpc-sixth-naphtha-cracker-academy-industry，2018 年 1 月 25 日上線。

林子凱、謝丞傑、林彥蓉

2024 〈穩定性狀　育種家善用遺傳寶庫——雜交育種簡介（二）：遠緣育種與雜交優勢〉。《豐年雜誌》74(10)：90–95。

林庄

1955 〈檳榔攤上〉。《聯合報》4 月 14 日：第 6 版。

林育建

2007 《族群、產業與社會資本：以屏東檳榔業「行口」為例》。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

林畊螗

2019 《蔬菜的價格與交易規則：臺北市第一果菜批發市場拍賣與行口交易制度中的社會關係、網絡與鑲嵌》。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

doi:10.6342/NTU202601203

林美珠

2015 《日治時期新竹州人口外移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

林富士

2023 《紅唇與黑齒：縱觀檳榔文化史》。臺北市：三民書局。

冷函君、蘇淑娟

2010 〈台灣沿山地區檳榔業的生產空間與社會：以嘉義縣中埔鄉為例〉。《地理研究》(52)：65–94。

姜貞吟

2020 《女歸成神：性別與宗族／親、族群之間的多重交織》。桃園市：中大出版中心。

施添福

2001 〈國家與地域社會──以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為例〉。刊於《平埔族群與臺灣歷史文化論文集》。詹素娟、潘英海編，頁 33–122。台北：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

柯立祥

2020 〈在香蕉研究所的 15 年黃金歲月〉。刊於《財團法人台灣香蕉研究所 50 周年紀念特刊》。邱祝櫻編。

柯志明

2006 《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臺北市：群學。

doi:10.6342/NTU202601203

柯志明、翁仕杰

1993 〈台灣農民的分類與分化〉。《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2：107–150。

胡台麗

1986 〈臺灣農村小型工業發展的特質及其經濟文化基礎〉。刊於《臺灣社會與文化變遷》。瞿海源、章英華編，頁 209-232。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馬道容

1997 〈連戰一陣罵！檳榔要課稅了〉。《聯合報》4 月 10 日：第 3 版。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2025 〈檳榔病蟲害防治用藥摘要表〉。

張朝欣

2015 〈六輕員工　抽菸抽到被解僱〉。「中時新聞網」，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105000475-260102?chdtv，2015 年 11 月 5 日上線。

張蕙珍、莊雅婷等

2014 〈麥寮地區居民健康促進實施經驗分享——菸酒檳榔使用者容易輕忽健康行為〉。《台塑企業》45(4)：15–20。

莊英章

1972 〈臺灣農村家族對現代化的適應：一個田野調查實例的分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4：85-98。

doi:10.6342/NTU202601203

莊雅仲

2019 〈新疆界：科學城的誕生與重組〉。刊於《政治的消融與萌生：新自由主義國家的治理效應》。黃應貴、林開世編，頁 191–235。台北：群學。

許文富

1997 《農產運銷學》。臺北市：正中。

陳正維

2014 《台灣檳榔的文化符碼及其政治運用》。靜宜大學碩士論文。

陳佩周

1994 〈不禁止、不鼓勵、不輔導：檳榔是台灣數一數二的重要作物，但它又有不衛生、不健康等負面因素，使得政府對它只有擺出「三不」政策〉。《聯合報》12 月 4 日：第 34 版。

陳昱安

2017 〈臺灣水稻田轉作政策之思維演變〉。《農政與農情》301：66–72。

陳柏文

2021 〈為國民健康和國土保育　政府助檳榔農轉型——檳榔廢園及轉作輔導計畫與成果〉。《豐年雜誌》71(2)：60–66。

陳秋坤

2004 〈清代地權分配與客家產權：以屏東平原為例，1700–1900〉。《歷史人類學學刊》2(2)：1–26。

陳麗華

doi:10.6342/NTU202601203

2010 〈客家人的宗族建構與歷史記憶塑造：以臺灣六堆地區為例〉。《臺灣史研究》17(4)：1–31。

陳曦

1990 〈也是檳榔次文化！？〉。《聯合報》7 月 23 日：第 15 版。

曾淑敏、廖安定

2009 〈輔導檳榔廢園相關措施之政策評估分析〉。《農政與農情》208：57-62。

焦鈞

2024 〈農產品的價格如何形成？從產地、批發市場到通路的價格大揭密〉。《豐年雜誌》74(1)：10–15。

童元昭

2001 〈「農村」社會分化初探：以屏東長青村為例〉。《考古人類學刊》57：89–113。

黃士玨

2021 《檸檬的社會生命史：從屏北到跨國的農作、風土品牌與飲食消費》。國立臺灣大學碩士論文。

黃世澤

2011 〈環保團體怕什麼，接受檢驗為何如此心虛？〉。「苦勞網」，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58872，2011 年 3 月 31 日上線。

doi:10.6342/NTU202601203

黃正華

1985 〈果樹產期調節之現況與未來〉。刊於《果樹產期調節》。梁鶚編，頁 4–5。台北市：財團法人豐年社附設出版社。

黃阿賢、徐信次

1999 〈柑橘類產業概要〉。刊於《調查台灣常綠果樹生產、流通、加工及輸出入》。科學農業社編。臺北市：科學農業社。

黃新川

2001 〈臺蕉產業面臨的問題及建議〉。《豐年》51(16)：6–9。

黃新川、蘇鴻基等

2002 《臺灣香蕉產銷改進研究報告》。中正基金會專題研究報告 4。

黃應貴

2014 〈導論〉。刊於《21 世紀的家：台灣的家何去何從？》。黃應貴編。新北市：群學。

楊弘任

2014 《社區如何動起來？：黑珍珠之鄉的派系、在地師傅與社區總體營造》。台北：群學。

楊汝椿

1998 〈檳榔「襲擊」台塑〉。《聯合報》7 月 6 日：第 7 版。

楚三戶

1954 〈也談「嚼檳榔」〉。《聯合報》3 月 20 日：第 6 版。

doi:10.6342/NTU202601203

溫啟邦

2013 〈台灣石化業的美麗與哀愁：流傳於台灣石化業負面形象的背景及對台塑之建言〉。《台塑企業》42(2)：11–18。

葉守禮

2021a 《世界經濟與山城農業：長時段中的台灣小農經濟》。東海大學博士論文。

2021b 〈地方後勤網絡：山城多樣化園藝農業的社會基礎與交換網絡〉。《臺灣鄉村研究》16：87–133。

葉淑貞

2001 〈日治時代臺灣的地租水準〉。《臺灣史研究》8(2)：97–143。

葛應欽

2001 〈嚼食檳榔文化源流〉。刊於《檳榔的健康危害》。韓良俊編，頁39–45。台北：健康文化。

農業部

2025 〈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第二條、第十二條之一修正總說明〉。「農業部法規查詢系統」，https://law.moa.gov.tw/index.aspx，2025 年 5 月 16 日上線。

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2023 〈檳榔田間有害生物綜合管理技術〉。

熊中果

1991 《臺灣農產品產銷及農業發展文集》。

doi:10.6342/NTU202601203

監察院

2021 〈調查報告〉。「監察院監察成果查詢」，https://www.cy.gov.tw/cl.aspx?n=132，2021 年 12 月 1 日上線。

慕南橋

1954 〈檳榔雜話〉。《聯合報》3 月 26 日：第 6 版。

蔡晏霖

2025 〈〔回應文一〕想像不一樣的多物種歷史、政治與關係〉。《成大歷史學報》69：325-335。

蔡培慧

2009 《農業結構轉型下的農民分化（1980–2005）》。國立臺灣大學碩士論文。

蔣宜婷

2018 〈小蝦米對大鯨魚，他們挺身控告六輕〉。「報導者」，https://www.twreporter.org/a/fpc-sixth-naphtha-cracker-yunlin-taixi，2018 年 1 月 25 日上線。

衛生福利部

2022 〈衛生福利部檳榔危害防制公聽會會議紀錄〉。「衛生福利部」，https://www.mohw.gov.tw/cp-101-69708-1.html，2022 年 7 月 7 日上線。

2024 《中華民國 111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

doi:10.6342/NTU202601203

鄧澄欣

2020 〈投入香蕉品種改良 12 年的回顧〉。刊於《財團法人台灣香蕉研究所 50 周年紀念特刊》。邱祝櫻編，頁 55-58。

鄭力軒

2014 《重修屏東縣志：產業形態與經濟生活》。屏東縣：屏東縣政府。

鄭陸霖

2020 〈道德經濟在消費社會中還有機會嗎？一個實質與形式分析雙軌並進的理論重構〉。《臺灣社會學刊》54。

鄭傑憶

2019 〈自成秩序的檳榔江湖之 3：價格越管越亂〉。「上下游」，https://www.newsmarket.com.tw/areca-betel-nut/part2-03/，2019 年 7 月 8 日上線。

盧敬文

2016 〈許厝分校的前世今生〉。「報導者」，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school-relocation-history，2016 年 8 月 30 日上線。

2022 〈醫療、身體與污染感知：從流病研究到免費健檢〉。刊於《福利之鄉・煙囪之城：麥寮與六輕的矛盾共生》。陳瑞樺編。新北市：群學。

薛玲

1991 〈臺灣地區檳榔產銷問題之研究〉。《農業金融論叢》25：131–192。

doi:10.6342/NTU202601203

韓良俊

2001 〈檳榔之危害——另類物質濫用〉。刊於《檳榔的健康危害》。韓良俊編。台北市：健康文化。

顏碧吟

2003 《由農業資材行的運作看栽培技術的發展與擴散——以屏東平原蓮霧產業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魏錫鈴

1989 〈檳榔年產值高過稻米，農政單位不應「三不管」〉。《經濟日報》12 月 26 日：第 11 版。

Akrofi, Andrews Yaw, et al.

2015 Black pod disease on cacao (Theobroma cacao L.) in Ghana: Spread of Phytophthora megakarya and role of economic plants in the disease epidemiology. *Crop Protection* 72: 66–75.

Antony, Robert J.

2016 *Unruly People: Crime, Community, and State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Appadurai, Arjun, ed.

1986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stor, Theodore C.

2004 *Tsukiji: The Fish Market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oi:10.6342/NTU202601203

Brunner, Bernd

2022[2021] 《馴果記：從諸神的花園、人間的天堂、大眾的果物到現代超市蔬果區——果園改造土地、誘發哲思、觸動感官的千萬年故事》（Taming Fruit: How Orchards Have Transformed the Land, Offered Sanctuary, and Inspired Creativity）。林潔盈譯。台北市：臉譜出版。

Callon, Michel

1998 Introduction: The embeddedness of economic markets in economics. In *The Laws of the Markets*. M. Callon, e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Carsten, Janet

2003 *After Kin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o, Sophie

2022 *In the Shadow of the Palms: More-Than-Human Becomings in West Papu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Cohen, Myron L.

2016[1976] 《孔邁隆教授美濃與客家研究論集（上）——家的分與合：臺灣漢人的家庭制度》（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黃宣衛、劉容貴譯。高雄市：高雄市史博館。

DuBois, Marc

1991 The Governance of the Third World: A Foucauldian Perspective on Power Relations in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16(1): 1–30.

doi:10.6342/NTU202601203

Fitzgerald, Deborah Kay

2003 *Every Farm a Factory: The Industrial Ideal in American Agri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oster, Robert J.

1992 Take Care of Public Telephones: Moral Education and Nation-State Formation in Papua New Guinea. *Public Culture* 4(2): 31–45.

Foucault, Michel

2022[1976] 《性史：第一卷　知識的意志》（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 La volonté de savoir）。林志明譯。台北市：時報文化。

Freedman, Maurice

1958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Oxford: Berg.

Glover, Ian C.

1986 *Archaeology in Eastern Timor*. Canberra: Department of Prehistory,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Gregory, C. A.

1982 *Gifts and Commodities*. London: Academic Press.

Gupta, Akhil

1998 *Postcolonial Developments: Agriculture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Haraway, Donna J.

2008 *When Species Mee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oi:10.6342/NTU202601203

Hetherington, Kregg

2020 *The Government of Beans: Regulating Life in the Age of Monocrop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Jordan, David K.（焦大衛）

2012[1972] 《神・鬼・祖先：一個台灣鄉村的民間信仰》（*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The Folk Religion in a Taiwanese Village*）。丁仁傑譯。新北市：聯經。

Ka, Chih-Ming, and Mark Selden

1986 Original accumulation, equity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The cases of socialist China and capitalist Taiwan. *World Development* 14(10): 1293–1310.

Kirksey, Eben, and Sophie Chao

2022 Introduction: Who benefits from multispecies justice? In *The Promise of Multispecies Justice*. E. Kirksey, S. Chao, and K. Bolender, eds. Pp. 1–22.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Kloppenburg, Jack Ralph

2004 *First the Se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nt Biotechnology, 1492–2000*.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Ko, Y. C., et al.

1992 Prevalence of betel quid chewing habit in Taiwan and related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Journal of Oral Pathology & Medicine* 21(6): 261–264.

doi:10.6342/NTU202601203

Li, Tania Murray

2005 Beyond “the State” and failed schem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7(3): 383–394.

Mauss, Marcel

2016[1925] *The Gift: Expanded Edition*. J. I. Guyer, trans. Chicago: HAU Books.

Musto, David F.

1999 *The American Disease: Origins of Narcotic Contro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redes, Alyssa

2020 *Plantation Peripheries: The Multiple Makings of Asia’s Banana Republic*.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latz, Anemone

2011 Living apart together: Anticipated home, 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old age. In *Home and Family in Japan: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R. Ronald and A. Alexy, eds. Pp. 254–269. London: Routledge.

Polanyi, Karl

2020[1944] 《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黃樹民譯。臺北市：春山出版。

Schneider, Eric C.

2008 *Smack: Heroin and the American Cit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doi:10.6342/NTU202601203

Scott, James C.

1976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2009] 《不受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的歷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李宗義譯。臺北市：五南。

2023[1998] 《國家的視角：改善人類處境的計畫為何失敗》（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梁晨譯。臺北: 麥田。

Sharp, Timothy

2012 *Following Buai: The Highlands Betel Nut Trade, Papua New Guinea*.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16 Trade's value: Relational transactions in the Papua New Guinea betel nut trade. *Oceania* 86(1): 75–91.

Singer, M.

2011 Down Cancer Alley: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Suffering in Louisiana's Chemical Corridor.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25(2): 141–163.

Tsai, Yen-Ling

2019 Farming odd kin in patchy Anthropocenes. *Current Anthropology* 60(S20): S342–S353.

doi:10.6342/NTU202601203

Tsing, Anna Lowenhaupt

2012 On nonscalability: The living world is not amenable to precision-nested scales. *Common Knowledge* 18(3): 505–524.

2024[2015] 《在世界盡頭遇到松茸：論資本主義廢墟中生命的可能性》（*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林浩立譯。新北市：左岸文化。

Tsing, Anna Lowenhaupt, et al.

2024 *Field Guide to the Patchy Anthropocene: The New Natu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sing, Anna Lowenhaupt, Andrew S. Mathews, and Nils Bubandt

2019 Patchy Anthropocene: Landscape structure, multispecies history, and the retooling of anthrop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supplement 20. *Current Anthropology* 60(S20): S186–S197.

Weheliye, Alexander G.

2014 *Habeas Viscus: Racializing Assemblages, Biopolitics, and Black Feminist Theories of the Hum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Weiner, Annette B.

1992 *Inalienable Possessions: The Paradox of Keeping-While Giv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eston, Kath

1991 *Families We Choose: Lesbians, Gays, Kinship*.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oi:10.6342/NTU202601203

Wolf, Margery

1972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Yoshiyuki, Koseki

2006 Taiwan's banana-producing regions and the Japanese market. *Geographical Review of Japan* 79(5)：216–236.

Zinkgraf, Matthew, Suzanne Gerttula, and Andrew Groover

2017 Transcript profiling of a novel plant meristem, the monocot cambium: Monocot cambium. *Journal of Integrative Plant Biology* 59.

doi:10.6342/NTU202601203